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 29

2019 年秋季号

总第 29 期

---

#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

---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 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沈洪成

主 编：刘竹香

副 主 编：吴晓璐 孙婷

编 辑：汝艺 吴娟 薛孟春 周小晴 杨静静

李硕人 胡麟 王岚茜 白静艳

投稿 E-mail: sociology\_hhu@163.com

刊 号：校 028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微信公众账号

## 目 录

### 暑期调查

- 制造“贫困”：一个非贫困村庄的“贫困”再造..... 白 杨（01）
- 小农户如何与市场衔接？——一个黎族村庄的生计方式..... 刘青青（11）
- 乡村污染工业的绿色转型——以 S 村为例..... 马超群（27）
- 四素人生：哈尼梯田的生态与危机——以元阳县多依树哈尼梯田为例..... 郑玉婷（36）

### 教育问题

- 结构洞察中的职业学校女孩..... 王毅杰 薄小奇 宋 姣（49）
- 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和随迁子女教育期望..... 王毅杰 黄是知（63）

### 社区研究

- 基于产权与场域关系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钱志远 孙其昂（78）
- 拆迁安置、财产分配与血缘关系走向的实证研究——以 TX 社区为例..... 秦祥瑞 沈 毅（89）

### 环境治理

- 理想类型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治理经验：相关文献的综述与引申..... 王 昭（99）
- 黑臭河道何以履治难清——以南京市 J 河为例..... 黄燕莹（108）

## 信访与网络

|                        |           |
|------------------------|-----------|
| 历史遗留型信访的发生机制与治理困境..... | 胡子瑜 (116) |
| 网络自拍：自我认同的符号化幻想.....   | 田晓娟 (126) |

## 理论精读

|                           |           |
|---------------------------|-----------|
| 科学世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探究：关系与方法..... | 马超群 (133) |
| 舒茨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意义.....        | 刘青青 (136) |
| 社会权力控制的极致——疯癫与他的自我审判..... | 孙 婷 (143) |

## 硕士毕业论文信息

|                              |       |
|------------------------------|-------|
| 2019 届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信息统计表.....  | (150) |
| 2019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论文信息统计表..... | (152) |

## 新闻快讯

|                                                              |       |
|--------------------------------------------------------------|-------|
| “第二届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国际水电移民对话高端论坛和国际移民网络 2019 年会”在河海大学举行 ..... | (48)  |
| “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机遇、挑战、路径”学术会议圆满举行.....                            | (61)  |
| 施国庆教授讲座：全球视野的河海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回顾、现状和展望.....                       | (98)  |
| 河海、东大、南航三校社会学论坛顺利举行 .....                                    | (112) |
| 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胡亮副教授参加第七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 .....                   | (142) |
| 河海社会学经典读书会第三、四期顺利举行.....                                     | (146) |



# 暑期调查

暑期调查实践为社会学专业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扎根田野、方法提升和视野拓展的宝贵机会。在 2019 年的暑期调查实践中，社会学专业 2018 级硕士研究生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进入田野调查地点，独立对社区治理、产业发展、教育实践等热点问题进行调研，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最终形成暑期调查报告。在综合社会学系老师的意见的基础上，编辑部内部成员再次进行遴选，本期推选出以下 4 篇优秀调查报告，希望与读者进行交流。

## 制造“贫困”：一个非贫困村庄的“贫困”再造

白 杨

### 一、导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但贫困和社会发展好像又存在一定的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在于缓解甚至消除贫困问题，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发展的过程中注定存在着区域间不平衡不平等的发展，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都可能会被放大，产生马太效应，发展迅速的地方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愈来愈好，而条件差的地区的发展则相对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党和政府始终把贫困问题看作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头等大事，将扶贫工作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扶贫道路是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大部分国内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扶贫道路是中央主导下，保护贫困户合法权益，消除贫困负担，具有自身社会主义特色、与时俱进、独一无二的道路。中国依靠其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已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创造着自己的中国奇迹。

在扶贫过程中，民族地区一直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地区贫困人口呈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复杂、扶贫难度大、脱贫不彻底、返贫比率高、贫困代际传递明显等多维特征，并具有长期性，表现为家庭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且日常基本物质生活需求无法满足，导致其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并因能力缺失造成恶性贫困状态。中国民族地区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灾害频发、生态脆弱、资源开发难度大等特征导致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条件艰苦、致贫因素复杂，扶贫脱贫工作面临严峻形势。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成为新时期扶贫工作主战场；尤其民族八省区贫困县占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的 48.5%。

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资源丰富地区存在高度重叠性。其一，据统计分析，2016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4335 万，其中民族八省区占 1/3 左右。其二，民族地区土壤资源丰富，目前已在湖北恩施州、青海平安、湖南桃源、甘肃兰州、贵州开阳、广西永福和新疆天山北坡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等多民族聚集地区发现富硒土壤。其三，民族地区大多地处中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独特，拥有丰富生物资源。

为何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会发生严重的贫困问题？是人力资本缺失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亦或其

他因素？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笔者在 H 省 B 民族自治县进行了 7 天的实地调研，期间对 4 个行政部门进行了访谈，且在 K 村进行了 3 天的田野调查，入户走访了 14 户农户，探究在物产丰富的地区贫困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 二、调查地点基本概括

B 民族自治县地处山区，基础条件十分薄弱，整体发展受到了制约，2002 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县里的大部分公共设施的建设主要依靠国家的转移支付。B 民族自治县位于 H 省南部内陆，五指山南麓，北纬  $18^{\circ}34' \sim 18^{\circ}53'$ ，东经  $109^{\circ}21' \sim 109^{\circ}48'$ ，县境东西宽 49 公里，南北长 54 公里，总面积 1160.6 平方公里，占 H 省陆地总面积的 3.42%，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由中山、低山、高丘、地球、台地和河谷阶地等组成，其中中山有 476.1 平方公里，低山 166 平方公里，高丘 59 平方公里，低丘 94 平方公里，河谷阶地 116 平方公里。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13 座。B 县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热量丰富，雨量充沛，蒸发量大，疾风变化明显等特点。全年日照约 1900~2000 小时，日照百分率达 45%。年平均气温  $20.7^{\circ}\text{C} \sim 24.5^{\circ}\text{C}$  之间。年平均降雨量 1900 毫米。灾害性天气主要是台风、冬春干旱、冬季低温霜冻、暴雨洪涝及山风。

B 县资源丰富。流经县境的主要河流有通什河、陵水河、藤桥东河和宁远河等。这些河流支流众多，水源充足，流苏急，落差大。其流源总长 269.19 公里，总落差 4467.8 米，水能蕴藏量 12.76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 3.5 万千瓦，已开发利用 0.86 千瓦，占可供开发利用的 24.6%。土壤分为 4 个土类，8 个亚类，140 个土种。土类主要是山地黄壤、山地赤红壤、砖红壤和水稻土等 4 种。森林资源丰富，有天然林 345598 亩，主要分布在 M 乡的南部和北部，X 乡的西部南部，B 乡卑不和 N 乡等地，树种繁多，计有 800 多种乔木。全县林木总储积量为 209.3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45.9%。珍贵木材有母生，子京、坡垒、油楠、青梅、陆均松、黄花梨等。野生动物有猕猴、马鹿、黑熊、蟒蛇、野猪、狐狸、穿山甲、金钱龟等。药用植物约有 148 种。主要有沉香、降香、巴戟、杜仲、砂仁、益智、槟榔等。土特产有红白藤、木棉花、山竹、红藤子等。地下矿藏有金、铜、铁、水晶和大理石，主要集中在 M 乡。除此之外，B 县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截至 2017 年，B 县户籍人口 16.78 万人，其中黎族人口 10.4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16%，分布在全县各乡镇；苗族人口 0.75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4.47%，主要分布在 BZ、XZ、XS、SD 等乡镇；其他民族人口 4755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83%，主要分布在县各国营农场。201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382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92 元。

## 三、B 县贫困成因的不同视角

关于贫困的成因，不同的理论流派有着不同的解释，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流派。第一种流派认为是穷人的特定属性导致了他们的贫困，有的研究指出懒惰、缺乏道德操守、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等个人因素导致了贫穷，这样的一种观点把贫穷归结于个体的失败。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困的困境产生贫困的文化，陷入贫困文化的群体则无法摆脱贫困，但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是贫困文化也一直存在争论。文化多元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存在的必要，都是当地人长时间和当地环境互相适应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处理不当便会将各种不符合现代主流价值观的文化都视为贫困文化，用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片面观点去解释贫困。第三种观点认为贫困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的问题，这里的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指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上观点都只是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贫困的成因，但若只是用单一的视角去看待贫困成



因往往只是片面的，各个视角综合起来才能窥探到贫困的真正起因。

### （一）懒与贫困

B 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在县里的不同部门进行访谈时，他们对于贫困发生的原因似乎都有着统一的口径，那就是“懒”。在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眼里，懒和贫困似乎永远联系在一起，懒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

“老百姓以前都不搞农业生产，应该说 60 年代以前都不搞农业生产很少。因为满山也都是他的粮山。有一条树皮衣穿一辈子。我们这里平均气温 20 多度，冬天最冷的时候冷的时候有十多度，也是一两天，一般都是 20 多度，夏天的时候我们 30 度左右还一条树皮衣，就一辈子穿两河里面山上河里都是他的粮山，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每天走亲访友。在路上的时候捡了一些小小动物鱼和虾鱼野菜，就到朋友家就喝酒，就爱喝酒唱歌。”

来自与 B 县政协副主席的访谈

懒并不是个人的原因，可以说是 B 县富足的自然环境的造就了贫困户的“懒”。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主要目标：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但在 B 县的农民，再贫穷，也不存在吃穿问题，野果遍山，有劳动能力的人即使每天都不劳动，在饿的时候去山上摘一些野果，去河里摸一些鱼就能解决温饱问题。这里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非雨季。一年平均温度 20.7~24.5℃，冬季温暖如春，夏无酷暑，住在这里的先民一辈子只需要一件树皮衣，穿同样不存在问题。

正是在这样富足的环境下，农民生存不存在问题，也就没有了太强的致富动机，造就了他们的懒。除了懒之外，还有一点被也被诟病，那就是饮酒，饮酒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由于村子里大多是黎族，他们热情好客，爱饮酒。县城里的干部告诉我村子里的一些人可以从早喝到晚，整天喝的醉醺醺的，就没有办法干工了，这也是导致贫穷的一个原因。

### （二）未婚致贫

未婚致贫是这边村庄的一个独特现象，在当地民宗局访谈的时候，当地的局长告诉我们，致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结婚。B 县农村不同于中国大部分乡村，这里的男性很少外出打工，他们更多的把打工看作一种经历而不是挣钱的手段，一般的男性在辍学或者毕业后都会前往县城或者别的省份打工一段时间，快到结婚的时候都会返回家里务工，然后在农村长期定居下来。但女性不同于男性，女性在外打工后一般都会选择外嫁，长期下来就使得村里光棍越来越多，这些光棍由于没有妻子和孩子，就更加缺少了脱贫致富的动力，而没有选择外嫁的女性一般也不会选择这样的男性结婚，就造成了越单身越穷，越穷越单身的恶性循环。

“我们经常下村的他们都说你不要扶贫，你帮我脱单都差不多了，脱单可能很快就脱贫，有家庭因素，有责任，小孩他会逼着你干嘛。有的二十七八，四十岁的也有，再不找以后肯定找不到了。”

来自与 B 县民宗局局长的访谈

### （三）因学致贫

因学致贫也是这里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过这里面也有因学致贫和借机享受扶贫政策的现象。前几十年因学致贫现象普遍存在，当时村庄的基础条件设施相比现在更为薄弱，农副产品并不能全部拉到市场上售卖，农副产品和市场匹配的程度也不如现在。农户手里一般并无太多存款，在上学还需要交学费的

情况下，学费对当时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虽然当时的大部分村民都保证了吃穿不愁的基本生存需求外，像教育医疗这些对于个人未来发展的需求还并不能得到满足。其他大部分地区并无太大区别，因学致贫是当时造成贫困的风场重要的原因。

现在也存在一些因学致贫的现象，一方面是平时孩子的开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因照顾孩子而损耗的劳动力。如果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学，特别是近些年施行了撤点并校之后，接送孩子就成为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家里就得有人专门负责接送孩子。但农村家庭的收入大部分都来自土地上的农作物，从事农活在农忙的时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根本无暇去照顾孩子。例如笔者在 TQ 村调查时发现，当地以种植黄秋葵为主，但摘黄秋葵却很消耗时间，一般从早上的六点直接到中午的十二点，中间简单休息过后又要摘到晚上。有些家庭因为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学，就不得不通过私人关系将土地流转出去，不选择种植农作物，而是去打零工，将时间放在照顾孩子上。

在扶贫政策的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钻空子的现象，因学致贫就是一个很大的空子，就有不少村民接着因学致贫的幌子去钻这个空子。笔者在 HK 村调研的时候，当地的驻村干部告诉我，村里的贫困户基本都是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学的，但这些家庭可能本身并不存在贫困问题。

“大部分都是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学的才会去申请这个贫困户，你想想，一个孩子一年就能补四五千，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就一万块了，你家要是孩子你不去申请吗？大家都想申请这个，除去真正贫困的，但这个很少，基本都是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学的才会去申请这个。” 来自与 HK 二村驻村干部访谈

#### （四）因病致贫

医疗作为两不愁三保障里面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扶贫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在 HK 村调研的时候就碰到过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有个农户八年前劳动过程中不小心损伤了眼睛，但当时家里条件一般，当时看病的报销比例也不如现在，看病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结果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来再去治疗的时候为时已晚。现在双目接近失明，家里仅有妻子一个健康劳动力，还有一个老人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照顾。家里虽然还有 10 亩左右的橡胶林，但根本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可用，橡胶也好几年都没有去割了，因病致残，因残缺少劳动力，是致贫的一个典型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入户的时候接触到的，该农户患有高血压，在没有精准扶贫的医疗保障之前，全家挣的钱几乎都给自己看病买药了。后来医疗有了保障之后，去了市里的一些大医院进行了治疗，症状比原来缓解了很多，而且几乎不花钱。她告诉笔者 2018 年的时候自己去市里的医院看病一共花了 6750 元，但自己仅付了 27.5 元钱，而且疗效要比自己在乡镇里面的卫生所要好很多。

#### （五）因房致贫

其实房子并不是一个致贫的因素，但扶贫过程中为贫困户提供的危房改造改善了他们的住房环境。2012 年之前，大部分农村都住的很破的砖瓦房，甚至部分地区还住的茅草屋。2012 年开始了村庄整治，在这个过程中家里有条件的都换上了钢筋混凝土的房子，2017 年开始的危房改造更是加大了补贴力度，基本所有的农户都在这两次惠民政策中重新修盖了房子，现在住房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在 TQ 村调研的过程中，TQ 村的驻村干部也告诉我们，住房问题是村子里最大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解决了，村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我在村里待了这么久，发现他们吃穿都不愁，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以前住的房子一下雨就



漏雨。我最早来这个村子的时候，那时候村民们都还住的茅草屋，虽然吃穿不愁，那房子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行啊，现在把住房的问题解决了，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来自与 TQ 村驻村干部访谈

因懒致贫、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因房致贫，都只是外部的人去观察村庄过程中看到的不同视角，并不能完整地囊括贫困的全方面相。简单的从这几个方面就去解释致贫的原因，并不能让我们详细的去理解贫困问题的来龙去脉，因为这几个视角都是从截面来看待贫困问题的产生，要想真正理解贫困是如何产生的，就要从其他的维度去展开。

#### 四、市场波动下的贫困

##### （一）市场与小农

要在市场经济下理解贫困问题，市场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因素。B 县处于生态保护核心区，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当地农民的大部分在家务农，也有小部分农民在县城或是周边城市务工，但数量不多，主要收入还是来源于土地。但农产品受市场波动极大，农民作为分散的小户，在市场面前极为脆弱。

拿槟榔产业来说，槟榔是 B 县的主要产业之一。过去几年国内的槟榔市场异常火爆，均价都在 10 元每斤左右，一个农户一上午就可以在自己家的林地中采摘一百多斤槟榔，一天就能收入一两千元。但由于这两年网上开始有流传槟榔致癌的说法，对槟榔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槟榔价格暴跌，由原来的 10 元每斤降到了现在的 3 元每斤。舆论对槟榔产业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收购商有借此压低收购价格以赚取更多利润的嫌疑，毕竟 10 元到 3 元的价格相差梯度太大。

B 县没有槟榔加工厂，只是产青果，加上农产品必须当季销售不能存储的特性，只能向外地的收购商出售未加工的产品。农户处于市场上劣势的一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很少有机会能和收购方讨价还价。且当前国内的槟榔行业也是这几年才兴起，槟榔市场也并不太成熟，在这样一个不成熟且波动较大的市场面前，种植槟榔的农户利益很难被保证。

除了槟榔之外，其他的农作物市场价格也不太稳定，每年波动较大，例如辣椒，价钱好的时候也有 10 块钱一斤，价格不好的时候只有 2 到 3 块，其他一些瓜菜在价格不好的时候甚至有几毛钱一斤的情况。不稳定的市场更是加大了作为散户的小农致贫的概率。

##### （二）市场与乡镇扶贫政策

在不稳定的市场面前，不只是农户，甚至乡镇政府的扶贫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在县里的一些部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乡镇政府的扶贫政策是如何受到市场影响的。

“15 年以前我们部门也单独运作过扶贫项目，就在我们负责的乡镇，但是上面的检查太频繁了，而且农副产品这种东西，又不好应对检查。农副产品做下去不一定短期之内就能看到效益，而且受市场影响比较大。比如我今年养了牛，可能过了两三年后上面的人都会来检查，牛呢？牛去哪了？如果我们今年让养了猪，非洲猪瘟来了，猪都死了，那怎么办，我们做的就全变成 0 了？现在农副产品这一块乡镇都不想去搞，不确定性太大，上面还老是检查，乡镇现在是钱好要不好花，少花少错，多花多错，不花还不行。所以现在大家都去搞什么光伏扶贫啊，这个东西好弄，好应付上面检查，钱投出去了就是资产了，你上面什么时候来检查这东西都在，但是效益也就那样。” 来自与县民宗局局长访谈

市场的不确定性加上政府的短视行为和繁琐的监管让相关部门很少在农户最重要的农业中去进行帮扶和兜底，在缺少了政府这样一层缓冲带后，农户暴露在风险面前的几率增加了许多。如果收成不好，加上家庭发生什么变故，很容易返贫。

但并不是所有的乡镇都不重视农业，有些乡镇发展的还是比较好。例如在 LG 乡，当地政府与福建的老板合作种植百香果，在地方成立合作社，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社”模式，解决了产品销路问题，且价格有保证。XS 镇也存在这种模式，成立了黄秋葵合作社，也是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每年以一个稳定不变的价格对黄秋葵进行收购，农户种植的热情很高，农户与市场进行了稳定的衔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问题。

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过程中，特别是以农产品为主的贫困地区，只有解决了其与市场的衔接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在分析 B 县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将市场因素纳入其中，就能发现 B 县的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懒、上学、贫困及住房等片面因素，处于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也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的信息都来自于和县里各个部门负责人和驻村干部的访谈过程中，但对于贫困村的真实情况并没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无论是上级部门扣的因懒致贫的帽子，还是以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处于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始终都是以一个外部的视角去看待贫困问题，真正想要了解贫困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还是要以一个内部的视角，从村庄内部的角度去看贫困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 **五、为何致贫？一个村庄内部的视角**

### **（一）HK 村概况及生计模式**

为了更加了解贫困是如何产生的，加深对贫困地区的认识，笔者在当地的深度贫困村 HK 村做了两天的田野调查。HK 村位于 B 县西北部，SJ 镇东南部，距离 B 县约 20 公里，面积 19.34 平方公里，下辖 9 个村民小组，273 户 1226 人。劳动力 775 人，其中外出务工 289 人。全村耕地 1580.5 亩，人均 1.28 亩，林地面积 2253.29 亩，以种植橡胶、槟榔等传统产业为主，退耕还林 125.6 亩。2018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25.0585 万元。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647 元，增长 13.6%。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槟榔、冬季瓜菜、外出务工。

HK 村 2017 年底被确定为 B 县两个深度贫困村之一，2018 年整村出列。目前全村建档立卡 130 户 564 人，其中，2014-2015 年脱贫 21 户 99 人，2016 年脱贫 28 户 126 人，2017 年脱贫 47 户 211 人。截至目前已脱贫 129 户 563 人，未脱贫 1 户 1 人，贫困发生率为 0.08%。

HK 村及其下辖 9 个自然村全部为黎族，村里已普及普通话，黎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村里大多数中老年人都会掌握部分黎语。9 个自然村中主要以陈、胡、黄、吉等大姓为主，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大姓。同姓之间不会选择通婚，一方面是村子比较封闭，同姓之间基本都有血缘关系，同姓结婚有悖于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是近亲结婚会对胎儿产生不利的影响。

村民绝大多数以务工为主，农闲时间为 7 月到 10 月，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季节属于雨季，不方便干工，另一方面是这个时间段田地里以种植水稻为主，水稻方便管理，不需要太大的劳动力。在水稻收成后，就开始整理土地种植冬季瓜菜，一般在 9-11 月。冬季瓜菜以豆角、辣椒、黄秋葵等为主，管理得当的话可以一直收成到来年 6 月份，然后再开始修整土地，种植水稻，循环往复。农户家里大多都种有橡胶树，村民一般会在 4-10 月份选择割胶。但近些年来橡胶价格不太好，只有 10 元每公斤，政府为贫困户免费购买了橡胶保险，每公斤能够得到 5 元的补贴，但村中的贫困户割胶的热情还是不太高。

9 个自然村的人文环境有所不同，和地理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主要还是“水”造成的差异。村中主要的河流为足下河，TQ 村和 ZD 村离河流很近，在早期时可以靠河水进行灌溉，且在河水水量不

足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打井，用地下水进行灌溉。其他的村庄大部分靠打井进行灌溉，个别村庄，例如 HK 一村和 HK 二村，在早期有时打井都未必有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天吃饭。当前 HK 村中进行的如火如荼的黄秋葵产业，TQ 村几乎家家都在种，但 HK 一村和 HK 二村仅有两三户选择种植，原因就在于黄秋葵喜水，村里缺水的情况限制了其产业的发展。

除了灌溉用水之外，土地的连片程度也对田地的收成起着一定的影响，土地连片程度越低，越需要在不同田地之间来回周折，单位劳动时间内的产出就越低。TQ 村，农户的土地大部分都连片，ZX 二村、ZX 三村等村是土改前后形成的自然村，因部分历史原因，土地连片程度不高，务农时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总的来说，HK 村内部的几个自然村之间也存在着差异，环境的差异也塑造了人的差异。资源富足的村子例如 TQ 和 ZD 饮酒的行为相对于其他村落就较多，相对于其他的村子的人来说就“懒”一些，HK 一村、二村的人就相对“勤劳”一些，外出务工的比较多。

## （二）HK 村民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

从微观的角度去观察农民的日常生活就能发现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及其生活智慧。下面我将通过几天在村里访谈了解到的一些故事和观察到的情况去阐述 HK 村村民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

当地村民大多数以生存理性为主导，这和村庄的历史有一定关系。以血缘为主的封闭宗族村主要依靠村民（亲戚）间的互帮互助，很难自发产生以货币为媒介的理性交换。B 县的政协主席就是黎族，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以前上学的时候，家里养过一些鸡，父母有时候就让我去市场上卖鸡，我就很不好意思，也很不愿意。我就把鸡放在路边，买鸡的人就会把鸡拿走，把钱放在鸡笼里。我走的时候甚至把鸡笼都扔了，不想让村里的人知道我是出去卖鸡了。”

来自与 B 县政协主席访谈

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宗族村中，村民之间以互帮互助为主，对货币主导市场行为很是陌生，甚至排斥反感。市场行中的个体是理性的，交易过程是公平的，但市场行为的逻辑是和其生存的逻辑是相悖的。村民在生活中的互动可能某一次看起来是一方占便宜或者吃亏了，但长期下来还是平衡的。

HK 村民对钱的概念和似乎不像所谓的“现代人”那样敏感，从我碰到的很多事例都可以看出。第一个是我在入户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在 B 县旅游公司打工的青年，28 岁左右，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已经 6 个月没有发工资了，现在不得已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在和其访谈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因为公司欠薪的那种愤怒和无奈，而是异常淡然，表示没有发工资就没有发，那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有工作干就只能先回家了。第二个是入户时访谈到的一个村民，其对“借钱”的理解让我很是诧异。

“您家里当初危房改造的时候自己出了多少钱？”

“三万多吧，好像是这么多。”

“当时钱都是自己出的吗，有没有从周围的人借钱什么的？”

“没有借过钱。”

“您不是说您当时家里挣的很多钱都用来给自己看病了吗，没有什么存款，哪来的钱盖房子？”

“当初盖房子的时候姐妹们给我一些，就每家都给点。”

“这不是借钱吗？”

“不是吧，姐妹们给的，有钱就还给她们，实在没钱的话也没有办法，大家之间总有相互帮忙的时候。”

来自 TQ 村与 HXJ 村民的访谈

第三个例子是在 B 县文旅局和负责文化扶贫的一些部门领导访谈时他们提到的关于如何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去克服懒惰，赚钱的方法。

“现在村里的产业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但是公司不直接给农户钱，是通过合作社把钱分给农户。合作社也并不是直接将售卖农产品的钱直接打给农户，而是把村民集结到村委会，用现金的方式给农户发钱，钱都是一摞一摞的，对村民直观刺激更大。有的村民就觉得别人家领了多少钱，我家才领了多少，回去就会好好种植，这样就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了。”

来自与 B 县文旅局部门领导访谈

当地文旅局的所谓激发村民内生动力的做法，堆积起来的钱对村民来说更具有符号上的价值而非实际的使用价值。激发的也并非真正想要去致富的内生动力，而是他们想要证明的某种能力或是刚刚萌芽的攀比心理。

当地村民生存理性还体现在对土地的利用上。这里的农户一般在 7-10 月会把家里的土地全部种上水稻，而不是再选择其他经济作物。我也产生过疑惑，种上其他经济作物不是比种水稻更赚钱吗？我还因此问过他们：

“田地里为啥 7-10 月一直要种水稻？种水稻又不赚钱，种上其他的东西不更好吗？”

“我们自己得吃啊，不种水稻吃啥？”

“吃的话，也吃不了那么多吧，五亩地都种上水稻，能吃得完吗？”

“吃是肯定吃不完的，所以你看我家煮饭每次都煮好多，基本都吃不完，都会剩下的，剩下的就拿去喂猪。”

“那为什么不种其他东西，卖了钱买大米吃？”

“大米太贵了啊，这边都是自己种水稻吃，哪有买大米吃的。”

来自与 TQ 村村民访谈

就拿我入户的这家农户来说，每年都要种 5 亩水稻，这里水稻亩产大米能有 800 斤左右，4000 斤水稻对于一家来说绰绰有余，除了自己吃之外，还会选择酿酒，最后多余的才会选择卖掉。但还是很难想象一个拿大米去喂猪的地方居然是贫困村。

种植水稻除了农民那种对粮食的特殊情感，还因为当地人对土地利用的地方知识。在 ZX 三村访谈的时候，村长告诉我种完冬季瓜菜的田地必须种一下水稻，这样可以杀死土地中的一些害虫什么的，这样才能保证来年再种冬季瓜菜收益更好，如果不种水稻，接着种瓜菜，瓜菜就会很容易得病，产量也不高。

村中的村民并不是全部都是生存理性占主导，生活条件好一些的有很强的经济理性。就像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农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程度上和资本家没有什么区别，生存理性也会逐渐转化为资本家的经济理性，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刺激，便会点石成金。田野期间我遇到一户村里的致富能手，家中有一辆皮卡车，除了自家原来住的房子之外，后院里还在盖楼房，条件算是 TQ 村中比较好的。他平时除了种瓜菜，还会去割胶，虽然大部分贫困户都不会去选择割胶，但他还是会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还有一户是他的隔壁，有比较好的经济头脑，之前靠着一部皮卡车去市场中贩卖海鱼，目前家里也正在盖三层楼房，房子预计一共要花 50-60 万，这对于一般的“贫困户”来说应该是一笔天文数字。同

时我还询问了他们对于贫困户的看法，他们几乎很少提到“懒”这个词，提到最多的是思想观念方面，要想让所谓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转变思想观念很重要。

从三天内在村里观察到的很多现象来看，当地的大多数村民还是以生存理性占主导，这也是他们“致贫”的主要原因。经济理性占主导的村民都不是贫困户，他们会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辛苦劳作，而不是像一般的“贫困户”一样享受有酒有肉的安逸生活。

### （三）村里人的安土重迁

田野期间，我发现当地村民对土地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并没有像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而被冲淡。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中国大部分农村都存在着空心化的现象，原因在于新一代的农民工不再满足于将生存局限在养育了他们几代人的土地，而是将希望和未来寄托给大城市。HK 村的村民也都会出去打工，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打工者，外出打工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经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他们最终都会返乡务农，打工只是一种经历，土地才是他们的归宿。

但男女之间的差别特别大，女性外出务工后一般都会嫁到外地，男性则回流农村，这也是为什么村里单身现象越来越严重。这里不存在空心化的问题，但光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之前我考虑过是不是和这里的土地传承制度有关系，土地只传男不传女，后来发现并不是，女儿同样可以继承土地。因此这里有很多入赘现象，家里女儿多的，就会招上门女婿作为劳动力，继续耕种家里的土地。

### （四）村里县里，两个世界

HK 村村民不愿意迁移或许和当地高额的房价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人在区域间的迁移都是逐级向上的，村里的人喜欢去县里买房子，县里的人喜欢去市里买房子。但 B 县的房子均价都在两万左右，高额的房价阻止了村民向县里流动。之前 B 县房地产行业过热，很多外地人都来 B 县买房子，房价越炒越高，现在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只有拥有 B 县户籍的人才能在 B 县买房子，但 B 县的房价仍是高居不下，保持在两万左右。

除了房价之外，B 县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匹配高额的房价。期间我曾询问过很多农户家里有在 B 县打工的情况，B 县的人均工资只有 2000 左右，难以支撑高额的房价，甚至还不如在家务农的收入高。

期间我也问过一些村民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县里安家，他们表示县里的房价太贵了，一般不会选择去县里买房子。不去县里，也不去其他地区，回流农村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最好的选择。可以说是高额的房价和低额的薪资阻碍了 HK 村村民向 B 县流动的欲望，在县里买 30 平米的价钱在村里就可以盖一个三层小楼。当失去了迁移流动的动力，村里的环境又十分安逸，村民们普遍不太勤快，而重在享受生活就可以解释的通了。

### （五）一定程度的瞒报收入

HK 村对于村外的人提防还是很高的，关于村内农户到底每年纯收入为多少，作为一个外来人很难摸清楚。期间我询问了 TQ 村的驻村干部，他很明确的告诉我，村民告诉你关于收入的情况都是不真实的。

“他们告诉你收入都多少？关于收入的你都不要相信，全是假的，他们没有一户愿意给你说真的。CB 告诉你收入多少？5 万？卖辣椒都不止这个价钱噢，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告诉我都赚了多少钱，但我在这里待了三年，他们每户每年收入多少我都清楚，因为我都知道瓜菜都卖什么价钱，他们

骗不了我的。他们的扶贫手册，收入情况也都是我填的，但是我一般不会把他们每年的真实收入都填进去，因为农产品嘛，价格你也知道，不稳定的，有时候赚的很多，有时候就不多，我们填的时候也会衡量一下，万一到时候出什么错，上面调查下来，我们也很麻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村里面的所有的人基本早就脱贫了，他们之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住房，这个我有给你说过，只看纯收入是绝对高于贫困县标准。”

来自于 TQ 驻村干部的访谈

驻村干部作为国家政权派驻乡村的一股力量，有点类似于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中提到的丈量土地的书手，但区别在于他不是内生于当地的，而是行政力量派出的，但也慢慢融入到了当地的文化网络之中。驻村干部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一方面要完成国家指派的行政任务，一方面又要结合当地农民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瞒报收入，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

从 HK 村三天的调研来看，以一个村内的视角来看的话。HK 村也绝非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贫困村。这里的村民吃穿不愁，历史文化及一些客观条件让其并没有选择与现代化随波逐流，而是仅仅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如果非要定义其为贫穷的话，那贫穷的原因就是其没有在现代化浪潮中追求自身的发展，而是用生存理性在村中每日喝酒吃肉知足常乐的过日子。

## 六、结语

本文基于在 B 县 10 天的调研，旨在探讨为什么资源富足，不存在吃穿的问题的民族地区为什么会发生贫困问题。大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维度上去解释“贫困”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或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政治上来说，行政部门或是官方利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将“懒”与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贫困归结于个人因素，为发生贫困问题的发生提供了正当的解释，也为扶贫行为提供一定的合法性。经济上来说，以务农为主的散户小农收入受市场波动较大，且受农产品特性的影响在交易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没有政府保障兜底的情况下，收入难以保障。文化方面，以 HK 村的内部视角来看，封闭的宗族村并不利于商品经济及相关意识的发展，生存理性为主导的生活生产方式，成本过高的迁移壁垒及安土重迁的情节让其并没有踏上现代化的跑步机，而是选择了安逸、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生存有余而发展不足，被贴上了“贫困”的标签，“贫困”得以被制造。

除了上述观察到的情况，B 县及 HK 村的贫困现象或许有其他政治方面的因素。HK 村被扣上贫困村的帽子也有政治运作的嫌疑，例如 2017 年底年被评为两个深度贫困村之一，2018 年就能整体出列，脱贫速度之快。其次，从宏观一点的角度来说，B 县作为生态核心保护区，处处是生态红线，土地财政不可取，当地政府汲取资源能力有限，拿上贫困县的称号可以从中央和省里拿到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和配套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原因，但不再本次调研报告讨论范围之内。

☆ 作者简介：白 杨，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薛孟春

# 小农户如何与市场衔接？

## ——一个黎族村庄的生计方式

刘青青

### 一、引言

“天然大温室”、“插根筷子能发芽”、“一口槟榔大于天”是形容海南农业的常用词汇。海南省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气候温宜，土壤肥沃，是全国最大的“热带宝地”。同时，海南省也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划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对望，东南和南部在南海与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为邻，地理位置独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省四大战略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无论是出于政治考虑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海南省被国家赋予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

B县位于海南省南部内陆五指山南麓，是海南省“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市县。黎族、苗族为世居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2.16%，分布在各乡镇。L村是B县的一个黎族聚居村，2017年底被确定为深度贫困村，也是中国最南边的少数民族贫困县，2018年整村出列，然而在当地却流传这样一句话“两季稻谷饱肚皮，一季瓜菜换酒钱。”按照贫困程度不同，贫困可分为生存性贫困和发展性贫困。生存性贫困是指个人或者家庭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无法得到有效和持续地满足，属于极端贫困或者绝对贫困。发展性贫困则是一种相对贫困，一般指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但缺乏自我发展以彻底摆脱贫困的知识、技能和机会。很显然，能吃饱喝足的L村并非属于生存性贫困，而是发展性贫困。相对应地，通过产业扶贫，将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打开农产品销路，提升村民劳动积极性，成为L村脱贫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对于遭受外部市场冲击的传统热带经济作物，全村已完成橡胶保险投保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反季节瓜菜种植，全村投入130万元进一步实施黄秋葵种植项目，同时，确定了以黄牛和黑山羊为主的养殖产业。这些举措已成为L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那么，作为“特定资源禀赋下以家庭为单位、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农业微观主体”（张红宇，2017），小农户如何谋生计？在种种产业扶持下，小农如何与市场衔接？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 二、研究方法

定性的实地研究包括多种研究范式，本研究选用个案研究的范式。具体的资料搜集方法包括文献法、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

#### （一）文献法

文献资料的搜集包括三个方面：地方史志资料、以地方政府官网为主的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和学术



文献。对 B 县和 L 村区域性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自然地理等历史背景的理解，主要通过研读地方史志资料获得。对于 L 村的扶贫政策和做法的了解主要通过各级政府的官网。而关于小农户如何与市场衔接的议题则通过搜集和阅读相关学术文献，将现有学术研究与本研究所获得田野资料做对比等途径加深理解。

## （二）观察法

观察法贯穿实地调查的始终，通过运用自身感官和辅助工具，对研究对象直接观察，从而获取研究资料。一方面，观察法可以对 L 村村民的生存状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得到的信息可以对访谈资料进行证实和证伪。

## （三）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是本次调研获取研究资料的最主要方法。首先，通过对 B 县政府扶贫办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从宏观上把握 B 县脱贫攻坚的整体状况；其次，与 L 村所在的 X 镇政府主要领导开展座谈会，了解 X 镇在脱贫攻坚中的主要措施；最后，笔者进入 L 村，与村两委干部进行简短的交流后，分别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人口、家庭、生计和社会关系等状况深入摸底。

此外，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注意搜集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文字资料。包括 L 村委会的会议记录、工作日志、和公告栏上所有的宣传资料，第一驻村书记的工作心得总结，以及村民 CW 的账本。通过这一系列文字资料，可以帮助笔者了解村民的生计方式，展现小农户与市场衔接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和存在的问题。

# 三、L 村：不愁吃穿的“深度贫困村”

初到 L 村，一幅欢快的生态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村主干道路两边长满了橡胶、槟榔和马蹄树等绿色植被，山鸡在树下自由觅食，一只五脚猪低着头匆匆出没林间。路面硬化已较为完善，汽车驶向 L 村委会，一路通畅。这番村容村貌让人很难理解，这竟然是贫困村。

## （一）L 村的自然生态环境

L 村位于北纬 18° 以南，是海南省南部中部生态核心区，面积 19.34 平方公里，为丘陵山区，地势开阔平缓；处于热带季风气候区，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为 20.7~24.5℃；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在 1575.1~2324.7 毫米之间，降雨较集中，雨季正常年份从 4 月中、下旬开始，10 月中旬结束；旱季一般从 11 月份开始至次年 4 月下旬结束。负氧离子浓度在每立方厘米 8200 个以上，“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爽而不燥、润而不潮”。

L 村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丰富。热带农作物主要有橡胶和槟榔，粮食作物主要是稻谷，经济作物以冬季瓜菜为主，包括黄秋葵、豆角和辣椒等。橡胶和槟榔是借助农垦的技术力量发展起来的，成为全村种植面积最大的产业，村民集中在每年 4 月至 12 月割胶。槟榔的花果期为 9 月至来年 1 月，其中 10 月和 11 月槟榔果较为集中，也是农民的集中采摘期。在 L 村，稻可三熟，菜满四季，然而当地农户对缺粮始终心怀恐惧，“我们村就怕没米吃啊，买的米贵，就怕断粮，反正米是不能缺的。”（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水稻一般在 7 月份种植，10 月份收割，之后平整土地，便迎来了冬季瓜的种植，主要在于 11 月、12 月和 1 月栽种。近年来，黄秋葵是 L 村村民热衷种植的作物，一年种两次，第一次是 9 月育苗，从十月到来年一月份，第二次是砍掉之前已经停止生长的黄秋葵，重新种上新苗，从

二月份到五月，如果管理得好，甚至可以摘到六月份。在长期的种植经验积累下，农民发现，黄秋葵和稻谷交替轮作，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如图 1 所示，9 月入秋，雨季之后至来年 1 月，L 村农民农活最为繁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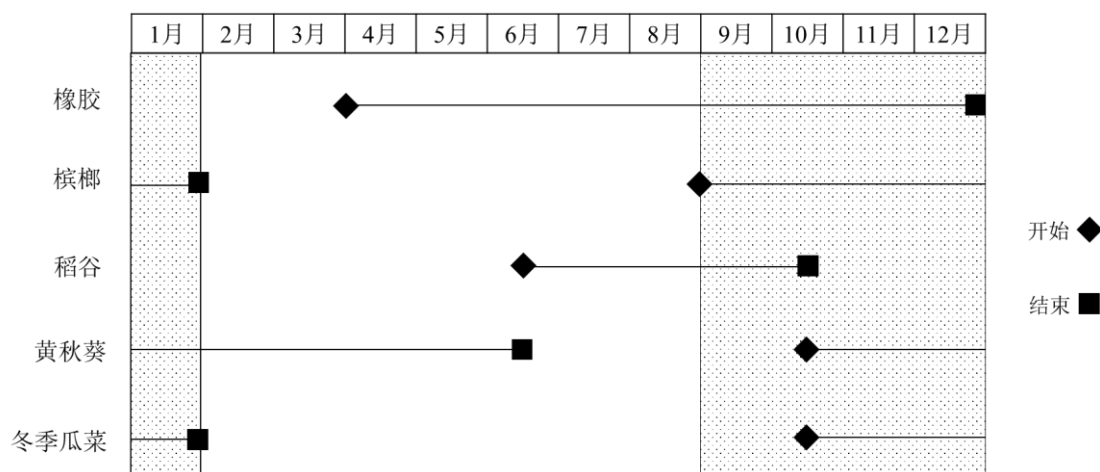


图 1 L 村农作物季节历

## (二) L 村的社会人文概况

L 村委会下辖 9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298 户 1227 人，劳动力 774 人（外出务工 210 人）。L 村现有耕地面积 1580.5 亩，其中水田 1085.7 亩，旱田 494.8 亩，林地面积 2253.29 亩；人均水田 0.88 亩，人均旱地 0.4 亩，人均林地 1.84 亩。2018 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25.0585 万元，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647 元，增长 13.6%。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槟榔、冬季瓜菜和外出务工。

从县政府官员到基层干部，对当地人的评价不外乎用一个字：“懒”。L 村土壤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村民不愁吃喝，这也致使 L 村许多村民长期养成“靠天吃饭”的习惯，不重视财富积累，生产滞后，这也是政府官员认为 L 村民缺乏内生动力的思想根源。而另一方面，L 村男性村民爱好喝酒，“忙的时候一天喝三顿，不忙的时候一天喝一顿，一顿从早喝到晚”（2019 年 9 月 8 日，CD 村 CXF 访谈录），在村民看来，不喝酒便无所事事。然而，长期摄入大量酒精麻痹导致人反应迟钝，智商低下，平日里昏昏欲睡，呈慵懒状态。另外，尽管政府给予外出务工人员相应的补贴与奖励，L 村村民几乎都“懒”的出去，在村民看来，“四十多岁的人不想出去了，他已经不想发什么财了。年轻人也只是暂时性出去闯一闯，看一下世界。”（2019 年 9 月 9 号，TQ 村 CB 访谈录）在大陆，部分贫困村同时也是空心村，村里只剩老人和小孩，几乎没有留在村里的。而在 L 村里中青年比比皆是。笔者问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性年纪轻轻为什么留在家里不出去打工呢？在追问之下，他似乎有些生气了，“就是不想出去啊，我也有在家帮忙干工啊。”“我就感觉工资低，不想做。”（2019 年 9 月 9 日，TQ 村 CW 儿子访谈录）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此“懒”非彼懒，即 L 村民有其懒惰的一面，如成天喝酒，靠天吃饭，但是他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根植于其生计资源上的生计方式，外出务工并不是其首要之选，拥有优质的生计资源，这里主要是指自然资源，他们更愿意在金子般的土地上深耕劳作。早先扶贫办周主任向我们介绍 B 县时说道：

“这里的土地，插根筷子都能发芽，随处都能找到吃的，又地处热带，年均气温都在 20℃ 以上，

一般冬天我最多加一个外套，冻不死人。‘两不愁三保障’中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是真不愁。”（2019年9月1日，县扶贫办主任访谈录）

尽管政府对L村贫困户全面实行教育补助，不容忽视的是，村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仍然低下，普遍不重视教育。现有整村在校学生237人（其中大学生或大专生25人，中学或中专生81人，小学106人，幼儿园25人）可以看到，L村小学升至中学人数减少了25人，而中学升大学，人数骤减了56人，大专已是高学历。另外，与村民访谈时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几乎不会使用连贯的句子进行口语表达，而更多是断断续续的词或短语，访谈过程进行颇为困难。村里没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孩子上学需要乘公交车到镇中心学校。一天傍晚，笔者在村委会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在劈柴，走上前去问：“明天周一你要上学了，作业写好了吗？”小女孩害羞地低下头嘀咕：“班里同学都不交作业。”后来女孩的母亲骑电动车过来，只带走女孩劈好的一捆柴，我拦住母亲问：“你让她一个人回家吗？孩子这么小，让她做笨重的活，她不学习吗？”女孩的母亲呵呵一笑：“哪有农村的孩子不干农活的？”（2019年9月8日，村民王大姐母女访谈录）母亲骑着电动车扬长而去，小女孩一人拖着一根有2米长的槟榔树干消失在路的尽头。谈及下一步脱贫方向，县发改委主任讲到：

“虽然现在政府对贫困户进行教育兜底，读书不要钱，确保‘全上学’，但是这些孩子是不是真的在读书？老师教的用不用心？孩子和家长是否重视？就目前来说，情况还是很糟糕的。”（2019年9月4日，发改委周主任访谈录）

尽管全村贫困户130户563人全部参加新农合，参合率100%。经过新农合报销、大病补偿、商业补偿、民政医疗救助、医疗兜底五道防线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极大地减轻农民的医药负担，但是一旦家中有人患病，意味着少了一个劳动力，这对农户家庭是沉重一击。L村贫困户J哥在2010年割橡胶时发现视力模糊，起初并不在意，最终导致视神经萎缩，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医药费共花费近10000万元，而当年医保仅报销40%，瞬间使这个家庭陷入贫困。他形容当时感觉天塌了，小儿子才两岁。他说，“大儿子如果年纪大一些就好了，大一些就能帮家里干一些农活，家里就不会这么困难。现在家里的农活都靠她（指他妻子）一个人撑着。”（2019年9月8日，HK二JDJ访谈录）

2012年L村享受危房改造以来，几乎家家户户住进了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房子，两层小楼和茅草屋星星点点，多数是两居室的平方。虽然整体并不富裕，但是不存在村民无处可居的状况，然而贫困户住房是否完全被保障却值得推敲。部分贫困户反映家中房屋有裂缝，村干部答应会尽快为其安排检查维修，等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危房改造资金追缴问题成为村民的心头大病。村民表示，危房改造时村干部说有剩余指标，家中有满18周岁的孩子即可分家，一家分为两户，只要筹到盖房子的钱，即可享受两份危房改造资金，如今村民被政府责令还钱，委屈的村民说：“盖房子我们借了5万块钱，到现在都没还上，政府又来追回房子钱，我们拿什么还？”（2019年9月6日，HK二LJH访谈录）村民当初“钻了空子”不假，但是村干部当年的错误引导又如何解决？5万块钱的欠款对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这对L村来说是返贫的巨大隐患。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L村单身率极高，单身人群主要为40-50岁的男性。一方面，L村比周边其他村子确实穷了一些，很少有女性愿意嫁到贫困村，而L村的女性大多嫁往周边城市市区甚至内地，自

然村内有着不通婚的传统。而长期单身使得 L 村男性村民性格内敛，不善交流，尤其与女性说话极为羞涩。笔者与同学去农户家访谈时，一个村民表示自己的摩托车后面已经很久没有坐过年轻漂亮的姑娘了。关于村里严重的单身现象，镇干部跟我们说：

“下村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单身男性确实是因为贫困找不到对象；还有一些单身男的，长相也挺斯文，穿着打扮各方面也挺好，年轻时候没找到，一直拖到现在四五十岁了，他们真的很害羞，都不敢和女的搭讪，怎么能娶到老婆。”（2019 年 9 月 5 日，镇党委副书记 HYY 访谈录）

如上文所述，L 村基本上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是，仍存在村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大病风险和危房改造的遗留问题。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L 村产业扶持下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

#### 四、遭受市场冲击的传统热带经济作物

##### （一）两次移民大开发

L 村所在的 B 县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解放前，B 县的热带经济作物主要是槟榔和椰子，橡胶生产甚微，面积共 324 亩，其中槟榔 198 亩，椰子 98 亩，橡胶 28 亩。解放后 50~60 年代，B 县处于山区开发期，国家先后在 B 县建立了 5 个以橡胶为主的国营农场和热带作物育种站，有效促进民营橡胶生产的发展，也迎来 B 县第一次移民浪潮，一批干部、职工来到 B 县支持山区建设，实现人口大幅度上升。而橡胶过度种植占领大片土地，也为农民陷贫返贫埋下了隐患。1966 年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橡胶种植曾一度停滞不前。1967 年全县面积 7250 亩，比 1964 年减少了 6373 亩。如今橡胶林紧密地包围村庄，加之橡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禁止农户私自砍伐，村民苦于没有土地种植其他作物，即便想勤劳，也无处可施。

改革开放以后，B 县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又恢复了生机，掀起第二次移民浪潮。1988 年，国家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七八十年代，对于广西西部和北部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国家实行整村搬迁，大量移民涌入海南，划地为居，成为自然村，并入当地农村系统管理。相比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外来移民勤劳节俭，善于经营，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较快，同时也挤占了大量土地资源。看似天然环境优越的 B 县，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重要因素，也进一步加剧县内诸如 L 村的贫困程度。

2017 年 B 县的橡胶和槟榔，收获面积分别为 27.8 万亩和 6.4 万亩，产量高达 1.86 万吨和 1.69 万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橡胶和槟榔也成为 L 村两大主要热带作物。

##### （二）“天”有不测风云

橡胶树喜高温、高湿、静风和肥沃土壤，对温度变化响应比较敏感，是种植周期较长的农作物，从种植到开割一般需要七八年时间，开割期长达 18 年左右。在开割之前的七八年里，需要不断投入人力打理。而我国天然橡胶主要栽培区位于副热带高压带，易遭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雨冲胶”常常导致农户辛苦一夜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以 2017 年为例，受 7 月第 4 号强热带风暴“塔拉斯”和第 19 号台风“杜苏芮”的影响，B 县连降特大暴雨，使得全县直接经济损失达 1397.022 万元。

对于很多胶农来说，种植橡胶树就像一场赌博，种植的时候根本不会预料到开割时的价格如何。价格好，算是运气好；价格不好，也不能贸然砍掉橡胶树。2005 年左右，干胶的价格涨至每公斤 30 多元，一时间掀起农户橡胶种植热潮。2011 年以来，金融市场动荡对实体经济影响深重，汽车工业疲软，直

接导致橡胶供大于求，天然橡胶价格走上了漫长的下跌之路。近年来中国进口复合胶大量增加，对天然橡胶价格形成冲击，无疑是雪上加霜。进口胶凭借零关税和成本低的优势，对国内胶形成了价格优势。积压大量橡胶库存，压制价格反弹。当年 4.2 万元/吨的历史高价，到如今，已跌至不到 1 万元/吨。胶农眼看着收入越来越少，却束手无策。

### （三）橡胶“弃割”、“弃管”的窘境

橡胶价格持续低迷，胶农往往会选择不割胶、不管理，以减少种植成本。

“我家有四多亩橡胶，今年只割了不到 3 成。今年割胶都不够辛苦钱呢。我种植一亩橡胶大概需要 3000~5000 元的成本。去年我家的这多亩橡胶，几乎挣不到钱，，不贴本就万事大吉了，橡胶这碗饭是越来越不容易吃了。价格这么不景气，我们都很少给橡胶树施肥，可以少一点成本吧。”（2019 年 9 月 9 日，TQ 村 CB 访谈录）

今年 8 月和 9 月，海南省分别出台《2018 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和《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两份文件，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政府允诺，只要橡胶价格低于 15 元/公斤，保险公司就会进行赔付。保险按照亩产 60 公斤干胶的标准计算，保费为每亩 108 元。理论上，保费由政府与胶农共同承担，省级财政补贴 30%，县级财政最少补贴 30%。大多数贫困胶农的自缴部分基本均由政府全额承担。在 L 村，目前已完成贫困户 118 户 934.3 亩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投保工作，完成全村 151 户 1271.42 亩橡胶期货保险投保工作。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最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真正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农民只有去割胶、卖胶，才能获得理赔收入。”

表 1 种植业保险分户标的投保清单（部分）

投保险种：显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标的名称：橡胶

标的种植地点：B 县 X 镇 L 村委会 单位保险金额：900 保险费率：12% 单位保险费：108

| 序号 | 保险数量（亩/株） | 总保险费 | 农民自交保险费 | 备注    |
|----|-----------|------|---------|-------|
| 1  | 8.5       | 918  | 45.9    | HK 二村 |
| 2  | 10        | 1080 | 54      | HK 二村 |
| 3  | 12        | 1296 | 64.8    | ZD 村  |
| 4  | 4.5       | 486  | 24.3    | ZD 村  |

而 L 村民似乎仍对这一政策持观望的态度，“投是投了，但是到现在我也没见着钱啊。”（2019 年 9 月 8 日，TQ 村 CB 访谈录）L 村委会大门口贴着一份 2019 年 8 月《种植业保险分户标的投保清单》，这次获益的主要是 HK 二村和 ZD 村，几个村民聚精会神地盯着清单数着上面的数字。

## 五、组织型：“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 （一）种植之源：水的获取

在传统热带农业持续低迷的情况下，L 村将农业发展中心转向反季节瓜菜种植和牛羊养殖。TQ 村是 L 村经济水平较好的一个自然村，也是反季节瓜菜——黄秋葵种植典型村。该村以 C 姓为主，共有 39 户 162 人。据当地老人说，该村并非土生土长的黎族人，其祖先——7 个兄弟在明清时期从浙源迁至

海南定居，该村人是最迟搬进 L 村的。地势相对于 L 村其他村落，TQ 村地势较低，X 河下游分支的 TQ 河绕村而过（如图 2 所示），耕地种植面积 244.48 亩，经济林种植面积 219.15 亩，为黄秋葵在该村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尽管如此，2014 年村里仍然出现了缺水状况，村民 CW 和周围 7 户共筹集 8000 多元在 CW 家门口挖了一口 10 米深的井，吃水灌溉全都靠这口井水。CW 妻子说，“14 年没水的时候就用挖掘机来挖，几户人搞。就这里，全部都挖这里，我都怕了，地会塌。”（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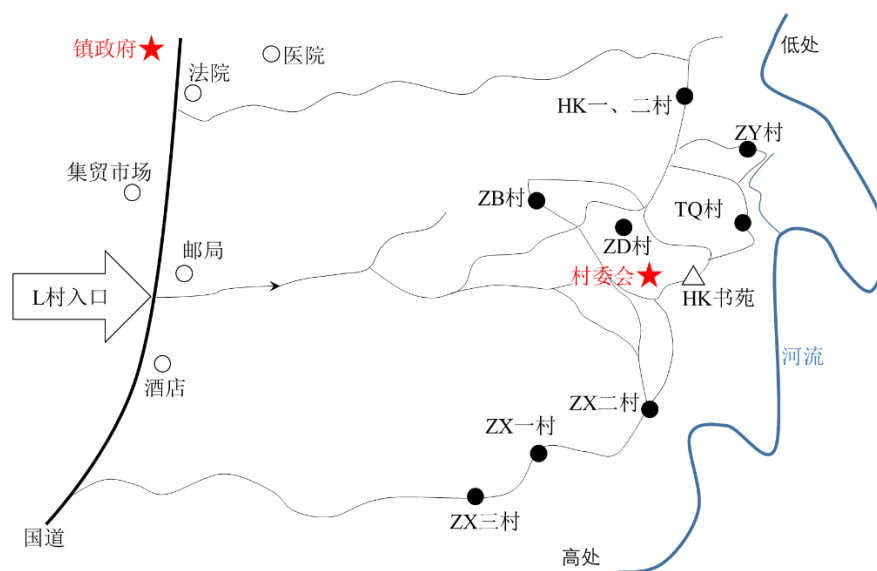


图 2 L 村地图

表 2 TQ 村和 ZX 村三的人口、种养殖业情况汇总表

| 自然村名称        |         | TQ 村    | ZX 三村    |
|--------------|---------|---------|----------|
| 总户数          |         | 39      | 18       |
| 总人口数         |         | 162     | 65       |
| 人口年龄结构       | 男       | 82      | 36       |
|              | 女       | 80      | 29       |
|              | 0~14 岁  | 21      | 8        |
|              | 14~59 岁 | 125     | 51       |
|              | 60 岁及以上 | 16      | 6        |
| 全村耕地种植面积（亩）  |         | 244.48  | 80.12    |
| 主要种植作物       |         | 水稻、冬季瓜菜 |          |
| 全村经济林种植面积（亩） |         | 219.15  | 227.21   |
| 主要种植作物       |         | 槟榔      | 橡胶、槟榔    |
| 主要养殖禽类       |         | 鸡       | 鸡、黑山羊、黄牛 |

即便如此，和 X 河上游村落相比，TQ 村已经非常幸运。“我们这边就是因为有 TQ 河才可以抽水，不然也没法抽水。人家都羡慕我们。”（2019 年 9 月 9 日，TQ 村 CW 访谈录）早年附近的农场大建鱼

塘，引走了 X 河水，这是导致 L 村缺水的最根本性的原因。

问：那个 X 河刚好流到咱们这边，他们把水引走了？

答：对，每个鱼塘都把水引走了，到我们这里就没有水了。有时候我们去抽两天，都没有水下来，政府都管不了，后来我们就不管了。

问：为什么政府管不了他们？

答：哪里能管得了，也是要收税。他们都说没钱，那种你怎么说。反正你就看吧，水流不到我们这里，那么多的水都不都流到他们那里去，我们这里全部供不上。主要是农场鱼塘太多了。（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

## （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种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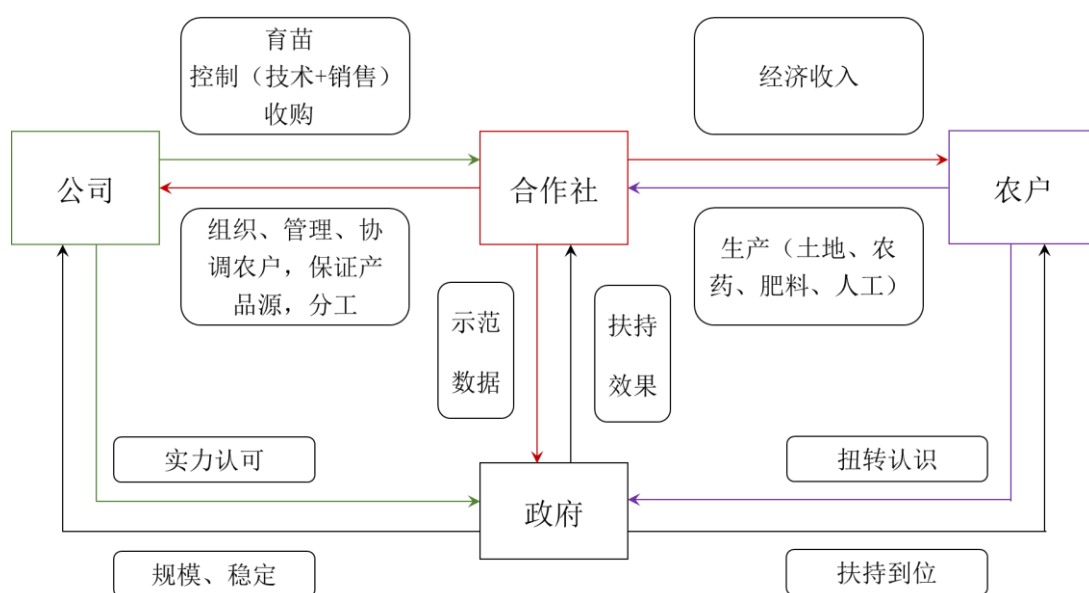


图 3 黄秋葵合作社组织运行图

黄秋葵种植主要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发展种植冬春季反季黄秋葵产业，是 L 村引以为“典型”的种植业发展模式。在这一种植模式中，政府（农业部门）委托农业公司培育种苗，无偿提供给农户种植，并将相关资金交予合作社进行采购。农业公司主要负责培育黄秋葵种苗，9 月份开始，召集村里几十个妇女到公司育苗，按照一天一百多的工资结算。农业公司还负责将种苗运到农户所在乡镇，给农户提供必要的种植技术指导，有权随时跟踪农户的黄秋葵生产、管理过程，最后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收购农户种植的全部黄秋葵果实，并负责销售。黄秋葵合作社对公司育苗进行发放，提供给农户种植。而农户自备土地、农药、肥料、人工，按照双方协定的质量要求进行黄秋葵生产，在同等收购平均价格情况下，农户不得将合同期内黄秋葵出售给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农业公司收购农户的黄秋葵果实，保底价 3 元/斤（即当市场价低于 3 元/斤时，按 3 元/斤收购，如果市场价高于 3 元/斤时，按市场平均价格收购）。收购期间，公司以每 30 天（月结）结算方式收购乙方当天所采取的黄秋葵果实。这样一种种植模式通过合作社组织把有种植技术的农户集中起来，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最为普遍的组织载体（叶敬忠，2018）。

### （三）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真假贫困户”的忧虑

CW 家坐落在毛政农军指挥部旧址边上，与别家相比，CW 家格外气派，也十分低调。四根顶梁柱撑起院落前厅，前厅为厨房，然而地面和墙上油迹斑驳，院落杂物堆积。内屋大门只敞开一个缝隙，笔者瞥一眼，看见客厅里面一个按摩椅和皮质的 L 型沙发，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算是奢侈品了。

CW 今年 63 岁，和妻子育有两女一儿，大女儿三年前嫁到大陆，二女儿在当地 5A 级旅游景区做导游，去年和河南籍丈夫在三亚结婚买房。目前，CW 夫妇和小儿子以及未过门的儿媳妇共同居住。CW 早年是孤儿，是堂叔的母亲将其抚养长大，陈武唤其为“妈”。2002 年，CW 曾担任过村长；200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4 年，被选为贫困户。关于 CW 致贫原因扑朔迷离，有多种说法：在 L 村贫困户初选名单上，他的致贫原因是空白；而在镇政府 2014 年贫困户复审报告上，他的致贫原因是缺资金；而当笔者询问其本人当初如何被评为贫困户，他表示是缺土地。在 CW 看来，所谓贫困户提名只是表面形式，关键在于，同样作为贫困户的他，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扶贫物资。而周边邻居认为，CW 家 2012 年能够建起 120m<sup>2</sup> 大房子，算不上是贫困户。

2015 年，CW 开始种植黄秋葵，早在一年之前，该村其他村民已经开始种植。问及为何会选择种植黄秋葵，CW 说，“有保底价能保本啊，种什么都怕吃亏的”。（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

表 3 CW 家 2018-2019 年黄秋葵种植成本

| 序号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肥（元）  | 270  | 105 | 105 | 110 | 105 | 100 | 200 | 200 |
| 药（元）  | 17   | 22  | 130 | 90  | 100 | 278 | 280 | 256 |
| 地膜（元） | 480  |     |     |     | 520 |     |     |     |
| 合计（元） | 3368 |     |     |     |     |     |     |     |

表 4 CW 家 2019 年 2 月份黄秋葵种植成本

| 序号      | 1    | 2   | 3   | 4   | 5   | 6   |
|---------|------|-----|-----|-----|-----|-----|
| 草药（元）   | 280  | 220 | 85  | 190 | 95  | 169 |
| 农药 2（元） | 220  | 225 | 169 | 100 | 170 | 190 |
| 化肥 1（元） | 250  | 200 | 100 | 100 | 100 | 260 |
| 化肥 2（元） | 360  | 50  | 115 | 100 | 570 | 225 |
| 合计（元）   | 4543 |     |     |     |     |     |

CW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平时却养成了记账的习惯。他从家里的柜子里拿出一个记账本，给我们看他 2018-2019 年种植黄秋葵的成本，这里包括整地，买农药和化肥的钱，如表 2 所示，CW 一年种植黄秋葵共花费 3368 元（2 月份除外）。而每年 2 月份，季节原因导致虫子尤其多，黄秋葵被叮咬，极易长一粒一粒的孢，一瓶效果好的农药需要花费至 60 元/瓶以上。如表 3 所示，仅仅 2019 年 2 月，CW 一共花了 4543 元买农药和化肥，加上正常时期化肥，CW 一年种植黄秋葵成本在 7911 元。而 CW 家一共种了 9 亩黄秋葵，这里包括租用他哥哥家的地，每年给哥哥 1000 元。一般而言，一亩黄秋葵产量在 75 斤左右，每天刚好可以摘 75 斤左右。假设 CW 每天都去摘黄秋葵（事实上，CW 和妻子很勤劳，除了雨天黄秋葵不结花导致无果以外，几乎每天都去地里采摘。）从十月摘到来年 5 月，那么他一年可以



获得近 54000 元，减去成本，那么他的年利润在 45000 左右。这对于贫困村的农民来说，光是种植黄秋葵便可以获得一笔“巨款”。驻村第一书记将 CW 评价为“种植榜样”。

然而，黄秋葵的种植越来越普遍，也引起村民对“规模不经济”的忧虑。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随着农户黄秋葵产量的增加，长期平均总成本下降，农户收益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规模经济追求的是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一旦生产规模扩大到超过一定的规模，边际效益却会逐渐下降，甚至跌破趋向零，乃至变成负值，引发规模不经济现象。全村黄秋葵，而黄秋葵被一家农业公司垄断，公司就会对该村种植的黄秋葵完全掌控议价权，从而对农户压价，并远高于成本价销往外部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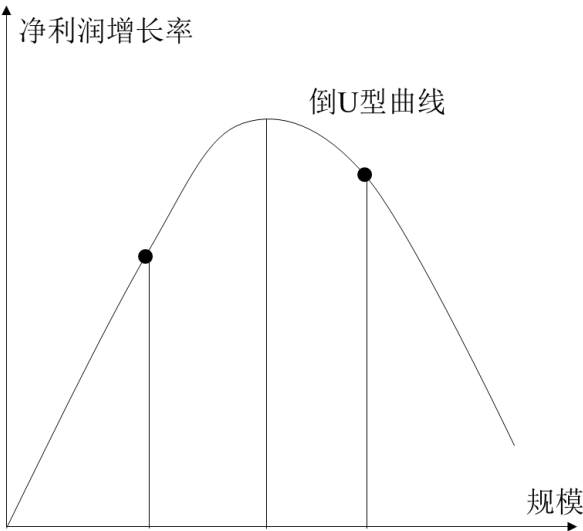


图 4 黄秋葵的规模经济效益

问：他们都说您黄秋葵种的最好，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答：（CW 连忙摆手）没有没有，我没什么经验的。人人都种，规模上去就没钱了，赚不到什么钱的。也就吃饭喝酒，吹吹。（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

（四）应对市场波动：公司和农户的策略

“掉价的时候他们（GH 农业公司）就早停啊，去年市场价高的时候，7 月份才停（收购）。掉价了就不想摘，摘久了累。7 月份太阳很大的，晒久了很累的，不想摘。四五个月连续早起摘也真的是累。”（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

看似 GH 农业公司承诺给农户 3 元/市斤的保底价，这也就意味着市场高于 3 元/市斤，公司受益；市场价低于 3 元/公斤，农户受益。实际上一旦黄秋葵市场价有所幅度波动，无论是公司还是农户，都有自己的应对策略。当市场价低于保底价，农业公司的策略是早早停止收购；而当市场价高于收购价，此时公司会选择延长收购期。《黄秋葵产销合同》里规定“甲方（公司）可依据市场行情变动适当延长收购期限”也使得公司延长或缩短收购期的做法得以在法律的界限内“自由行走”。而对于农户来说，尽管合同强调“如有违约 2 次以上，本合同自动终止，甲方（公司）不再收购乙方（农户）黄秋葵，且

三年内不再发放种苗给乙方。”仍少部分农户选择投机倒把，冒着违约风险偷偷将黄秋葵卖给其他个体或公司。

问：我听说外面有商贩高于这个价钱来收？

答：也不行，人家（合作社）不给卖的，都签了协议的，很多人都拉去跑去卖的，我们家很老实的。像人家之前有 5 块钱一斤，老板还是给我们 3 块，因为之前打过合同了。（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

#### （五）追问：合作社的市场主体性

村民反映，之前合作社发的是两百多元一包贵的化肥，2018 年之后换成了有机肥，“那肥发下来大家都不想要，槟榔都不想用，那叶子不绿，长不了果。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给少一点，好的一点，给那么多大家都不想要，你看现在每家每户都堆积那么多。”（2019 年 9 月 10 日，TQ 村 CW 访谈录）笔者查阅了 2018 年 12 月合作社和肥料公司签订的《肥料购销合同书》中，合作社购买了 50 万元的精制有机肥，共 178.58 吨，每吨 25 包，则一包为 112 元左右。和之前的化肥相比，价格低了一半。无奈之下，村民只好自掏腰包，自行购买农药和化肥。同时，2018 年公司和农户签订的《黄秋葵产销合同书》，规定“黄秋葵的生产由乙方（农户）负责，乙方自备农药和肥料”，从该层面来说，农户自费农药理所因当。那么，“农户自备农药”与“合作社统一发放肥料”相矛盾，关键在于购买肥料 50 万元的效用在哪里？

追溯合作社成立的缘由，在 X 镇黄秋葵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时出现，之前村民已经和 GH 公司形成一定的合作模式，只是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后，政府补贴给予农户最低价。事实上，合作社的自主性并不强。在村民看来，所谓的合作社有两个主要人物，社长是 GH 农业公司的老板，理事长是 ZX 三村的小队长，理事长其实是帮老板管事的，平时只负责登记参加合作社名单，记账，组织发放苗种，收购果实。合作社本应该是农民实现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组织，却依旧受制于市场和行政因素的强制结合，从而埋下侵蚀小农户生产经营利益空间的隐患。

## 六、个体型：农户“自产自销”模式

#### （一）水少人稀

L 村所有自然村中，ZX 三村发展较为落后。如图 1 所示，与 QT 村得天独厚的水源位置相比，ZX 三村用水非常困难。虽然 ZX 三村位于 X 河上游，但 ZX 三村位于 L 村西南方向地势偏高的林地，高于河流位置，该村若想用水，需要将 X 河水从低处抽到高处，而电灌站的修建到年底才被提上日程。另外，ZX 三村人少地多，住户相对稀松，仅有 18 户 65 人，全村耕地种植面积 80.12 亩，主要种植水稻和冬季瓜菜；经济林地种植面积 227.21 亩，主要种植橡胶和槟榔。目前，ZX 三村只有一户在养黑山羊，养殖黄牛的人也越来越少。

H 叔今年 48 岁，儿子去年去广东当兵，和妻子居住在村里一栋朝北的两层小洋楼，这栋楼房建于 2016 年，在整个 ZX 三村，这是唯一一栋“豪宅”。我们去访谈时候，H 叔妻子躺在摇椅上看视频，H 叔正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静静地发呆，今天是他养黄牛的最后一天，就在我们去之前，他杀掉了最后一条黄牛，打算今后从事黄牛收购生意。

2010 年之前，H 叔家只有一亩田地，然而一亩地很难支撑一家三口的花销，儿子还在上学，后来他又承包别家的 5 亩土地，共 6 亩，全部用来种植瓜菜。“一亩瓜种完钱很快就花完了，种四五亩，六亩以上，就可以留下一亩来温暖我们的家庭。”（2019 年 9 月 10 日，ZX 三村 H 叔访谈录）2010 年之后，H 叔又因少数民族扶持项目得到政府发放的两条黄牛，开始走上了养殖之路，养黄牛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一方面，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放牛喂牛；而另一方面，放牛时需要人全程看管，防止牛踩踏或者吃了别人地里的瓜菜。与此同时，H 叔还担任 ZX 三村的队长。而基层繁多的会议让 H 叔应接不暇。2010 年之后，他把队长这一职务“转让”给现在的队长 HB。H 叔觉得当队长比做生意还累，更是一种无法完成工作的无奈，他形象地比喻“做队长好比我们一天卖牛赚一万块钱”，权衡利弊之下，H 叔辞掉了队长一职。

“你要是（队长）做的好便是好，打个电话你就要跑去县城那里开会，我那会养牛怎么离开？你养牛拿不回本钱很麻烦的，起码损失七八千，当时很多钱的，而且我是合伙的，你一天两天不回来，别人多干一点，你要是很长时间不回来，人家会有意见的，你就得给人多一点。以前去一趟保亭再回来补贴 24 块钱一个月，连一次油费都不够。”（2019 年 9 月 10 日，ZX 三村 H 叔访谈录）

## （二）进入市场

2011 年开始，H 叔开始全心全意做起了黄牛的生意，妻子主要负责干农活和料理家务。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明确。

七八年前，割橡胶、摘槟榔是村民追崇的“生财之道”，在当地，村民通常每天从凌晨 3 点早上 7 点割橡胶，四个小时可以割 250 棵树。一桶橡胶大约 50 公斤，其中干含大约在 15 公斤，而卖橡胶主要卖的是干含，当时干含最高有 28 元/公斤，这意味着一桶胶便可以获得 420 元左右收入，而槟榔也可以买到 6 元一斤，成为每家每户主要收入来源。正当村里其他人家纷纷卖掉黄牛从事种植业的时候，H 叔却反其道而行，在原先两条黄牛的基础上，又以低价进了 4 条黄牛，开始和基层政府、农场一起在县城成立黄牛合作社。H 叔说这些人每次总是借以查看牛肉、牛尾、牛排的名义蹭吃蹭喝，实质上却什么事都办不成，两年间一无所获。

“你跟他们干，他们天天打电话问，有什么好的肉，弄一点过来，我们吃吧。你还要出肉出钱还有买烟酒。喝酒第二天去干工，谁都累。搞了两年就不想搞了，浪费时间嘛，还是自己弄自己的”。（2019 年 9 月 10 日，ZX 三村 H 叔访谈录）

于是，H 叔选择“跑路”，自行组队单干，跌跌撞撞地摸索进入市场。进入市场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找到“带路的”。H 叔黄牛刚开始仅仅做养牛和卖牛的生意，除去饲养成本，一条牛只能赚不到 500 元。有时 H 叔也会做黄牛中介，不懂市场门道的 H 叔也常常遭人“算计”。B 县的牛主要来源于周边的陵水和五指山，进购大陆的牛很难过海关。收购黄牛，必须知道哪些人家有黄牛，尤其去外村，这就需要中介带路。黄牛中介市场约定俗成的规矩是，请别人带路买黄牛需要给予一定的小费。然而往往有人请别人带路卖黄牛后，故意说没看好牛，之后第二天自己直接又来找卖家买牛，如此一来，便可以逃掉中介费。

“第一次，是大湾岭那边带人来买我们的牛，能要他们不要嘛，因为他们不想给我们小费，因为我带过他，他懂路了，今天他不买，明天后天他就开车过来买，这样就不给我们小费了嘛，你带路不给人家小费人家以后不肯带你的，后来我们叫人家带路也是要给小费的。”（2019年9月10日，ZX三村H叔访谈录）

H叔到县城集贸市场上买菜，转了一圈突然发现，把牛杀了解剖卖比直接卖一条牛赚的更多，可以多挣足足一倍。他开始转换思路，从零售到批发，生意范围扩展到收购黄牛和卖牛肉。此时的H叔再次遇到瓶颈，滞销成为最大的问题。

“人家一看你是陌生人，不肯跟你买啊，那些顾客多的，人家就经常有人来买。看到我们这种面不熟的，都是脸黑黑的，不搭理的。”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自己搞自己卖，也没钱请工啊，多累你也要顶，顶到下午和晚上亏本的时候，卖不掉拿回来分给人家吃，天天吃牛肉，吃了都怕，吃不掉就放冰箱第二天又拿去卖，搞来搞去。”（2019年9月10日，ZX三村H叔访谈录）

一个偶然的契机，H叔的生意有了转机。县政府机关食堂找到了H叔，食堂负责人说，“这牛肉怎么一点水都没有？”从此，H叔抓住机会，和食堂负责人去的稳定的联系，并采纳他们的改进建议，牛肉口感提升，后来和机关食堂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H叔的生意越做越好，县城饭店和农家乐纷纷找他订货。访谈至此，H叔终于露出了笑容，乐呵呵地说，“他们都说我的牛肉，哎哟，可以哦！”

### （三）摊位垄断横行

B县管理条例规定租用一个1.2米的小摊位是6000元/半年，需要提前预定，并且一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两个摊位。事实上，在摊位申请还未开始时，地头蛇往往会通过非正当方式一个人拥有四五个摊位，等到普通商贩再预定摊位时，早已被抢光。然后地头蛇“顺理成章”地按照20000元/半年的价格二次租给渴望租到摊位的小商贩。谈起这件事情，H叔对地头蛇露出无奈而又羡慕的神情。长期以来，地头蛇在当地拥有雄厚的生计资本，包括纵横密布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金，通过垄断市场，哄抬价格的方式，增加小农户参与市场的成本。

问：为什么会有14000的差价？那么大？

答：你愿意你就做，不愿意你就没有摊位摆。

问：他是怎么弄到这么多摊位的？

答：这是智商啊。他懂人啊，他有钱啊，他不就是坐着等钱当老板了吗？（2019年9月10日，ZX三村H叔访谈录）

### （四）小农户成为“市场人”

2015年台风的让H叔家遭遇飞来横祸。那年他家拆迁准备盖新房，热水器的电管被台风刮倒在铁皮牛棚上，雷电和暴雨交加，将五只牛活活电死。当时H叔正在县里做生意，下午四点多时候妻子突然打来电话说家里牛棚里的牛死了5只，H叔急急忙忙赶回家。“我回来以后用水冲刷干净，剖膛开肚拿去卖了，送啊送，卖啊卖，没办法，一下子死了5条。”按照当时市场价，一只成年牛大约250斤，

平均价格是 35 元/斤，除去卖掉的一些，这场事故给 H 叔家带来了两万多元的损失。回忆起这件事情，H 叔仍历历在目，“对，那天就是母亲节！”从那以后，H 叔减少黄牛的养殖。

H 叔家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养了 20 头牛，至于为什么从养殖黄牛的小农户转变为“市场人”，一方面自然灾害事故让他至今耿耿于怀，他感到小农终究是靠天吃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很多，甚至让他无法掌控。而另一方面，牛是群居动物，也是出了名的“护犊子”，新的牛难以融入原先的牛群。如果扩大黄牛养殖规模，难以管理，感到自己力不从心。H 叔牛在县城集贸市场上，建立起稳定的购销渠道，聘用员工三人，黄牛的收购成本为 55 元一斤，可以卖到 60-65 元/斤，一天销售量达到一百多斤，那么一天的纯收入可以达到上千元。

问：您是怎么能理解市场的？

答：看市场就知道咯，我经常在（集贸）市场上，看什么有价钱，走势。你看人家种瓜菜，反季节种菜是赚钱的，你能反季节你就厉害。

问：就做跟人家不一样的？

答：嗯。要靠自己多多理解才知道做什么才好，做什么才快。

访谈最后，黄叔感叹说，“我从小读书的时候，家里一直很穷，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做到家里平衡富裕起来，大家都过得去。”（2019 年 9 月 10 日，ZX 三村黄叔访谈录）

#### （五）渴望种植的“养殖户”

与黄叔相比，林老汉却没有走上“市场人”的道路。林老汉家在 ZX 三村的主干路底下，一栋三间房屋的瓦房，石头堆砌起来的简易厨房，还有一个用铁丝网精心围起来的羊圈，共养羊 15 只，笔者去参观林老汉的黑山羊时，2 米开外就能闻到羊圈里臭气熏天的味道。

2017 年，林老汉获得镇政府发放的扶贫物资——5 只 12~18 公斤黑山羊。与此同时，ZX 三村另外三家贫困户也获得了数量同等的黑山羊。然而，到了 2019 年下半年，ZX 三村只有林老汉一家仍在养羊。

林老汉已年过六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老人，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儿子也分家后自立门户，林老汉妻子在县城里替儿子带孙子，每周回村一次，家中只剩林老汉一人，橡胶、槟榔和瓜菜都靠林老汉一人打理。另外，养殖黑山羊并非易事，需要把羊“捧在手心里”，精心呵护，对农户的时间和精力要求较高，年老的林老汉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山羊吃的草需要仔细消毒，防止肠胃疾病的发生，否则一旦山羊嘴巴开始糜烂，15 块钱才能买到一小瓶消毒液，增加农户养殖成本。另一方面，圈养的黑山羊必须要有运动，一日保持两次，在舍外和舍内运动场进行，每次半小时至一小时。黑山羊喝了早上的露水易中毒，必须要等到露水干了才能放羊，非常消耗养殖者时间。而下雨天是最让林老汉头疼的，羊喝了雨水会肚子疼。尽管政府给养殖黑山羊的贫困户配备兽医，但似乎并没有起到根治黑山羊养殖困难的问题。

一般市场上的买家更倾向于购买小羊羔，林老汉会将小羊羔在 20~30 斤时按照 25~28 元/市斤卖出，一只羊可以赚到 500~840 元。而如果林老汉农活繁忙，请人帮忙销售，价格会更低些。目前林老汉有已经将原先的 5 只黑山羊发展到 15 只，山羊一年平均两胎，林老汉坦言，两年下来很辛苦，却赚不到太多钱，还要用种瓜菜赚的钱作为养殖黑山羊的成本。林老汉感叹：

“羊一养多了，就干不了农活了。我老头六十多岁了，想种瓜菜，肥料是政府的，我们两公婆能赚一万多块一年。”（2019年9月9日，ZX三LCY访谈录）。

这时笔者好奇的是，为什么林老汉不干脆把羊卖了呢？刚进ZX三村，队长带有自豪感地向我们介绍这是村里唯一养殖黑山羊的贫困户。听闻林老汉对养殖黑山羊的诉苦，陪同我们做访谈的村干部XF却一直在鼓励林老汉继续养黑山羊，而林老汉无奈地摇了摇头。

林老汉：养羊？一年到头，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头痛。

XF：那当然呀，有辛苦才有收获啊。

林老汉：没有收获，每天都是一样的。

XF：你养的多就不一样了。

林老汉在前期的养殖黑山羊的生计实践中，发现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资源不足，不适应现实养殖需要，希望做出生计调整。从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黑山羊养殖是L村“树亮点”、“造典型”的产业扶贫项目之一，鼓励农户增加养殖，但是却忽视了年过六十的林老汉一个人养殖黑山羊的困难，也忽视了林老汉对做出生计调整的渴望。这里让笔者不禁提出质疑：“精准扶贫”的扶持主体究竟是产业？还是人？

##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海南省B县L村为例，从村民日常的生计方式出发，阐述橡胶保险、黄秋葵合作社和牛羊养殖的产业扶持下，小农户如何衔接市场。用水问题是影响L村下两个自然村TQ和ZX三生计方式选择的关键因素。TQ村位于河流边，抽水灌溉相对来说更为便捷，为冬季瓜菜——黄秋葵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环境。先富带动后富，TQ村其他村民看到以CW为首的种植能手通过辛勤耕作获得丰厚的收益，也纷纷跟随效仿。CW却对规模种植后黄秋葵的规模种植感到担忧：“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村民CB在种植黄秋葵的基础上，又尝试增加了冬季瓜菜——辣椒的种植，一跃成为TQ村今年的收入大户。TQ村冬季瓜菜的种植增益且提高了生计层次，随着黄秋葵发展愈发蓬勃，黄秋葵合作社也相应地成立，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种植的模式，保障农户的收益，然而初期参与市场的小农户所形成的组织仍然缺乏主体性，在市场实践中显得颇为被动。

而ZX三村位于河流上方，人少地多，种植业也在当地发展遭受取水困难，因此，村民选择的生计方式是以个体为主的割橡胶、摘槟榔以及牛羊养殖，无法形成规模化的组织。人力成本不足是ZX三村养殖业发展的瓶颈，H叔家夫妻合理分工解决了这一困难，通过前期养殖黄牛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得以进入市场，小农户转变为“市场人”，开始从事市场收购，却遭到地头蛇的摊位价格垄断，举步维艰。而林老汉在面临这一困难时渴望做出调整，顺应市场潮流，却面临着基层政府“树典型”的牵绊。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方式在我国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农户和市场的有机衔接是在充分发挥小农户所蕴含的生产力合理性的基础上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现代农业形成生产力联合。组织型的衔接是以组织化实体为中介对象，具有相对紧密的联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的障碍；但基于权威不对称原则的组织型衔接容易对资源“精英俘获”，并侵蚀小农户生产

经营利益。而个体型的衔接则是通过农户自产自销的方式，减少小农户与市场衔接的环节，可在相对平等的原则上实现资源和经验的共享；但衔接数量和范围较小，市场抗逆力较弱。总体而言，个体型、组织型构成 L 村小农户和市场衔接的基本形态。目前尚未形成以小农户自身为主体的稳固衔接方式，小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人格依附和市场依附的状态，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依然潜藏于不同的衔接形态中。因此，在探索小农和市场的衔接路径时，一方面如何减少小农户与市场的衔接环节，提升小农户的生产受益，另一方面，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衔接模式，使企业愿意连接小农户，维持企业的长远发展，保证市场容量和产品质量，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白雪秋、余志利，2019，《消除“发展性贫困”：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上海经济研究》第 3 期。
- [2]桂华，2019，《市场参与视角下的农村贫困问题——贫困类型、地区分布与反贫困政策》，《南京社会科学》第 7 期。
- [3]何宇鹏、武舜臣，2019，《连接就是赋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第 6 期。
- [4]李小云，2019，《发展性贫困的生产：制度与文化的田野对话——一个 Y 族村庄生活的发展叙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5]强舸，2013，《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开放时代》第 2 期。
- [6]叶敬忠，2019，《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7]叶敬忠、豆书龙、张明皓，2018，《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如何有机衔接》，《中国农村经济》第 11 期。

☆ 作者简介：刘青青，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汝 艺

# 乡村污染工业的绿色转型

## ——以 S 村为例

马超群

---

**摘要：**1978 年改革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进入乡村工业化阶段。乡镇企业在给地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的环境危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乡村污染工业急需转型。本文通过对 S 村实地调查，发现 S 村在上个世纪 80 到 90 年代发展采石业，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但也破坏了生态环境。21 世纪初，在环保政策的压力下采石场关停，随后 S 村进入了萧条期，历经十年之久的探索后，S 村开始打造旅游业，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的绿色转型。但与此同时，旅游业虽然实现了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产业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村民参与问题等。

**关键词：**乡村工业 绿色转型 乡镇企业 压力体制

---

### 一、导言

#### （一）问题提出

乡村工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1978 年改革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进入乡村工业化阶段。费孝通将此概念化为“离土不离乡”，并主张通过乡村工业化之后的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经济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财政包干制改革，中央财权下放，激发了地方发展的自主性，基层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大规模开厂置业；贫困的中国农民，在饱受苦难之后，终于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几方力量形成合力，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代价之一就是地方环境的破坏，苏南地区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大量污染企业借此机会扎根乡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环保政策的压力下，乡村工业面临着关停、转移或转型，这样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S 村的采石场的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展起来，给村民和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代价是环境的破坏。政府出于环境的考量，在 2003 年后陆续关停采石场，村民因失去生计大规模外出打工，村委也因失去集体经济而丧失绝大部分收入失去活力。但正是因为关停污染企业，使得 S 村的生态得以恢复，为后来转型为旅游业打下了基础。从采石业到旅游业的转型历经十年之久，S 村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作为一个转型的成功案例，对此过程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S 村转型虽然成功，但仍不免存在各种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 （二）S 村概况

S 村位于 NJ 市 JN 区 DS 街道东侧，距离 DS 主城区约有 13 公里。2005 年改为 S 村社区，辖区面积 16.46 平方公里，共有 6 个自然村。截至 2018 年，户籍户 585 户，户籍人口 2190 人，现居住在 S 村



的户籍人口不足 400 人，流动人口约 200-300 人。S 村历史悠久，据《S 氏家谱》记载，元末明初（公元 1370 年前后）该族先祖为避战乱由河南开封府迁徙于此。自然环境优美，S 村位于青龙山东麓，南接双龙湖，西倚青龙山，东望黄龙山，北接天云湖。S 村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林木繁茂。历史上的 S 村主要以种田和采石为生，20 世纪 70 年代，S 村重新复兴了采石业，发展社队企业，80 到 90 年代后期经历了一个采石业发展的黄金期。2003 年退耕还林，S 村两千亩水稻田改种为白杨，每户只留几分地耕种蔬菜，传统 S 村的农耕历史就此结束。2006 年采石场关停，S 村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沉寂期。转折出现在 2011 年的环境整治，S 村凭借其自然禀赋和地区的支持成为了政策试点，在省委书记做出批示后更成为省内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参观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试点村，旅游业快速发展起来。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二手文献和半结构访谈收集资料。文献来源有三：其一是《SF 乡志》，记载了 S 村自 1949 到 1988 年这一阶段的历史，其中对 80 年代采石场等乡镇企业的记录对本报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二，JN 区政府官方网站中信息公开栏目，详细记录了有关 S 村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旅游业财政投入的预算计划表，有助于笔者理解乡村工业转型的政策背景；最后，参考了一些网络上的新闻以及相关论坛。访谈方面，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重点访问了 11 人，涉及到了解村庄历史的初中语文老师、社区（涉农社区）书记、大学生村官、旅游负责人、导游、妇女主任以及普通村民若干。访谈根据访谈对象的特点，重点访问了村庄的变迁过程及其影响。

表 1 访谈对象

| 编号 | 姓名  | 基本信息                                        |
|----|-----|---------------------------------------------|
| 01 | CCF | 女，70 多岁，S 村本地人，前妇女主任兼赤脚医生，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和接生工作     |
| 02 | WCG | 男，30 岁左右，家住 JN 区，S 村村官，已在 S 村工作 5 年，工作非常忙碌  |
| 03 | NMG | 男，60 岁左右，连云港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负责山地自行车项目            |
| 04 | SQQ | 女，28 岁，S 村本地人，旅游公司员工，主要负责对公接待讲解和社区一般性事务     |
| 05 | LSJ | 女，60 岁左右，S 村本地人，前任书记的妻子，访问时书记在一旁边干农活        |
| 06 | SSH | 男，65 岁左右，S 村本地人，原采石一场副厂长，手指上有采石时留下的伤残       |
| 07 | ZZ  | 男，40 岁左右，S 村本地人，现任 S 村社区副书记，主管党政            |
| 08 | DZ  | 女，35 岁左右，DS 街道公务员，旅游公司实际负责人，负责 S 村旅游开发招商引资  |
| 09 | PLS | 男，70 岁左右，S 村本地人，原上坊中学初中语文老师，毕业于 NSD         |
| 10 | XCS | 男，60 岁左右，S 村本地人，原 S 村木匠，现在村口经营超市            |
| 11 | CLB | 女，40 岁左右，在 S 村经营农家乐，同时在 S 村承包一茶社，接待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

## 二、采石为业：自然环境与村民生计

S 村位于青龙山与黄龙山之间的山谷，有着丰富的石灰石和石料资源。历史上的 S 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采石是他们生计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社队工业的兴起恢复了传统的采石工业（1977-2006），但不久后到来的工业狂潮，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只有当政府出面叫停时，S 村的生态环境才得以

恢复。

### （一）因地制宜：采石传统复兴

社队工业的复兴源于恢复经济的需要。社队工业是指“社”或“队”所办的企业，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就已存在，但发展要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社队工业的发展才开始走向正轨。S 村社队工业的复兴源于政府和村民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文革对城市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急需恢复生产秩序，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号召，提出了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政策要求，社队工业因而有了有利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文革的风雨并没有多大程度上扰乱农村的生产秩序，但因缺乏激励的组织方式，村民的生活水平仍旧停留在温饱边缘，村民渴望改善生活，村庄具备发展工业的内生动力。此外，村民面临的现实选择是，一个男性成年劳动力，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分，还有现金的激励，这个收入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随着采石一厂的效益增加，采石二厂也在不久后成立，接着一些生产小队也开始成立自己的石料加工厂。

历史上的采石传统和丰富的石料资源为采石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明清时代，青龙山龙耳石灰，便闻名于周边地区。访谈过程中，村民无不自豪地告诉我们，NJ 城墙便是由 S 村石灰和糯米的混合物浇筑而成。由糯米汁和石灰做成的粘合材料，号称中国古代的“混凝土”。一些年老的村民对我们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有水泥，他们的房屋建筑往往也使用石灰的混合物，不过现在这种材料已经没有人使用了。建国前，S 村曾有少数私营土窑，石灰产量很小。人民公社时期，全公社办起来 10 个采石场，有石料、石粉、石子、石灰石、红砂等产品。产品种类的丰富直接来源于水库建设的需要，而建设水库旨在改善 S 公社频繁旱涝灾害。公社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充沛，但不均衡，加之处于山谷地区，石质的山体并不存水，导致雨季时洪灾严重，旱季时旱灾严重。“以粮为纲”的目标设定，加之中央领导对各地水利设施改造的热情，S 公社大搞水库建设的会战工程。不过，水库建设的需要奠定了 S 村采石业的工业基础。在“大跃进”期间，集中人力开采石灰石，以供高炉炼铁。这一时期的产品较为单一，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较为严重，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1963-1966 年，以生产队为单位，S 村大队开办 17 个采石场。因文革的干扰，采石工业陷入停滞，直到文革之后，才得以复兴。

“到 1988 年，石灰平均日产量达 185 吨，年产石炭 62886 吨，产值 138.1 万元，利润 43.12 万元。”《上坊乡志》

### （二）工业狂潮：乡镇企业发展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中期是 S 村采石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77 年 S 村采石一厂建成，主要生产工业用石灰石和建筑石料。石灰是转炉炼钢的主要造渣剂，所以一般钢铁厂都需要大量石灰作为原料。S 村出产的石灰主要出售给马鞍山钢铁公司和 NJ 钢铁公司。建筑石料主要支援国家建设，采石场将开采下来的石块粉碎成石子，用于地方政府道路或其他公共设施建设。除此之外，随着建筑市场的兴起，S 村的石料也面向市场销售。原采石场副厂长骄傲地告诉我们，夫子庙地下商城建设所用的石子全都来自 S 村。据《上坊乡志》记载，到 1980 年，该厂进行企业改革，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形成开采、粉碎大片、二片、道碴、瓜子片、石粉生产流水线，经济效益逐年增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S 村相继开办了 S 村西埕采石场、S 村石料加工厂、S 村建设片砂厂、S 村李家片砂厂、S 村建国片砂厂以及 S 村瓦厂。据采石一厂原副厂长回忆：

90年4月26日，我开始做副厂长，当时一年能拿到5000元。当年大队拿18万进行分配，因为我是搞经营的，允许我拿这么多的。那时候人老实，再说有胆子，大家都清楚，我们也不敢贪污。（编号：06）

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采石场的效益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正值国家乡镇企业改制的政策要求，S村的企业在镇长推动下陆续开始转制，在交付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费用后，转为私人经营。一厂在1998年作为试点转制成功，效益在逐年增长，但对村庄的贡献也越来越少。为了降低成本，一厂老板雇佣了大量安徽籍工人从事生产，那些不愿意从事辛苦劳动的村民逐渐被排除在外。转制不久，随着“绿色JN”的打造，村内所有属于污染的企业被勒令关停。一番博弈后，政府最终控制了开山所必备的炸药，采石场失去了原料供应。截止到2006年12月，S村的采石及相关企业全部关停。

### （三）环境危机：被忽略的环境

采石业的复兴虽然带动了S村的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大量开采石料对山体和植被造成巨大破坏。如今的S村也能看到光秃裸露的山体，经过旅游公司包装，美名其曰为“雅丹地貌”。其次，在开采过程中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采石场在对石材进行爆破、破碎和筛分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粉尘，降低空气质量。于此同时，开采出的石料需用大型车运载，这种负荷使得乡村道路难以承受。在访谈过程中，村民对此最为不满，下雨时全是泥泞，天晴时则都是粉尘和噪声。再次，废料堆砌加之凿山烧灰，尤其是容易与水发生化学反应的石灰石，导致农田的污染。虽然这些环境问题的经济利益面前尚不足以影响人们发展经济的热情，但如果没有政府的叫停，危害便会在不久的将来集中爆发。最后，石灰石原矿开采量过大，无法加工利用，只能当作建筑石低价出售。有些矿场已发掘的资源不能全部开采，复又掩埋在废层中，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村民虽然对此有所不满，但在经济利益和集体观念的驱动下，并不认为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承受的，一种平衡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头脑。

于此同时，采石还带来了许多其他影响。例如炸山时对房屋的影响，临近采石场的人家，房屋会或多或少的损坏，墙体裂缝等不一而足，不过由于家里有人在采石场干活，加之修理房屋并不是一件难事，因此也没有引起特别的争执。工伤也是采石时不可避免的，原一厂的副厂长就曾在工作中失去一根手指，直到近两年才取得了五万元的补偿。

## 三、绿色转型：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更替

S村的绿色转型最早源于政府出台的两个环境政策，一是退耕还林，二是“绿色JN”。前者使得村庄绝大部土地流失，农民失去耕地，后者使得采石场关停，S村的村民基本失去了传统的生计。于此同时，如火如荼进行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S村的男女老少，S村的人口大规模流失，直至今日，常住人口不到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大规模流失，极大减少了环境的压力，使得S村的生态在十年之内迅速恢复，加之政府对环境的重视和整治，S村意外地走向了以旅游业为依托的乡村振兴之路。

### （一）环境政策：传统生计衰落

2003年退耕还林，S村基本失去了耕地。2000亩水稻田改种为白杨，每户只留几分地耕种蔬菜，传统S村的农耕历史就此结束。现在剩余的耕地不到二百亩，平均每人不到一分地，只能种些蔬菜。潘

老师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些水田一直就是耕地，根本不在退耕还林的范围之内，这里还另有隐情。据说当年 JN 区大搞开发区建设，县委书记私底下告诉自己的亲戚 S 村也将面临拆迁，于是书记的亲戚以退耕还林为由头，向村民租了 2000 亩水田用以种植白杨，租期 20 年，以期拆迁时能够获得补偿款。可是不知为何原因 S 村没有被拆迁，加之县委书记调离，租地的老板做了赔本买卖。木匠说，白杨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过去实在没有办法才用白杨打家具。潘老师笑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结论是老板每年还要亏进去 100 多万。不过二十年租期马上临近，这些土地去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2003 年的“绿色 JN”计划，S 村的采石场被关停。按照《上坊乡志》的记载，1988 年 S 村共有 206 人在采石场上班，当年的人口数为 1961，户数为 465，也就是说基本两家就有一个青壮劳力在厂子里上班，这还不算临时来厂子里帮工的村民。采石场的收入不菲，在社队企业时期，在采石场上班不仅有丰厚的工分，还有每月 10 元钱的补贴，据说当时进采石场还需要“过硬”的关系；副厂长在 1990 年便可以拿到 5000 元的分红，在采石场上班是村民羡慕的工作。同时，由于采石场是村办工业，村级政权有相当的收入，农民负担也并不严重，各项提留与统筹都可以从采石场的收益中进行支付。综上，采石场对村庄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关停企业遭到了各种方式的反抗。三年后，因为政府控制了炸药，才得以阻止采石场的继续生产。

出于政策的压力和理性计算，S 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传统生计的丧失是一个推力因素，火热的城市建设所创造的机会，是人口流向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拉力因素。外出打工，寻找新的机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采石场当时效益蛮好的，关了之后，大队没有钱发工资了，以前都是采石场拨得钱发工资，关了之后就没钱了，乡镇府来救济，大队的工作人员没钱了。”（编号：06）

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原本热闹的乡村归于平静。农田的荒废、工业的退场以及人口的流失，环境压力的降低以及政府不时的治理运动，使得 S 村的生态环境没有被继续破坏，反而得到了长时间的修复，余村变成了一个近于市镇、隐于乡野的郊野公园。优美的环境和一些明清时代的古建筑，比如潘氏宗祠和潘氏老宅等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村庄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前提。

## （二）替代产业：旅游产业确立

发展旅游业并非 S 村领导人最初的设想，而是一系列政策演变的结果。采石场关停之后，村集体便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政府项目补贴和租种白杨获得收入，S 村一度面临着进入经济薄弱村的行列的危机之中。

旅游项目的到来，为 S 村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从 2011 年开始的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再到建设特色田园乡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纯改造人居环境向带动农村发展的方向转变。2017 年，JS 省副省长 LSM 在 NJ 市召开全省的特色田园乡村推进会，NJ 市将任务交给的 JN 区，JN 区将任务拆解发包给各个街道，每个街道选点打造，这就是 JN 区“五朵金花”的由来。S 村虽然并不属于“五朵金花”，但作为 DS 街道仅有的涉农社区，S 村便成为街道的重点打造对象。村庄建设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 JN 区官网的官网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份《2017 年 QLS 郊野公园暨 S 村美丽乡村建设计划》，计划包括大大小小的项目 22 个，预算资金约达 1.8 亿元（其中上级补助资金 4670 万元）。其中统拆统建（3170 万）、老宅修缮（2590 万）、立面改造（2000 万）、道路改造（1660 万）和环境

整治（1340 万）为预算中的主要部分，约占总预算的 42%。

### （三）转型空间：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的更替离不开地方经济发展。首先，JN 区（县）在 21 世纪初便开始大规模开发工业园区，进行招商引资。大规模发展二三产业，使得 JN 区的经济发展一直稳居 NJ 市第一。S 村曾经也在拆迁的规划范围之内，但因耕地保护，并没有拆迁。

（为什么不拆了？）因为 JN 县搞得太过分了，我们 JN 县有一段时间谣传，JN 县的地图挂在国土资源部的办公室里面，引起中央重视了。拆的太厉害了，没有耕地了。政策上面是好的，但是下面瞎搞得太多了，这就是腐败。（编号：09）

其次，DS 街道属于 JN 区的主城区，DS 街道的经济也排在全省前十，S 村是其辖区内仅有的“经济薄弱村”。

S 村现在是 DS 唯一一个涉农社区，其他都是居民社区。他不像 xx 街道大多数以农村为主。DS 一开始是以工业开发，整个 DS 这个经济一开始就有工业开发区，包括主城区的商业配套，像万达就在 DS 的范围内。它的经济不会依靠农村这点收入。（编号：08）

一方面，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产业的准入门槛，污染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特别是政绩的推动使得街道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为 S 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四、旅游振兴：政治任务与村庄发展

现在的 S 村又热闹了起来，不仅有成群的游客，还有各级领导的视察。旅游项目也非常丰富，目前正在打造水上漂流项目、高档旅游养生别墅以及华东最大的山地车竞赛基地。通过发展旅游业，S 村实现了产业得绿色转型，告别了开山采石、凿山烧灰的旧时代。但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中与环境有关的便是社区内的垃圾问题。

### （一）项目进村：行政主导的公司开发

目前的 S 村大大小小的项目有 100 多个，但最为核心的招商引资则是由 DS 街道实际控制的旅游公司负责。旅游公司的负责人 DZ 主要复杂 S 村旅游项目的招商引资，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就曾几次被上门寻求合作的老板所打断。关于旅游公司的运作，公司负责人给我们介绍到：

…我是在编的政府人员，我们的公司也是街道层面成立的（公司法人并不是政府人员）。你们学生可能不懂，政府主民生，园区主经济。比如为什么要成立 JN 经济开发区，是因为政府层面不好做这种土地买卖呀，涉及到金钱上的交易，必须以公司为平台进行。那么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也是这个目的，公司要牵扯一些业务上的东西，必须要由公司这个主体来运营。你比方说生产经营活动吧，我的营业、收入和支出，都是通过公司来运作的。社区本身没有这个功能，社区连发票都开不出来。（编号：08）

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从社区的角度印证了公司负责人的说法。

…这个旅游公司是街道专门成立出来负责这一块的。社区是服务老百姓的，有些事我们政府不能做，所以成立这个公司，就能承接业务了，以后就能收费。旅游公司收钱盈利，就可以反哺社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集体收入也就得到了保证。（编号：02）

有着政府的支持，旅游公司虽然目前尚没有盈利，但是已经成功引进了许多大型项目。除了 DZ 外，旅游公司还有两名员工，她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接待来 S 村视察的领导们，同时负责处理社区的一些杂

物。她们对工作颇有不满，每月只能挣到 3000 多一点的工资，年底也没有分红，唯一的希望都是希望通过现在的努力，来换取正式的编制。

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平时社区的工作也要做，更多的是接待一些领导。基本是对“公”比较多。比如说，今天上午有市交通局的领导参观和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今天下午省领导也要来参观。现在来到的人太多了，我们根本就忙不过来。（编号：04）

在我们访问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时，有游客进来咨询，但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她们详细介绍，而是懒洋洋地打发他们离开，态度十分冷漠，并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看的。面对游客的抱怨，工作人员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游客只好气冲冲地离开。

### （二）政策典型：互相加码的政治任务

S 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还是一项行政和政治任务。在行政方面，江苏省委响应中央号召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NJ 市将任务发包给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 JN 区政府，JN 区政府将任务拆解，将建设任务发包给各个街道。在政治方面，“古风 S 村”已经成为政策试点，被树立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典型。2017 年 8 月，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李强来 S 村视察，并做出了重要批示，此后 S 村的建设便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成为各省市学习和参观的对象。在我们的调查期间，就遇到了省财政厅厅长、市招商局局长以及各单位参观学习的队伍。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平时社区的工作也要做，更多的是接待一些领导。基本是对“公”比较多。比如说，今天上午有市交通局的领导参观和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今天下午省领导也要来参观。现在来到的人太多了，我们根本就忙不过来。（编号：04）

所以，S 村的建设从一个例行公事的行政工作，变为了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这也给社区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村官小王跟我们说，“5+2”、“白+黑”成为他的常态，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一周没有休息的时间，不仅要处理村民的各种事情，还要应付各级领导的检查。我们的访问也不时被进来办事的村民所打断，最后以接市里来的领导而告终。在与书记熟悉之后，书记也曾劝我们不要在基层工作，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难以应付。不过在谈及自己的成就时，便是另一番说辞了。学界曾提出“层层加码”的概念，意指在压力型政体下，上级政府为了保证下级政府完成任务，在拆解和分配任务时，倾向于给下级增加任务量，导致政策越往下执行负担越重。通过与书记的聊天发现，S 村的建设不仅存在层层加码的现象，还存在相互加码，即 S 村建设的越好，上级政府对 S 村的要求更高，这种水涨船高的现象，使得村级领导不得不时刻紧张起来，不能出现半点差错。这种加码不一定是被动的，也有主动的成分。超额完成上级任务的倾向，是出于价值的实现还是出于晋升的动机则不可得知了。

### （三）环境压力：美丽乡村的环境问题

旅游业依托于 S 村的自然风光，因此 S 村领导对自然环境高度重视。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利用项目资金进行生态修复；另一方面定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在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垃圾的处理问题。垃圾的主要来源有四，其一为村民的生活垃圾，其二为游客所制造的垃圾，其三为旅游开发和房屋改造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其四为农家乐经营过程中所制造的垃圾。

传统的 S 村是没有垃圾之说的，每家都有一个“灰坑”，所有的废料都会被堆积在里面积肥，然后

回填到农田，废料的处理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但随着城市消费品的下乡，城市垃圾也随之下乡，而乡村却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难以降解的垃圾。

生活垃圾特别多，都有人拉，三天不拉走，那就成堆了。以前垃圾没这么多，垃圾都压田的，猪粪啊、人粪啊什么都是下田的。后来就开始买肥料用，现在没有地里也不需要肥料了。以前我们每家都有个灰坑，把什么草木灰、豆壳啊都往那里倒，然后需要的时候下田。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垃圾就更多了。而且现在建筑垃圾也比较多，比生活垃圾还多。（编号：06）

我们对垃圾桶的观察证实了村民的说法可能还有些保守。垃圾车每天来收一次垃圾，而我们在中午看到的垃圾桶，都是被很多的建筑和生活垃圾包围。为了处理垃圾问题，S村社区雇佣了三十名左右的清洁工人维护环境，并在村庄各处设立垃圾桶。

相对于干垃圾（社区也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垃圾桶分为干湿垃圾），农户和农家乐所制造的湿垃圾的处理则更难以处理。村民们将不同的垃圾都堆放在一起，加之垃圾总量随着游客的增多逐渐变大，目前的清运系统难以及时清理，影响了村庄的环境卫生。

## 五、探讨：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目前来看，从采石业到旅游业，S村已经成功实现了绿色转型，走上了一条“振兴”的道路。但如果回溯其转型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S村的转型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推动的结果。无论是环境政策或是振兴战略，其本质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依靠政府单方面的而实现的转型是否是可持续的。一味地批判政府，而忽视政府采取行动的历史情境是不可取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这些已经形成的事实来分析其存在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行一些设想。由此，在本文看来，S村在未来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限于目前的成就，在其振兴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成为阻碍乡村的持续发展。所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仍旧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从S村的案例来看，限制性因素主要有三。

其一，政府主导的体制背景，使S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无论是采石业的关停，还是旅游业的发展，政府都起着主导性的因素。政府的项目支持使得景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一方面，旅游业可以快速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一旦政府减少投入，或者放弃支持，那么S村的旅游业是否能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实现盈利。不过，既然称其为是一种体制背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体制就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失，但发展的脆弱性却一直存在，一旦政府不能承担其成本，旅游公司的自主经营则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其二，发展需要村民的参与，然而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却少有参与。村庄的发展除了需要外在条件的支持外，村民对村庄建设的认同与参与也格外重要，这是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这种内生的动力在村中老一辈的人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年近70的潘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恢复高考后，潘老师便考上了市里一所不错的师范院校，毕业后便在县里最好的初中当语文老师，现在退休已经十年。退休的潘老师并不清闲，而是投入到忙碌的乡村建设工作，除了收集、整理、创作和宣传有关村庄的文化故事外，还积极投入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帮助村委出谋划策，协调邻里之间的矛盾。不过，这样的情况较为少见，更多的村民关注点往往是利益分配，例如拆猪圈会补偿多少，路从谁家门口过以及有没有拆迁的可能。更为年轻的上学一代，他们对村庄的未来则更为陌生。在访谈过程中，村民普遍对现在

生活状况有所肯定，认为现在的环境变好了，各项设施也有所改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但是 S 村人并没有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回到乡村。S 村的人口特征依然于中国大大小小的乡村一样，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常驻人口不到户籍人口的五分一，不过由于时间短暂，目前仍然不能妄下结论。不过，我们已经能看出来，对 S 村的建设，村民普遍没有热情，一方面是可观条件的限制，诸如时间与能力等；另一方面，村委制定村庄发展规划是一个封闭的过程，村民少有参与。

其三，旅游项目的到来，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村庄内部的分化，利益的纠葛也使得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充满张力。可以依据旅游业给村民带来的收益与否将村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益者，这些主要包括社区干部，拆迁户以及商店的经营者，旅游的发展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他们你是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支持者。第二类是相较于第一类有明显收益的村民而言，只有少量的收益，对比之下，巨大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对旅游业的发展较为冷漠，并且抱怨有人在项目的规划中做了手脚。第三类为村庄的受损者，我们的访谈并没有遇到第三类人，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收益，只是生活设施有所改善，对比那些在项目中有巨大收益的人而言，他们的收益也被忽视，甚至感觉到社会的不公。村庄内部的分化，除了个人和家庭外，自然村之间也存在这利益的分化，例如被重点打造的王家村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旁边的自然村则少受益。除了村庄内部的分化，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外村人开始进入余村的市场，开始了与本地人的竞争，而且这种趋势只能是随着旅游业发展而愈来愈加剧，集体的保护主义和市场的丛林法则，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更多的碰撞。

综上，对于 S 村的发展，政府在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需要培育产业面对市场竞争的自主经营能力；在村庄的建设过程中要促进村民的参与，这是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力；最后，转型时期面临利益的重新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协调村庄内部之间的矛盾，协调好村庄内外之间的关系，需要重点关注。

#### 参考文献：

[1]王仲模，1990，《上坊乡志》，南京：南京县上坊乡人民政府。

☆ 作者简介：马超群，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汝 艺



# 四素人生：哈尼梯田的生态与危机

——以元阳县多依树哈尼梯田为例

郑玉婷

---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哈尼族则为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借鉴。哈尼族发挥少数民族的生态智慧，在不适宜的地形中开凿梯田，创造了农耕文化奇迹。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有机循环的生态系统。四素同构系统体现了人文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高度和谐统一，为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典范。同时，哈尼梯田也体现了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他们在创造自然、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环境，创造了独特的梯田文化，也创造了独特的生态文化观念。然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哈尼族的一些传统观念也在逐渐发生一些变化。

**关键词：**哈尼梯田 四素同构 生态系统 文化

---

## 一、导言

### （一）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理就是强调要以系统的思维来治理生态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的系统。在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人类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时无刻不处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之中，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就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话题。同时，山水林田湖的系统治理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不同的环境塑造着不同的行为观念，因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生产和耕作方式，也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理念。在汉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有了新的谋生手段，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很多人放弃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而从别的行业，造成很多土地的荒废。在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如内蒙古地区，由于无节制地过度放牧，造成草场的荒漠化，陷入“公地悲剧”，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生态系统的破坏。这些无不启示着我们重新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探索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高度完美的和谐。而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典范。

哈尼族，原本是游牧民族古羌族的后裔，但是由于民族内乱、战争加剧等原因，他们不得不从青藏高原南下，迁至哀牢山区，与红河州的土著居民融合，开始了他们的定居农耕生活。这里山高林深，偏僻险阻，少有外界的侵扰，他们在这里安居。然而，高山高原的地形并不适宜农业生产，哈尼族发挥民

族智慧，依山就势。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他们因地制宜，在有泉水的地方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并且在有水的地方建起了村寨，安了家。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即四素同构体系。森林涵养水源，流水通过村庄、梯田、沟渠一级一级地流到山谷，在山谷高温地区经过阳光照射，形成水蒸气，蒸发至高空形成降雨，形成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哈尼梯田文化体现了在不适宜种植的地形条件下，人们是如何发展民族智慧，因地制宜地改造自然、利用资源，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哈尼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应的梯田农耕文化。他们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将对自然的崇拜内化于自己日常的行为之中，形成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念。自然环境塑造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改造自然。在他们的行为之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也体现着文化与环境的互动融合。

哈尼梯田是哈尼族日常生产的平台，也是他们生活的舞台，他们的文化也依托于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成为他们生产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哈尼族人与当地的环境有机融合，四个要素缺一不可。

## （二）理论回顾

生态人类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其先驱者为斯图尔德。他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它不仅允许或阻碍文化发明的运用，而且往往还会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社会适应。生态人类学强调环境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环境塑造着文化，同时文化也在改造环境。

宋蜀华认为，生态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包括：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与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是历时性的，也可以是共时性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产生了生态系统论，生态系统就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地球上的森林、草原、荒漠、海洋、湖泊、河流等，不仅它们的外貌有区别，生物组成也各有其特点，并且其中生物和非生物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物质不断循环、能量不停地流动的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在生态系统中，人类、其他生物及非生物互为环境、相互有影响。人对环境有影响，也受到环境的影响。

而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系统体现了环境和人的有机统一，在哈尼梯田的文化创造中，体现着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哈尼族人发挥民族智慧，克服地形限制，改造梯田以发展生产，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他们的农耕技术。另一方面，梯田也在塑造着人，在人们逐渐适应梯田农耕生活的同时，产生了独特的梯田文化。人与自然高度融合，密不可分。

## （三）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种方法，本文主要是通过定性的研究获得调查资料。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研究方法开展调查。

1.深度访谈法。深度访谈法是本次调查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哈尼村民、村干部、梯田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访谈，对哈尼族的历史、文化、梯田生产耕作、梯田保护

等一些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2.观察法。观察法主要是通过田野观察，获得感官认识。笔者通过在多依树村田野的观察，近距离接触当地的村民，了解哈尼族的文化；通过对梯田景区的实地观察，了解梯田生态系统和梯田耕作方式。

3.文献法。文献法主要分为前期的文献收集和后期的文献收集。前期主要是在新闻、知网上查找一些关于哈尼梯田的背景知识，对哈尼梯田有一个大体的认识，为调研做好准备工作。后期主要是通过收集一些县志、统计年鉴等资料，对哈尼梯田进行补充调研，以便对哈尼梯田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 二、调查点基本情况

### （一）元阳哈尼梯田

元阳县位于云南南部，红河南岸，东经 102°27′至 103°31′，北纬 22°49′至 23°19′之间，总面积 2189.88 平方公里，东接金平，南连绿春，西与红河、绿春毗邻，北与建水、个旧隔红河相望。全境属哀牢山脉南段，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海拔 280 米至 1800 米地带，村寨密集，梯田层层。元阳县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类型，境内温差小，四季不分明，干湿季分明，多雨区和少雨区明显，水平分布复杂，垂直差异突出，高山区常年多雾，呈“云海”奇相。元阳哈尼梯田位于红河州南部，红河南岸，总人口 38.6 万人，国土面积 2189.88 平方公里，世居哈尼、彝、汉、傣、苗、瑶、壮七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88%，哈尼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53%。

哈尼梯田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是自然和人文因素交织的杰作。哈尼梯田的四要素——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哈尼梯田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同时，它又是一个人文学景，体现着哈尼族的民族智慧。哈尼梯田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文化体系，人在梯田里面劳作，进行着生产生活活动，被称为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2013 年，哈尼梯田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吸引着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 （二）多依树村概况

多依树村位于新集镇东部，临近东观音山，国土面积 10.47 平方公里。总户数 861 户，4233 人，其中，劳动力人口 2540 人，有 8 个自然村。八个自然村从上面往下排是普高老寨、普高新寨，然后是村委会所在地猴子寨，再往下就是彝族在的平安村和小寨，再有三个寨子都是哈尼族，有上寨、下寨、牛保。村中人主要是哈尼族和彝族，以哈尼族居多，哈尼族和彝族占比大约 4:1。村中以卢姓居多，通过村中各种关系网络的连接，都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

多依树村的海拔为 1870 米，年平均气温 14℃，年降水量 1370 毫米，气候条件适宜种植水稻，他们的主要作物为水稻和玉米。村庄总耕地面积 3332 亩，水田面积 1329 亩，人均耕地面积 0.8 亩，年人均收入 6283 元。人多地少，使得村中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家中的梯田主要由老一辈的人打理。靠近村庄主干道的村民受梯田旅游资源的辐射，大多改造家中的住宅用以经营民宿和农家乐。他们的住宅以三层为多，背靠森林，群山环绕，隔着门前的道路与梯田相望，视野较为开阔。

多依树梯田景区位于县城东部 55 公里，新集镇东部 25 公里，是观赏梯田日出的最佳景点。景区 6000 多亩连片梯田形成的自然景观，是聚云海、梯田、山寨及 16000 多公顷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为一体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一、二级保护动植物保护区，是观赏日出、拍摄云海、梯田、山寨最佳的景区之一。每年春节期间和国庆节后，是多依树村梯田旅游的旺季，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宿产业的发展。

### 三、四素人生：哈尼梯田四素同构系统

哈尼梯田是一个有机循环的生态系统。海拔最高的是高山森林，用以涵养水源，村民们在半山腰建房安寨，建立村庄，而在村庄之下，便是人们耕作生产的梯田。梯田之下还有河流，河流和梯田之上的水分通过蒸发以后上升，遇到冷空气后迅速地形成降水，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四素同构系统的打造充分说明了哈尼族人对生态环境的改造，是人们适应环境的过程。

#### （一）森林

哈尼族谚语“树是水的命根，水是田的命根，田是人的命根”，充分说明了哈尼族对“森林—水—梯田—人”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刻认识，对于森林的利用和管理，他们也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

##### 1. 森林的划分

茂密的森林植被吸纳了水气，汇成溪流、泉水，流入水沟，灌溉了哈尼梯田。对于森林的开发与利用，他们也有着独特的方式，哈尼梯田的森林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水源林、寨神林和生计林。其中，只有生计林是允许他们采伐的，用来获取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水源林和寨神林是严禁砍伐的，并且会在里面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之中，哈尼族的信仰并未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哈尼族认为万物有灵，他们敬畏大自然的一切，信仰树神、水神、山神等。

水源林是哀牢山特有的中山温性常绿阔叶林，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是梯田稻作所需的绿色水库。水在哈尼族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在他们心中，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生命之源。而作为涵养水源的林地，更是受到哈尼族人的保护与珍惜。水源林是不允许砍伐的，但是人们可以在里面打猎、采蘑菇等，采集一些必要的食物进行营养补充。

生计林一般位于村寨的周边，是哈尼族的多功能用林，主要包括风景林、用材林和薪炭林等林地。其中，风景林分布于村寨周围，通常为果树林和竹林，为村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生产生活用材。

寨神林是寨神“昂玛”栖息的神林，一般位于各个村寨的后上方。寨神林作为祭祀林地，同时也兼具着涵养水源和美化环境的功能。在寨神林中，人们一般会选择一两棵树枝挺拔苍劲的古老常青树作为寨神的化身加以保护和祭祀，并且人们会在寨神树下放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作为祭坛，在祭坛上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主要由莫批来主持，在祭坛上放一些祭品，杀一两头猪进行祭祀，并进行吟诵，以祈求寨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这体现着哈尼族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希冀，同时也体现着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

##### 2. 森林的保护

哈尼族的森林保护是与他们的神灵崇拜信仰体系紧密相连的。他们认为万物有灵，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将森林仪典化和神圣化，同时这些信仰也内化于他们的行动之中，使得他们自觉地保护森林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此地处高山之上的哈尼族就十分信仰山神，而山神的主要依托为树，于是他们会在寨子中选择一棵枝繁叶茂、苍劲挺拔的“龙树”用以祭祀，在哈尼族的原始思想中，寨神林只有本宗的男性可以进入到里面，女人和外人不能进入。

林权改革之后，森林有自留林和公有林之分，对于自留林的管理相对来说要松一点。之前人们家里的能源燃料类型主要为柴草，砍树的行为相应地会多一点，而现在由于人们家里主要烧气，烧柴的少了，人们乱砍滥伐的行为相应也减少了。如果家中建房、办红白喜事需要用到木材，一般是要向村委会申请，

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砍伐，没有得到批准就砍伐则会受到相关的处罚。

哈尼族每个自然村都有护林员，护林员的职责主要是每天到周边的森林里去巡查，看有没有人乱砍滥伐，并对乱砍滥伐者进行相应的制裁，制裁一般是由村民共同商议决定的，这也是人们利用村规民约相互监督的一种体现。

## （二）村寨

### 1.村寨选址

村寨建立在半山腰，这里的气候条件相对较为适宜人们居住，于是人们就在半山腰地带集中建屋扎寨。居住在半山腰，方便人们对梯田进行管理，也方便人们在高山林地中采摘，这也是与梯田文化息息相关的。

哈尼族十分注重风水，他们村寨的选址历来也都有自己的地理风水观，在他们看来，寨子后面要有坚实的“靠山”，同时中间不能有河流和山溪截断，寨子的左右得有走向延伸的山脉作为屏障。左右山梁怀抱的向阳凹地是福地，适合建屋扎寨。寨子前面有横亘的山脉，好似门槛，这样才会使寨子兴旺，人丁兴旺。

通过对当地村民的交谈，我们也发现他们对风水观念的重视，他们认为风水对村寨的整体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之前我们那边的山上传说过有凤凰，那里的风水特别好，你看，现在这开发弄民宿，那边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所以客源很好，在那里建屋的都相对比较发达了。（7.3 日多依树村卢先生访谈录）

### 2.建筑风格

哈尼族的传统建筑结构是蘑菇房，他们就地取材，用土坯砌墙，用竹木上梁，屋顶用茅草铺着，整体呈土黄色，具有很好的保暖性和散热性，冬暖夏凉。他们的传统住房是三层式的结构，最下面是关牲畜的，中间一层是供人居住的，最上面的一层则用来堆放一些粮食和农具。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这种传统的蘑菇房也变得越来与现代化。但在阿者科，这种传统的建筑风格保留的相对比较完整。阿者科作为遗产区里面申遗的五个重点村落之一，注重对传统村落风貌的保护。对老旧建筑的危房改造，他们也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力图保留和还原原始的蘑菇房的风格。

我们修那个房子都是请云南理工大学还是哪个学校的那些专家学者，有的房子它已经不具备修缮的条件了，但是他的原来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原来所用的每一块石头，它都是在拆除的过程中标记号，12345 标记好了后，后来建的时候每个石头在哪个位置，它都是按照原来的来修建，修旧留旧。不能扩建，不能改进。就是说修了还保全以前的那种风貌。但是所用的材质这一块提升了，老百姓他家里面木板都没用了，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材质都是我们这边最好的桉树、还有松树，用最好的材质。修一栋房子，有修栋房子将近要投资三四十万。（7.4 梯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访谈记录）

而现在哈尼梯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了与整体环境相协调，相应地也对住房的整体规划作出一些要求。现有的住宅需保留哈尼族的特色，并且不能超三层。

### 3.生计转变

多依树村传统的生计模式为农业生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多地少、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从事农业耕作，他们走出家门，外出务工。

梯田的开发，给了当地村民一个很好的增收机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赏梯田，相应地，人们对食宿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外来者发现商机，在梯田景区附近开旅店，本地人受到影响，也在自家开起了民宿，扩展了他们的谋生渠道。外来思想与本地思想碰撞，使得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转变。

### （三）梯田

#### 1. 梯田的开垦

哈尼梯田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高山地形并不利于水稻的种植，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又适合水稻的生产，于是哈尼族人克服地貌的影响，探索在高山种植水稻的经验。元阳哈尼梯田开垦于坡度 15-75 度之间的山坡上，形状和大小根据山势地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坡度缓土地面积大的地方开垦大的田，在坡度陡面积小的地方则开垦小田，从山上往山下，层层开挖，一座山坡上的梯田最高达 3000 多级。挖了田之后修筑田埂，用土饼依次垒起来，再用脚或者锄头踩实。根据坡度的不同，土饼的高矮、厚薄也有所差异。地势越高的地方，坡度越陡，田埂也需要不断地加厚。

#### 2. 梯田的维护

梯田是哈尼族人生产生活的资料，因此他们都十分爱惜梯田。哈尼族的土地观念不同于我们汉族，在他们心中，土地是祖先一辈辈传下来的，因此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土地。如果他们外出打工，顾不上自家的梯田，他们会将梯田转交给自己信任的人来打理，并且给他们一笔照看梯田的费用，让别人替他们管理梯田，而种的稻谷也归他人所有。这与我们传统的认知方式是存在出入的。在我们的观念中，荒废的土地一般闲置，如果有人愿意种，就送给别人种或者低价租给别人种，而哈尼族人则专门给钱让别人帮他们照看梯田。他们认为，梯田是祖先世代传下来的，也是他们的生活来源的一个保障，以后在外面打工回来，还得靠种田来维持生计。并且梯田的养护不同于地面上的田，不及时养护梯田，梯田就会发荒，存不下水，再想恢复起来就更加困难，维护成本更高，所以人们宁愿每年给钱找别人帮忙照看梯田。

梯田需要人们定期来维护，受地形的影响，哈尼梯田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只能依靠人工进行耕作。每年都要挖田、翻田埂、修田埂等，水稻收割完之后，便翻挖梯田再放水泡田，以保持地力，也防止田埂干裂崩塌。遇到大雨冲毁了田埂，还要对其进行加固。梯田加固的方式是在原有梯田的界线上先放一块砖块或者石头，以大概确定梯田的边界。等有时间的时候，人们会将梯田的田埂用土饼垒实，或者堆积石块，或者砌上水泥。所以在不断地对梯田进行维护翻修之后，梯田的形状也变得大小不一。

#### 3. 梯田稻作文化

高山海拔对作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海拔不同，水稻的产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海拔越高，温度越低，对作物的生长不利，因此稻谷的产量也就越低。哈尼族的稻作有旱稻和水稻两种类型，为了适应高山气候，他们培养了不同品种的稻种。有的能适应高山低温冷水区，有的能适应半山中温区，有的能适应河谷热区，更为独特的是，有的品种能适应所有的区域。相比于陆稻，哈尼族水田稻作技术更为复杂更加完善。根据梯田海拔高度的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等选择不同的稻种，因地制宜地进行作物的生产。

根据海拔不同，它种的品种不同。但是的话至于他们具体种什么品种，我还真不清楚。但是像有的

品种，比如说像他高寒地地区的品种，你拿去比较热的地方就种不了，像我们这边的多依树，你们看到的秧苗现在还绿油油的，这么高。像攀枝花那边那个方向，可能还过一个礼拜就可以打谷子了，可以收了。像我们南沙下面跟周边的地方基本都收完了。所以它气候不同，它种的品种不同，产量不一样，营养价值也都不一样。（7.4 刘先生访谈录）

梯田里主要种植红米、紫米、糯米，其中以红米居多，元阳的梯田红米是最早驯化的古稻，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元阳梯田红米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也成为元阳独特的商标品牌，加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极大地提升了元阳红米的价值，增添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哈尼族人还有换种的传统，为了保证产量，稻种种三年左右就会交换一次，他们可能会跟本村或者其他村寨的村民交换，也可以去购买。他们会将自家地里长势好的、健壮饱满的稻种留下来做种，并跟别的村民的优良稻种作交换，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改良稻种，保证水稻基因的多样性，同时也提高了稻种的适应性，提升了水稻的品质。

你就看哪些长势较好，口感较好，比较容易操作一些，不易倒伏。这个地方风比较大，就是八九月份，收穗的时候是吧，风大的话就倒伏了，是比较费力的，还要看病什么的。现在要求比较高一点。以前那些村民的话是不太出门是吧，我知道。留着好的选过来就行了。现在是科学化，哪些品种好吃，我们就选择这些。（7.6 日张先生访谈录）

#### （四）水系

##### 1.开凿水渠

哈尼梯田位于山区，高山流水，水资源十分丰富。而农业耕作也需要大量用水，哈尼梯田受地形的影响，不便于人们在田间浇水灌溉。于是，他们为了充分利用高山上的水资源，他们从高山上逐级往下开凿水渠，将高山林间山涧和河流里的溪水相连，以使流水得以层层灌溉梯田。他们在山间溪沟处开挖串珠状水塘，再修建引水沟渠引水下山，顺着山势，自上而下灌溉。

他们在开凿沟渠的时候利用地势发明了“流水开沟法”。在开凿沟渠的时候，目测大概的沟线，一边沿着线开沟，一边引水，利用水流来保持沟的水平。沟渠修到哪里，就能把水引到哪里，从沟头引水至沟尾，把水引到需要灌溉的土地上。遇到难以开凿的大石块，他们便采取“火攻破石”的方法，在石头上放干柴，烧热之后浇水在石头上，通过热胀冷缩把石头炸成小块。在引水的过程中，难免会夹杂一些碎泥沙，于是哈尼族在梯田入水口处挖一个水池，流水流过时，泥沙便经过水池沉淀。

##### 2.水资源的利用

哈尼族的村落附近就有溪水，水资源十分丰富，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他们在村落中修建了水碾、水磨、水池等，将这些水储存起来，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

哈尼族人有着特殊的肥料观念，在他们看来，水即是肥。高山地形使得溪水顺着一级级的梯田流下来时产生巨大的能量，哈尼族也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靠这些流水所带来的动力冲肥。旧时，哈尼的各个村寨都设置有积肥塘，用于堆积牲畜粪便和一些枯枝烂叶用于沤肥，他们利用山区地形的优势，在梯田需要施肥的时候，把梯田用水引入积肥塘，进行搅拌，流水就会带着农家肥顺势而下，流入梯田之中。有人专门负责把这些天然肥料引入梯田，叫做“赶沟”。但是现在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会使用化肥来进行施肥。

哈尼族还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在梯田养鱼、养鸭，形成稻鱼鸭共生的生态系统。在插秧的时候，他们便将鱼苗、鸭苗一起放进梯田，使得鱼苗和梯田共同生长。收割的时候，他们又将梯田上方的水口堵住，放干水后以便抓鱼。梯田中的鱼以田中的浮游生物和稻谷花粉为食物，同时鱼的排泄物又可以给田地施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政府每年会给他们发放鱼苗或者鸭苗，鼓励他们利用梯田进行养殖，增加收入。

### 3.水资源的管理

为了减少人们梯田的用水纷争，使得梯田能得以均匀地灌溉，哈尼族人采取木刻分水法。他们在水沟引水处设置分水器，一般采取木头，也有石头材质，但是木质分水器更容易雕刻分水。他们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沟长，由沟长控制木刻分水器，其他人则不允许碰分水器，沟长则主要负责村落水资源的分配以及疏通河道。他们以每条水沟的总量、开沟时各个村户投入的劳动力以及梯田的面积为依据，刻出不同的宽度和深度，使得水能量化分配，均匀地流入各家的梯田中，实现了梯田灌溉用水的公平和合理分配，避免了用水纷争，维护了村庄的和谐，同时也体现了科学的“水位——流量关系”经验。

水是顺着梯田一级一级地流下来的，在梯田日常的放水、引水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纷争，这时就需要村规民约来进行约束。需要放水的时候，跟其他的村民提前沟通好，轮流放水。如果别人不需要放水，则把他家的水口堵起来，在引水放水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树枝、疏通水口等方式来改变水的流量和方向。一般而言，大家都会相互配合，共同维护梯田的用水秩序。

#### （五）作为整体生态系统的四素

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是人们不断改造自然、创造自然的结果。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个要素共同组成了哈尼梯田的生态循环系统。其中，他们借助于水的力量，将这几个要素结合起来，森林涵养水源、流水经过村寨灌溉梯田、流至谷底水系，河谷水蒸气在高温下又形成降雨，循环往复。四个要素在功能上可能相互区分，但是却有一个整体的目标，共同维护着梯田的生态循环系统，并且四个要素缺一不可。

他们在开垦山区、开凿梯田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建立了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系。紧密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貌特征，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梯田农耕生态循环系统。哈尼人会充分地考虑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当村寨人口过多时，他们便会划分一部分人出去，重新建立村寨，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在选择寨子的位置时，他们也会充分考虑气候环境等因素，村寨两旁常年山泉流淌不止，村寨下方是供人们进行生产耕作的梯田。在梯田的耕种过程中，他们遵循轮耕养息、循序渐进的原则，割完稻谷之后，便让田常年泡在水中，蓄水固肥，并且每年对梯田进行精心养护。为了提高稻种的适应性，他们定期换种，提高稻种的品质和基因的多样性。在村寨的上方，是哈尼族村寨灵魂“昂玛”的栖身之所，因此他们格外重视对森林的保护，以求寨神庇佑村子的平安兴旺。为了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他们从高山开凿沟渠引水，并且发明木刻分水法，维护了村寨的和谐。他们因地制宜地对地形条件进行改造利用，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农耕文明中，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哈尼族人重视田地，即使有别的谋生手段，他们也会定期对梯田进行维护管理，自己没时间打理时，会请别人照看。一方面，这种土地观念体现着哈尼族人对祖先的敬重，对祖宗留下来的资源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而对比我们汉族地区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哈尼族对土地的珍视无疑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作为农耕大国，土地是我们的赖以生存的资本，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无疑会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土地，每一种生态系统都是如此，各个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我们要以系统的观点来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四、梯田环境对哈尼“环境观”的塑造

哈尼族梯田的文化特征是在他们世代耕种、与自然的相处中形成的，体现着他们的农耕文化，并且这种农耕文化也指导着他们进行农事活动，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哈尼族以村寨为舞台，形成了文化演绎延续的人文系统，周而复始地演绎着他们的节日仪式、祭祀活动、原始信仰、歌舞艺术等，形成自然系统和人文系统的和谐。

##### （一）敬畏自然与生态保护观念

哈尼族长期以农耕为生，依靠自然万物指导他们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他们对自然十分敬畏，认为万物有灵，并且进行崇拜祭祀。这一点在他们文化象征符号日月盘中也有所体现。日月盘中间是月亮，大的整个圆盘代表着太阳，月亮旁边是一圈星星，日月代表着父母，也代表着天地。日月盘中有几个动物图腾，一个是白鹇鸟，白鹇鸟在哈尼文化中是最神圣的动物，被认为是类似于造物的存在，在哈尼村寨的选址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有的人也认为那是鸡，鸡叫就意味着天亮，预示着新的一天开始，他们也要开始劳动。日月盘中的螃蟹意味着水神，有水他们就能够生存，可以建村立寨、开垦梯田。而青蛙则为气象神，指示着天气的变化，方便农业生产。日月盘图案上的鱼则代表万物之母，同时也有五谷丰登的意味在其中。他们将大自然的一切赋予特殊的意味，并且加以崇拜。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生命，都有灵性，他们也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这些神灵，祈求美好的生活。他们也将这些自然图腾刻在他们的服饰之上，哈尼妇女佩戴的银制品的图案主要为银鱼和螺蛳，这些图案体现了哈尼的农耕文化，也表达着他们希望族人兴旺的美好愿望。

在传统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他们所有的生活来源都取自于自然，他们对自然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因此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而非征服自然。在一些灾害面前，他们无力抵抗，于是便通过对这些自然事物的祭祀膜拜来祈福，对自然产生敬畏之情。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使得他们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

##### （二）“山水林田湖”五位一体的生态观

他们崇敬自然，信奉树神、水神、山神，并且将对这些神的敬仰内化于行动之中，对水系、寨神林、水源林严格保护，自觉地维护生态环境。对自然的崇敬使得他们形成“山水林田湖”五位一体的生态环境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而对于哈尼族人来说，山、水、林、田、湖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高山孕育森林、森林涵养水源、水源养育着梯田也养育着整个哈尼族。

对于森林的保护，一方面，他们通过创造“寨神”的方式将其神圣化，并且对寨神林进行严格的准入约束，防止对森林的破坏，保护了森林。在每年的昂玛突节，会进行专门的祭祀仪式，以祈求寨神的庇佑。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设置护林员专门对森林进行管理，对人们乱砍罚的行为进行约束。从思想观

念上和行动上使人们保护森林资源。

对于水的管理，他们有专门的水神，通过祭水仪式将其与水与人紧密结合。在多依树村的普高老寨，我们看到了专门的水井和竖立的“祭水”的木牌，他们崇拜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命带来了活力，他们敬畏水的力量及其自然精神，视泉水中的螃蟹和石蚌为神灵，在每年的“昂玛突”、“矺扎扎”节等重大节日，会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

他们认为，在山中也有统管群山的山神，为了使山神不要施威发怒，他们每年也会进行祭山仪式，以祈求山神保佑村寨风调雨顺。

通过敬畏自然、神灵崇拜，他们将各个生态系统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村寨选址时，他们也会充分考虑这些自然资源，使得村寨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机融合，从而形成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位一体的空间布局。不同的生态子系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但是却又高度和谐统一。

### （三）梯田农耕仪式

伴随着梯田耕作，哈尼族还形成了一套很规范的礼俗活动。祭秧田、拔秧礼、开秧门、栽秧礼、祭田神等，还有关害虫礼、祭谷魂、祭谷仓礼等，围绕着农事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都有专门的仪式。他们通过创造“神”，在神、人、田之间形成纽带他们将自己的一生与梯田及其耕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梯田不仅仅是他们生产的平台，更是他们生活的舞台，梯田里的每一个要素也都与他们紧密相连。哈尼族创造了神，神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梯田，梯田也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被赋予人性，使得梯田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也正是这些仪式活动，使得梯田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

围绕着梯田农耕，他们还创造了一些歌舞仪式，比如铓鼓舞和四季生产调等，共同构成了哈尼的梯田文化，体现了哈尼梯田的人文价值。哈尼梯田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一部“活”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人文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高度融合。

## 五、梯田文化保护中的危机

### （一）对梯田的破坏

#### 1.自然条件的破坏

元阳县地处滇南低纬高原的哀牢山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由于境内地形复杂，冬夏环流交替迟早不同，形成特殊的山地季风气候。加之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气象灾害频发。元阳县境内山高坡陡，是全省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县之一。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不稳定斜坡和崩塌四种类型。县内洪涝灾害也频发，主要有夏季洪涝和秋季洪涝。这些多发的自然灾害都对梯田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使传统梯田的牢固性受到挑战。

今年6月份，受低涡切变和西南气流的影响，元阳县内连续发生强降雨，县内攀枝花乡降水量累计达194.9毫米。6月26日，攀枝花乡老虎嘴梯田片区观景台下方100多米处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72亩多的梯田不同程度的损毁，作为观赏梯田最佳景点的老虎嘴片区不得被封锁起来，不允许参观，等待着后续的修复。自然灾害无疑对梯田景观造成了损坏。

#### 2.人为开发的破坏

随着哈尼梯田的申遗成功，这里越来越多地被开发成景区。元阳世博旅游公司不断对梯田景观进行改造，修筑观景台供人们观赏，一方面，这些景点的开发的确为当地村民的增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

对梯田的开发无疑是对当地生态资源的一种破坏。修筑观景台，在观景台的周边还要进行一些绿化、做一些道路的防滑治理等工作，有些观景台甚至未经批准私自扩建，虽然后续采取了行动对私自扩建的观景台进行铲除，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梯田景观进行了破坏。随着游客的增多，人们对梯田的破坏也越来越大。垃圾的乱堆放、对梯田的踩踏，都对原有的梯田生态产生了巨大的破坏，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荷。

## （二）现代文明对农耕文化的冲击

### 1. 农耕生产后继乏人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哈尼族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现代文明的渗透对哈尼族过去的传统农耕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他们传统的一些耕作技术也在慢慢被现代科技所取代。传统的穗选法育种方式慢慢被杂交水稻所取代，为了图方便和更高效地进行红米生产，他们会根据需要去种子站选择适合的稻种；传统的冲水积肥方式也被化肥所代替。现在家中养的牲畜少了，加上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没有那么多的牲畜粪便供冲肥使用；除草剂也成为他们管理农田的得力助手。传统的农耕方式被人们渐渐忘却，加之外来思想的冲击，人们对梯田的兴趣也在丧失。

像现在大多数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哈尼梯田的农业生产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现在大部分的梯田耕种的主体是中老年人，年轻一代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外出务工，迁移到别的地方以谋求更高的收入。他们认为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太累，而且农作物产量较低，生产投入与回报难以平衡，靠梯田种植维持不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发，他们愿意留在家中的也是从事商业、服务业，比如在家开民宿、餐饮店之类的，很少会有年轻一代愿意进行耕种，梯田管理的高强度和高难度也使得他们难以承受。哈尼梯田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难以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这些都制约着梯田农业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虽然政府采取了一定的补贴措施，比如和用红米加工厂收购红米，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助、引导青年返乡创业等，但是感觉这些补贴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并没有太大。

### 2. 哈尼传统文明的流失

哈尼族没有文字，他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也随着老一辈的逝去而面临失传的风险，坚持传统礼法的人也在逐渐减少。传统的蘑菇房也随着现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生改变。随着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他们的一些民族风俗也在慢慢发生变化，越来越被汉族文化所影响，丢失哈尼族的文化特色。

在当地的学校，也都是用普通话进行教学，他们对当地的民族语言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太高。我们在多依树村遇到一个彝族青年，由于多依树村大多数人为哈尼族，他从小便跟哈尼族的伙伴一起玩，现在他只会说哈尼话不会说彝族话，渐渐变成了“哈尼族”。因此，对哈尼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是值得引起重视和关注的。

## 六、讨论

文化和环境相互发生作用，两者是相互辩证的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塑造作用上，即他们也在不断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另一方面，生物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对环境产生影响。哈尼族的梯田实践也体现了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他们从青藏高原游牧民族南迁至哀牢山，依山就势，开凿梯田，逐步适应农耕文化。克服地形、气候等因素的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使农耕文化在高山地区得以成为可能。并且，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凿沟渠，灌溉梯田，形成了

举世瞩目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生态奇观，充分弘扬了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而哈尼族在梯田耕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梯田文化。他们创造了各种神，并将对这些神灵的崇拜融入进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形成独特的生态保护观念。崇拜树、崇拜水、崇拜山、崇拜稻谷、崇拜万物，通过这些崇拜和祭祀仪式，将人与自然万物有机联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

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整治，坚持系统的生态观，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无疑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共存的典范。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逐渐发生转变，从过去的敬畏自然，慢慢演变为征服自然，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人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人们想攫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为我所用，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殊不知，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消灭未来的财富。狂妄、征服之心，导致人类与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灾害频发，自然用种种方式给人们敲着警钟，警示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而哈尼梯族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却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意义。他们用自己创造的世界文化遗产向我们传达人文系统和自然系统和谐共生之道，启示我们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样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

哈尼族的梯田实践体现着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外来者，我们应该相信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创造出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中国文化。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指导地方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别的民族也有值得借鉴的意义。在我国的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之中，不保护生态环境就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利于民族的协调发展。因此，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项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功利性的驱使使得人们越来越计较利益得失，农业生产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使得很多年轻人从事梯田耕作的兴趣减退，对梯田旅游文化的开发在给当地居民增收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种现象并不是单单在哈尼地区，是在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哈尼梯田未来何去何从引发人们的思考。不过，哈尼梯田的成功申遗也使得人们对梯田文化保护的责任意识更加强烈，合理地开发利用梯田文化，加强对遗产区资源的管理，才能实现保护民族文化和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的双赢。

#### 参考文献：

- [1]任国英，2004，《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第5期。
- [2]宋蜀华，1996，《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3]元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元阳县志》，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
- [4]元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9，《元阳县志 1978-2005》，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 [5]杨海霞、张子伟，2019，《开凿田园：哈尼梯田引水体系营建述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2期。

☆ 作者简介：郑玉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届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国际水电移民对话高端论坛和国际移民网络 2019 年会”在河海大学举行**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第二届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国际水电移民对话高端论坛和国际移民网络 2019 年会在河海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INDR（国际移民网络）、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电水利规划设计研究总院与三峡大学共同主办，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印度、孟加拉国等 19 个国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印度行政管理学院等 30 多个知名机构逾 300 名专家学者参会交流。

大会开幕式由徐卫亚校长主持。徐辉校长在开幕式对参加大会的中外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各位嘉宾介绍了学校办学历史、定位和学科发展布局等。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吴义航常务副秘书长、国际移民网络 Downing 主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吴海斌总经济师、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龚和平院长等嘉宾相继致辞，强调本次大会对于移民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为期 4 天会议中，中外参会专家就中外水电移民政策与实践创新、水电工程的利益共享、多学科视野的水电移民、水电移民的全球经验和教训、移民理论和方法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次会议专门设置了水利水电移民、移民安置中的利益分享、国际青年移民、矿业移民、社会性别与移民、社会工作与移民等专题分论坛，逾百名参会代表在专题分论坛发言交流。

本次大会对接前沿、探讨热点、激荡智慧，为移民与社会发展领域不同国家、不同研究机构、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深度交流机会，有助于充实河海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学术共享与合作。



## 结构洞察中的职业学校女孩\*

——基于启明中专的个案研究

王毅杰 薄小奇 宋姣

**摘要：**基于身体社会学的两种分析视角，即身体结构模式和身体行动模式，可探讨职业学校女孩的规训、洞察与应对逻辑。研究发现，“差生”的共享身份使职业学校不再重视学生学习成绩，而把关注点放于“守规矩”和“课外活动”；职校为学生制定了可预见的未来，但遭到职业学校女孩的抵制，她们有自己的职业设想；职校女孩片面洞察了结构性钳制，却无力反抗，由此在校内外，她们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在校内，她们以“乖乖女”的形象示人，迎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校外，她们是在酒吧和 KTV 里抽烟、喝酒与“混混”谈恋爱的“坏女孩”，她们寄希望于外界，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底层再生产中女性群体特殊的一面。

**关键词：**职校女孩 规训与再造 结构洞察 双重逻辑

###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up>[1][2]</sup>作为义务教育向非义务教育的转折点，中考是学生人生轨迹的重要分水岭。中考通过者可进入高中，并继续接受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教育，而中考落榜者只能另谋出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以及中国制造的全球供应，国家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分流通渠道，日益走进大众视野。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中考落榜者的选择。

但在脑力劳动凌驾于体力劳动的现代社会中，学者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高等教育，近年来才开始对职业教育进行详细的深入分析。其中，周潇认为，国内的中等职业学校旨在培养对雇主忠诚的一线技术工，并付诸实施于包括课程设置在内的各项环节，进而完成了底层的再生产。<sup>[3]</sup>作为特定阶层的专用场所，职业学校对阶层流动的作用收效甚微，甚至只有阶层再生产的功能。<sup>[4]</sup>不过，目前针对职业学校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宏观的结构性约束，而忽视了微观层面的行动策略。同时，此类研究多着眼于“职业学校男孩”的结构性特征和身份认知，女孩只是作为附带角色出现，鲜有研究将“职业学校女孩”作为一个群体，女性的独特性遭到忽视。

本文重点突出女性在职业学校生活中的特殊性，通过对宏观层面的权力结构与微观层面的行动策略的结合以探究：（1）职业学校是如何评价、管理职校女孩的；（2）职业学校女孩从学校对她们的培养

\* 本文已刊发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 04 期。

中洞察到了什么；（3）面对结构性钳制、学校的规训时，职业学校女孩是如何回应的？其具体表现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职业学校女孩群体的深入研究，来理解底层再生产中女性群体特殊的一面。

## 二、权力结构与身体体现

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sup>[5]</sup>保存并传递了社会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存在于学校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结构性对应。<sup>[6]</sup>通过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所赋予学校的结构、组织原则、管理和功能等，学校与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建立了“同谋式”的关系。<sup>[7]</sup>学校通过潜在课程来实现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sup>[5]</sup>但学生作为被管理者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批判性认识，对学校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也有着主体自身的洞察。

汤普森在研究自为阶级形成历史的过程中指出，当一批人自己的亲身体验（或者从先辈那里）得到共鸣，明确感知彼此间有共性，且这种共性与他人有不同，便指引着他们形塑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sup>[8]</sup>威利斯在《学做工》中首次明确提出“反学校文化”的概念。威利斯通过展现小子们（即“lads”）在学校、家庭以及工作中的经历，揭示了“小子们”通过反抗教育权威和体系进而形成独特的反学校文化过程。<sup>[9]</sup>“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中蕴含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洞察，同时反学校文化也是这种洞察的实践。

受威利斯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对女性“反学校化”进行研究，但目前为止成果较少。1978年出版的《女人当家》（*Women Take Issues*）中有部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性成员抱怨该研究中心并没有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研究议题纳入研究框架。<sup>[10]</sup>为了回应文化研究学派中所隐藏的性别偏见，麦克罗比（A. McRobbie）采用民族志的方式，探究了英国学校中一群14到16岁底层劳工阶层的女孩群体。在她的研究中，女孩群体所形成的亚文化和《学做工》中的男孩群体有一定的共性，她们也有自己的抗拒文化，只是方式和男孩群体有所不同。女孩们抗拒学校的方式比较温和，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上，整天不断地讨论身边的男性，非常在意吸引男性的目光；她们注重自己的女性特点和性欲，酷爱化妆，关注时尚八卦和外表。<sup>[11]</sup>C. Wallace 也认为，女孩通过对现实的洞察，形成了很多女孩特有的反抗策略，比如怀孕、同性恋，同时她们对爱情的构想也不再单纯。<sup>[12]</sup>整体而言，不同于“小子们”对学校的直接抵制，女孩们的反抗更为温和与间接，并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

不过，已有研究也发现，女孩们对流行文化持肯定态度并不意味着发生反学校行为，她们对教师、学校的态度并不一定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大多数学生能够与学校就校规达成共识。<sup>[13]</sup>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发现，多数女生更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好，但也呈现出迥异于普通学校女生的特征，在生活中大声说话，说脏话，与男生打架，具有明显的“男性化”的倾向，<sup>[14]</sup>可是并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仅是与学校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sup>[15]</sup>通过对比农民工“子弟”与工人阶级“小子”也发现，两者的反学校文化形似质异，“子弟”通过拒绝学习和找乐子来表达对学校的反抗，但也仅仅是自我放弃的表达，而不是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sup>[16]</sup>在薄弱型公办学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面对学校的规训时，他们不再是直接的反抗，而盛行的是“自弃文化”。<sup>[17]</sup>

已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一个面向，比较重视权力结构对群体的结构性钳制或者学生群体反学校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忽视了权力结构的钳制性实现过程。此外，现有研究也淡化了女生群体面对结构性钳制时的洞察以及面对洞察时所独有的抵制策略。因此，我们不仅要着眼于学校教育中

的学校、老师如何实现意识形态霸权，还要以翔实的民族志展现女孩们对此的洞察，更要关注到该群体抵抗主流文化的多样化策略。<sup>[18]</sup>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身体社会学，将权力和行动实践相结合，对该研究提供了较为贴切的分析视角。

福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给人们进行时间、空间以及活动安排的纪律，自上而下的层级网络及全景敞视的监控来对主体意识进行构建，个体的主体意识正是话语建构的产物。<sup>[19]</sup>特纳（B.Turner）受福柯的影响，认为社会必须在时间上控制人口的繁衍，防止因人口过多而造成的问题，也要从空间上对身体进行管理和控制；<sup>[20]</sup>弗兰克（A.Frank）认为身体具有动态性和多元性，需要探究身体的行动和实践。<sup>[21]</sup>在此基础上，关于“身体”的研究发生了分化，形成两种不同分析模式，即身体结构模式和身体行动模式。以福柯和特纳为代表的身体结构模式把身体看成是结构、权力所构建的产物，关注身体所体现出的权力和道德等内涵，强调“对身体做了什么”；而以弗兰克和戈夫曼为代表的身体行动模式则关注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并认为必须对身体进行保养、维护和再生产，以建构自我、表现自我以及社会互动，即“身体做了什么”。<sup>[21]</sup>

学校是权力对未成熟的身体进行建构的重要场域。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懵懂状态，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极易与权力的理性化目标产生冲突。本文以“身体”为切入点，结合身体社会学的两种分析思路，通过观察职业学校女孩之间、她们与环境之间细枝末节的互动，以及互动中呈现的状态，探究职业学校女孩所具有的独特性。

基于上述，课题组成员在2015年10月到2017年9月期间，采取随堂听课及校外活动参与的方式，对南京市启明中专某年级某班学生进行长期的观察。访者从入班第一天开始，基本保持每个星期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对学生近距离接触、观察并访谈。同时，访者有幸加入了该班级的班级群，并与许多同学在聊天软件上进行交流，因此，访者能够较好地接触和观察到班级的日常活动以及他们在朋友圈中的互动。此外，为了全面了解职业学校学生，访者还辗转与该专业毕业班的同学进行了交流互动。由于学生都是零零后，在互动的过程中将调查员亲切地称之为“姐姐”，融洽的氛围正是调查能够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为尊重和保护调查对象，本文调查的学校和人物均做匿名化处理。

### 三、职业学校的规训与再造

在英文和拉丁文中，规训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多种含义。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规训作为重要且关键的术语，用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不仅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也是不断制造知识的方法，它本身是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职业学校学生身上贴着社会、家长、学校以及同辈们给予的“差生”标签，而学校作为权力的实施者，根据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标准对职校生进行规训和再造。

#### （一）职业学校学生的共享身份

启明中专的学生都是中考后未被高中录取的落榜生。在学历社会和脑力分工的社会文化裹挟下，上大学成为一个人走向更好的职业和生活的必经之路。而对于进入启明中专的学生而言，不仅在学历上处于劣势，在就业上也不被看好，预示着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可能是失败者。进入启明中专后，无论是在家长、学校、老师，还是同龄人的眼里，他们都具有一个共享的身份——“差生”。而对职业学校学生是“差生”的想象，也均体现在家庭、亲友、老师与其互动中。



家长们为孩子选择职业学校的时候往往侧重于询问学校的风气好坏与管理松紧程度而不是教育质量。很多家长来咨询的时候，主要问学校校风是否好和管理是否严格。而对于孩子要具体选择什么专业并不会过多了解。选一所校风好的学校对家长而言格外重要，可以降低自家孩子被带“坏”的风险。这间接地表达出家长对职业学校及其学生的看法——“坏”孩子的聚集地。

在日常上课过程中，任课教师从言语中流露出对职业学校学生智商的贬低。

这么简单的分都不要，作业也不知道是不是抄的，课就和没上一样，一点都没往脑子里装，这些东西都记不住。咱们的同学好多都记不住，如果你的大脑硬盘还有，就多记两个，如果大脑硬盘不够，就不用记了。

如果说任课老师只是对学生的课堂状态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蔑视的话，那么班主任表达的更多是无奈和心寒。

不要伤害对你最好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你的好去着想的。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最关心你们的，也是最容易伤心的。你们知不知道，那种绝望的感觉，我想你们中考的时候应该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一个是你们的父母，还有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让我产生绝望，因为绝望我会管不过来的，因为到最后的话我可能就不管你们了。一个班那么多的学生，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我都已经说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给我考三四十分，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当学生考试成绩较低时，班主任再次提及女生们中考失败的经历，强调现在已对她们产生了犹如中考失败的那种绝望感，并暗示出自己的无力感。这些言辞虽然是老师和班主任们面对真实情况时无可奈何的真实反映，但“差生”身份作为职业学校乃至社会的共同认知正加剧着部分学生的“自暴自弃”。

中职学校的学生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多是普高落榜生，极不情愿到中职学校就读，有的在初中阶段就厌倦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很多（学生）都是被家长“逼”进中职学校的，（并且）不少中职学生文化水平低，缺乏学习目的性，规则意识不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职学生是“父母操心，老师闹心，社会担心”的群体。

G校长的这番说辞与老师和家长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评判一脉相承。职业学校学生学习较差，也不喜欢学习，他们进入职业学校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他们更是父母、老师和社会认为的“坏”学生。

如葛兰西所言，西方国家具有复杂的市民社会结构，国家将市民社会纳入统治是有赖于意识形态塑造的文化霸权，而教育体系则是传递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sup>[22]</sup>基于家长、老师和学校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判断，学校针对学生的特性改变培养理念。

职业学校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合格教育’，不是选拔教育。我们力争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培养中职学生的信心。让优秀学生的评比摆脱一把尺的传统学生评价制度，让更多的学生成为优秀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专项能手。

针对职业学校学生的特性，学校制定符合他们的评价制度，但该评价制度与学习成绩无关，同时评比条件也较低。启明中专开展了“Q之星”评比活动（包括“文明之星”“体育之星”“读书之星”“职业之星”“学习之星”“服务之星”“技能之星”“艺术之星”“自强之星”），以建构主流价值观中的“好学生”。

职业学校学生被老师、学校乃至社会贴上了“差生”的标签，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有瑕疵的群体”，

甚至女孩群体自身也是这样自省的。职业学校利用其特有的管理方式和培养策略,对落入教育底层的“差生”进行再造,以确保权力的实施与学生对教育失望之间的平衡。

## （二）职业学校的规训策略——“守规矩”和“社团活动”

进入职业学校前,学习成绩是社会评判学生“好坏”的标准,但进职业学校后,学习成了职业学校的“调剂品”,成绩不再那么重要,只要不挂科就行。

什么叫好学生?你学习好就叫好?你学习好,但是你其他的行为习惯和老师接触的感觉,什么沟通能力啊,这些情商很低,那也不能叫好。学习好在我们这里不是唯一标准,主要是个人素质,班级活动,社团活动,个人情商,最基本的是遵守学校的校规校纪,对所有的要起到带头作用,做的可以不完美,但是最起码要说得过去,然后成绩要在全班的前三分之一,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只要前三分之一,就够了,然后学校的活动,在班级里和学生的相处这方面,综合考虑。

“守规矩”和“参与课外活动”作为职业学校规训学生的重要方式,在职业学校学生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我们就看到黑板上方“你已进入国标考场视频监控区域”的标记。学生在这个教室里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于是我们询问某男生:“你们宿舍有没有监控器?”他说“宿舍没有,走廊有”,然后又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宿舍里没有,宿舍里都有的话那不就是监狱了”。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面监控器无处不在,学生的所作所为都在它的眼睛里面,学校通过监控器来警示和规范着学生行为举止,并且配套了一系列的奖罚制度。

在启明中专,班级整洁(包括个人卫生整洁和班集体卫生整洁)是每个班级的重头戏,其不仅是班级内部的事情,还涉及学校和不同班级之间的评比,评比包括系部、班级、出勤和宿舍。学校也会定期组织老师和同学对此进行整体检查,对不合格的学生和班级在学校公共网站上进行公布并作惩处与警告。班主任作为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桥梁,面对薪资报酬和名誉资源争夺的压力,对此较为重视。

AF同学,在10月份的月末,为我们班级扣一分,为班级抹黑,本人仪容仪表扣5分,并在本学期操行等第评优中一票否决。特此通知。并请AF同学自己想好为班级做什么事情,比如打扫卫生等,到我这边汇报,以功抵过。

诸如此类的警告和通知,在他们班级QQ和微信群里每天不计其数。

批评BS,课桌旁边有饮料瓶。

CL为晚自习班长,走的时候打扫卫生了吗?窗户也不关!!!

115宿舍男生们,你们被子都叠得很好,为什么床单不能整齐、平整呢?宿管讲了,就是因为你们的床单,所以才不能够表扬。下次再这样的话,我带着我们班女生参观你们宿舍。

女生宿舍314、312又为班级加一分。

班主任通过扣分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未打扫好卫生的警告。而作为对学生学习状况评价的分数,在此成为了老师控制班级整洁和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砝码。除此之外,学校资产的损坏、丢失也与个人挂钩。

同学们,体育课上一定要爱护,看好我们的器材,尤其后面上排球,如果丢了,会在我们班代办费里面扣钱,如果钱不够,全班平摊。这是上学期丢失器材的班级要交的钱,同学们引以为戒。

在此情况下,班集体与学校挂钩,班级又与班级中的每一个人相关,层层对接。

对此,班主任这样解释:

因为它是集体活动，所以每次你的东西必须摆放在它需要的位置上，大家都摆在一个地方，你的盆子必须放在床底下，学校也有学校的规章制度。住校生，你是一个集体的，你就看看自己这边乱七八糟的放，人家其他人都做得很好，就那一个两个的。我们学校常规天天抓，因为毕竟职业学校这些方面都很严格，从小处着手。其实说真的，毕竟我们的生源中大都是中考的失败者，多多少少学习习惯不好，或者其他的习惯。

班主任把对职校生的要求归结为他们是中考的失败者，而学校只需要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去管控这些“习惯”不好的学生，其管理的重点是学生的行为举止，而学习成绩则成为管理的次要内容。

社团活动也是学校开展规训的重要途径。在启明中专有很多学生活动，月份不同，主题也会有所不同。启明中专多种形式的社团活动中最为瞩目的就是该班班主任带领的炫风啦啦操社团。

经过选拔，我们重点观察的班级中有六个人加入旋风啦啦操社团。2016 年的全国锦标赛暨省职业学校啦啦操锦标赛，有 103 支参赛队伍，2488 名参赛选手，而该班学生所在团队得了亚军。比赛过程由“直播 TV”全程直播，学生在直播时疯狂留言，充满对啦啦操队员的羡慕。社团活动的胜利让职业学校女孩再次找到自信，同时也达到了学校组织活动的初衷。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课业有多轻松，完全不影响他们的兴趣爱好，每天回去作业半个小时就做完了。比如说我教的啦啦操的这些学生，他们完全是零基础，但是现在已经学得很好了，参加区里的市里的省里的比赛，能拿各种奖，为一些公司的年会编舞、跳舞，还能拿到钱，其中有两个同学就直接签约了。每次（演出）服装费一千多块钱不用他们出，中场休息他们作为啦啦宝贝上去啦啦队表演，每次 1 场演出可以拿几百块钱，家长都开心得不得了，（家长）没想到自己的孩子能够这样，还能赚钱。我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锻炼，因为他们的时间很长呀，四年半呀，只要他们有事做。

职业学校对学生有较为清晰的定位——“差生”，由此学校不以学习成绩要求学生，而用“守规矩”和“参加社团活动”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行为举止的管控。学校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掌控着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体”，构建职业学校场域内的优秀者。

### （三）职业学校为学生设定的出路——校企联合与升学

职校生的出路比较有限，职业学校为学生设定了两条途径：校企联合和升学。学生可以通过半年的实习并通过考核后，留在各大药房进行药物销售。或者取得中专毕业证书和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在毕业转段考试通过后，升入指定学校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抑或通过专转本和专接本的方式进入大学学习。

我们重点调查的班级共 36 人，其中有 22 人选择了专接本。“专接本是宽进严出，不需要考试，直接报名，就是你上了这个大学，你必须学分修够了，每门课过了才给毕业。而专转本有个入学考试，和高三考大学一样”，相对于专接本，专转本的含金量高，但专转本的竞争力和难度相对较大。“专转本和高三考上去的一样，只是我们在学校里玩了四年，人家高中考上去的是在高中拼命读了三年也未必能够上到一个好的大学。”职业学校处于高等教育系统低端，有限的社会资源与流动机会使得职校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与认同危机。多数职校生会选择专接本或者专转本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学历，以降低就业风险，但往往事与愿违。招生办人员告诉笔者：“他们虽然声称启明中专每年至少有一百人成功专转本，但是实际上，启明中专只是将专接本的名额杜撰成了专转本的名额，在招生期间滚动播放在学校网站的首页，以此获得更多的关注和生源。”启明中专的大部分学生想要通过专接本的方式获取上大学的

资格，以期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可，但这些都是学校的招生策略。以此种方式提高学历的职校生较少，职校女孩看似有较明确的未来，事实上其未来的限制非常的大。而职业学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使学生接受这一切。

职业学校通过对学生未来愿望的许诺，并让他们产生毕业后可以获取高薪资和高成就的想象。学校长廊的展板上常年张贴着优秀毕业生的事迹。他们都是在学校学习了相关技术和知识，毕业后在工作单位中得到褒奖的。展板上面带笑容的优秀毕业生使得在校生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想象，同时也成了继续学习的动力。此外，学校经常请优秀的毕业生回校演讲。

学校对我们很严格，其实，更多的是爱，是真爱。因为真爱，而对我们严格，处处不放过，处处计较，处处花心思！要不是他们的严格，要不是他们的智慧，要不是他们的付出，不可能有如今的我们！还记得刚进入学校时的我，一开始是多么害羞、胆怯、自卑，因为没考上普通高中，因为成绩差而自卑，对未来毫无打算更谈不上梦想。然而，两年的中专生活，改变了我，让我迅速健康成长，综合素质与能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对生活充满激情，我对自己充满信心！现在我顺利当上了店长，我的同学们大多也是店长，这是学校与新希望公司培养我们的最初梦想，我们实现了！我们会更加努力，朝着我们心中的理想不断迈进！

作为权力掌控者的学校拥有学生缺乏的资源——“技能”和“知识”，以及通过校企合作等形式而形成的就业途径。职业学校利用该优势对学生进行规训，让学生在产生美好想象的同时重视规定，淡化了权力结构对学生的钳制。在实践中，尽管表达方式较为委婉，但学校对学生的认知，如“差生”“守规矩”“底层再造”，无处不在。而身处其中的学生、老师对此无一不知。那么职业学校的女孩们是如何回应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呢？

#### 四、职业学校女孩的行动逻辑

面对社会的结构性钳制，女孩们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承受者，而是洞察结构的创造者。职业学校女孩抵制学校为她们设定的未来，并有自己的规划。她们在校内外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策略。在校内，她们尽量表现出“乖乖女”形象；而在校外，她们是在酒吧和 KTV 里抽烟、喝酒并与“混混”谈恋爱的坏女孩。职业学校女孩一边迎合着学校的规章制度，以便能够正常毕业，另一边寄希望于外界，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

##### （一）职业学校女孩的职业设想

2015 年夏，当一群失落的中考生走进启明中专时，她们便面临构建新同伴关系的压力。女孩们根据空间就近、志趣相投和性情相近等原则形成若干小群体。但随着交往的延伸，成员组合也会随时发生变化，这是女孩群体相比较男孩群体更有弹性的特征。她们以偶然或非偶然的方式结合成小团体，构建着自身的价值和存在。

职业学校给学生谋划了两条出路，但对学生而言，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她们接受学校安排的校企联合，就意味着她们要接受低工资的事实。对于年轻的职业学校女孩而言，对如此低的工资充满了不甘和无奈。

药房熬出头挺困难的，基础工资太少。我特意跑到药店问过，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嘛，买药的时候我就特意问她，“那你们大概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她们就很委婉地给我说，“能有多少钱？不就

2000 多一点嘛。”当时我就听见了心碎的声音。

而她们专业中有高工资的岗位又不大适合女孩们从事。

医药代表工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这一行有个规矩，女生不能干，潜规则比较多。现在女孩子干（医药代表）的话会嫁不出去的。

同时，专转本和专接本不仅对她们的学习能力有要求，对她们的经济能力也是挑战。该班女生父母多数从事体力劳动，家庭收入在当地属于中低水平，很多家长早已无力支持孩子继续攻读大学。

我想冲到大学之后再找工作，但我还有妹妹，她比我小十多岁，家庭负担在那儿，担不起两个人的负担。启明中专要不了多少学费，前三年学费很低，前三年是公办，学费是每年 647 元，第四年学费就高了，四五千。我爸说能给我的就这么多。其实我并不想进这个专业，我有自己的兴趣，我其实挺喜欢古代文学，或者服装设计，他们不支持我，说没有那么多钱给我。

面对校企联合的不甘和升学的艰难，职业学校女孩有着自己的打算。

我想毕业以后应该不会去学校安排的药店工作吧，嗯，如果给我一个店长当吧，我会愿意的。但熬出头挺困难的。我想以后可以开个店之类的，比如养生美容健身。到时候我会说“肾虚的过来，喝两副汤药补补啊”之类的，这个可以赚钱多一点。还有我也可以搞器材批发，开店当老板，留在药房给人拿药的话没有出息。

职业学校女孩利用暑期打工赚钱，以获得工作经验来提高未来找工作时的胜算。DH 暑假的时候在商场里做话务员的工作。她每天九点钟之前必须到达商场，然后十分钟后开始电话推销产品或者产品回访。上午她需要一直打电话到十二点，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两点钟开始，然后打电话到四点，中间休息半个小时，再工作一个半小时，“虽说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从来没有按时下班过。”基本上每天是七点钟下班。DH 暑假总共工作 36 天，工资 2750 元钱，每天工作七个半小时，时薪仅十元，还没有达到所在地划定的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标准的规定。职业学校女孩原本想利用暑假时间提高自己的能力，以抵御未来的就业风险，但是事与愿违，她们往往因文化程度低和年龄小，只能做像超市促销员工、话务员、快餐店员等比较繁重、工资低的暑期工。暑期打工的经历，让她们体验到了找工作的艰难，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对于学校宣传的内容，学生是了然于胸的。

（学校希望你们成为什么样的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尊师重道，听话，成绩什么的都无所谓，只要不挂科就好了，然后毕业之后就安排工作了。

职业学校女孩抵制学校给她们规划的未来，她们不甘于从事低工资的工作，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设想。但事与愿违，女性身份和低文化水平使她们在找高薪工作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学校虽为职业学校女孩建立了毕业后能够获得高薪的想象，但是她们通过实践体验了解到这只是假象，她们对此早已有部分洞察。不过，作为女孩，她们面对学校给予的钳制无力抵制，因此她们选择了在校内外使用不同的策略进行反抗。

## （二）校园里的“乖乖女”

面对职业学校无死角的监控，女孩们在行为上较为收敛。在学校内，她们迎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老师面前多数时间展现“乖巧”的形象，并使用各种方式来“提升”学习成绩，以求自己能够正常毕业。

这在女孩们的言谈、喜好以及考试中有所体现。

女孩们在打交道的时候，韩流、明星和化妆品是她们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她们通过对明星资讯掌握的多少彰显自己的潮流和独特。

下课我们聊聊韩剧啊，明星啊，电视剧啊，综艺啊，还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之类的，一些小八卦都会聊啊，主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偶尔我们也会买些喜欢的明星海报，但是没有疯狂追星的。

但实际上，女孩们并没有疯狂的追星与消费行为，这些也仅是她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话题。

除了追星，化妆品也是女孩之间重要的话题。

啦啦操的时候就会互相借用口红啊，不过这个不多。有时候 EL 买的口红色号，她不喜欢了，然后就会低价卖给 FY 她们啊。HM 有指甲油，不喜欢的话也会低价卖给我。这多好啊，我们有时候就围在一起，一块研究色号。

女孩们关注化妆品的内容不大一样，由此她们之间互通有无。虽然她们很热衷化妆，但因学校对妆容有要求，她们对于化妆程度还是较为收敛。

其实在班上，我们班还是挺乖的。我们老班（班主任）说化妆可以但是不能化浓妆，如果让她发现化浓妆，“哦，第一次是跟你讲一下，然后把妆卸了，第二次就是把卸妆水往你脸上浇两盆，第三次就直接处分”。

如今，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了。玩手机游戏作为一个较为广泛的兴趣，普遍存在于女孩们之间。在她们言语之中经常出现“逆战”“躲猫猫”“阴阳师”“球球大作战”“狼人杀”等之类的词语。但是很少有学生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上课期间打游戏，她们多数选择在上自习课或宿舍休息时玩。即便有些同学上课玩手机，也会较为隐蔽。

作为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影响着老师和同学对她们的认同程度。同时，她们也因能通过伪装成功欺骗老师，并赢得老师的信任，而产生一种成就感。作弊是她们形成认同感和成就感的重要渠道。

作弊是一个双方的互动，即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按照学校的原则，对于被抓到的作弊者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和行政处罚，但启明中专针对作弊形成了转换制度：一是安排党员教师一对一帮带，每月党员教师至少与犯错误同学交流一次，且在帮带结束时学生需要上交学校一份书面思想汇报；二是校团委组织违纪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违纪学生想要撤销学校处分，必须完成一定量的志愿服务活动；三是受记过及以上处分的学生必须参加二次军训；四是学生处定期组织违纪学生分类教育。老师对学生作弊的事情都心知肚明，但很少去抓作弊同学。即便是抓到作弊的同学，在实际运作中，也仅仅是走过场而已，学生只需要通过一些体力上的劳动来消除处分便可，比如打扫卫生等。

作弊是职业学校女孩取得更好成绩，并使老师和同学认可自己的一种方式。作为职业学校女孩间心照不宣的规则，在她们说话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作弊成功的赞扬和作弊失败的鄙夷。“会抄是本事，认真写作业的没几个人。”而作弊如果被抓到的话，大家则会用“笨得像猪”一样来形容。大家都作弊啊，那又没关系，上一次可搞笑了，别的班的有三个人作弊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了，跟猪一样，做个弊还能被发现。”因此，当作弊不成功时，她们自己也会无比懊恼。“我上次将答案抄在裤腿里面，当时裤子穿得宽松，可是那天大概是动作太大了，把裤腿里的答案掉在地上了，我找不到答案往上搂，还是没有，气死我了。”但由于学校对作弊学生惩罚力度较小，所以当询问学生对作弊被抓的看法时，她们持

较为轻松的态度。“不大喜欢打扫，但是真被抓到作弊就忍了，也没什么。”

职业学校女孩在有校内教师出现的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她们迎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老师面前收敛自己的喜好，并为了获取老师和同学的认同而作弊。职业学校女孩无力反抗学校对她们的规训，选择以“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逻辑与老师进行周旋。当她们走出学校后，女孩们将会换一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 （三）校园外的“坏”女孩

每当接近放学时，启明中专的侧门处相聚着十几位校外男生，他们骑着拉风的摩托车，穿着黑色的衣服，嘴里叼着烟。他们站在学校门口与五十多岁的门卫相互敌视，而这种敌视在他们的女朋友出现之后便会消失。“坏”女孩们明目张胆地同社会“混混”或其他技校的学生谈恋爱，并以此为荣，同时她们的行为也会招到其他同学的羡慕。

你在我们私密群里应该能够看见，她经常炫耀性的发一些她和她男朋友的聊天记录。但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那些聊天记录都不是和一个人（的交流），经常变。她交男朋友的能力非常强大，前两天是这个对象，后两天就变成那个对象。比如说她现在分手了，三天之后就换对象了，这是我（IH）的感觉，很神奇。她男朋友是技校的，她比较社会，认识的社会人比较多，三教九流，跟他们相处，玩得很开。她对象也不一定就是技校的，也有可能就是社会上的小混混或者是已经工作的，都有过。

对职业学校“坏”女孩而言，酒吧和 KTV 是她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在这些场合中，职业学校女孩往往穿着成熟，浓妆艳抹，行为轻佻，与在学校时的表现大相径庭。

她们穿的衣服就是露肩吊带、超短裤短裙之类的，短裤比较多。她们去夜店玩，喝酒拼酒，夜店有男的呀，有男人在。她们去夜店泡男生，泡帅哥，我也被拉过去一次，听她们聊天，经常就有各种和生殖器相关的词汇，我就怕了。（她们）和自己的男朋友一起去，男生就是为了泡妹子，她们就找帅哥。

不过，她们在这些场所中学到的行为举止，为寻找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GH 以前经常去酒庄帮别人卖酒，推销得比较溜（厉害），她是那种能和客户聊天到半夜的人。她们就是给客户打电话，与各个年龄段的人接触，比如发微信，和客户聊天。（她们）挺会交际和赚钱。她们赚钱就买化妆品，买衣服，吃东西，她花钱比我们多一点。卖酒经常是和男生打交道的。她穿得很漂亮，能说，能和别人聊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尴尬。实际上男生和她聊得都特别轻佻。

职业学校“坏”女孩在校内以“乖乖女”的形象示人，面对学校为她们设置的规章时，她们无力反抗。但是在校外，她们是打破禁锢的命运掌控者，她们展现了大部分女孩心中渴望却又克制的疯狂。当遇到喜欢的男生时，女孩会向男生主动大胆地表达。

那个男生第一次和 EL 见面的时候，踩着滑板，她说她当时看到那个男生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我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过来见我”。

后来，EL 和这个男生快速地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但最终因男生出轨而分手。职业学校女孩的恋爱时间较短，次数较多。

当女孩感情出现问题时，酒吧和 KTV 是寻求慰藉的必选场所。EL 和他男朋友分手复合多次，每次分手她都会约朋友到酒吧拼酒，直到有一次酗酒住院。

那天陪她喝酒的是其他班的一个女生，还有 HS，她们三个人喝了三瓶二锅头，啤酒喝了几十瓶，

那天晚上就一直待在夜店里起哄。HS 没怎么喝，就是那两个女生陪着她喝，喝断片了，HS 喝的是有点醉但是还稍微清醒。最后酒吧的人打 120，EL 才好不容易进了医院。

入院后，EL 的男朋友去医院看她，但她把男生的胳膊咬到流血，以至于时隔半年还能清晰地看到男生胳膊上的疤痕。只有在言情剧和小说中才会出现咬伤胳膊的情节，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对张无忌便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节给憧憬“偶像剧”的职业学校女孩们带来遐想。在日常生活中，职业学校女孩也会用网络言情小说打发时间，比如说《杉杉来吃》《微微一笑很倾城》《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时光且住，不言离别》《风华是一指流沙》《你的青春我来过》等等。这些小说情节基本上都是靓丽贫穷的女主一无所长，但凭借着“善良”“天真”“柔弱”赢得了“高富帅”男主义无反顾并死心塌地的爱。这恐怕便是她们所向往的。

职业学校女孩经常在 QQ 空间里发关于爱情的文字，如“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你敢评论我还在，我就敢评论我爱你”，“之所以在乎一个人，是因为心有了感觉。之所以心疼一个人，是因为爱有了甘愿。愿意留下来的人，就好好相处，彼此信任；想要远走的，就挥挥手说声抱歉，恕不远送”等。她们的恋爱观充满浪漫色彩而又不切实际。

无论是频繁地换男朋友、买醉和咬伤胳膊，还是在 QQ 空间晒浪漫的爱情文字，无一不表明她们对言情小说里爱情故事的向往，同时也是她们感知到未来希望渺茫后的寄托。她们寄希望于自己未来的家庭，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翔实的实地调查材料，呈现了职业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和管理方式、职业学校女孩的洞察以及她们的双重应对策略，勾勒出职业学校女孩较为独特的一面。

职业学校学生身上贴着社会、家长、学校以及同辈们给予的“差生”标签。在踏入职业学校之后，职业学校女孩一直笼罩在“差生”的氛围中，学校领导、老师以及家长的言行举止无一不表达出对职业学校学生“差”的评价。由此，成绩不再是职业学校对学生的关注焦点，“守规矩”和“课外活动”成了评价学生的重要标准。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卫生等方面进行着规训，并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职业学校作为权力的掌控者，拥有学生缺乏的资源，学校利用此优势让学生产生美好想象，并为她们设定了可预见的未来，即校企联合、专转本和专接本。但实际上，对于学校的这种建构方式，职业学校女孩已有洞察。

身体不仅是我們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sup>[23]</sup>在社会化过程中，职业学校女孩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承受者，她们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洞察到结构的钳制。面对学校、家长和社会对她们的预设，职业学校女孩有着自己的认识。她们抵制学校设定的未来，并制定自己的规划。但却因女性身份和低学历，对自身境遇无力改变。在学校时，职业学校女孩尽量表现出“乖乖女”的形象，课业成绩“好”；课堂上表现安静；虽然关注韩流、明星、外表、时尚，但不张扬；钟爱化妆，但是在老师的要求范围内，她们迎合学校的规章制度，以便获取学校和老师的认可，从而能够正常毕业。在学校外，她们是在酒吧和 KTV 里抽烟、喝酒，与“混混”谈恋爱的“坏女孩”，她们寄希望于外界，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职业学校女孩主动建构着群体独特的行为方式，并截取虚幻的大众文化形塑着自身，可她们的幻



想终会破灭。当自身无力摆脱困境的时候，部分职业学校女孩会走上阶级再造的老路。

我国的职业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sup>①</sup>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党和政府也已作出重大决定和举措。2019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为突出的位置。<sup>②</sup>可以看出，国家对职业教育比较重视，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教育尚处于弱势地位，职业学校学生多是从事底层工作，这也导致了很多职业学校学生出现诸多不良现象，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家、学校和家庭三个层面入手，以改善职业学校学生的现状。首先，通过合理的政策干预，提高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从而提高社会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认可程度以及职业学校学生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其次，学校需从教师教学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增加学生的自我认同感，淡化“差生”认知，同时为职业学校学生普及如何正确对待早恋的知识，为学生建立健康的心理和合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行为。最后，家长配合学校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关心孩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状况，以免其走上不归之路。国家、学校和家庭三方合力，将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 参考文献:

- [1]兰德尔·柯林斯，2018，《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历史社会学》，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周潇，2015，《从学校到工厂：中等职业教育与农二代的社会流动》，《青年研究》第5期。
- [3]葛茹、王刘飞，2016，《职业学校与农民工随迁子女阶层再生产》，《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4]阿尔多塞，1987，《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李讯译，《当代电影》第3期。
- [5]H.Gintis,S.Bowles.1976,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
- [6]林晖，2007，《阿普尔教育哲学思想中的“合法知识”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 [7]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8]保罗·威利斯，201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9]张盈，2009，《童年的凝视——儿童的文化研究选集》，屏东：“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出版社。
- [10]McRobbie A.1977,The Culture of Working-Class Girls,In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London:Macmillan Press.
- [11]Wallace C.1987,For Richer for Poorer:Growing Up In and Out of Work,London:Tavistock.
- [12]萨哈，2011，《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社会学》，刘慧珍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13]史晓晰、王毅、熊春文，2013，《“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14]熊易寒，2010，《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第1期。
- [15]周潇，2011，《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第5期。
- [16]丁百仁、王毅杰，2017，《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自弃文化”研究》，《青年研究》第2期。
- [17]栗治强，2015，《学校教育中的支配、洞察与反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期。
- [18]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布莱恩·特纳，2000，《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 [20]赵方杜，2012，《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1]李光荣, 2008, 《解析 Antonio Gramsci 的学校教育观点》, 《教育研究学报》第 1 期。  
[22]安东尼·吉登斯, 1998,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作者简介: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薄小奇,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博士生  
宋 姣,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5 级硕士生  
☆ 责任编辑: 吴 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机遇、挑战、路径”学术会议圆满举行

2019 年 9 月 22 日, 江苏省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机遇、挑战、路径”在河海大学举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河海大学张兵副校长、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宋林飞会长、江苏省老龄产业协会张建平会长、江苏省老年学学会施国庆会长、江苏省妇女学研究会张勤会长、江苏省人口学会孙燕丽会长、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倪洪兰会长、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吴剑卿副会长、河海大学社科处史安娜处长、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涛珍院长等领导以及来自江苏省内社会学社会团体、高校等逾 400 名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参加会议。

江苏省老年学学会施国庆会长主持大会开幕式, 河海大学张兵副校长、省社科联徐之顺副主席先后致辞。张兵副校长在致辞中介绍了学校办学历史、定位和学科建设等有关情况, 并简要介绍了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老年保障领域的科研实力及取得的成果, 希望会议充分交流、集思广益, 推进老年学科发展。徐之顺副主席表示,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聚河海大学围绕“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机遇、挑战、路径”这一主题进行学术研讨, 时机很好, 内容重要, 意义深远。徐之顺副主席指出, 江苏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 迫切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研究, 全面总结历史经验, 探索老龄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并充分发挥学会智库功能, 推动全社会关注老龄事业。

宋林飞教授认为, “十四五”时期, 我国必须积极正确应对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同时要为重度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做好思想与政策准备。宋教授指出, 居家智慧养老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思路, 但目前面临居家智慧养老市场化不足、居家智慧养老标准缺乏、城市外来老人规模扩大等问题。推进居家智慧养老, 需要建构科学、符合中国国情、满足老人需要的居家智慧养老模式, 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智能基础、医养结合、康乐保障、社区支持、邻里互助、家人陪伴”。宋教授提出,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与国家发展步伐, 居家智慧养老发展可以分三步走, 逐步实现现代化: 2020-2025 年建设居家智慧养老 1.0, 实现初步现代化; 2026-2035 年建设居家智慧养老 2.0, 实现基本现代化; 2036-2050 年建设居家智慧养老 3.0, 实现全面现代化。实现路径则依赖于智能化、产业化、社会参与、专业化, 创造居家智慧养老中国经验。

左学会会长介绍, 我国未来人口低生育率趋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 将在本世纪长期持续。根据上海社科院研究团队的预测, 本世纪中叶以后, 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 30%-40%, 超过 2018 年“超级老龄化”的日本的老龄化率(28%)。左会长表示,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

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降低中国人口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同时提高劳动力的稀缺性和劳动力成本，放慢我国经济增长率并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人口老龄化还会造成我国人口在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再分布，部分农村地区与小型城镇化地区将出现人口的快速缩减甚至被废弃。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创新、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并为老年医疗保健、长期照料、养老地产、老年文化教育和休闲旅游、以及老年金融等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原新教授指出，中国快速人口转变创造的劳动力规模巨大且持续增加以及低成本、低抚养负担的人口机会窗口，是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高速增长的贡献率为 15-27%之间。中国是全球成功收获人口红利的典范。原新认为，中国人口基础正在改变，老龄化社会正在向深度老龄社会快速迈进，并最终进入稳定的重度老龄社会，这是基本国情。人力资源缩减但规模依然庞大、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且日渐雄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是新时代人口机会新形态。他强调，要继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经济社会可持续需秉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探索经济新动力、经济结构升级、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稳定发展的新思维、新模式、新路径，此乃客观需要。

大会主论坛特别安排了一场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等嘉宾的对话沙龙环节，围绕“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路径”主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教授和省卫健委老龄办副主任刘育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吴磊、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健元教授、江苏枝秀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秀、江苏-哈佛适老社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芮国兴、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张建平展开对话交流，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大会下午安排了六场分论坛，主题分别为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社会、养老服务业、健康养老、科技创新驱动的智慧养老、养老政策与社会支持、社区、性别与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大会论文获奖者以及高校师生们通过学术报告、获奖论文分享交流等形式围绕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医养结合、老龄健康、智慧养老、养老政策与社区养老等热点问题开展深入交流讨论。

本场学术聚焦专场按照省社科联组联中心对会议筹备方案的指导意见以及论文评选管理办法要求，从 215 篇投稿论文中评选产生一等奖论文 22 篇，二等奖论文 44 篇。在大会闭幕式上，省社科联领导、河海大学领导以及协办单位领导给论文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最后，大会闭幕式由省老年学学会施国庆会长做总结发言，施会长提出，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理想老龄社会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共享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研究及管理相关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探索加强各学术团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跨学科、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水平，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智力支撑。在省社科联指导下，由江苏省老年学会联合江苏省社会学学会、江苏省人口学会、江苏省老龄产业协会、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江苏省妇女学研究会省级学会，以及南京市社科院（联）、南京市社会学学会、南京老年学学会，河海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邮电大学 8 所高校共同举办本次学术会议，也是省社会学界开展学术交流的一次创举。

# 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和随迁子女教育期望\*

王毅杰 黄是知

**摘要：**异地中考政策近年来在随迁子女教育领域备受关注，但以往的研究侧重于政策的评估、执行等方面，忽视了政策的微观影响。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可以发现政策因素也会对随迁子女产生影响，相比于不受政策限制的随迁子女，受部分限制的在教育期望上的降低尤为明显。除了随迁子女本身，其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在政策限制之下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会进一步影响子女。具体到各类行为，亲子沟通在政策与个体间发挥了调节作用，而父母教育期望的降低也成为随迁子女教育期望降低的重要原因。因此，随迁子女需要一个积极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也需要父母通过各类教育参与行动支持他们”。

**关键词：**异地中考政策 教育期望 父母教育参与 随迁子女

## 一、问题的提出

随迁子女在城市能否平等地接受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但随着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政策的全面推进以及随迁子女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否在城市接受高中教育成为急需关注的话题。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需要研究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升学问题。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46 号）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 2012 年年底出台”。随迁子女的教育过程无疑会受到这一政策变化的影响。

根据教育部的一项报告，2016 年全国普通初中随迁子女毕业人数为 121.6 万，但只有不到 40 万人在流入地就读普通高中。<sup>[1]</sup>原因在于，当随迁子女面临政策限制，部分人会选择在流入地就读职业高中。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随迁子女在过大的政策限制下决定返乡另谋出路。考虑到不同城市在政策偏好上确实存在差异，<sup>[2]</sup>较高的政策门槛会影响随迁子女的异地升学，<sup>[3]</sup>因此，结合政策背景来把握随迁子女的教育状况就显得尤为必要。那么各城市异地中考政策的严与松到底会对个体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宏观城市政策对微观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中，家庭教育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教育期望作为有效且稳定地预测教育获得的指标，<sup>[4]</sup>通过它能够更好地把握随迁子女在政策影响下的学习观念与动机。因而，本文试图以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为切入点，回答上述研究问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系统理论视野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实践及干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ASH01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已刊发于《社会科学》2019 年 07 期。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布朗芬布伦纳 Urie Bronfenbrenner 教授在 20 世纪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系统理论。<sup>[6]</sup>该理论强调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作用。在互动中分别产生微观、中间、外层、宏观四个系统。其中,微观系统涉及能与个体直接互动的环境,比如家庭、学校、同伴等;中间系统则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之间形成的相互联系,家校互动是最常见的例子;外层系统并不与个体直接接触,但它依然对个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父母的工作单位、学校的领导结构等;宏观系统主要指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遵循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本文首先梳理已有研究,其中包括教育获得、教育期望、学业成就等多个方面。这些涉及教育结果的研究,逻辑基本趋同。此外,外层系统的相关研究较少,后文不再过多提及。

### (一) 微观与中间系统的视角

在已往教育过程与获得的研究中,以微观系统入手是最常见的分析思路。该思路研究了社区、家庭、学校、班级、同辈群体等多个方面。陈友华等认为,教育获得存在社区差异。由于社区之间存在不同的定位、不均等的教育资源以及各自发展变迁与兴衰,不同社区人群的教育机会也会随之产生差异。<sup>[6]</sup>除了社区差异,黄超发现初中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城乡差异,该差异受家庭与学校双重力量形塑,其中家庭影响占据主要地位。<sup>[7]</sup>而在家庭内部,魏勇等通过检验影响孩子教育期望的一系列因素后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部分亲子间的互动行为能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起到积极作用。<sup>[8]</sup>家庭因素之外,学校因素也被诸多学者关注。吴愈晓等人通过研究指出我国学校存在阶层分割,学校的平均阶层地位越高或内部阶层异质性越大,学生的教育期望也会越高。<sup>[9]</sup>不仅仅是阶层分割,不同学校拥有的教育资源也存在差异。高学历教师比例更高、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其学生也有着更高的教育期望。<sup>[10]</sup>而学校内部的班级、教师也会影响学生的教育期望。自身学历较高且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班主任更有可能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sup>[11]</sup>同时,来自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的积极反馈越多,学生的教育期望会越高。<sup>[12]</sup>在同辈群体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方面,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证实,如果其同辈群体的上进程度越高,学生本身的教育期望也就越高。<sup>[13]</sup>

中间系统视角下的研究一般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微观系统,例如研究家校间关系、家庭与邻里的联动对子女发展的帮助等。吴愈晓与黄超认为,我国的学校系统高度分化,优质学校更注重素质教育,与高阶层家庭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在高阶层学生聚集的优质学校,家庭的文化资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子女在学业成就上取得优势。<sup>[14]</sup>蒋亚丽则指出,公办学校一般拥有良好的师资和严谨的校风,这些不仅能够帮助流动子女取得更好的学业成就,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流动子女家庭在经济资本上的不利地位。<sup>[15]</sup>陈友华与方长春从社区入手,他们认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群体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为一个空间区域上的差异。设施与资源丰富的优质社区能够带来高阶层的家庭的聚集,同时也能吸引办学质量良好的中小学。高阶层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力量自由挑选到更优质的社区来建立教育优势,又或是通过优质社区对中下阶层群体的排斥进行教育优势的巩固。<sup>[16]</sup>

可以看出,微观系统视角下的研究强调不同群体的子女会从内部(家庭)或外部(社区、学校、同伴等等)汲取到不同的资源与支持。以上因素都会使其在教育获得、教育结果的竞争中占据不同位置,并最终形成教育不平等。而中间系统视角则进一步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不仅将多个微观系统串联起来,

而且为个体的教育问题提供机制上的解释。这两个视角多采用排斥范式、资本范式或文化范式分析问题,路径清晰且直观,以探究个体教育中相对微观的实现过程。两个视角的共同不足在于各要素的分析未能置于更大的情境下,例如社会环境与政策背景,忽视了随迁子女教育环境系统的多面性,也忽视了与之相连的不同教育环境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性。<sup>[17]</sup>

## (二) 宏观系统视角下的随迁子女教育期望

宏观系统中存在各类不同的环境因素,例如社会风俗、价值观念与政策法规等。本文着重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问题,异地中考政策作为与随迁子女息息相关的宏观因素,就成为这一议题的重要切入点,理应在学术界得到重视。

回顾现有的研究,多数学者探讨了较为宏观的政策实施现状及政策评估问题,例如罗娟与汪泓以一系列精细的量化指标评估了政策在不同阶段中的实施状况。<sup>[18]</sup>这类政策研究更偏重应用性,注重分析政策执行、评估政策结果。但伴随着异地中考政策的出台,随迁子女群体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更需要研究者去考察政策影响他们观念和行为的微观过程。而该方面的研究较少,依靠现有文献难以全部概括。

宏观系统视角下的理论范式更关注政策效应、教育公平等问题。从教育公平理论的视角看,教育机会的平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科尔曼曾在《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中提出教育机会平等的观念,其中就包括允许所有儿童进入同样的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sup>[19]</sup>瑞典教育学家胡森认为教育平等可以通过特定社会政策的制订来实现,在社会政策的保护下,能够不加歧视和没有其他限制地对所有儿童一视同仁。<sup>[20]</sup>在我国,异地中考政策一方面承担着实现随迁子女教育平等的重任,缓解过去教育机会不平等给随迁子女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另一方面该政策依然设立了一系列门槛,门槛的高低则会影响随迁子女平等接受高中教育机会的大小。科尔曼同时也指出,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在当下的显著特征是向儿童提供他们所期望的未来,教育上的分流则会影响到儿童对未来的期望。<sup>[19]</sup>所以政策为随迁子女带来的限制会影响到他们在教育追求上的观念与行动,换言之,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政策首先会带来一种直接效应:

假设 1: 受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降低。

## (三) 宏观系统与微观系统的交互——教育参与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最基本的意涵是各子系统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但该理论的意涵远不止于此。布朗芬布伦纳并非孤立地讨论各个系统在青少年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交织,在这种相互联系中,个体获得了发展。顺此思路,本文尝试将宏观系统中的异地中考政策以及微观系统中的父母教育参与结合考虑。

首先是政策与父母教育参与之间的关系,过去的研究较少触及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的相关研究多是从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一系列构成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来探讨其微观基础。<sup>[21]</sup>但和他们的子女一样,外来务工人员也身处特殊的社会情境之下,因此就有必要弄清楚宏观的政策背景是否会对该群体的教育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目前高中阶段的教育尚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每个家庭都必须基于成本—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子女是否接受高中教育。<sup>[22]</sup>然而对于随迁子女家庭而言,过高的门槛会使其承担一系列“隐形”成本,例如部分地区所要求的稳定居所、稳定职业、社保缴纳或是各类积分条件等。这种情形下,经济资本、

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具有劣势的随迁子女家庭可能无法像当地家庭一样顺利将其子女送入当地高中就读，家长自然也会重新考虑子女未来的选择。刘谦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随迁子女父母都有着让子女上大学的期望，但该期望却又显现出某种迟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政策的制约，最终父母将会选择让子女及早打工、放弃学业。<sup>[23]</sup>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父母面对过高的政策门槛时，出于理性的考虑，他们不会将子女就读普通高中作为唯一出路。这种观念也会影响其教育实践，本文以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为主要考察对象，在此提出假设：

假设 2：受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会随之降低。

其次，父母教育参与行为也会影响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儿童观念态度、行为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接受的教育，而家庭则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最初和最主要场所。这种教育长期、全面、渗透性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继承性，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子女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等。<sup>[24]</sup>并且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教育参与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它与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有关。<sup>[25]</sup>周菲、程天君的研究从父母参与和管教、亲子沟通和交流以及教育期望三方面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三类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都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教育期望。

最后再结合两个系统及其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认为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行为以及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三者之间很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关系。在此继续提出假设：假设 3：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以及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可能存在着更进一步的关系。其中包括：

假设 3a：政策对随迁子女的负面影响可能以父母教育参与为中介（mediator）。

但反过来思考，在政策限制的客观情况下，父母的教育参与如果依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政策限制给随迁子女的不利影响则有可能被降低。因此有假设：

假设 3b：父母的教育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moderate）政策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年基线调查数据。该数据以初中一年级（7 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 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使用多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进行抽样。全样本包括来自全国 28 个县级单位、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的近 2 万名学生。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与 CEPS 问卷设计，选取其中的 1379 名 9 年级随迁子女及其父母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 9 年级的随迁子女，主要是 CEPS 问卷向这部分学生询问了关于异地中考政策的情况。

#### （二）变量设置与测量

#####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CEPS 在学生问卷中询问了“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实际处理中将各教育阶段所对应的受教育年限赋值为教育期望变量。

##### 2. 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异地中考政策。来源于学生问卷 C31 题项：“按照当地政策，你能否在本市（地级市）报考高中？”该题项有 4 个答案，包括“可以报考重点高中”、“只能报考普通高中，不能报考重点高中”、“重点和普通高中都不能报考”以及“不知道”。在模型中，将其设定为有 4 个类别

的分类变量，同时分别命名为“不受限制”、“部分受限”、“完全受限”、“不知道政策”。笔者认为，CEPS 所问的其实是随迁子女及其家庭能否满足当地中考政策所设定的各种门槛。因此本研究不涉及具体政策条目，仅仅关注随迁子女受不同限制后能在当地报考何种类型的学校。

3. 中介与调节变量

父母教育参与是指父母为提升子女学业成就所采取的各种行为。<sup>[26]</sup>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父母教育参与经由三个方面过程发生：一是父母对子女学习活动的参与和介入；二是来自父母对子女的鼓励和日常沟通；三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sup>[27]</sup>对应 CEPS 父母问卷，父母监督依据 A8 题项：“在下列方面，您对孩子管得严不严？”该题项询问了作业、学校表现、上学、放学等 8 个日常学习事项上父母监督的严格程度。依据选项“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分别赋为 1 分、2 分和 3 分，并将其累加。亲子沟通交流选择 A14 题项：“您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以下事情？”该题项涉及孩子在校情况、孩子心事”等 5 个方面。依据选项“从不”、“偶尔”、“经常”分别赋为 1 分、2 分和 3 分，并将其累加。父母教育期望则根据问卷中相关题项，变量处理方法与学生问卷中相同，不再赘述。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父母与学校三方面的变量。其中关于子女的变量有性别（0=女性，1=男性、同胞数量（连续型变量）、认知能力（连续型变量）、班级排名（1=不好，2=中下，3=中等，4=中上，5=很好）与户籍（0=非农户籍，1=农业户籍）关于父母的变量有职业（0=一般职业，1=高地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连续型变量）、家庭经济水平（1=非常困难，2=比较困难，3=中等，4=比较富裕，5=非常富裕）以及政治身份，（0=非党员，1=党员）。学校层面的变量有学校排名（连续型变量）、学校所在地区。后者又分为两个变量，其中包括宏观的东、中、西部划分，（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也包括学校所在城市区位的划分，（1=中心城区，2=边缘城区/城乡结合部，3=乡镇农村）。

（三）多重插补

通过描述统计分析（见表 1），笔者发现核心自变量的无填答现象十分严重。不仅如此，其余多数变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缺失，整体数据的缺失率更是超过 40%。有学者认为高比例的数据缺失可能会导致估计偏差。<sup>[28]</sup>因此本研究就不太适合将缺失值直接删除来进行分析。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n = 1379）

|         | 个案数  |      | 均值    |       | 标准差  |      |
|---------|------|------|-------|-------|------|------|
|         | 插补前  | 插补后  | 插补前   | 插补后   | 插补前  | 插补后  |
| 子女教育期望  | 1304 | 1379 | 15.94 | 15.90 | 3.15 | 3.16 |
| 异地中考政策  | 1185 | 1379 | 1.20  | 1.10  | 1.31 | 1.25 |
| 同胞数量    | 1357 | 1379 | 0.90  | 0.90  | 0.86 | 0.86 |
| 班级排名    | 1367 | 1379 | 3.04  | 3.04  | 1.13 | 1.13 |
| 父母受教育程度 | 1374 | 1379 | 10.25 | 10.25 | 2.89 | 2.89 |
| 政治身份    | 1238 | 1379 | 0.08  | 0.08  | 0.27 | 0.27 |
| 父母职业    | 1370 | 1379 | 0.17  | 0.17  | 0.37 | 0.37 |
| 家庭经济水平  | 1370 | 1379 | 2.88  | 2.88  | 0.57 | 0.57 |



|             |      |      |       |       |      |      |
|-------------|------|------|-------|-------|------|------|
| 父母监督        | 1245 | 1379 | 18.67 | 18.67 | 3.21 | 3.22 |
| 亲子沟通        | 1251 | 1379 | 10.94 | 10.93 | 2.67 | 2.68 |
| 父母教育期望      | 1290 | 1379 | 16.34 | 16.31 | 3.30 | 3.32 |
| 性别          | 1379 |      | 0.51  |       | 0.50 |      |
| 认知得分        | 1379 |      | -0.02 |       | 0.85 |      |
| 户籍状况        | 1379 |      | 0.64  |       | 0.48 |      |
| 学校 PSU 所在地区 | 1379 |      | 1.50  |       | 0.83 |      |
| 学校区位        | 1379 |      | 1.85  |       | 0.81 |      |
| 学校排名        | 1379 |      | 1.82  |       | 0.68 |      |

注：表格中的后六项数据没有缺失

针对数据存在缺失值的问题，学界多采用多重插补法来应对。这种方法会给每个缺失数据插补上多个值，再根据插补的次数形成多个插补样本，然后对多个插补样本分别进行模型估计，最终合并为一个综合结果。常见的多重插补方法包括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 MCMC）和链式方程多变量插补(multivariate imputation using chained equations, MCMC)。其中，MCMC 法对变量有一系列的限制要求，例如变量分布、分类变量的转换等，而 MCMC 法需要满足的限制条件较少，所以本文将使用后一种方法处理数据的缺失。又考虑到缺失数据的比例较大，本文将进行 30 次插补。每一次插补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集。后文如不作说明，那么将会报告这 30 个数据集的综合统计分析结果。

#### （一）分析步骤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数据分析包括三个部分。首先考察在不同的政策限制下，子女的教育期望会发生何种变化。第二部分考察在不同的政策限制下，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会发生何种变化。第三部分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将父母教育参与行为加入第一部分的模型中，观察在这种情形下，政策限制带来的影响。第二步考察父母教育参与行为是否在异地中考政策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又或是调节了政策对子女期望带来的影响。为了避免学校层次因素对随迁子女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将采用两层次的分层线性模型进行控制。进行该模型公式如下：

$$y_{st} = \beta_0 + \sum_{a=1}^n \beta_a x_{sta} + \sum_{b=1}^m \beta_{0b} Z_{tb} + \mu_{0t} + \epsilon_{ia}$$

其中 s 表示儿童，t 表示学校。 $y_{st}$ 表示第 j 所学校的第 s 个儿童的教育期望。 $\beta_0$ 代表截距； $x_{sta}$ 代表儿童个体层次变量。 $Z_{tb}$ 代表学校层次变量。 $\mu_{0t}$ （是学校层次的随机误差项，表示第 j 所学校儿童教育期望均值与全体儿童教育期望均值的离差。 $\epsilon_{ia}$ 是儿童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表示第 j 所学校第 i 个儿童的教育期望与该学校全体儿童教育期望均值的离差。

调节效应的检验上，本研究采用最基础的模型，如下所示。

$$Y = aX + bM + cXM + e$$

X 为自变量，Y 为因变量 M 为调节变量。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 之间的关系是调节变量 M 的函数，系数 c 为调节效应的大小。<sup>[29]</sup>

中介效应的处理方法相对复杂。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与中介变量都是常见的连续型变量，但自变量异地中考政策是类别变量。因此需要对这一点进行针对性处理。本文采用 Hayes 和 Preacher. 提出的相对中介效应(relative mediation effect)、相对直接效应(relative direct effect)和相对总效应(relative total effect)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sup>[30]</sup>该方法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由于自变量是类别变量，需要在其中选出一个参照水平。自变量的其他水平都需要与之对比得到相应的间接（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

第二步，对自变量编码，可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如果自变量有 k 个取值，则需要生成 k-1 个虚拟变量，分别为  $D_1, \dots, D_{k-1}$ 。

第三步，依次进行如下的计算：

$$\begin{aligned} Y &= i_1 + c_1 D_1 + c_2 D_2 + \dots + c_{k-1} D_{k-1} + e_Y \\ M &= i_2 + a_1 D_1 + a_2 D_2 + \dots + a_{k-1} D_{k-1} + e_M \\ Y &= i_3 + c'_1 D_1 + c'_2 D_2 + \dots + c'_{k-1} D_{k-1} + bM + e_Y \end{aligned}$$

其中  $C_1, \dots, C_{k-1}$  为相对总效应， $C'_1, \dots, C'_{k-1}$  为相对直接效应， $a_1 b, \dots, a_{k-1} b$  为相对间接(中介)效应<sup>[31]</sup>。

#### 四、研究结果

##### (一) 异地中考政策下的随迁子女教育期望

如表 2 所示，本研究首先给出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该模型模拟过往的研究思路，即个人、家庭、学校等因素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造成的影响。

表 2 不同政策限制下随迁子女教育期望 (n=1379)

|         | 基准模型               | 政策模型               |
|---------|--------------------|--------------------|
| 性别（男）   | -0.40 * *          | -0.38 * *          |
| 同胞数量    | 0.157 <sup>+</sup> | 0.165 <sup>+</sup> |
| 认知能力    | 0.480 * * *        | 0.429 * * *        |
| 班级排名    | 0.968 * * *        | 0.896 * * *        |
| 户籍（农业）  | 0.011              | 0.048              |
| 职业（高地位） | -0.099             | -0.063             |
| 父母教育年限  | 0.116 * * *        | 0.114 * * *        |
| 政治（党员）  | -0.053             | -0.141             |

|              |                    |                     |
|--------------|--------------------|---------------------|
| 家庭经济情况       | -0.079             | -0.100              |
| 地区           | 以东部地区为参照           |                     |
| 中部           | 0.236              | 0.254               |
| 西部           | 0.450 <sup>+</sup> | 0.433               |
| 类型           | 以中心城区为参照           |                     |
| 边缘城区 / 城乡结合部 | -0.350             | -0.351              |
| 农村           | -0.268             | -0.268              |
| 学校排名         | 0.644 * * *        | 0.621 * * *         |
| 政策限制         | 以不受限制为参照           |                     |
| 部分受限         |                    | -0.881 * * *        |
| 完全受限         |                    | -0.514 <sup>+</sup> |
| 不知道政策        |                    | -0.688 * * *        |
| 常数项          | 11.015 * * *       | 11.662 * * *        |
| 组间变异         | 0.572              | 0.539               |
| 组内变异         | 2.674              | 2.654               |
| 平均增加方差       | 0.052              | 0.065               |
| 最大信息缺失       | 0.167              | 0.197               |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其中组间变异和组内变异在多重插补法中不给出显著性水平。下表相同。

第二列回归结果显示了不同异地中考政策下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变化。相较于不受限制的随迁子女，部分受限的在教育期望上低 0.88 年，（ $p < 0.001$ ）。不知道政策的随迁子女则比其低 0.69 年，（ $p < 0.001$ ）。而完全受限的随迁子女与之相比，教育期望上低 0.51 年，但这种差异不如另外两类群体显著（ $p < 0.1$ ）。因此假设 1 得证。受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存在不同程度的降低，但并非政策限制越强，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下降越多。政策限制对那些无法在当地报考重点高中但可报考普通高中的随迁子女影响最大。受政策限制最大的子女尽管也会受影响，但相较之下教育期望要高于部分受限的群体。笔者认为，虽然部分受限的随迁子女拥有在当地报考普通高中的权利，但这些高中很可能是该地区主要用以接纳随迁子女的学校，择校选择上依然有较大限制。如果他们选择了地处边缘地带的高中，其接受的教育与城市其他普通高中的教育相比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异会加剧他们在教育期望上的劣势。另一方面，当他们拥有在当地就读普通高中的资格后，回乡读书（报考职业高中等意愿可能会被削弱，一些更好的出路或许在无形中被忽略。而在流入地完全受政策限制的随迁子女，他们可以尽早与父母商讨升学的规划。如果选择回到原籍，他们在高中学校的选择上会留有较大的余地。如果选择留下来，那么至少在职业高中的选择上不存在过多限制。以上原因导致了能报考普通高中的随迁子

女，实际接受的负面影响最大。而受限制较大的随迁子女，固然也受到影响，但比前者小很多。

最后是不知道政策的随迁子女，由于该群体并非本文重点，并且其实际情况较为复杂，难以和前三类群体进行有效对比，因而笔者仅做简要讨论。这部分随迁子女可能对学习不够关心，又或是早早做好毕业后不在流入地读书的打算，所以对政策也采取漠视的态度。其教育期望也与不受限制的子女有很大区别，只是这种区别无法用政策因素解释。

综合分析上述结果，以异地中考政策为代表的教育公平问题对随迁子女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政策给随迁子女带来不一样的教育机会，无形中产生不一样的教育分流。如果机会平等，随迁子女能拥有与本地儿童相同的升学及分流路径，在政策环节他们就不再囿于自身的流动身份，也就对自己的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相反，身处门槛过高的政策环境，随迁子女会丧失大量教育机会，使其在与本地儿童的教育竞争中处于先天的劣势位置，从而减弱他们在教育上的积极性，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此看来，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是解释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虽然政策不像家庭与学校因素，直接教育育人，但会通过一系列条目规定影响随迁子女未来努力的方向。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宏观系统对个体教育的影响确实存在，那么该系统与其他层次的系统又存在怎样的关联？这种关联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随迁子女？

（二）异地中考政策下的父母教育参与

表 3 呈现了不同政策限制下各类父母教育参与行为的基本情况。与不受限制的随迁子女父母相比，在父母监督行为上，不知道政策的在得分上低 0.69 分，( $p<0.01$ )；在亲子沟通方面，部分受限、不知道政策的分别有 0.58 分，( $p<0.05$ )和 0.50 分( $p<0.01$ )的劣势；在父母教育期望方面，部分受限的要低 0.76 分，( $p<0.01$ )，完全受限的劣势要低于参照群体 1.04 分，( $p<0.01$ )，不知道政策的介于两者之间，低于参照组 0.93 分，( $p<0.01$ )。

从而，假设 2 部分得以验证，受异地中考政策限制，父母的部分教育参与行为也随之降低。其中最明显的是父母教育期望的下滑，并且政策限制越大，教育期望下滑程度越严重。说明父母面对政策困境时，迫于现实中许多无奈，不得不降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除了教育期望之外，亲子间在学习上的沟通也会减少，这种减少在部分受限制的父母中最为明显，而完全受政策限制的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不难理解，当随迁子女正常升学的路径被阻塞时，父母可能会将精力转向其他方面，与子女在学习上的沟通也就相应减少。在学业监督上，父母多少会产生松懈，但总体仍可维持较高的水平，只有不知道政策的父母会明显疏于管教。从上述结果来看，当父母面对异地中考政策对子女的限制时，部分教育参与行为确实会下滑，但这种下滑也不代表对子女不闻不问，该结果可能也反映了父母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某种迟疑。只有不知道政策的父母在各类教育参与行为上存在明显的劣势，这可能是对子女未来学业抱有不关心的态度所导致。

表 3 不同政策限制下的父母教育参与（ $n=1379$ ）

|      | 父母监督     | 亲子沟通     | 教育期望       |
|------|----------|----------|------------|
| 政策限制 | 以不受限制为参照 |          |            |
| 部分受限 | -0.316   | -0.581 * | -0.759 * * |
| 完全受限 | -0.416   | -0.252   | -1.036 * * |

|        |           |          |           |
|--------|-----------|----------|-----------|
| 不知道政策  | -0.687**  | -0.498** | -0.928***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18.223*** | 8.764*** | 11.597*** |
| 组间变异   | 0.548     | 0.021    | 0.536     |
| 组内变异   | 3.134     | 6.525    | 2.881     |
| 平均增加方差 | 0.121     | 0.293    | 0.089     |
| 最大信息缺失 | 0.233     | 0.786    | 0.279     |

注：控制变量与上表一致。出于篇幅及本文论述侧重点的考虑，不再具体列出。下表相同。

以系统的视角来看，宏观系统中的部分要素与微观系统中的部分要素确实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系统与系统之间产生了某种关联，那么较高层次的系统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又是不是通过系统间的关联传递出去的呢？

### (三)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及子女教育期望

#### 1. 基础效应分析

这部分将遵循前面的分析步骤，首先把父母教育参与行为纳入表2所呈现的模型中，进一步观察在控制父母教育参与行为的情况下，政策限制给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带来的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综合参考表2和表4，纳入父母教育参与变量后，异地中考政策给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带来的影响明显降低。其中，部分受限的子女与不受限制的差距从0.88年降低到0.56年，不知道政策的与不受限制的差距从0.69年降低到0.31年。与不受限制的子女相比，完全受限的只有0.12年的差距，且这种差距不具有显著性。

在前文我们已分析到，随迁子女受到不同程度的政策限制时，其教育期望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进而，这种下降可能是以父母教育参与为中介来完成的，同时父母教育参与程度也可能调节着政策的影响，较高的父母教育参与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政策的不利影响。

#### 2. 父母教育参与的中介作用

相对中介检验的结果见表5和表6。首先是父母教育期望，以不受限制的子女为参照，部分受限的相对中介的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53, -0.02]$ ，该区间不包括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 $a_1 = -0.68$   $b = 0.41$   $a_1b = -0.28$ ）。因此部分受限的子女，其家长的教育期望年限要比不受限制的少0.68年，受其家长影响，这部分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会随之减少。同时，其相对总效应也显著（ $C_1 = -0.82, p < 0.1$ ），相对中介效应的占比为33.62%。类似的，完全受限的子女相对于不受限制的子女，其相对中介效应也显著（ $a_2 = -1.21$   $b = 0.41$   $a_2b = -0.49$ ）。但其相对总效应只在最低程度上显著（ $C_2 = -0.54, p < 0.1$ ），相对中介效应的占比为91.82%。最后，不知道政策的子女相对不受限制的子女，其相对中介效应依然显著（ $a_3 = -1.08$   $b = 0.41$   $a_3b = -0.44$ ）。其相对总效应显著

$C_3 = 0.79$ ,  $p < 0.001$ , 相对中介效应的占比为 56.08%。除了父母教育期望之外, 表 6 中列举的父母监督和亲子沟通两个变量, 经检验后发现各系数的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均包括 0<sup>[31]</sup>, 所以两个变量都不存在中介作用。

表 4 不同政策限制下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及其父母教育参与 (n=1379)

|        |             |
|--------|-------------|
|        | 父母教育参与模型    |
| 政策限制   | 以不受限制为参照    |
| 部分受限   | -0.556 * *  |
| 完全受限   | -0.117      |
| 不知道政策  | -0.305+     |
| 父母教育参与 |             |
| 父母监督   | 0.018       |
| 亲子沟通   | 0.034       |
| 教育期望   | 0.395 * * *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6.414 * * * |
| 组间变异   | 0.365       |
| 组内变异   | 2.404       |
| 平均增加方差 | 0.103       |
| 最大信息缺失 | 0.218       |

表 5 父母教育期望的中介效应分析 (n=941)

|         | 系数 ak-1 检验   | 相对中介效应    |          |        | 相对总效应系数 (ck-1) |
|---------|--------------|-----------|----------|--------|----------------|
|         |              | 系数 (ak-1) | 95% 置信区间 |        |                |
| 政策限制    | 以不受限制为参照     |           |          |        |                |
| 部分受限    | -0.675 *     | -0.276    | -0.531   | -0.024 | -0.821 * *     |
| 完全受限    | -1.207 * * * | -0.494    | -0.791   | -0.199 | -0.539+        |
| 不知道政策   | -1.038 * * * | -0.443    | -0.652   | -0.253 | -0.790 * * *   |
| 系数 b 检验 | 0.409 * * *  |           |          |        |                |

注: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都采用 SPSS 软件中的 Process 插件, 由于该插件无法综合分析多重插补后的样本, 因此只能对缺失变量采用直接删除法。表中置信区间为自助法置信区间。

因此假设 3a 部分得以验证, 异地中考政策对随迁子女的负面影响以父母教育期望为中介实现, 且父母监督与亲子沟通都不产生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之外, 政策带来的直接效应依然存在。当一个家庭面

对异地中考政策限制，父母和子女都会受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抱负不如以往强烈。而认知到父母对自己期待的下降，孩子的内心或许也受到动摇，降低了对自己的教育期望。这种经由父母而产生的连锁反应，影响力不容小觑，甚至可以比拟政策限制带来的直接影响，相对中介效应与相对直接效应的比较，总和为 100%）。

表 6 父母监督和亲子沟通的中介效应分析（n =941）

|       | 父母监督的相对中介效应 |          |       | 亲子沟通的相对中介效应 |         |       |
|-------|-------------|----------|-------|-------------|---------|-------|
|       | 系数（ak-1b）   | 95% 置信区间 |       | 系数（ak-1b）   | 95%置信区间 |       |
| 政策限制  | 以不受限制为参照    |          |       |             |         |       |
| 部分受限  | 0.000       | -0.017   | 0.022 | -0.005      | -0.046  | 0.028 |
| 完全受限  | -0.005      | -0.046   | 0.026 | -0.005      | -0.048  | 0.031 |
| 不知道政策 | -0.006      | -0.041   | 0.025 | -0.005      | -0.042  | 0.026 |

注：这里仅列出中介效应的关键参数。其余参数中，系数 ck-1 及系数 b 与上表一致，ak-1 出于篇幅考虑将其省略，可参考表 3 系数。

### 3. 父母教育参与的调节作用

各类父母教育参与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 7 所示，表中变量取值已去中心化。可以发现，父母监督行为、父母教育期望均不是异地中考政策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调节变量，而亲子沟通行为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的。具体来说，当亲子沟通与政策限制各种子分类的交互项纳入时，该变量完全受限的子女以及不知道政策的子女两类人群中系数为正，且系数值显著。这说明亲子沟通能够削弱政策限制给这两类随迁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从调节效应的整体模型检验结果来看，该效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略微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度。

由此，假设 3b 部分得以验证，异地中考政策对部分随迁子女的负面影响可以被亲子沟通行为所调节。该调节作用对受限制最大的子女效果最明显，其次也对不知道政策的有很大帮助。这说明父母与子女在学习生活上的交流能够帮助他们重新树立信心，使他们不会降低对自己要求和期待。同时，调节效应的检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政策影响为何在不同群体间具有差异的思路。结合假设 2 得出的结论，完全受限的子女在整体水平上未与不受政策限制的拉开太大差距，亲子间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不知道政策的子女来说，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对升学的前景并不关心，因此想要逆转消极态度产生的影响，就需要父母灌注更多的心血。

表 7 父母教育参与的调节效应分析（n =941）

|             | 父母监督       | 亲子沟通       | 父母教育期望    |
|-------------|------------|------------|-----------|
| 政策限制        | 以不受限制为参照   |            |           |
| 部分受限        | -0.845 **  | -0.905 *** | -0.630 *  |
| 完全受限        | -0.525     | -0.521     | -0.079    |
| 不知道政策       | -0.778 *** | -0.783 *** | -0.419 *  |
| 调节变量        | 0.021      | -0.019     | 0.386 *** |
| 调节变量 * 部分受限 | -0.097     | -0.046     | 0.014     |

|              |              |              |              |
|--------------|--------------|--------------|--------------|
| 调节变量 * 完全受限  | 0.132        | 0.373 * * *  | 0.102        |
| 调节变量 * 不知道政策 | 0.067        | 0.166 *      | 0.013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11.173 * * * | 11.249 * * * | 13,244 * * * |
| 整体模型检验       | 0.004        | 0.011 * *    | 0.001        |

但仍需注意，并非所有的父母教育参与行为都能调节政策对子女造成的负面影响。学业上的监督与教育期望上的高期待对缓解政策压力并无裨益，甚至在某些时候会产生较弱的不良影响。因此父母需要及时把握当前子女身处的政策环境，对子女的教养必须结合该环境的实际情况，在不同情境下迅速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此外，有一处结果较为特殊。根据表4与表7，父母监督行为与亲子沟通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起到的助推作用有限，而父母教育期望则与子女教育期望关系紧密。但该结果与父母教育参与在政策及子女教育期望间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并不一致。（根据调节效应的原理，两者不必一致。）本文虽然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但关于这一点的深入原因需要在今后继续探索。

最后，联系到生态系统理论，个体身处不同层次的系统，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自身行为。仅仅只考虑单一系统或者是孤立地考虑不同系统对个体的影响都是不充分的，研究中还需要考虑到教育环境系统的多元性与互动性，以得到最准确与最全面的结论。

## 五、结论与启示

在微观层次的教育获得研究中，家庭、学校、同伴等因素最容易得到学者的关注，而政策的影响力常常被忽视，那么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子女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已有研究中，教育期望被认为是一个综合预测教育获得的可靠指标，因此将其结合教育政策做深入探讨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

本文基于 CEPS 2013-2014 基线调查数据，探究了异地中考政策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途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异地中考政策会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但不同子群体受到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不满足当地政策，只能报考普通高中的随迁子女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普通高中与重点高中都不能报考的随迁子女虽然也被波及，但情况好于前者。其次，异地中考政策也会对随迁子女的父母造成影响。在受到限制时，父母的教育期望以及和子女学习生活上的沟通会减少。就教育期望而言，部分受限的父母要好于完全受限的父母，但在亲子沟通上却相反。而父母的日常、学业监督则只有不显著的下滑。最后，宏观的政策（微观的父母教育参与以及子女教育期望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因果链。一方面，完全受限的随迁子女在教育期望不至于被拉开太大差距，父母与他们的沟通交流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受政策限制的各类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在总体上低于不受政策限制的子女，主要是因为政策先影响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随迁子女自身。

本文的结论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启示。其一，该研究可以置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之下加以分析。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未能将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置于复杂的教育环境系统之下来考察，同时还忽视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互动性，难以有效还原随迁子女的教育实践面貌。而生态系统理论弥补了过往研究的缺陷。该理论



认为,个体是处于不同层次系统中的个体,其教育实践行为会被这些系统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多元的、具有互动性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这一观点:不同政策情境下随迁子女的教育实践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也在随迁子女与其他层次系统的互动中被再次建构。

其二,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缓解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的异地中考政策,对他们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排斥性。随迁子女无法完全在教育机会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制度导致了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分流,这种分流影响了随迁子女对于未来学业的期望,这是政策带来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随迁子女家庭通常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上没有优势。这些家长在高昂的入学成本下,必须仔细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出于理性的考虑,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可能会随之改变,这种改变进一步波及到随迁子女。反观同一空间(同等家庭条件下的户籍地儿童,他们完全不需要考虑政策的影响。

而教育期望最终会影响教育获得,异地中考政策给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带来的影响会成为随迁子女与本地儿童拉开差距的不利因素。当受到不同程度的政策限制,随迁子女会降低他们的教育期望,进一步对他们的学业成就与教育获得产生影响。而学业成就、教育获得又与随迁子女今后的社会流动紧密相关。长此以往,会再生产该群体已有的不平等地位。所以,本研究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营造良好(公平的政策环境对于随迁子女意义重大。目前各地相继出台的异地中考政策也仅是近几年政府初步实践探索后的结果,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除了维护本地学生应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之外,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照顾到随迁子女。第二,政府需要努力推进各类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努力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政策限制下学校选择的分流是影响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重要原因,积极提升各类学校的办学质量也是缓解政策影响的一剂良方。第三,随迁子女家长需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除积极的言行态度和教育方式外,与教育环境相匹配的教育方式同样能够增加子女的教育期望。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父母自身先受政策影响,其子女也难免受到波及,造成连锁反应。总而言之,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是单靠一方的努力就能改变,必须多方力量协同共进,才能消除那些制约和排斥对随迁子女带来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73、134页。
- [2] 王毅杰、卢楠,2019,《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研究——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11个城市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 [3] 陈宣霖,2018,《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后的流向——异地中考政策影响高中教育选择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第3期。
- [4] Turcios-Cotto, Viana Y., S. Milan, 2013, “Racial/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Adolescents: Does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Mean Something Different to Latino Students Compared to White and Black Students?”,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Vol.42, No9, pp.1399-1412.
- [5]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1.
- [6] 陈友华、方长春,2007,《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一项对义务教育阶段“划区就近入学”等制度安排公平性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 [7] 黄超,2017,《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家庭背景与学校环境的影响》,《社会学评论》第5期。
- [8] 魏勇、马欣,2017,《中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EPS的实证分析》,《教育学术月刊》第10期。

- [9] 吴愈晓、黄超、黄苏雯, 2017, 《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 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社会发展研究》第 3 期。
- [10] 张云亮, 2018, 《亲子互动、学校资源与学生教育期望——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异质性分析》, 《青年研究》第 2 期。
- [11] 刘浩, 2018, 《班级环境对初中生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青年研究》第 1 期。
- [12] 张阳阳、谢桂华, 2017, 《教育期望中的班级效应分析》, 《社会》第 6 期。
- [13] 黄超、吴愈晓, 2016, 《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 表现与成因》, 《江苏社会科学》第 4 期。
- [14] 吴愈晓、黄超, 2016,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 [15] 蒋亚丽, 2017, 《父母期望、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学习成绩》, 《青年研究》第 2 期。
- [16] 陈友华、方长春, 2007, 《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一项对义务教育阶段“划区就近入学”等制度安排公平性的实证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第 1 期。
- [17] 丁百仁、王毅杰, 2019, 《以生态系统理论创新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研究》, 《青年探索》第 2 期。
- [18] 罗娟、汪泓, 2018,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现代教育管理》第 8 期。
- [19] [美]詹姆斯·科尔曼, 1989, 《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 载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瑞典]托尔斯顿 胡森, 1989, 《平等——学校与社会政策的目标》, 载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1] 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 201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 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3 期。
- [22] 陈宣霖, 2015, 《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后的流向——异地中考政策影响高中教育选择的实证研究》, 《青年研究》第 1 期。
- [23] 刘谦, 2018 年, 《迟疑的“大学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人类学分析》, 《教育研究》第 3 期。
- [24] 王毅杰、刘海健, 2018, 《家庭背景与流动儿童的留城意愿——一项基于家庭教育内容的实证研究》, 《南方人口》第 4 期。
- [25] 丁百仁、王毅杰, 2016, 《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基于四类儿童的比较研究》, 《教育科学》第 5 期。
- [26] Rachel Seginer, 2006,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 Ecology Perspective”, *Parenting*, Vol. 6, No.1, pp.1-48.
- [27] 周菲、程天君, 2016, 《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父母教育卷入的影响效应分析》, 《教育研究与实验》第 6 期。
- [28] DeMaio, Theresa J., 2009, “Refusals: Who, Where and Wh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4, No.2, 1980, PP, 223-233; Groves, R. M., Fowler Jr, J. F., Couper, M. P., Lepkowski, J. M., Singer, E., Tourangeau, R., *Survey Methodology*,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p. 56.
- [29]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2005,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心理学报》第 2 期。
- [30] Hayes, Andrew F., K. J. Preacher, 2014,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with a Multi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y*, Vol.67, No.3, pp.451-470.
- [31] 方杰、温忠麟、张敏强, 2017, 《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科学》第 2 期。

☆ 作者简介: 王毅杰,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是知,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周小晴



# 基于产权与场域关系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钱志远 孙其昂

**摘 要：**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中国城市社区出现了以住房产权为核心，以共有产权为纽带的新型邻里关系。住房产权是社区场域运行的重要基础，住房产权制度塑造了社区场域的运行秩序和构成形式，促进了个人主体性的实现与道德的培育，但也带来了社区关系物化与分化等问题。同时，住房产权是嵌入到社区场域之中的，不仅受到社区场域横向网络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交互建构，而且受到纵向网络中“制度”和“生活”的交互建构。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要将住房产权作为多元共治的载体，而且要适应现代住房产权制度及其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城市治理 城市社区 社区治理 住房产权 产权理论 场域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基层社区体制经历了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从“社区管理”再到“社区治理”的转变。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及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愈演愈烈，直接威胁着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但现在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以及如何实现社区中多方主体的良性互动。多年来，虽然我国城市社区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也进入了瓶颈期，社区治理实践急需新的理论体系来指导。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国家—社会”和“共同体—社会”两大分析视角。其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在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学者们将社区作为切入点来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持社会中心论的学者更关注中国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发展，将社区实践视为与国家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发育<sup>[1][2][3]</sup>。与之相反，持国家中心论的学者更关注国家权力如何对城市社区进行控制以及国家意志如何渗透到基层社会。列文森奖得主邓利杰（Tombs）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市民组织和维权运动实际上是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一种形式运作着<sup>[4]</sup>。海贝勒和戈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都市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的创新机理与居民主动性参与机制研究”（17CSH008）。本文已刊发于《求实》2019年06期。

尔(Heberer and Göbel)则强调政党国家在中国城市社会的重要性,认为虽然政府培育了大量依靠国家的社会团体,但这并没有成功地建立广泛参与的基础<sup>[5]</sup>。学界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探讨经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式分析后,逐步转向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交叉渗透关系。桂勇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种“粘连”状态<sup>[6]</sup>。何艳玲将中国都市街区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概括为“权变的合作主义”<sup>[7] (P217)</sup>。与此类似,黄晓星认为国家-市民社会关系存在“含混-谋略型”关系<sup>[8]</sup>。上述研究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织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增强了这一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社会的解释力。

“共同体-社会”是社区治理研究的经典研究视角。“共同体”是指由“本质意志”推动的、以情感为纽带形成有机整体。“社会”是由“选择意志”推动的、以利益为导向的机械结合形态<sup>[9]</sup>。为了探寻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中国学者们沿着这一理论脉络展开了对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一部分学者关注中国城市社区的“共同体”特征,强调社区治理的价值性、情感性、认同感和凝聚力等本质属性。丁元竹提出社区建设要回归“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把握社区的真正内涵和内在规律<sup>[10]</sup>。毛丹认为社区发挥着邻里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基础功能,良好的社区治理要发展和保护社区的基础功能<sup>[11]</sup>。文军等学者强调现代社区治理应该重视“人”及其情感的重要性,从而提出“社区情感治理”<sup>[12]</sup>的理念。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性,强调社区是以利益、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合形态。石发勇认为中国的社区既不是民主制度顺利运转的“公民社区”,也不是黑恶势力横行的“非公民社区”,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准公民社区”<sup>[13]</sup>。陈鹏认为,以业主组织为核心建制的社区政体系统对于加强社区治理具有积极意义<sup>[14]</sup>。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注“共同体”特征的学者忽视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因素,而关注“社会”特征的学者则忽视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区的“共同体”依旧是人类基本的需求。由此,郑中玉提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跳出西方线性的“共同体-社会”分析框架,立足于非线性的多元社区立场来理解中国的社区实践<sup>[15]</sup>。

梳理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学界虽然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相关研究也进入了瓶颈期,局限在“共同体-社会”和“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之中而无法突破。笔者认为,现有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忽视了住房产权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中国城市社区出现了以住房私有产权为核心、以共有产权为纽带的新型邻里关系。产权是理解中国现代城市商品房社区的重要基础。虽然郭于华、沈原等学者较为敏感地关注到住房产权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sup>[16][17][18]</sup>,但是并没有揭示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之间的深层关系。笔者从产权与场域关系视角出发,力图揭示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之间的深层联系,为加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资源。

##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 产权理论与场域理论

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sup>[19]</sup>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强调,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产权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直接决定效率高低<sup>[20]</sup>。上述研究都强调产权清晰是有效资源配置的前提,但在现实社会中这一前提往往是不存在的,因为产权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为不同的行动者所建构。社会学者周雪光认为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权利产权”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解释的困境。他基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理论,提出“关系产权”

概念，强调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是该组织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果<sup>[21]</sup>。另外，也有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象征地权”<sup>[22]</sup>“社会合约性产权”<sup>[23]</sup>“复合产权”<sup>[24]</sup>和“村庄社区产权”<sup>[25]</sup>等分析性概念，从而形成了“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sup>[26]</sup>，进一步推动了产权研究。但无论是产权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都没有深入到产权的本质层面，没有揭示产权制度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基础，深刻地阐述了产权的本质、起源和内容，揭示了财产关系的本质，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sup>[27]</sup>。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提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此外，马克思还提出所有制关系就是以物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上述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都为我们研究围绕着居住而形成的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从产权出发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场域理论是皮埃尔·布迪厄学术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理解其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布迪厄从传统的实体主义方法论转向了关系主义方法论，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sup>[28]</sup>（P133-134）。在他看来，社会大场域是由各种相对自主的小场域构成的，这些小场域各自具有特定的逻辑，行动者必须习得某个场域特有的规则才能融入这个场域。场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空间，各方力量的非对称关系是场域运转的动力来源。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依据其占有资本的不同而不断展开“博弈”。此外，场域概念必须与习性和资本等概念联系起来理解。由此，布迪厄提出了实践理论的分析模式： $[(\text{习性})(\text{资本})] + \text{场域} = \text{实践}$ <sup>[29]</sup>。一方面，实践是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另一方面，实践又产生新的规则形塑习性，影响场域形态，并导致资本的获得或转化。它们之间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型塑的循环往复的统一整体。中国的现代社区是一个结构复杂、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具有流动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是一个围绕居住活动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场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二）产权与场域关系：城市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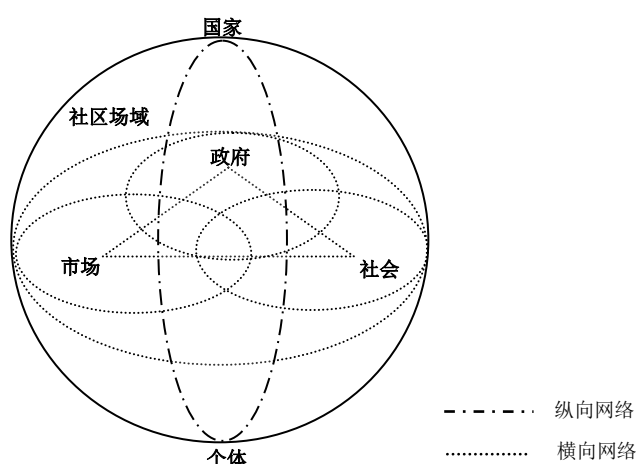


图1 产权与场域关系：城市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产权理论与场域理论的启示下，笔者立足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际经验，从产权与场域关系出发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如图1）。产权塑造社区场域治理规则，社区场域重构产权制度实践。首先，产

权是社区治理场域运行的重要基础。从中国现代商品房社区的主体看，每一个业主都被看作是权利主体，都可以通过购买住房获得自己的居住的权利。个体之间的权利关系通过产权而实现。整个社区就是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在行动中相互联系着的场域。我国住房产权制度塑造了社区治理场域的运行秩序和构成形式，影响着社区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住房产权的发展具有促进主体性的实现与个体道德的培育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社区关系的物化与分化的消极意义。其次，住房产权是嵌入到社区场域之中的，受到社区场域的建构。住房产权虽然是一种以专有权为主导的独立的所有权，但这种权利受到相邻关系以及社区场域的限制。在以商品房住宅小区为主要住宅建设方式的中国现代城市中，每一个住宅小区包括了为数众多的住宅楼房，而每一幢住宅楼房被分割为独立单元（“单元房”）。这种由独立的私人不动产所有权与多层次的不动产共有权相结合的权利结构形式，其本身就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住房产权是对以建筑物为中心而形成的“权利群”，所包含的各种权利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现代城市社区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共有财产关系，以共有财产为媒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扣连的社会人关系。中国城市社区的住房产权制度设计，实质上是人的关系的界定和社会价值的体现。研究现代城市社区，实际上是研究社区成员间如何因住房这一财产关系而形成的独特的人际连带，并在实践中加以表达。在社区中，个人对于住房产权的处置不是自由的，因为住房产权是嵌入到社区场域之中的，不仅受到社区横向网络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交互建构，而且受到纵向网络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行动者日常生活价值的交互建构。

### **三、住房产权是社区治理场域运行的重要基础**

住房产权是社区场域运行的重要基础。住房产权制度塑造社区场域的运行秩序和构成形式，影响社区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住房产权的发展具有促进主体性实现与个体性培育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社区关系物化与分化的消极意义。

#### **（一）住房产权制度塑造社区场域的运行秩序和构成形式**

首先，我国城市土地公有制的土地权属制度决定了城市居民不能取得土地所有权，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由此形成了我国“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复合房地产权结构。因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年限设置，所以住房所有权也具有时限性。也就是说，以住宅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并不是永久性存在的，而是在一定时间中存在的场域。其次，住房的商品属性及投资功能使住房产权具有流动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社区邻里关系、情感等难以沉淀形成稳定的社区文化。此外，社区居住形态取决于住房产权的性质，而住房产权的性质取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而存在多种住房产权。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解体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城市中出现了多元的居住形态。以住房权属构成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单位公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商品房等不同的权属形态。住房体制改革产生了不同性质的住房产权，这客观上导致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从而塑造不同社区场域的运行秩序和构成形式。

#### **（二）住房产权的发展促进个人主体性的实现与道德的培育**

当前中国城市主要的住房权属形态为区分所有制度。区分所有制度是指多个主体分别独立地拥有一幢建筑物的所有权形式，将同一栋建筑物划分为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并将业主的权利相应地区分为专

有权、共有权和管理权（成员权），进而构成一种复合型所有权体制<sup>[30]</sup>。这种住房产权是一种以专有权为主导的所有权，共有权和管理权均随专有权的取得而获得。从商品房社区的主体看，每一个业主都被看作是权利主体，都可以通过购买住房获得自己居住的权利，整个社区就是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在行动中相互联系着的场域。因此，住房产权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个人主体性的实现，也有利于个体道德的培育。个人可以自由地支配、占有、收益和处分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住房产权的意义就在于给人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使人的自由在对财产的支配中成为现实。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陈鹏认为业主维权会产生从维护产权到维护公民权的升华<sup>[31]</sup>。

个体不仅是权利主体，也是道德主体。个体对于自己的所有物的使用过程及其结果负有道德责任。权利主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这不仅仅是法律的强制规定，更是从产权中产生出来的内在要求，是产权对于现代人的道德律令。产权的发展不仅要求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求个人尊重他人的产权以及他人的各个私人领域。产权表面上是一种以特殊性为基础的权利，但又包含着普遍性的原则：一个人要想占有自己的财产，就必须同样尊重他人的财产。所以，社区中的个人是通过普遍性的原则、通过他人这一中介而使自己在社区中获得独立。社区中的个人对于他人以及自身和他人之间关系的这种尊重和认同，是一种相互尊重差异性的认同，这不是因为彼此的价值观达成完全的一致，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差异。也就是说，个人在社区中事实上分享着一种一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通过外在的力量强加给个人的，而是内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之中的。通过这种对于普遍意识的分享，个人一方面把自己看做是社会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也把他人看做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所以，在现代城市商品房社区中，各个成员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种自觉联合的产权基础。

### （三）住房产权的发展具有社区关系的物化与分化的消极意义

住房产权的发展虽然具有促进个人主体性实现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使社区关系物化与分化的消极意义。在商品房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只有通过住房产权来维系，就会导致人们之间的社区交往关系异化为产权这一经济利益之间的交换关系。社区中的个体一旦失去产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物化了，物控制了人本身，人的存在就成为物的存在。在住房产权中，不是住房通过人的赋权活动变成了人的对象性存在，而是人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变成了物。如果人被住房商品关系所遮蔽，那么，这样的住房并不是作为人的个性和本质力量之体现的住房，不是人的对象性存在，而仅仅是没有生命的被人消极占有和消费的物。这种占有表面上是对人的肯定，实际上却是对人的否定。作为私有财产，住房仅仅是个人拥有和消费的对象；作为资本，住房仅仅是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的工具，这就导致了社区关系的物化。

因为住房产权的分割，社区这一整体也就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原子”。不同的业主通过占有不同部分的住房财产，并让自己成为社区共同体的一个环节，就形成了社区关系的分化。他者不再表现为个体占有财产的基础，而是个体占有财产的妨碍。个体想要占有私有财产，就必须设法排除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干涉行为。在所有权的保护下，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是只有在获取自己所必需的生存资料时才与之打交道的存在。但社区中的共有产权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如果社区成员的利己主义盛行，其结果必然导致哈丁意义上的“公地悲剧”。因此，在中国现代城市社区，业主在拥有住房产权之后并不必然形成一个共有产权的集体行动联合体，而往往出现“一盘散沙”的现象，从而对社区治理产生消



极意义。

#### 四、住房产权受到社区场域的建构

住房产权是嵌入到社区场域之中的，不仅受到社区横向网络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的交互建构，而且受到纵向网络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个体日常生活价值的交互建构。

##### （一）横向多元利益主体互构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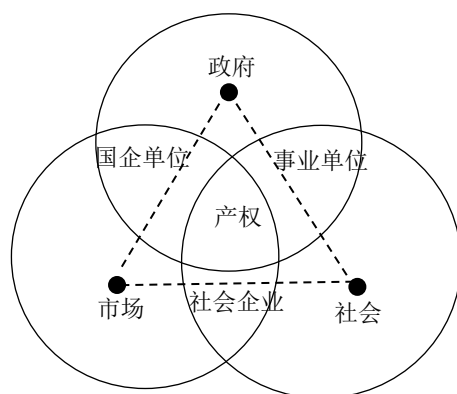


图2 横向多元利益主体互构的场域

如图2，现阶段中国城市社区已经由先前单一化的权力主体转变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不仅有以街道办等政府机构为代表的政府力量，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和以业主组织、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而且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力量，还出现了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社会企业力量，这多种不同力量在微观社区场域之中通过以产权为中心的利害关系而扣连在一起，形成了多元主体互构、相互嵌套的社区场域。

政府力量的在场。国家虽然已经无法像单位制时期那样通过单位对社区进行高度严密管理，但依然通过多种方式来寻找自己在社区的代理人，主要是通过推进基层政权建设来实现。首先，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代表居民的利益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但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行政末梢。政府还通过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工作站，一方面为居民提供各种民生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也将国家的权力渗透进社区。其次，街道办、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具有监督和指导业主委员会成立和换届的职权。并且，小区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及房屋维修基金的使用等产权问题也都会受到基层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面对产权纠纷和矛盾而产生的法律问题，基层法院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力量也会参与进来。当社区发生物权纠纷和矛盾时，基层政府相关机构都会因产权利益而卷入到社区场域之中，从而产生一系列的互动。

市场力量的进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等市场力量开始迅速地进入社区并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房地产开发有很大部分采用“项目开发模式”。这种模式中，房地产公司在项目完成后就不再承担与项目有关的责任，其结果是业主在购房入住之后出现的房屋质量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由此，房地产开发商遗留问题成为了社区住房产权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有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完成之后会有意地保留一些房屋产权和产权部位，从而发挥其在小区的影响力。物业公司不但承担消防治安和环境绿化等职责，而且要负责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维护工作，



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阶段，真正市场化的物业公司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当一部分物业公司是属于企事业单位后勤部门改制而成的物业公司，或者是计划经济时期房管部门改制而来的物业公司，或者是房地产开发公司自己组建的物业公司。这些物业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利益集团并进入到社区场域之中。因此，物业管理领域实际上是一种复合式的政治经济运作<sup>[32]</sup>。

社会力量的生长。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后，城市基层社会出现了以住房产权为基础的业主群体，这是基于产权形成的地域性利益共同体。为了维护业主共有的社区公共物品，业主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成立业主委员会来实现物业自治。虽然以业主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发育成长，但这一群体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也缺乏自我培育。甚至有些业主群体内部由于利益纠纷而产生分化、冲突和派系斗争的现象，这也构成了社区场域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近些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场域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能够组织广大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当中，从而促进社区良性运行；另一方面，在面对社区物权纠纷时，社会组织可以充当“第三方”智囊团<sup>[33]</sup>的角色来献计献策，从而调解矛盾。

单位力量的延续和社会企业力量的兴起。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住房体制的改革，原先单位社区的很多配套设施被划归地方政府，房屋使用权也就相应地脱离了原来的单位社区主办单位。但是，很多单位社区的房屋权属、土地产权关系依旧复杂。因此，在很多的“后单位社区”，单位依然是社区场域的重要力量之一。此外，在商品房社区，由于单位制的影响，福利分房政策其实仍然存在于一些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之中。一些单位以集资形式投资于房地产，以各种方式在商品房社区中保有部分房屋权利，成为社区治理的共建单位。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组织——社会企业。这类组织不仅与企业、政府组织有较大的差别，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是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组织形态，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重属性、双重特征的社会组织<sup>[34]</sup>。目前，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如很多社区养老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注册为企业，有着营利目的和资本积累的特征，但却以社会公益服务为宗旨。如南京翠竹园社区互助中心，虽然是非营利性组织，但它也采用市场机制进行运转和服务。这些社会企业作为社区场域的利益主体之一，也会对住房产权功能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 （二）纵向“制度与生活”互构的场域

住房产权不仅会受到社区场域中横向上多元利益主体的交互建构，而且会受到纵向网络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个体日常生活价值的交互建构。狄金华认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应该仅仅关注权利主体的行为和特征，更应该关注规则的变迁与实践<sup>[35]</sup>。这提醒我们，当前社区场域中愈演愈烈的物业纠纷实际上是多元主体依据规则在互动中对住房产权进行建构的过程。在社区物权纠纷中，我们看到如下要素：矛盾事件、与产权相关的正式的规章和观念制度、非正式的日常生活价值、多元行动主体等。社区物权纠纷实质上是行动主体对不同的制度规范和日常生活价值规范的实践。在“制度”与“生活”的互构中，正式的规章和观念制度与非正式的日常生活价值本身在发生着变化，行动主体的认知同样也在变动，多元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在社区场域不断地再生产。李友梅、肖瑛等学者将这一分析路径称为“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

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sup>[36]</sup>。在社区治理场域中，“制度”不仅由硬性的规章制度如《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组成，而且也由柔性的观念制度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区等价值观念组成。规章制度与观念制度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生活”是指社区人日常生活和邻里交往中的行动逻辑，由情感、伦理、道德和习惯法等非正式规范等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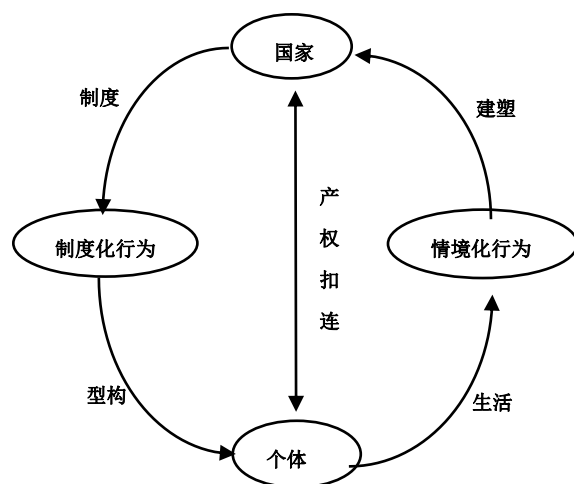


图3 纵向“制度”与“生活”互构的场域

国家制定的社区治理制度具有支配和改造社会生活的权力，遵循单一理性，具有客观性、普遍性、静态化的特征。社区生活则受限于多元理性的日常行动逻辑，具有复杂性、权宜性、动态化的特征。制度与生活两者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规避的矛盾<sup>[37]</sup>。如图3，在社区纵向网络中，国家与个体通过产权勾连起来。住房产权不仅扮演着个体与国家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而且体现着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当国家制定的住房产权制度进入到社区生活领域之中，个体会在主导性社区制度的规训下产生“制度化行为”，这是国家通过产权制度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进而产生自上而下的“型构”机制。但是，国家无法控制产权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个体的情境化应对。生活中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赋予具体情境以意义而产生“情境化行为”，此时的生活领域已经不再是制度最初面对的那个生活领域了。也就是说，产权制度不能完全安排生活领域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当旧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就会唤起新的制度建设或者调整相关的制度设计来重新引导生活主体。这是生活中个体的情境化行为对制度主体所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建塑”机制。如此，制度与生活的互构就像太极图一样是不断转化的且是有规律的。

多元行动主体嵌入到“制度与生活”互构的场域中，基层政府依据国家制定的制度来行使职能，社区中的个体依据日常生活逻辑来行动。当然，在社区治理场域中存在着行动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错位或者交替使用“制度与生活”两套规则的复杂现象。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生活主体对各种规则的认知和理解，具有一定的因情势和需求权益性地引援两类规则的能力。从这一点看，制度与生活互构的更为复杂的机制在于，正式制度规范与非正式日常生活价值如何被不同行动者在行动、话语中策略性地使用。总之，社区场域中国家与个体通过产权制度勾连起来，住房产权受到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个体日常生活价值的交互建构。

##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社区治理实践需要新的理论体系来指导。现有研究局限于“共同体—社会”和“国家—社会”分析视角之中,亟待新的理论视角来拓展和创新中国的城市社区研究。在产权理论与场域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产权与场域关系视角出发,力图揭示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之间的深层联系,为加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资源。首先,住房产权是社区场域运行的重要基础。住房产权制度塑造社区场域的运行秩序和构成形式,影响社区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住房产权的发展具有促进主体性的实现与个体道德培育的积极意义,却也存在社区关系物化与分化的消极意义。其次,住房产权是嵌入到社区场域之中的,受到社区场域的建构。住房产权不仅受到社区横向网络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交互建构,而且受到纵向网络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个体日常生活价值的交互建构。

产权塑造社区场域治理规则,社区场域重构产权制度实践。产权与场域关系视角对于加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产权可以作为社区治理的载体。一方面,产权可以作为社区横向网络中多元共治的载体。多元主体在微观社区场域之中通过产权勾连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嵌套的社区场域,所以产权是多元主体共治的利益基点。社区治理制度设计应该明确各方主体基于产权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在产权范围上的混淆以及职能上的错位。另一方面,产权可以作为纵向垂直网络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行动者日常生活价值之间的载体。在正式制度规范与非正式日常生活价值中,产权被不同行动者在认知和行动中不断地建塑与型构。因此,社区治理创新不应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而应该通过产权嵌入到行动者日常生活的社区场域之中,在“制度—生活”互构中实现政府与居民的良性互动<sup>[38]</sup>。其次,处理社区矛盾与冲突的一整套社区治理体系一定要适应现代住房产权制度及其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住房产权私有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个体化”。住房产权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个人主体性的实现与个体道德的培育,但也有可能导致社区关系的物化与分化,导致个体在社区中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倾向。因此,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既要发挥产权的积极意义,也要防止产权异化。总之,“产权与场域”理论视角启示我们,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既要住房产权作为多元共治的载体,也要求社区治理体系适应现代住房产权制度及其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 参考文献:

- [1] 夏建中, 2003,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第3期。
- [2] Benjamin L. Read, 2003, *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rhood? 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 [3] 李友梅, 2007, 《社区治理: 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社会》第2期。
- [4] Luigi Tomba, 2014,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5] Thomas Heberer and Christian Göbell, 2011,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Urban China*, NY: Routledge Press.
- [6] 桂勇, 2007, 《邻里政治: 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 《社会》第6期。

- [7] 何艳玲, 2007, 《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 乐街调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8] 黄晓星, 2012, 《“上下分合轨迹”: 社区空间的生产——关于南苑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 《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9] 斐迪南·滕尼斯, 1999,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丁元竹, 2013, 《价值意义与工具意义上的社区——关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探索》, 《中国治理评论》第 2 期。
- [11] 毛丹, 2017, 《谁的社区? 谁的治理? 》,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 1 期。
- [12] 文军、高艺多, 2017, 《社区情感治理: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13] 石发勇, 2013, 《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4] 陈鹏, 2016, 《城市社区治理: 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15] 郑中玉、梁本龙, 2016, 《非线性视角下的社区实践与变迁——兼论中国本土化的多元社区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
- [16] 李骏, 2009, 《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 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民主》, 《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17] 陈鹏, 2015, 《住房产权与社区政体: B 市业主维权与自治的实证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8] 郭于华、沈原、陈鹏, 2014, 《居住的政治: 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 A. 阿尔钦, 1994, 《产权: 一个经典注释》, 载科斯等编,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刘守英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 Coase, Ronald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21] 周雪光, 2001,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22] 折晓叶、陈婴婴, 2005, 《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23] 张小军, 2004, 《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 [24] 张小军, 2007, 《复合产权: 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25] 朱冬亮, 2013, 《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 关于集体林权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第 11 期。
- [26] 曹正汉, 2008, 《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从博弈论的观点评中国社会学家的产权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27] 卡·马克思,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8]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1998,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9] Bourdieu, 1984,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30] 高富平、黄武双, 2010, 《房地产法学(第三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31] 陈鹏, 2009, 《从“产权”走向“公民权”——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 《开放时代》第 4 期。

- [32] 张磊, 2005, 《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33] 钱志远、孙其昂等, 2017, 《“互构型”社区治理——以一个城市社区的停车位事件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第5期。
- [34] 王名, 2013, 《社会组织论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35] 狄金华, 2015, 《被困的治理: 河镇的复合治理与农户策略(1980-2009)》,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36] 肖瑛, 2014,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 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37] 李友梅等, 2008, 《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38] 孙其昂、钱志远等,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作者简介: 钱志远,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孙其昂, 河海大学社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 李硕人

# 拆迁安置、财产分配与血缘关系走向的实证研究\*

——以 TX 社区为例

秦祥瑞 沈 毅

---

**摘 要：**聚焦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安置补偿及财产分配对于农村家庭血缘关系走向的影响。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 TX 拆迁安置社区为例，发现农村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单位需要重新划分财产时，具有效率取向的拆迁安置激励了个人财产观念的发展。其血缘关系矛盾主要以独子隔代型、兄弟同辈型、亲子混合型为表现形式。这本质上反映了家庭成员面对“情义”与“利益”冲突时的内在困境，财产分配实践中的平均分配原则优先于道德规范与家长权威，进而决定了父子、兄弟等直系血缘关系的走向。需立足基层社区建立“情、义、理”结合的调解机制，以降低农村家庭陷入伦理危机的风险。

**关键词：**拆迁政策 财产分配 血缘关系 义利紧张性

---

## 一、拆迁财产分配之血缘关系议题的凸显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促生的大量土地开发与拆迁安置实践中，地方政府行为与基层社会反应是近年各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在国内关于拆迁的社会学研究中，一方面集中于土地开发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特征的探讨；<sup>[1]</sup>另一方面，关注“抗争政治”范式下的社会抗争行动，讨论强势拆迁政策压力下的抗争悲剧。<sup>[2][3]</sup>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圈地”决策与民众有限社会行动间的张力展开，有关城镇拆迁引发的系列微观议题如对社会关系影响的研究相对欠缺。在有关社会关系的经典研究中，“嵌入”的概念在经济社会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重视。“嵌入”的本质是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绕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人类行为不会像游离于社会联系之外的原子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相反，他们尝试进行有目的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的”。<sup>[4]</sup>拆迁安置作为当下形塑基层农村社会的重要政治经济活动，会对原村落共同体中包括家庭血缘关系在内的诸多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血缘关系由于承载着“财产继承”“感情”“抚养”“孝”等多重意涵，在拆迁安置过程所引发的家庭财产分配矛盾中更为凸显。因此，将视角转移至拆迁安置中的农村家庭内部，聚焦于拆迁安置、财产分配及其家庭成员血缘关系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个体生活的初级群体。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国内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如运用个体化理论对中国家庭的分析表明，相较于家庭结构变动，家庭成员个体或横向夫妻关系自主性的增长在农村家庭变迁中开始凸显。<sup>[5]</sup>区别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的家庭“核心化”趋势，上海城市白领家庭研究中提出的“个体家庭”(ifamily)概念揭示出“个体形塑了家庭的面貌，而不是家庭决定个体的生活”。<sup>[6]</sup>转型期家庭变迁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考察以血缘为基础的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未来趋向，表明代际关系的传统维系力量已经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个体化’进程研究”(15BSH001)。本文已刊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12期。

随着社会变动而相对削弱了。<sup>[7]</sup>此外,还有研究将社会转型期乡村代际关系的现状描述为“紧张”二字,并从三个维度概括其中的原因:孝道的衰落、代与代之间资源的不对称及有关养与孝的地方性共识的改变。<sup>[8]</sup>综上,家庭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非会正规——家庭主义与正规——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区分,<sup>[9]</sup>而转型期家庭血缘、代际关系、孝道等方面的变动在根本上往往内隐着中国“诸子均分制”的分家传统。在中国的分家制度中,作为经济的家是分了,但作为文化的家是永远分不开的。分家实际上是分中有继也有合,“继”一则表现为“继人”,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一则表现为继宗祧,即对祖先的祭祀义务;“合”则指本家与分家、分家与分家之间的种种文化上的约定。<sup>[10]</sup>

中国人对幸福和生命意义的追求带有中国式自我主义的特点。<sup>[11]</sup>因此,家庭主义“继”与“合”的理想在实际操作层面始终需要处理“义”“利”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义”主要以传统“利他和谐伦理”的儒家道德规范约制性为特征,“利”体现为个体的“自我利益需求”。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血浓于水”“家和万事兴”等价值理念,也使得以血缘为基础的“情”与儒家伦理之“义”相互交融,“情义”与“利益”之间内在紧张而又混合转化的“人情”实践,构成了家庭血缘关系及相关人伦关系的核心。<sup>[12]</sup>

进一步说,中国人在家族内部乃至组织群体中的关系形态表现为内聚还是内耗,取决于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四个因素: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平均分配和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始终是中国人的归属性关系,而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和平均分配之间构成了对血缘关系的动态化牵制作用。<sup>[13]</sup>当然,在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内部因各类生活事件(例如结婚彩礼)“嵌入”表现出代际责任凸显或血缘关系震荡的倾向始终存在。<sup>[14]</sup>网络媒体近年也屡现亲情因拆迁而散的报道,对此,可以借鉴上述四因素分析框架,以呈现案例调研中存在的“拆迁财产分配及其血缘关系走向”议题,并就厘清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和平均分配间关联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化探讨。

## 二、案例聚焦:宅基地产权与户口分配

### (一) 案例来源与基本情况

TX 社区是 2008 年由 XM、TJ 两个社区整合合并而成,现有居民 7400 多人,2100 多户,设 42 个居民小组,总占地面积 9.1 平方公里。小区内还有 NSH 社区、ML 社区部分拆迁户居民和外来从业人员,总人口已达 1.4 万人。自 2003 年至 2019 年,上述已安置范围内的村民小组具体征迁时间不一致,拆迁政策方案经过两次调整。案例调研集中于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5 月间,与 7 位拆迁村民、2 位普通村民、5 位参与拆迁协调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1 位拆迁办负责人等进行了深度访谈,掌握了近年拆迁的基本状况,最终聚焦于拆迁安置与财产分配引发的家庭血缘关系走向问题。

### (二) 隐患:模糊的宅基地与房屋产权

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下,农村宅基地具有较强的生产生活功能。不同于农村耕地与城市土地。<sup>[15]</sup>农村宅基地要承担居者有其屋的生活功能,维持小农家计的生产功能及应付市场不稳定的保障功能。在传统意义上,尽己所能为子女兴建婚房和举办体面的婚礼也是父母对子代应尽之“义务”,TX 社区也不例外。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在当地百姓口中称为“交差”,客观上形成了对农村宅基地的普遍需求。

宅基地制度是农村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6]</sup>虽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宅基地的无偿使用导

致小农“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占用大量土地建房，但 TX 社区安置的村民的态度表明，其并不以建房的无限制扩张为特征。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以户为单位申请，但目前学界有关“户”的概念，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存在不完全产权、一户多宅等现象。“关系产权”概念的提出，对产权的认知实现了从“一束权利”到“一束关系”的转移，表明宅基地和房屋产权在基层农村社会并不完全遵循契约逻辑。<sup>[17]</sup>部分宅基地房屋流转(比如外来户购买本地村民房屋)需签署书面协议并在社区备案，但大家庭内部因分家、升学、婚姻、就业及其他社会流动所引起的房屋流转、翻建等，在基层农村社会并无制度化手续。一位村干部在访谈中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

“这个我跟你讲，农村那时候的房子，有的有房产证，有的没有房产证，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叫既成事实。比如讲老大他单独在这边盖的房子，那边是二弟盖的，这个三弟跟父母在一起盖的房子，随着形式变化，原来是平房，后来变成砖头房、楼房，老大结婚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家里就没有房子，或者分了两间房子，后来又拆了重新盖了，三弟那时候后来逐渐逐渐都是楼房了，你不翻建个楼房，你老婆娶不到，那就想办法翻楼房唉，在一起翻建啊这些，那老大和三弟就讲了，那上人贴你的钱，带你盖的，还是的。但是你又讲，规规矩矩地讲，那前面已经分了两间房子给你了，已经分了财产给你了。”(村干部 ZHM 20190528)

农村的宅基地因为各种历史的原因，尤其是大家庭内部因子女成婚、分家所产生的非制度化翻建、转让与赠与，使得相当多数宅基地和房屋产权较为模糊，为之后拆迁财产分配中产生矛盾纠葛埋下了隐患。

### (三) 导火索：拆迁户口的不可分割性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其中房屋拆迁安置在总补偿额中占绝大部分，房屋安置面积与家庭人口呈正相关关系。虽然各阶段拆迁实施方案具体内容经历了两次调整，但一项基本原则却始终得到了贯彻，即：人口基数大的家庭将在拆迁中占据优势。第一阶段(2004—2005 年)拆迁方案规定：每个户口分配 30 平方米的安置房面积；第二阶段(2008—2011 年)拆迁方案规定：每户在产权调换的基础上可以另外分配 30 平方米的安置房面积；第三阶段拆迁(2018—2019 年)方案规定：一人户不超过 120 平方米，二人户不超过 180 平方米，三人及三人以上户按人均不超过 80 平方米认定。

在 1982 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之前，一对夫妻可以生育多个子女，这批 1982 年前出生的婴儿在 2003—2019 年间(拆迁期间)相继达到结婚生育年龄。与父辈相比，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一代人适逢中国经济大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时代，在非农领域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在经济能力和独立性提升的同时，这一代人所组成的核心家庭对于个体“利”的要求也日趋强烈。由于父母的户口仅能计算在一个核心家庭户头上，拥有父母户口的子代核心家庭在拆迁中将享受到额外的拆迁安置补偿面积，因此产生了一些子代核心家庭间对于父母户口的不当竞争。拆迁政策内在规定的户口非分割性与子代核心家庭间趋于平均分配的矛盾，成为引发家庭矛盾、影响血缘关系走向的重要导火索。

## 三、“拆”散的亲情：家庭矛盾的类型

根据矛盾主体和类别的不同，可以将拆迁中 TX 社区家庭成员关系的矛盾分为独子隔代型、兄弟同辈型和亲子混合型三种类型。家庭矛盾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拆迁房产和亲代户口分户等赔偿额度较高的家



庭共财。

### （一）独子隔代型矛盾

集体化以后，土地已不再是家长手中掌握的权力，家长不能再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掌握来确立代际关系中父辈的优势。<sup>[18]</sup>但由于拆迁中宅基地房屋多由亲代所建，因此家长制仍旧在农村的权威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按照中国农村的风俗习惯，亲代对子代的完整抚育包括了为子女创造婚配所需物质条件，使之“成家”，否则会被认为没有尽到责任。<sup>[19]</sup>在这一形势下，亲代也掌握着财产分配权，一旦亲代在财产分配方面有失公允，或子代自觉没有达到自身的预期，子代就可能背离“孝道”。由此，在拆迁安置中，独子隔代型矛盾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子代对于亲代财产的争夺要求为主要特征，表现为成年独生子女与亲代之间对所安置房屋财产的竞争，或借机表达对于长期共同生活的叛逆。此种情况下，家庭财产虽不涉及在多个子女间平均分配的问题，但成年未婚独生子女不合时宜地表现其利己动机也会被视为“无礼”“不成器”“不孝顺”，而亲代考虑到未来养老的客观需要，也会有所戒备，对于向子代转移财产支配权采取保留态度，导致双方矛盾加剧。

### （二）兄弟同辈型矛盾

除上述独子隔代型分配涉及的问题外，兄弟之间的宅基地房屋馈赠，在拆迁中也会引发兄弟间的矛盾。在 TX 社区所了解的个案中，某家庭户主的长子早年进城定居，便将其宅基地房屋流转给了二弟，三弟开始并没有异议。但在得知即将开始的拆迁有相当数额的补偿之后，三弟提出要与二哥平分大哥的宅基地房屋。遭到拒绝后便中断了与兄长们的关系往来。宅基地与房屋产权模糊及其早期馈赠所产生的隐患容易在该种情况下凸显，兄弟同辈间的矛盾以在兄弟之“义”与房屋产权之“利”两者间的抉择为特征，但已经体现了子代核心家庭间对宅基地房屋产权的平均分配原则。

### （三）亲子混合型矛盾

就 TX 社会拆迁补偿引发的家庭矛盾看，独子隔代型矛盾和兄弟同辈型矛盾现象较为少见，也相对易于沟通及协调，更为常见而难以处理的是亲子代际与子代兄弟同辈相交织的亲子混合型矛盾。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追求拆迁收益最大化的家庭目标。该目标涉及拆迁安置补偿政策中所允许的家庭成员分户和亲代房屋、多余宅基地安置房屋面积等有效资源的转移、拼凑问题，最容易在隔代和同辈间引发矛盾。

“兄弟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呢……那上人是可以分户的嘛，比如讲几个儿子当中，有的儿子的小孩年纪比较小，达不到分户年龄，分不起来户，他会跟上人讲，那你给我这边多分一个户，不是能多拿面积嘛；兄弟之间如果关系好，那讲讲就算赖，比如讲我家小孩大了，我能分户了，上人的户给你就给你吧；那另外兄弟想，如果你这样让了，我就给你一点钱，他如果不那个的话，他又产生矛盾了。”（村干部 ZHM 20190528）

此外，分家是家庭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分家不仅意味着重新界定财产所有权，更意味着重新建立一个特定家庭内的权力结构。<sup>[20]</sup>在拆迁中，由于分家后兄弟核心家庭之间基本形成了平权型的家庭结构，而中国传统上也一直秉持“诸子均分制”的传统，因此按照惯例，为避免产生家庭矛盾威胁家庭结构，父母的财产应该在多个兄弟间平均分配。但父母在考虑户口分配问题时因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或既往生活经验影响，在多个儿子间存在选择偏好以至偏心的做法，常常会导致兄弟间的矛盾。一位访谈

者详述了某自然村兄弟俩因拆迁补偿不均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的敌对状态：

个案 1：“农村它有一个很坏的风俗习惯，就是重男轻女，那个××家他两个儿子原来都是木匠，关系好得很，都一起出去做活的，后来拆迁因为一个老母亲户口只能算一个儿子身上，哪个都想要，哪个都是为了自己，就给了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家生的是男孩，做爷爷奶奶的啊，做什么事就顾着孙子了。他们兄弟两个到现在也不来往，跟敌人一样的，去年我舅妈去世的时候，两个人就算坐对面也不讲话。”（村民 YMZ 20190212）

由于祖辈的重男轻女思想，破坏了财产在子代间平均分配的原则。造成了子代兄弟间的深刻矛盾。亲子混合型矛盾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兄弟间的关系矛盾内隐着亲代养老、原宅基地房屋产权等影响因素。

个案 2：“那个时候因为比较穷，三个兄弟因为我爷爷的赡养问题起争执嘛，都不愿意养，我爸爸就说承担我爷爷的赡养工作。但是，谁也不知道要拆迁，拆迁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口问题，都想要我爷爷（户口）过去，当时我爷爷就说，坚持在我家，他们三个兄弟也跟我爷爷吵，最后还是算到我家了嘛。拆迁搬到小区来之后，我爷爷还是跟我们一起住，然后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家因为我爷爷的人口多分了一套 60 平方的房子，又起争执了，说那套房子得拿出来三个兄弟分。”（村民 YMM 20190225）

在这一案例中，负责抚养的子代继承了亲代的户口及房屋补偿，而没有承担抚养责任的子代却仍然坚持对亲代户口补偿财产的均分原则。最终子代对亲代“孝道”践行的偏离甚至会在重要的丧葬仪式中体现出来。

此外，根据当地第三阶段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外嫁女和离异已迁出户口或户口不在本地的妇女并不享受拆迁房屋安置政策，其对于拆迁安置房屋安置面积的要求只能在家庭内部协调解决。离异妇女对拆迁财产的诉求在 TX 社区村民拆迁过程中不在少数，其一般采取与家庭成员协商、社区调解或法律程序解决。离异且获得子女抚养权的妇女往往在拆迁安置房屋分配中可以分享一定的话语权，但目前尚无制度化措施对妇女权利给予单独界定和保障。总体来看，在 TX 社区具体拆迁财产分配实践中，平均分配、道德规范、家长权威的不同作用影响了家庭血缘关系的走向。

表 1：四因素与家庭类型对照

| 平均分配 | 道德规范 | 家长权威 | 血缘关系 | 家庭类型  |
|------|------|------|------|-------|
| ×    | √    | √    | √    | 独子隔代型 |
| √    | √    | √（×） | √    | 兄弟同辈型 |
| √    | √    | √    | √    | 亲子混合型 |

注：×代表不影响；√代表影响；√（×）代表父母健在与否。

根据表 1，独子隔代型家庭不涉及平均分配原则，在亲代与子代出现房屋及其他财产纠葛时，道德规范和家长权威两者能否有效约束双方行为往往决定着亲子血缘关系的走向；兄弟同辈型家庭主要面临的是兄弟间宅基地房屋产权的平均分配问题，而父母健在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长权威是否会参与到血缘关系走向上来；在亲子混合型家庭中，平均分配、道德规范、家长权威共同影响了家庭血缘关系的走向，财产的平均分配成为其中的核心原则。

#### 四、四因素作用下的财产分配实践及血缘关系走向

对拆迁中 TX 社区家庭矛盾的调研表明:普遍的拆迁政策及较高的补偿标准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家庭“和谐伦理”的道德基础,拆迁安置补偿分配实践促使家庭成员矛盾公开化,案例呈现的亲子混合型家庭矛盾主要由模糊的宅基地产权、亲代户口归属、既往家计生活史、价值观念差异等多元社会与家庭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简言之,在农村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单位需要重新划分财产时,一方面具有集体主义取向的大家庭内部强调成员凝聚力的价值需求;另一方面,具有效率取向的拆迁补偿又激励了个人财产观念的发展。无论如何,在植入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这一制度因素时,子代平均分配的利益诉求在拆迁中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后引发了其与道德规范、家长权威间的内在紧张性,并可能导致血缘关系的破裂。

##### (一) 拆迁补偿激发了子代平均分配家庭公共财产的内在要求

儒家伦理树立的“大公平观”一定程度诠释了中国人作为个体的生存之道。<sup>[21]</sup>在传统家族公共式“利他和谐伦理”的引导下,个体对“利”的追求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但是,个体对于家产平均分配的利益诉求是自传统延续到现代的,子代平均分配的诉求在拆迁补偿中也始终是第一位的。而拆迁政策内容规定的户口的唯一归属性却加大了财产平均分配上的难度,从而激化了子代关于平均分配的要求。某些个体为防止在财产分配中吃亏,甚至采取隐蔽性措施独占亲代户口,这种个体对“利”追求的无限膨胀激化了财产平均分配中难以调和的矛盾。

##### (二) 拆迁中的利益矛盾所呈现的“义”“利”紧张性

传统乡村社会,道德规范在初级群体内部具有很高的效力,“血浓于水”“仁”“孝”“礼”等儒家规范约束着个体私欲,并且成为自然村落或宗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矛盾冲突后和解的基础。这种传统社会秩序规则贯穿式的运用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礼治秩序”。<sup>[22]</sup>

但是从村庄人际关联的视角出发,支配当前村庄社会交往的规则已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伦理规范等公共性规则逐渐被个体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所取代。<sup>[23]</sup>随着拆迁安置房产市场价值上升,财产分配问题实际上成为“家家都很难念的经”。在亲子混合型矛盾中,部分子代家庭成员不顾“脸面”公开追求个体利益,除邀请中间人评理或通过社区调解,甚至采取对簿公堂的方式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综上,一方面,平均分配本身是遵循道德规范与否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对于“自利”的追求超越了“情义”所划定的限度,以“情义”为代表的道德规范对家庭成员在财产分配中的约束大大降低了。

##### (三) 财产分配失衡导致家长权威趋于解体和崩溃

在中国,传统分家模式仍旧顾及“诸子均分”原则和家庭主义的和谐目标,因此该原则的执行并不受亲代在子代中的偏好影响,家长实际不能改变资源平分的格局。即使财产在家庭成员间的分配中存在偏颇,家长权威也只能在小范围运作或表现出形式化维系的特点,至少财产均分在“台面”上应“说得通”“过得去”,家庭成员的不满也因道德规范的制约而难以转化为公开的冲突,呈现出表面和谐“无违”的家庭秩序及家长权威形式化遵从的特点。

农村房屋拆迁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核心化趋势。一方面,拆迁安置拉大了亲代与子代以及子代家庭之间居住空间的距离,这限制了互动双方交往的频率,提升了各自独立性;另一方面,拆迁政策引入的户口分配问题又是传统分家进程并不涉及的内容,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各自独立导致亲代家长权力的行使有了更大自主权,个体价值观和既往生活家计史成为家长参考的主要指标。实际上,拆迁中家长资源

的代际转移已突破了家长权威形式化维系的边界，亦即家长可依其个人价值偏好选择如何向子代转移其户口、已分配到的资源，自由支配家庭公共财产。这可能造成子代财产分配中的相对失衡。同时，已婚子代的代际关系从“家内”到“家际”的转化后，自觉吃亏的子代核心家庭成员甚至采取公开的策略行动表达对于分配结果的不服从，家长权威会趋于解体和崩溃。

简言之，一旦家庭成员在拆迁财产分配中存在较大自主抉择和行动的空间，其对平均分配原则的破坏将导致道德规范的无力乃至家长权威结构的解体。

（四）亲情困境：血缘关系的十字路口

中国式大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共同体，一方面为家庭成员提供生存必需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在家庭财产必须分割的情况下，其内部的父子、兄弟矛盾会被激化出来，从日常生活经验而言，这是情有可原的社会事实。前文已述，一旦亲代在财产分配方面有失公允，子代可能采取诸如对“孝道”的背离等策略表示对于权威的不服从，或者与其他兄弟断绝关系往来，长期而言无疑会造成血缘关系疏离直至破裂，甚至破坏整个家庭共同体物质及情感支持系统。

从正向度而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灵活性也不可忽视，一般通过搁置矛盾等策略可维护血缘关系的相对和谐稳定，例如：

个案 3：“主动跟老人沟通好的也有，你看 YM 家，她有个奶奶，当时我姐夫弟兄三个人就给老太拿一套房子，给她单独住，任何人不要想拿这个房子，等老太若干年后去世的时候，房屋按现有市场价对外出售，所得钱财三个人平分。”（村民 YMZ 20190212）

兄弟间因存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也会在综合考虑各自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互相谦让，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兄弟“情义”的延续性：

“比如讲有的人家弟兄三个，三弟最苦，大哥和二哥条件好些，然后呢比如父母有三间老房子，大哥和二哥都主动提出来不要，就给三弟拿房子算了，他讲我们房子本来就多，房产就算了，就不跟他计较了，这种的也有，还对，血缘关系嘛，血缘关系在里面。”（村干部 ZHM 20190528）

即使血缘关系因拆迁财产的分割已出现裂痕，父子兄弟间的关系还存在转圜余地。在后拆迁时期，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各自经济能力的提升，父子兄弟会冰释前嫌，闻讯侄儿侄女结婚或兄弟生病，也有重新聚集为情感共同体的可能。引用一位访谈者的表述，即“越缺什么，就越在乎什么”，因家庭关系维系的“感情”存在，血缘关系在此又趋于和谐化了。借鉴建基家庭分配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取向理论中的四因素，可以将拆迁补偿所引发的家庭公共财产分配及血缘关系走向分析如下表：

表 2：拆迁补偿中的家庭公产分配及血缘关系走向平均分配

| 平均分配 | 道德规范 | 家长权威结构 | 血缘关系走向 |
|------|------|--------|--------|
| 不公失衡 | 自利失控 | 松动至解体  | 疏离至破裂  |
| 相对均衡 | 情义退让 | 形式化维系  | 趋于和谐化  |

由表 2 可见，拆迁安置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分家后的家庭财产分配实践，其中家庭公共财产和亲代自由支配的财产能否相对平均分配始终是核心原则。道德规范以“义”“利”间的内在紧张性为特征，对于亲代和子代而言，一旦个体“自利”之诉求超过道德规范之“情义”的限度，财产分配的明显不公正

会导致家长权威趋于解体乃至直系血缘关系的破裂,而相对均衡的财产分配将维持家长权威的形式化效力及直系血缘关系的相对和谐。总体而言,相较拆迁安置补偿带来的收益,相对均衡的平均分配原则始终是优先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家长权威的维系常常相对脆弱。因此,在亲子混合型家庭中,拆迁补偿利益分配的不公失衡导致的血缘关系疏离问题比较突出。

## 五、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当地村民家庭生活嵌入于拆迁政策和传统伦理双重逻辑所塑造的机制中,这也形塑了当地村民特别是子代面临拆迁补偿所采取行动的双重特征,那就是得益者以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受损者则采取对于传统伦理和行为规范背离的策略。拆迁财产分配中的家庭矛盾由拆迁政策外在规定性和家庭成员内生自主性相互交织引发,其中以独子隔代型、兄弟同辈型为相对次要的表现形式,亲子混合型则成为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拆迁政策而言,其较高的补偿收益与政策后果对于农村家庭构成了结构性冲击,户口落户唯一性最终激化了家庭成员对于平均分配财产的要求,弹性的亲代分户和宅基地房屋面积转移、拼凑方案也复杂化了家庭财产分配实践。就家庭血缘关系而言,亲代对部分资源的自主决策导致其家长权威逐步瓦解,道德规范共同体的松动也为子代扩大个体利益诉求提供了自主行动空间,如何平衡道德规范“义”与个体需求“利”之间的张力往往成为家庭直系亲属之间的重要问题。

集体化时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个体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上升,除了赡养问题,分家后的核心家庭其实与亲代核心家庭间已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代际互动模式。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拆迁安置补偿将财产分配问题重新引入到已分家的农村家庭中,这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离散化趋势。离散化并不是代际之间的个体化,恰恰是利益预期的分配不公或个体对大家庭公产的过度摄取,其所带来的亲代与子代以及子代核心家庭间的关系隔绝,将破坏传统大家庭赡养、互助、安全的重要功能,进而带来乡村家庭内外人伦与情感的紧张与冲突。<sup>[24]</sup>当前对于家庭关系的研究往往围绕养老方式、居住模式、孝道内涵等家庭内部因素的探讨,对拆迁安置引发的家庭血缘关系变动的关注则相对欠缺。对TX安置社区拆迁家庭矛盾纠葛的社会基础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补偿塑造的、强利益分配格局的客观状况,以及拆迁补偿的家庭内部分配问题对农村拆迁安置社区代内或代际关系的稳定性构成的冲击。推动构建农村社会和谐家庭关系和生活氛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为避免重大外部事件对家庭血缘关系的影响,在拆迁政策层面应对家庭成员间户口、宅基地房屋面积等资源的转移与拼凑加以限制,尤其应明晰亲代所持房产或资源的界定与保护,进而有利于维护农村家庭血缘关系的长期稳定。社会转型时期,代际关系受到了内外部力量冲击,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应对。<sup>[25]</sup>立足基层农村社区建立“情、义、理”结合的调解机制,能够防止拆迁财产分配中的家庭血缘关系陷入伦理危机。

## 参考文献:

- [1] 周飞舟,2007,《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 吕德文,2012,《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第3期。
- [3] 施芸卿,2013,《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公民运动与转型期国家一个人关系的重塑——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
- [4]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5] 阎云翔, 2006,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6] 沈奕斐, 2013, 《个体家庭 iFamily》, 上海: 三联书店。
- [7] 王跃生, 201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 《江淮论坛》第 2 期。
- [8] 张婷婷, 2011, 《社会转型与乡村代际关系研究: 基于文献的述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9] 黄宗智, 2011, 《中国的现代家庭: 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 《开放时代》, 第 5 期。
- [10] 麻国庆, 1999, 《分家: 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 [11] 阎云翔、杨雯琦, 2017, 《社会自我主义: 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探索与争鸣》第 7 期。
- [12] 沈 毅, 《“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 《开放时代》第 4 期。
- [13] 翟学伟, 1995, 《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一种本土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卷。
- [14] 杨华, 2019,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 《北京社会科学》第 3 期。
- [15] 贺雪峰, 2012, 《论土地性质与土地征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16] 印子, 2014, 《农村宅基地地权实践及其制度变革反思——基于社会产权视角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 4 期。
- [17] 周雪光, 2005,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18] 贺雪峰, 2008,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 《江海学刊》第 4 期。
- [19] 王跃生, 2010,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第 4 期。
- [20] 阎云翔, 1998, 《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 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21] 翟学伟, 2010, 《中国人的“大公平观”及其社会运行模式》, 《开放时代》第 5 期。
- [22] 费孝通, 2014,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3] 宋丽娜、田先红, 2011, 《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24] 金一虹, 2009, 《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第 2 期。
- [25] 王跃生, 2019, 《社会变革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变动、问题与调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 3 期。

☆ 作者简介: 秦祥瑞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沈 毅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胡 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国庆教授讲座：全球视野的河海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回顾、现状和展望**

2019年11月6日上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一百期）”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909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院院长、中国移民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做题为“全球视野的河海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回顾、现状和展望”的主题讲座。本次论坛由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教授主持，公共管理学院众多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一期开始于2014年，经过五年的时间来到了第一百期，河海社会学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岁月。讲座伊始，施国庆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生涯带领大家回顾了河海社会学的发展历史。1982年，水电系水经教研室成立；1983年，水利经济研究所成立；《水利经济》杂志创刊。水利工程的移民和社会问题开始进入科学研究视野。1987年，水利部计划在河海大学设立水库移民专业，河海大学于1992年成立中国移民研究中心，研究非自愿移民。施国庆教授还与大家分享了在移民调查过程中的故事，在贵州深山的苗寨里，田野勘察、入户调查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三个月的调查结束后就磨穿了一双鞋。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移民研究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广，并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交流。

接着，施国庆教授介绍了河海社会学学科的申请与发展历程，河海社会学发轫于2003年，获批二级学科硕士授予权，接着陆续获批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二级博士授予权、博士点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获批招收社会学本科生，师资队伍和学生培养规模不断壮大。今天的河海社会学在移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人口学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迅猛，在教育部组织的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并列全国第11名，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广大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施国庆教授总结了今天河海社会学的发展现状：研究生聚集程度高，基金申请优势领域，科研成果累计多，符合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

然后，施国庆教授从学科特色、发展方向、师资、研究项目和成果总结了现在河海社会学发展的不足。施国庆教授展望未来提到，河海社会学的发展战略在学科方向上要特色与主流并重，做好强特色，融主流，拓空间，辟疆土；在师资队伍上培育和引进并重，大力促进新生代学术带头人成长，老中青三结合；在科研与学术上要拓展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发展和凝练高水平科研成果；在人才培养上完善培养体系，鼓励创新；在国际化上要加强与高校、合作专业、学科、研究生培养、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最后，施国庆教授还从时代背景、环境社会挑战、中国社会学发展机遇、风险治理、河海行动、社会学研究新领域六个方面介绍了“一带一路：河海社会学发展新空间”这一主题。河海社会学滥觞于移民，于畎亩江海中走出来，于高峡平湖中强起来，于滚石荆棘中壮大起来，施国庆教授寄语广大师生：做一件事就要成一件事，一定要折腾，一定要谋事，有奉献精神，争取河海社会学再登新高峰。

在本次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以热烈掌声感谢施国庆教授为众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





## 理想类型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治理经验： 相关文献的综述与引申\*

王 昭

**摘 要：**通过理想类型的概念对中国环境治理相关文献加以系统梳理，借助行动系统理论框架以行动者与行动手段为维度区分单中心科学主义模式、多中心科学主义模式、单中心人文主义模式与多中心人文主义模式四种环境治理理想类型，相应的典型实践表现分别为运动型、市场型、抗争型与参与型环境治理，并对其当前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在理想类型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总结出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整体特征为政府主导与科学主义取向，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应为加强多元环境治理方式的综合研究与创新研究。

**关键词：**环境治理 理想类型 单中心-多中心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从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到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高度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国家发展观的根本变化，环境的地位愈加重要，不仅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到全面进行环境治理的新阶段。

目前，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以“环境治理”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搜索，结果显示涉及环境治理的文献从 2000 年前后的每年 1000 篇左右增加到近几年的每年近 15000 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当前环境治理的相关文献有四种类型划分维度：一是从研究学科的维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环境学等等；二是从治理主体的维度，主要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方面；三是从研究路径的维度，包括理论研究 with 经验研究两种；四是从研究主题的维度，包括各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与责任等，环境治理的模式、问题、制度逻辑、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等，国际环境治理经验及中外比较等等。

总体来看学术界关于环境治理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旨在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系统梳理，以达到多种维度综合的效果。本文的思路是：首先构建环境治理的理想类型，并以此作为研究起点；然后对各个理想类型的当前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展现当前环境治理研究的焦点、特征、格局与进路；最后结合以上讨论对各理想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今后研究可能拓展与突破的空间，推动环境治理研究与实践的发展。

\* 本文已刊发于《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 年 09 期。



## 一、环境治理的理想类型构建

理想类型分析是由韦伯提出来的，<sup>[1]</sup>在社会科学是重要且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是用以研究社会和解释现实的一种概念工具，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提炼与抽象得出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体系。“理想类型”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理想类型是一种主观建构，所以其既来源于现实社会，又不等同于现实社会；第二，理想类型为了研究目的只侧重概括事物的某一种特征。<sup>[2]</sup>

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社会行动包含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提出的四个基本要素：行动者、目的、情景与规范限定，其中情景指的是为了达成目的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相应手段。<sup>[3]</sup>环境治理行动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同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也就框定了环境治理行动的规范限定，即目的与规范两个控制变量是固定的，因此行动者与行动手段两个自变量是决定不同环境治理类型的主要因素。从环境治理行动主体的角度来看，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试图以单个主体解决环境问题到提倡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过程<sup>[4]</sup>，所以行动者的维度选取数量作为标准，即单中心治理模式或者多中心治理模式。从环境治理行动手段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方法论取向，环境治理中的科学主义手段注重客观的环境问题本身，针对环境层面的物质污染进行治理，而人文主义更加注重主观的个体生活体验，从社会层面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出发进行治理，所以行动手段选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论作为划分标准。

以单中心与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行动手段两个维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得出四种环境治理理想类型，分别是单中心科学主义环境治理模式、多中心科学主义环境治理模式、单中心人文主义环境治理模式与多中心人文主义环境治理模式。理想类型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完全一致的，只能找到相类似的情形，在中国环境治理实践中，与四种理想类型相对应的表现如图1所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它们并不等同于理想类型，只是理想类型的常见表现形式之一；第二，它们并不涵盖所有中国环境治理方式，只是学界讨论较多的几种方式。下文将以四种理想类型的常见实践表现作为典型进行文献梳理，以此来认识环境治理理想类型的本质特征与存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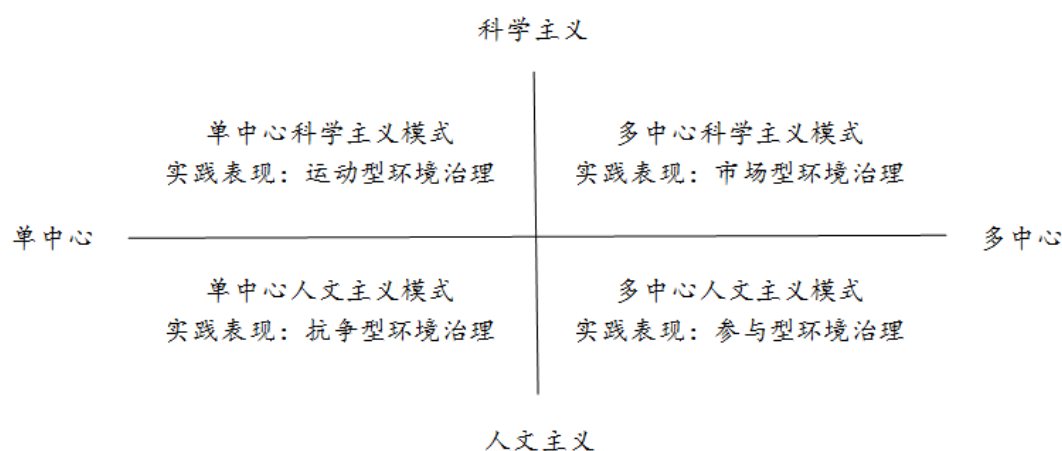


图1 环境治理的理想类型及主要实践表现

## 二、单中心科学主义模式：运动型环境治理

运动型治理指的是由一定政治权力的占有者，如国家、政党、政府等为主体，以政治动员的方式自上而下的调动各种资源与力量来集中完成某一个特定目标<sup>[5]</sup>。运动型环境治理就是运动型治理在环境领域的实践应用，通常是以政府等单个行政权力主体为中心，注重环境治理的效率，如某项指标的达标程度等，手段上贴近科学主义方法论，因此是单中心科学主义模式的典型实践表现。常见的运动型环境治理形式有“环境整治行动”、“环保攻坚战”、“环保阻击战”等等，将环境治理比作一场战役生动地体现了运动型治理的特征。

“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是运动型环境治理产生的逻辑前提，其存在根源与持续动力有四种解释：第一，官僚科层制的局限需要运动式治理替代常规治理进行纠偏与规范边界。<sup>[5]</sup>中国长时期“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不仅影响了地方发展策略，还影响着科层制内部升迁考核标准，“唯GDP论”的盛行使地方政府为达到财政收入与政绩的最大化，往往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成为环境污染的共谋之一。因此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主观意愿不强，运动型可以自上而下打破地方利益共同体。第二，历史与文化产生的路径依赖<sup>[6]</sup>。冯仕政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革命教化政体”是国家运动不断形成与变异的动力<sup>[7]</sup>，而周雪光认为运动式治理贯穿于整个中央集权历史时期。<sup>[5]</sup>由于采用运动方式常常可以达到既定目标，所以当环境领域出现问题时，采用运动型进行环境治理成为惯性选择。第三，治理资源匮乏条件下的理性选择。<sup>[8]</sup>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中国社会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以及处于转型期的不稳定特征等等，变得更加复杂。基层政府在应对环境问题时经常面临财政、人力、组织等等资源不足的境遇，因此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的运动型成为环境治理的一种常用手段。第四，治理工具的有限性约束。中国当前正处在转型期中，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法律制度等方面都还不够健全，导致政府在市场失灵、社会失范与法律缺位的情境下只能选择运动式治理。<sup>[9]</sup>这四种解释表明了运动型环境治理具有合法性基础，在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并被广泛运用。

但是运动型环境治理的效果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难以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运动型非制度化、非常规化与非专业化的特征<sup>[7]</sup>决定了其“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结果。如淮河治污的“零点行动”只在当时达标，行动过后并未建立起长效防治机制，出现污染反弹的现象。<sup>[10]</sup>狄金华认为运动型环境治理是“扎扎实实走过场”的活动，基层治理的内卷化使环境治理的程序与过程严谨有序但收效甚微。<sup>[11]</sup>另一方面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经济、社会影响，运动型常常采取“一刀切”的简单手段，不惜牺牲经济、社会利益。荀丽丽对政府动员的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sup>[12]</sup>、陈阿江对卵集全面关停皮革业的研究<sup>[13]</sup>都发现运动型环境治理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

## 三、多中心科学主义模式：市场型环境治理

市场型环境治理指的是将市场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利用市场机制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市场型环境治理的发生逻辑主要受近现代不断扩张的市场的的影响，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市场一直被认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手段，市场制度带来了经济的飞跃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与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对市场作用的过分依赖与过分夸大的倾向，甚至一度出现“市场万能论”的论调。尽管不少人将环境问题的根源指向市场，如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指出市场造就的个体

理性是环境公共资源遭到破坏的原因<sup>[14]</sup>，施奈伯格的生产跑步机理论指出环境问题的产生逻辑可以概括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即工业社会与市场机制对于经济扩张的持续追求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sup>[15]</sup>，但是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仍有很多人市场的力量抱持乐观态度，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改善环境。市场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与消费者双方，并且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在宏观层次发挥调控作用，所以市场型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中心的，但市场型环境治理同样主要关注的是诸如企业污染物排放与治理数据指标等纯粹环境问题，因此是多中心科学主义模式的典型实践表现。

政府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对市场进行监管、调节，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征收税费。环境领域中国一直采用的是排污收费制度，遵循的是“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但是排污收费制度存在征收标准偏低、征收范围过窄、征收力度过轻等缺陷<sup>[16]</sup>，因此提倡通过立法实现“费改税”的呼声一直很高。环境税最早是由庇古提出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收的“庇古税”<sup>[17]</sup>演变而来的，在西方已有很多国家进行实践，有学者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的效果，既可以实现环境改善的第一重红利（环境红利），又可以实现提高市场效率、增加产出、促进就业等的第二重红利（非环境红利）<sup>[18]</sup>，但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质疑双重红利效果是否存在<sup>[19]</sup>，进而提出双重红利实现的条件基础。<sup>[20]</sup>在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与教训启示基础上，中国 2016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从 2018 年起正式实施，目前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法理层面对于法律条文的解读，<sup>[21]</sup>关于中国环境税的效果等方面的考察尚需实施之后方可进行。

企业是市场生产环节的主体，广泛被大众指责为环境污染的元凶，虽然有些偏颇，但企业确实应当在环境治理中担负起相应责任，当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企业履行自身环境责任，另一条是以改善环境为服务目的的环保产业的兴起。当前企业履行自身环境责任的主要通过结构与技术两方面措施，包括调整产品与能源结构、技术革新或替代以降低能耗等具体方式。<sup>[22]</sup>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效果既受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影响，又受到社会关系、管理者个人素质与家乡认同、企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sup>[23]</sup>所以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不是仅凭企业单一主体就能完成的，需要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出发，通力合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sup>[24]</sup><sup>[25]</sup>尽管环境问题给传统经济领域带来巨大冲击，但是也催生了许多新的经济领域，环保产业就是其中之一。环保产业就是为生态环境的污染防治、保护恢复等提供产品与服务支持的，从环保部 1993 年、2000 年、2004 年及 2011 年对环保产业的四次调查数据来看，环保产业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家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了门类众多的环保产业体系，并且得到国家稳定的政策、法规支持，<sup>[26]</sup>但是也存在着结构失衡、经济贡献有限、产业散而弱、竞争实力不强等问题。<sup>[27]</sup>

消费者是市场消费环节的主体，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阐述是虽然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具有现实价值；第二，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需要，为生产提供动力<sup>[28]</sup>，所以可以通过不断提升消费的绿色化倒逼生产方式实现绿色化。199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奥斯陆专题研讨会议提出“可持续消费”一词，可持续消费的逻辑起点是可持续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指的是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产生，从而不影响后代的需求满足”<sup>[29]</sup>，。但是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困境是在当今消费社会<sup>[30]</sup>的大背景下，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消费方式转型之路道阻且长。<sup>[31]</sup>

#### 四、单中心人文主义模式：抗争型环境治理

抗争型环境治理的主体既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冯仕政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抗争是个体对环境危害的创造者或相关社会公共部门做出的一系列对抗性行为，<sup>[32]</sup>而景军则从群体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抗争是环境问题引发的集体维权行为。<sup>[33]</sup>环境抗争之所以能够起到环境治理的效果是由于其通常以消除污染源作为诉求，如厦门PX项目事件、什邡的钼铜事件、启东的排污事件、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等典型环境抗争案例，最终都迫使项目叫停或终止，保护了当地环境质量。环境抗争往往以受到环境损害的个体或群体单中心主体为主，他们对环境治理的诉求来源于个人体验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抗争型环境治理是单中心人文主义模式的典型表现。

近年来，环境抗争事件屡见不鲜，1996年起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保持年均29%的增速，<sup>[34]</sup>远远高于中国经济增速，媒体关于环境抗争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学界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中国环境抗争方式的兴起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宏观背景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全球掀起了环境运动的风潮，其所倡导的环境公平、环境正义等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中国社会结构来看，张玉林指出中国的“政经一体化”体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即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将经济增长作为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指标，导致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数据，从而选择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牺牲环境效益来满足经济发展。<sup>[35]</sup>因此当个体与群体在遭受到环境损害时，自下而上的环境诉求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解决，被地方政府简单压制，最终被迫无奈走上抗争的道路。

抗争型环境治理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打破环境污染的利益格局，维护环境正义。第二，形成环境抗争倒逼机制，促使相关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第三，环境抗争具有较大的社会效应，公众的环境意识与相关知识从而得到提升，公众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与自觉性进一步增强。

但是抗争型环境治理面临着很多制度性与结构性困境，难以得到成效。陈涛对环境抗争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总结，<sup>[36]</sup>认为有四方面的困境：一是体制性困境，即“政经一体化”体制对于环境抗争的压制。二是权力与技术的制约，面对法律以及污染认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大多数人陷入发现污染难、确定责任主体难、收集证据难及损害鉴定难的困局，<sup>[37]</sup>如司开玲关于取证难的审判性真理研究<sup>[38]</sup>即反映了这一困境。三是底层通常为环境抗争的主体构成，而面对实力强大的利益获得者与专业技术壁垒，大多数底层公众遵循生存理性，从而难以实现组织化。<sup>[39]</sup>四是在环境抗争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会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消解。<sup>[40]</sup>

#### 五、多中心人文主义模式：参与型环境治理

参与型环境治理是参与式治理在环境领域的实践应用，参与式治理指的是有相关关系的公民个体、组织等与政府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sup>[41]</sup>作为同样是以社会为环境治理主体的抗争型与参与型，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抗争型的主体是被动卷入，而参与型的主体是主动参与。参与型环境治理除了政府更加强调公众的加入，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之所以采取参与式的手段是因为公众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政府应当担负起治理责任，还应当有社会公众参与其中，因此参与型环境治理是多中心人文主义模式的典型表现。

参与型环境治理的发生逻辑包括内外两方面：首先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是内生基础。<sup>[42]</sup>环境问题最

终影响的是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利益，因此每个个体都有权利与义务在环境治理进程中贡献自身力量，并且在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与信息获取能力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参与热情都在逐渐提升。<sup>[43]</sup>其次以政府、市场等主导的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是外在驱动，促使人们寻求新的途径，参与型环境治理作为一种可能性被广泛讨论。

参与型环境治理能否实现的关键是对公民赋权，核心是推进政府和公民的民主合作，<sup>[44]</sup>具体通过三个机制的实践建构来实现：第一个是建立信息公开为基础的监督机制。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从而对环境治理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推动环境治理的发展。<sup>[45]</sup>第二个是建立保障诉求表达顺畅的沟通机制。打破各种条件的限制，建立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直接对话的有效途径。<sup>[44]</sup>第三个是建立参与决策为目标的互动机制。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制度与法规，保障公民通过成立或参与环境 NGO 组织、参与听证会、座谈会、公民会议等途径形成与政府、企业等相关主体的良好互动，真正实现环境相关事项的决策权利。<sup>[46]</sup>

参与型的环境治理效果是十分显著的，郑思齐对 2004-2009 年中国 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sup>[43]</sup>与李子豪对 2003-2013 年中国 30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sup>[47]</sup>进行实证分析都印证了参与型的治理效果，在具体案例实践中，辛方坤的“嘉兴模式”研究<sup>[48]</sup>、杨小柳对大理洱海的流域治理研究<sup>[49]</sup>等也都对参与型的效果进行了详细论述。

但是参与型环境治理同时也面临着公众参与程度过低的困境，公众参与的困境形成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会资本匮乏。姚志友认为目前中国传统社会资本衰减而现代社会资本微弱，总体处于式微状态，<sup>[50]</sup>社会资本匮乏的结果是难以形成有效合作机制，<sup>[51]</sup>公众容易以自利倾向的个体理性出发来行动，“搭便车”等行为在所难免，从而制约了参与的积极性。<sup>[52]</sup>第二，参与保障制度难以落实。为公众参与提供的各项政策、制度、程序、支持等保障处于缺位状态，<sup>[53]</sup>因此政府依然处于强势主导地位，公众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公众参与的深度受制于政府的态度偏好，公众参与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弄虚作假。<sup>[48]</sup>第三，参与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公民的很多参与途径本身存在着问题，这就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热情与效果。以环境 NGO 组织为例，环境 NGO 组织本是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当前环境 NGO 组织的合法性难以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认可，参与环境治理缺乏制度保障，同时自身还存在着资金和专业能力的普遍不足，<sup>[54]</sup>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 六、环境治理理想类型的比较与研究展望

上文通过理想类型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各理想类型的主要特征与典型实践表现如表 1 所示。通过表 1 的总结与比较，揭示出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两个整体特征：第一，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更多的环境治理责任。政府无论作为单一治理主体还是在多元治理格局中，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即使以社会个体或群体作为单一主体的抗争型，目的也是要以抗争为手段倒逼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第二，科学主义方法论是治理手段的主要基础，当前环境治理依然处于主要关注环境层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利用各种科学管理与技术手段控制各种污染物质的指标数据是环境治理的焦点。以人文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抗争型、参与型之类的环境治理实践，正如上文所述面临着诸多困境而难以实现。

表 1 环境治理理想类型及典型实践表现特征

| 理想类型      | 主要特征                       | 典型实践表现      |                    |                        |                                 |
|-----------|----------------------------|-------------|--------------------|------------------------|---------------------------------|
|           |                            | 名称          | 行动者主体              | 方法论基础                  | 主要形式                            |
| 单中心科学主义模式 | 单一主体；<br>注重环境层面的<br>污染物质治理 | 运动型<br>环境治理 | 政府                 | 管理学<br>相关理论            | 环境整治行动<br>环保攻坚战<br>环保阻击战        |
| 多中心科学主义模式 | 多元主体；<br>注重环境层面的<br>污染物质治理 | 市场型<br>环境治理 | 企业、消费者等<br>市场主体与政府 | 经济学<br>相关理论            | 环境税费调节<br>清洁生产<br>环保产业<br>可持续消费 |
| 单中心人文主义模式 | 单一主体；<br>注重社会层面的<br>生态文明建设 | 抗争型<br>环境治理 | 受到环境损害的<br>个体或群体   | 环境运动、<br>环境正义、<br>环境公平 | 环境群体性事件                         |
| 多中心人文主义模式 | 多元主体；<br>注重社会层面的<br>生态文明建设 | 参与型<br>环境治理 | 社会公众与政府            | 民主主义                   | 环境治理公众监督<br>诉求表达<br>参与决策等       |

环境治理如同医病治疗，应当“对症下药”，根据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选择适当的治理方式。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产生根源错综复杂，既有与其他国家共通的普遍原因，如施奈伯格的“生产跑步机”模式<sup>[15]</sup>指出的对经济持续扩张的不断追求，又有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原因，如洪大用用社会转型揭示的社会结构原因<sup>[55]</sup>、张玉林用“政经一体化”揭示的体制原因<sup>[35]</sup>、陈阿江用“次生焦虑”概念<sup>[39]</sup>及“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路径<sup>[56]</sup>揭示的历史、文化原因等等。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种环境治理理想类型都只是部分有效的，有其适用的条件与情境，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根源。真正有效的环境治理首先应当理清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然后针对性地采取某种或某几种治理模式，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较好的环境治理效果。

在此基础上，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研究的可拓展空间有两个可能的方向：

一是加强多元环境治理方式的综合研究。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偏重于某一种环境治理方式或几种环境治理方式的比较，这种研究的优势是可以对一种方式进行深入剖析，加深对其理解。但是环境治理的效果实现需要多种治理方式综合运用，通常仅靠某一种是难以达到的，而关于多种方式在环境治理实践中的“兼容性”如何，怎样构建协同作用最大化的途径等问题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关于如何综合运用多元环境治理方式的研究。

二是加强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研究。上文已经提及本文重点梳理的四种环境治理方式并不涵盖所有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环境问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方式也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应当关注国外最新演进的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深入考量它们在中国环境治理过程中借鉴的可行性与适应性。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借用国外经验，应该有“文化自觉”，加强对中国本土社会情境的深入研究，提炼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范式。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斯·韦伯, 1999, 《社会科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周晓虹, 2002, 《理想类型与经典社会学的分析范式》, 《江海学刊》, 第2期。
- [3] 乔纳森·特纳, 2000,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华夏出版社。
- [4]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上海三联出版社。
- [5] 周雪光, 2012,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开放时代》, 第9期。
- [6] 曹龙虎, 2014,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学海》, 第3期。
- [7] 冯仕政, 2011,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 《开放时代》, 第1期。
- [8] 唐皇凤, 2007,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开放时代》, 第3期。
- [9] 唐贤兴, 2009,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运动式治理”的一个解释》, 《学习与探索》, 第3期。
- [10] 刘效仁, 2004, 《淮河治污:运动式治理的败笔》, 《生态经济》, 第8期。
- [11] 狄金华, 2010,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 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社会》, 第3期。
- [12] 荀丽丽, 包智明, 2007,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第5期。
- [13] 陈阿江、罗亚娟、陈涛, 2011, 《“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与后果——环保与卵集皮革业发展之案例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期。
- [14]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 [15] Schnaiberg A, Pellow DN, Weinberg A., 《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Mol APJ, Buttel FH.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under Pressure》, London: Elsevier North-Holland。
- [16] 王萌, 2009, 《我国排污费制度的局限性及其改革》, 《税务研究》, 第7期。
- [17] A. C. Pigou., 1932,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4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 [18] 刘晔、周志波, 2010,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文献述评》, 《财贸经济》, 第6期。
- [19] 王慧, 2015,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真的可能吗》, 《当代财经》, 第4期。
- [20] 刘建徽、周志波、刘晔, 2015, 《“双重红利”视阈下中国环境税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国际比较分析》, 《宏观经济研究》, 第2期。
- [21] 叶金育、褚睿刚, 2017, 《环境税立法目的:从形式诉求到实质要义》,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學報)》, 第1期。
- [22] 李昆, 2014, 《基于结构和技术的企业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科研管理》, 第5期。
- [23] 胡珺、宋献中、王红建, 2017, 《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 《管理世界》, 第3期。
- [24] 谢坚、杨力超、张欢欢, 2016, 《多利益相关方互动:对企业履行环境治理责任困境的探索》, 《贵州社会科学》, 第10期。
- [25] 刘蓓蓓、俞钦钦、毕军、张炳、张永亮, 2009,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6期。
- [26] 李淑文, 2017, 《中国环境产业的现状分析与战略选择》,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S1期。
- [27] 李宝娟、王政、王妍、莫杏梅, 2015, 《基于调查统计的环保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环境保护》, 第5期。

- [28]卡尔·马克思, 1955, 《政治经济学批判》, 人民出版社。
- [29]UNEP, 1994, 《Element of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Nairobi。
- [30]让·鲍德里亚, 2001, 《消费社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 [31]郭强、相雅芳, 2007, 《我国可持续消费文化的现实困境及构建》, 《甘肃社会科学》, 第1期。
- [32]冯仕政, 2007, 《沉默的大多数: 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第1期。
- [33]景军, 2009, 《认知与自觉: 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期。
- [34]《近年来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 年均递增29%》, 《新京报》, 2012-10-27。
- [35]张玉林, 2014,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 《探索与争鸣》, 第5期。
- [36]陈涛, 2014, 《中国的环境抗争: 一项文献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
- [37]黄家亮, 2008,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 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 《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
- [38]司开玲, 2011, 《农民环境抗争中的“审判性真理”与证据展示——基于东村农民环境诉讼的人类学研究》, 《开放时代》, 第8期。
- [39]陈阿江, 2010, 《次生焦虑: 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0]韩宗生, 2012, 《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消解策略分析》, 《新疆社科论坛》, 第4期。
- [41]陈剩勇、赵光勇, 2009,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教学与研究》, 第8期。
- [42]庄晓惠、杨胜平, 2015,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期。
- [43]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罗党论, 2013, 《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 《管理世界》, 第6期。
- [44]于水、李波, 2016,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研究》, 《中州学刊》, 第4期。
- [45]郑石明, 2017,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行政论坛》, 第4期。
- [46]楼苏萍, 2012, 《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与机制》, 《学术论坛》, 第3期。
- [47]李子豪, 2017, 《公众参与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2003-2013年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第8期。
- [48]辛方坤、孙荣, 2016,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第4期。
- [49]杨小柳, 2008, 《参与式流域环境治理——以大理洱海流域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
- [50]姚志友、张诚, 2016, 《培植社会资本: 乡村环境治理的一个理论视角》, 《学海》, 第6期。
- [51]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苏时鹏, 2016,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以欠发达地区J村养殖污染为个案》, 《公共管理学报》, 第4期。
- [52]曾粤兴、魏思婧, 2017, 《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赋权-认同-合作”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0期。
- [53]王红梅、刘红岩, 2016, 《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 模型构建与实践应用》, 《求是学刊》, 第4期。
- [54]谢菊、刘磊, 2013, 《环境治理中社会组织参与的现状与对策》, 《环境保护》, 第23期。
- [55]洪大用, 2001, 《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56]陈阿江, 2007,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 《学海》, 第1期。



☆ 作者简介：王 昭，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岚茜

# 黑臭河道何以履治难清\*

——以南京市 J 河为例

黄燕莹

---

**摘 要：**黑臭水体一向是水污染防治中的“老大难”。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J 河屡次上榜黑臭名单，虽历经多次河道整治，短期内能消除黑臭现象，但难以长效保持。为探究 J 河屡治难清的原因，从技术专家视角来看，治污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技术效用的实现也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从生活者视角来看，居民与河流的社会距离逐渐疏远，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受到忽视；从“河长制”治理视角来看，各部门之间、民众与“河长”之间的联动合作受阻，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黑臭河道长效治理过程中，专家、公众和政府三类主体不可分割，三者应当共同面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关键词：**黑臭河道治理 生活者视角 公众参与 河长制

---

## 一、导言

城市水体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污水排放量急剧增加，城市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水体黑臭现象普遍发生。当前，水污染防治正在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求，而黑臭水体则被视为城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对象，成为政府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2015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明确要求 2017 年底省会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大大推动了黑臭河道的治理。然而，黑臭河道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充分考虑黑臭治理的客观难度，合理确定目标。

根据文献，由于黑臭水体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黑臭水体的治理模式和案例实践，大多集中于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的风险挑战和对策建议等方面的探讨。从短期来看，有学者指出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主要存在控源截污、管网建设、垃圾收集和内源污染控制等方面的技术效用问题。

<sup>[1]</sup>从长期来看，崔佳萍等认为公众满意程度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是评判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好坏的依据。

<sup>[2]</sup>而沈坤荣等则通过识别河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的政策效应，发现河长制仅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可能治标不治本。<sup>[3]</sup>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应对策略，如技术上，刘福兴等主张根据目标河流的不同河段及内、外源污染进行合理的技术协同设计，以达到工程设计的要求。<sup>[4]</sup>张智等认为要结合生态性措施和工程性措施解决人为污染和地面雨水径流等方面的问题。<sup>[24]</sup>柏杨巍等总结了专项

督查行动在倒逼各地实质性解决水体黑臭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强调实现问需于民、问绩于民的重要性。

<sup>[5]</sup>王谦、高红杰等提出将工程与自然净化有机结合的生态治理理念，并认为要加强政府智慧化的管理体制。<sup>[6]</sup>综合以上，针对黑臭水体的治理问题，学者们的关注维度主要体现在技术、社会和政府等方面，

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多数研究体现的是单一维度，并未将三类主体如专家、公众和政府结

\* 本文已刊发于《四川环境》2019 年 05 期。

合起来统筹考虑，也未能体现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体系。因此，本文拟从技术专家视角、生活者视角和“河长制”治理视角来探讨黑臭河道屡治难清的原因，并分析专家、公众和政府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J河是贯穿南京市G区Z街道的一条重要的河流。J河的水质和环境，直接影响南京市水环境质量，也直接关系到长江南京段的生态保护。自2010年以来，南京市J河经历过多次大规模治理，短期内能够消除黑臭现象，但难以长效保持。因而实际治水治污操作中，距离J河的治理目标尚有差距。那么，为何J河一直在整治，却收效甚微、依旧黑臭？

## 二、J河的历史回顾

J河是南京城北地区一条通江河，涉及G、W、X三个区，其历史悠久胜于秦淮河，古时可谓南京人的一条“母亲河”。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发展，J河成为城市排水的重要通道，污水排放量急剧增加，水体黑臭现象普遍发生。20世纪20年代后期，J河流域开始发展，在接纳地表径流的同时逐渐汇入城市生活污水。30年代，南京城市中心开始由南向北推移，特别是60年代以后，这一流域已完全城市化。因而，城北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排J河，加之节制闸常年关闭，J河逐渐成为城北的一条排污渠道，水质感官性状较差，常年发黑发臭。进入80年代，J河每天汇入10万吨左右的污水，工业废水占70%左右，J河水质已呈明显的有机污染。<sup>[7]</sup>2000年以后，J河的水体黑臭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虽历经多次河道整治，短期内能消除黑臭现象，但难以长效保持，多次入榜“黑臭名单”。

## 三、从技术专家视角看：技术建设受制约

通过查阅《南京环境保护志》、《市政建设志》等文献资料，笔者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京市J河的治理一直在进行。但G区的水环境治理有着不同于其它城市和城区的复杂性。一方面，J河是整个G区水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承接着上游的来水，又联接着下游的去水，且河道受地势影响，流动性差，水质容易变差。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市建设规划意识不强，大部分河道流域范围均已成为城市用地，其部分支流被覆盖而成为地下暗河。并且，笔者从J河附近居民处解到，J河多处河道被封盖于地下，且各河段均分布着多个排口，每个排口后面对应的都是若干个工企单位或居民小区的污水源。

从技术专家视角来看J河的治理过程，治污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技术效用的实现也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结合J河上榜黑臭名单的关键时间节点，笔者可以发现：第一，就引水补源来说，主要是由于从玄武湖向J河补水的闸口流量有限，未能发挥作用，加之引水的通道截污不到位、水质差，无法解决引水补水的矛盾，尚未实现常态化引补水；第二，就截污清淤来说，河道暗河中的排口众多，污染源复杂，“截污”任务艰巨，且部分地段挡墙易倒塌，“清淤”工作难以根本消除。如果截污不到位，即使河道经过清淤整治告别黑臭，水质仍不能达标；第三，就雨污分流来说，这一技术建设能够提高污水处理率，避免河道被污染，有助于全流域治理。G区曾推进雨污分流工程，展开了较大规模建设，但仍有污水收集主干管尚未构建，系统建设也不完善，并未实现全覆盖。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治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之中。部分技术能在短期内发挥效用，但难以长效保持。并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J河的整治与改造、维护与建设是与G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等紧密相关的。如1966至1976年，J河的治理曾受到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使得刚刚起步不久的工业废水治理处于停顿状态。1976 年，国家建委曾批准并建设 J 河水系污水治理工程，后因江苏省实行财政包干，国家不再另行拨款，地方建设资金困难，工程只得中途停顿。<sup>[8]</sup>而且，早期建设规划不合理所带来的历史欠账，给后期治理技术的实施增加了极大难度，也由此导致了 J 河黑臭水体治理“老大难”的问题。

#### 四、从生活者视角看：人水关联性被忽视

从生活者视角来看，环境是嵌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的。因而，相较于专家，居民与河流打交道的的时间更长，社区居民更了解河道的基本情况，但是随着居民与河流的社会距离的疏远，这种优势并不明显。<sup>[9]</sup>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J 河成为城市排水的重要通道。但河道两岸并没有截污沟道，生活污水被直接排入了 J 河，导致 J 河水系淤塞严重，水质日趋恶化。这就使得 J 河的功能层次演变为纳污功能，这一水功能的转换反映了水体的变化，也说明了人的需求变化。陈阿江教授曾指出：“河的比较高级的功能丢失了，人们转向利用它的比较低级的功能……外在的污染，使河失去正常的功能。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从这个时间点往后，它的内生污染就开始了”。<sup>[10]</sup>人们从传统的保护者逐渐变为现代的污染者，意味着点源污染向面源污染的转换，也意味着河流从外源污染转向内生污染。并且，城市河流的沿岸多由自然护岸逐步退化为硬化和直立的防汛墙，虽然具有景观功能，但也人为地割断了河流的自然生态链，亲水步道的修建也并没有拉近居民与河流的距离。因而，城市河流不能满足居民多方面的需求，也不需要他们的养护，居民与河流的社会距离逐渐疏远。

从 J 河整治效果的评估来看，除了专业机构检测报告外，最重要的是看公众满意程度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根据居民对于 J 河治理情况的评价来看，可以总结如下：J 河已经治理过多次了，河道清淤工作也有在进行，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居民认为好景不长，容易黑臭反复。总的来说，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通过技术手段来治理环境污染。然而实际上，社区居民对于当地环境情况的熟悉度较高，在评价其治理效果时，社区居民也拥有自己的“生活智慧”。在黑臭河的多次整治过程中，人们对于河道治理的具体实践工作有着清晰的认识，也能意识到河道治理长效管理和养护投入的不足。并且，从社区居民的角度来看，由于“黑臭河”自带“污名标签”，对河流的治理关键是靠大家自觉的“爱河护河”的日常行动。但黑臭河的治理一向是水污染防治中的“老大难”，人们对 J 河的河道整治工作期待的同时又不抱太大希望。因而，在黑臭河治理过程中，若未将“生活者”视角纳入黑臭河治理策略中，或者纳入程度不够，忽略居民与河流的关联性，则黑臭河治理的长期性和有效性是极为有限的。

#### 五、从“河长制”治理视角看：联动合作不畅通

目前 G 区已推行了“河长制”，明确了区、街道、社区三级河长。实行河长制，并不是以河长和河长办来代替职能部门的工作，而是要让职能部门更有压力和动力。但由于现行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河长制”实际上流于形式，各部门之间、民众与“河长”之间的联动合作受阻，未达到预期效果。

首先，强调整体联动，但沟通不畅。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黑臭河的治理过于依赖各级“河长”的重视程度和统筹协调力度。党政负责人兼任“河长”，具有某种程度的“挂名”色彩，常态化的巡查工作通常交由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来完成，重在“维护保洁”和“发现问题”，并不真正“解决问题”。当遇到河道黑臭问题时，由巡查人员向上汇报，而街道河长和社区河长作为属地的直接责任人，则负责

制定水环境治理实施方案，统筹安排、协调推动各相关部门（如水务部门、环保部门）对河道的专门处理，以及督促检查等工作。这就使得治理工作周期加长，容易导致部门间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更难谈长效管理，甚至可能会抑制各治水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缩小各职能部门的自由塑造空间。

其次，注重公众参与，但信息不对称。“河长制”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招募“民间河长”参与治水。然而，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环境信息公开的主动权掌握在河道治理主管部门手中，其公开程度仍然是选择性的，民众对具体信息所知甚少。河道排查和治理情况往往以新闻发言的形式进行公示。为了寻找关于J河治理历程的相关资料，人们需在法规、新闻、政府官网报道中寻找蛛丝马迹，进行大量的信息整理及汇总工作后，才对黑臭水体治理的整体状况有所了解。<sup>[25]</sup>另一方面，公众参与主要表现在志愿服务活动、主题宣传活动等方面，其功能基本限于营造氛围，而非深度参与。在社会监督方面，居民投诉信息往往难以得到及时考察和反馈，民众与“河长”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同时，评议、举报制度也难以发挥效用，尤其“民间河长”的作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最后，实行分河段管理，但难以协调。结合观察，笔者发现G区范围内直接下河的污水排口较多，每个排口都对应着大量的污染源，甚至在不同河段之间还可以看到明显的分界线——即以水面浮标为界，两侧水质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众多的排污源头，上游“发展”的代价往往要“下游”来“埋单”，从而促使下游水环境恶化。而且，目前河道治理主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各行政单位单独治理，各社区也是按照属地原则负责对河道沿岸进行日常巡查和维护工作。因此，河道实行分河段管理，上下游地区的黑臭水体治理难以协调一致，各社区之间也缺乏联动合作。“河长制”具体工作的落实依托于各社区河长和街道河长，依赖个别行政单位的人员的日常巡查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即使组建民间志愿者队伍，由于监测技术的缺乏，效果也不会太理想。所以，J河的治理仍然缺乏系统性，这也是其治理效果难以长效保持的重要原因。

## 六、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20世纪60年代，J河黑臭水体的污染源主要是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进入80年代，工业废水的污染尤为突出，J河水质呈有机污染的特征。2000年以后，J河的水体黑臭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京市J河的治理一直在进行。虽历经多次河道整治，短期内能消除黑臭现象，但难以长效保持。究其原因，在实际的黑臭河治理过程中存在主体缺位的现象。从技术专家视角来看，治污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技术效用的实现也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如政府政策与体制的约束和居民生产生活的阻碍；从生活者视角来看，治污技术由政府和技术专家主导，居民与河流的社会距离逐渐疏远，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受到忽视；从“河长制”治理视角来看，各部门之间、民众与“河长”之间的联动合作受阻，未达到预期效果。除此之外，J河屡治不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河道的整治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紧密相关。因此，在黑臭河道长效治理过程中，专家、公众和政府三类主体不可分割，三者应当共同面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首先，专家掌握技术，其技术效用的实现需要政府提供资源支持和公众自觉维护治理成果。其次，政府拥有权威与资源，其治理措施的实现离不开专家的技术创新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最后，公众具有生活经验，其活动空间的拓展依赖于政府和技术专家的统筹安排。黑臭河道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应当重视三者关系，在三者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总的来说，环境是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黑臭水体污染源也主要来自于人们的生活污水。因此，

笔者相对应地提出以下对策：其一，技术专家要注重引水补源、截污清淤和雨污分流等方面的技术革新与进步，同时将黑臭水体的整治、改造、维护与建设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其二，要从生活环境主义出发，在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同时拓展公众的参与空间和参与深度，重视公众的生活智慧和评价标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组织基础和法制保障。其三，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资源分配和监督反馈的联动作用，保障经费和加强日常管护，增强“河长制”的正向效应。最后，在发挥各自的独特性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信息沟通渠道，畅通专家、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保障黑臭河道的长治久清。

## 参考文献：

- [1]李斌、柏杨巍、刘丹妮等，2019，《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的分布、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环境工程学报》第13期。
- [2]崔家萍、唐德善，2018，《基于ISM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公众满意度影响因素》，《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第16期。
- [3]沈坤荣、金刚，2018，《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4]刘福兴、付子、宋祥甫等，2009，《生态浮床及辅助技术治理汇丰河黑臭水体》，《四川环境》第28期。
- [5]张智、杨骏骅，2005，《重庆渝北双龙湖综合治理与工程实践》，《四川环境》第6期。
- [6]柏杨巍、李斌等，2018，《强化督查，倒逼实质性解决水体黑臭》，《环境保护》第46期。
- [7]王谦、高红杰，2019，《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现状、问题及未来方向》，《环境工程学报》第13期。
- [8]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市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1996，《南京环境保护志》，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9]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市政建设志》，深圳：海天出版社。
- [10]王书明、黄敏，2017，《专家、生活者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建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础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期。
- [11]陈阿江，2009，《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2]叶榕蓉，2016，《我国城市黑臭河道治理的法律支撑——以“水十条”的落实为视角》，《法制与社会》第19期。

☆ 作者简介：黄燕莹，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李硕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海、东大、南航三校社会学论坛顺利举行

2019年11月29日下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一百零五期）”暨河海、东大、南航三校社会学论坛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909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分别来自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三个学校的老师为同学们做主题讲座，众多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沈洪成副教授主持。第一位做讲座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武小龙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共生理论的视角”。

首先，武小龙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城乡共生治理的逻辑起点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工农业关系进行调整和治理过程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如何发展农业，在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的粮食

自给与工业化初期的资金积累；另一个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如何不断振兴乡村并平衡以工农业为核心的城乡关系。从乡土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本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甚至是“城市中国”的转型过程，而“城乡中国”则将成为中国社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结构特征。在这个阶段，城乡中国的特征表现为农民出现高度的异质化，并且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会发生显著分野；城乡间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的配置会存在失调与分化。

接着，武小龙老师提到他的研究目的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治理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有效把握和变革临界点的准确判定，试图揭示新中国城乡治理 70 年的演变规律与共生逻辑。

然后，武小龙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共生理论。共生型治理框架包括共生单元（城镇共生单元，乡村共生单元）、共生环境（硬环境因素，软环境因素）、共生界面（城乡共生发展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和居民），三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不同的共生模式。武小龙老师把 1949 年—1978 年称为城乡“寄生型”治理模式，1978 年—2002 年称为城乡“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 年称为城乡“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 年至今称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并分别做了介绍，并对比了四种模式。通过介绍城乡共生治理，武小龙老师提出了城乡共生治理中的“渐进主义”，要继续加大加深“次第推开，循序渐进”的渐进改革逻辑；城乡治理中的“国家—农民”关系，从“资源汲取”到“资源输送”，意味着城乡治理正在出现新的转型；城乡共生治理中的“空间正义”，制度供给的同步性是空间正义形成的前提基础。

第二位做讲座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系的郝龙博士，他的讲座题目是“计算社会科学：数字化生活与社会研究方法创新”。首先，郝龙老师从技术和应用两个方面帮助大家理解了互联网时代。接着郝龙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网络社会”，他主要引用了卡斯特的观点，网络社会用于指称在信息技术范式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社会结构形态，即一种基于网络化逻辑而形成的独特社会组织形式。互联网社会是网络化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用以指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软硬件基础之上，以二进制代码形式搭建起的虚拟行动场域，其显著特征是虚拟真实，虚拟更多指的是一种符号化，身体的缺场，还实现了对时空结构的重组。

接着，郝龙老师谈到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不断普及，数字化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开始大量出现。面对这些全新的研究对象，推动社会科学同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的相互融合，已成为量化社会研究方法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并由此催生出名为“计算社会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领域。计算社会科学通过将多样化的信息数据和数字化工具引入到社会研究之中，为提升量化研究的资料收集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开辟出新的方法路径。

然后，郝龙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计算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包括大数据计算，社会仿真模拟和互联网实验。大数据计算的来源可以分为基于人机交互形成的互联网大数据，通过传感器采集来的物联网大数据和通过数字化和数据化手段由既有信息资料转制而成的大数据，比较典型的大数据包括电子踪迹数据，关系数据，文本数据，空间位置数据。社会仿真模拟是在数据建模基础上对复杂社会系统进行计算机模拟推演的研究方法，基本逻辑是采集与分析现实世界的相关数据，根据现实数据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使用编程语言将数学模型转至为仿真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并根据结果对模型做出修正。它包括三个类型：宏观模拟，微观模拟和行动者模拟。基于行动者的模型是一种计算机模拟的形式，能够使研究者

创建、分析和试验在环境中互动的行动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研究复杂社会系统。在模型中，建模者首先设置足够数量不同的行动者，他们具有各自的特征和能力；然后，根据研究的需要，将不同的行动者设定为不同的角色，并赋予其各自的特定的属性；之后，将行动者放置一个人工建构的环境中，随着时间的进程，通过行动者个体之间、行动者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不断互动，展现宏观的社会现象。互联网科学实验的基本逻辑是在既有理论或假设的指导下，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在（自然发生的）互联网环境中控制地设置某些条件和干预（刺激变量），通过观察、记录、分析这种人为外部干预的变化对实验对象某些状态（结果变量）的影响，以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

第三位做讲座的是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的钱霖亮副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电商经济的时间制度与观念：以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卖家为中心的讨论”。首先，钱霖亮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时间研究。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产生的新的时间革命，这称为压缩时间。钱霖亮老师提出的研究问题为，信息技术是否真的如此彻底地改变了当代人的时间制度和观念，我们的生活时间是否已经全部为技术所主导？钱霖亮老师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商务经济对其从业人员在时间安排和观念方面的作用并非是简单地加速时间进程、压缩时间距离，造成一种去时间化的即时状态，而是受到社会和自然因素的塑造，生产出更为复杂的时间层次。

接着，钱霖亮老师介绍了他在义乌的田野调查经历和发现。做电商最重要的是让卖家自己的产品在搜索引擎的排名中尽量靠前。与时间直接相关的技术是产品上下架时间和阿里旺旺在线时长，懂行的卖家都会把自己产品的上下架时间定在消费者上网购物的“黄金时段”，但是也要避开畅销的同行，不断钻研调整上下架时间。除了上述内容，对于卖家最重要的还是销量与转化率。在电商群体中流传着一种“七天螺旋刷单法”，以7天为一个周期的原因在于电商平台以此周期在产品上下架时对其业绩进行考核，每周对产品的搜索排名进行调整。除了“七天螺旋刷单法”，还有2014年双十一开始试水的赛马制，11月11日当天，各会场卖家以小时为单位进行销售竞赛，销量和销售额更高的卖家将会在下一小时获得更多渠道，落后的卖家将长久落后，完不成销量指标会影响以后参加活动资格，不参加活动会导致店铺一蹶不振（销量排名）。从上下架时间选择到7天螺旋刷单法，再到促销活动的赛马制，这反映了电商平台的技术运作对卖家时间安排和观念的重要影响。

然后，钱霖亮老师提到依赖平台生存的卖家会自觉或被迫调整自身的商业实践和日常生活节奏以适应平台不断翻新的时间制度，但电商技术并不脱离社会和自然而存在，它在塑造新的时间制度和观念的同时，也受到基于既有社会和自然条件形成的时间制度与观念的制约。

第二阶段由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张晶晶副教授主持。第四位做讲座的是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胡亮副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五湖四海’与‘地方主义’：袁文才与王佐事件中的土客矛盾”。胡亮老师先从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这句话引出，提出了三个问题：革命在地方上是如何表现的，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如何与“革命”互动，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必然形成地方主义，家乡主义，这些社会网络如何影响革命？

接着，胡亮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他提到在应星老师的文章中谈到已有的革命研究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缺乏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勾连起来的意识与方法，地域社会

史的研究与革命史研究之间未能很好地实现对接。革命的嵌入性表现在党的组织，地方网络和政治结构的相互影响中。

然后，胡亮老师根据文献和党史记载从地方社会的特征，党员的身份特征，土客矛盾的特点等多个方面介绍了袁文才与王佐事件的具体时间发展过程和社会意义。从对这一事件的分析中，胡亮老师分享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五位做讲座的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刘莹博士，她的讲座题目是“‘专业性’的异化：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转型中的合法性重构研究”。首先，刘莹老师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转向，非营利组织市场化和西方与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路径及制度环境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下列问题：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对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带来了怎样的冲击，非营利组织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他们应对策略的选择是否会因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模式，组织的转变又如何影响组织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传递？刘莹老师依照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在地化”的制度研究路径将变迁中的非营利组织置于中国公共服务的具体制度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希望揭示中国非营利组织领导者对于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及其逻辑，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组织员工以及组织的服务对象如何理解和诠释环境的变化，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组织的变迁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

接着，刘莹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专业性”话语的崛起，专业性的异化。刘莹老师认为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背景下，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进行市场化运作，甚至会主动消解组织的“非营利性”，将“专业性”话语作为组织合法性来源和发展目标。通过对民族志资料的分析，刘莹老师谈到“专业性”话语在组织领导、员工与服务对象的共同参与下发生异化，非营利组织内部呈现多样性，不同类别组织选择不同改革策略与变迁路径，我们应关注不同主体对环境和组织策略的解释，在主体的互动中理解组织的变迁，关注与警惕制度环境和组织的变迁对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挑战。

第六位做讲座的是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周东洋博士。他的讲座题目是“出身与偏爱：师生互动的阶层差异与后果”。周东洋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当前的中国的学校中，师生互动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其具体体现及原因是什么，师生互动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如果有这种效应是否同样存在着阶层差异？

接着，周东洋老师谈到他对于师生互动结果的阶层差异推论是积极的师生关系可以显著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教育期望和心理健康水平等；而消极的师生关系则会导致师生之间冲突的上升、学习成绩的下降和越轨行为的增加。周东洋老师通过对 CEPS 基线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师生互动水平的阶层差异有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表现，个体层面上学生所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与老师的互动也越好，在群体层面上学生所在的班级的平均阶层地位越高，其师生互动越趋于积极和正面；学生的阶层出身越高，家庭背景越好，其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存量就越高；师生互动与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学生的阶层出身会放大师生互动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一方面学生的阶层出身越好，师生互动的学业成就的效应就越高，另一方面是学生所在的班级平均阶层地位越高，师生互动的学业成就的效应也越高。

最后，周东洋老师认为，师生互动水平的阶层差异的表现说明在当前中国的初中学校，老师并不能平等或公平地对待每个学生；师生互动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在中国当前的初中学



校，师生互动的阶层差异是教育再生产和教育不平等的一种重要微观因素；要做到教育公平，首先要做到课堂上的公平。



## 信访与 网络

# 历史遗留型信访的发生机制与治理困境

——以 X 市参试退伍军人上访为例

胡子瑜

**摘 要：**历史遗留型问题是在社会转型、体制变迁和政策环境变动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它的信访诉求它在一系列的“畅通信访渠道”和“维护稳定”的制度安排中不断产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面对此类问题的信访诉求，地方政府现有的治理资源难以在基层制度化解决。上访者实践中形成的话语动员体系与归因策略、与政府所使用的“恩威并施”的维稳手段是上访行动不断再生产的主要动力。针对这一类型的信访，应尤其注意对其信访类型加以甄别，任何维稳手段的不当使用都很有可能激发出更大规模的上访；同时，应警惕其向谋利型上访转化的可能，并清晰地认识到制度化解决此类问题的必要性。

**关键词：**参试退伍军人 集体上访 维稳

## 一、引言

历史遗留型信访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属于时间跨度较长、情况较为复杂、牵涉面较广，由社会转型、体制变迁和政策变动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难以制度化解决的社会问题。历史遗留型上访主要指各地多发的退伍军人、民办教师、企业改制下岗工人等特殊群体的上访。<sup>[1]</sup>与以往信访不同，在分类研究的谱系中，很难将其上访诉求界定为有理或无理，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具有一定模糊性，基层政府在面对这类信访问题时格外棘手。一方面，历史遗留型信访的诉求和所针对的事由不是地方政府单方面所能制度化解决的，另一方面，属地管理的信访原则和维稳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又不得不竭尽所能地把上访者稳控在当地。退伍军人的上访问题在该类型信访问题中最为突出，上访人数之多、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令人震撼，已经超出了部分地方政府所能稳控的局势。如：2018 年在北京、长沙、镇江、漯河、成都等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集体上访，其中镇江与漯河的上访活动还因遭到强力镇压引发全国性的老兵声援，<sup>[2]</sup>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因此本调查试图将退伍军人上访从历史遗留型上访群体中抽离出来，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这些年来，从中央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来看，关于退伍军人的各项政策总体上是越来越明朗的，但即便如此，退伍军人的上访活动仍在持续，甚至上访的频度和强度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近年来开始走向上访之路，并且在政策好转的情况下依然如此坚持？笔者想通过对 X 市近年来的退伍军人上访的调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探讨上访的发生机制与当前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为基层治理这类信访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作为资料收集的主要途径，访谈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参与上访的 10 个参试退伍

军人，还适当地扩展到未参与上访活动的其它退伍军人和一名退伍军人家属，以便更全面地了解这个群体的心理动态；同时采用资料分析法，通过查阅现有政策文件、法律法规、期刊论文等资料，获取与退伍军人安置、上访等相关联的一些信息，以便梳理调查研究的背景与写作思路。访谈的整个思路大致如下：

（一）缘何开始上访与持续上访。了解不同的人对上访起因的建构；

（二）上访过程是怎样的。通过他们对印象深刻的事情的描述，了解受访者在上访过程中与其他上访人员的互动，以及受访者在上访中与政府的互动以及他们对相关事件的评价；

（三）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态度与看法；

除了访谈资料以外，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地区下达的有关该群体的政策文件、未刊稿件、媒体报道等相关材料都将作为本文的资料来源。

## 二、问题建构——上访诉求的从无到有

既然是历史遗留型信访，X市退伍军人上访所反映的事由其实很早就存在了，这也是当地政府感到棘手和难以解决的原因。但既然事情很早就发生了，为什么上访活动在近年来才开始愈演愈烈呢？行为的变化与观念的变化相关联，理清不同时期退伍军人对同一事件观念看法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建构的过程。

（一）革命年代的“奉献”观与现代的“受损”观

X市上访的这批退伍军人退伍前所属的部队曾经承担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氢弹的生产、试验、运输、储备等相关工作，参与这些工作的军人现今被统称为参试退伍军人。由于那个年代物质匮乏，试验的安全防护条件跟不上，这批退伍军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核辐射影响。提到核辐射，在有关的新闻报道和研究中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些描述：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患肺纤维化、出现恶性或良性肿瘤疾病等。病，血液病，神经系统异变概率偏高，早逝，子女有畸形病变。

但很难想象在当时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核辐射对身体的影响并未形成一个问题。从一般性解释来看：其一，虽然在访谈里了解到，国家有告知核辐射影响的事实，但是当时人们文化程度并不高，对核辐射威力到底有多大，对身体损害程度有多深并不全然知晓；其二，由于核试验的敏感性，涉及到国家保密工作，这个问题被封锁多年没有搬上台面。其三，核辐射与疾病的关系较复杂，它对人身体的影响有一定的潜伏期，很多人是退伍多年以后身体上的不良状况才慢慢出现，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医学认定上，核辐射与某种疾病的直接关系也较难判定，很难证明某一疾病的出现就一定是核辐射导致的。

“我是81年入伍，84年退的。我们部队参加核试验，因为反映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群体才被大家所知道。1964年的第一次核爆，因为年代特殊，一起未被社会所了解。直至1994年国家决定停止核试验后才有新闻报道出来。我们这个群体全国有10多万人，我们最近这些年才出来维权，主要是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其次，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在体内的看不到，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反映出来的……我们这个群体整体的身体免疫力低下，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在我们部队有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就是这么个意思。”（参试退伍兵刘某 20180715）

虽然以上能够说明核辐射为何在当时没有成为问题，但还是无法解释近年来退伍军人对参试的看法所发生的转变，无法探究促使他们走向上访的深层原因。只有将退伍军人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才能

理清其脉络。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愿景”是具有绝对优先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国家倡导个体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每个人要充当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颗螺丝钉。因此在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对人的激励是以“牺牲、奉献、大无私”精神为代表的精神激励，那代人的青春是在为集体利益献身的鼓舞中度过的。这也是退伍军人的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并不凸显的原因。参加核试验是“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等同于与光荣奉献画上了等号，在过去是令人振奋和骄傲的事情，而个人利益的受损并不太引人注意。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个人利益诉求被赋予了相当的合法性，并被不断地表达出来。在国家和媒体维权话语的宣传攻势下，退伍军人对参试经历的认知逐渐从一种“伟大的牺牲”转变为“受损”，既然“受了损”，理应得到赔偿和补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一旦这一观念形成，历史遗留问题便被建构起来了。

## （二）经济体制转轨与企业改制

观念上对“受损”的认知并不能直接促使上访者产生上访的诉求。上访群体在现实中遭遇的打击与经济上的困境促进了问题向诉求的转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建立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变革与资产重组拉开了序幕，之后这一指导思想又在“十五大”上得到了加强，“减员增效”的口号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打响，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减员和破产转制。按照那个时期国家的政策规定，城市志愿兵和义务兵、农村志愿兵退役后，回到地方可由当地政府安排工作，农村义务兵复员农村后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sup>2</sup>但企业改制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由政策安置到地方的城镇义务兵就变成了下岗职工中的一员。笔者针对这一问题，对上访的10位参试退伍军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了解，如下表所示：

表一

| 姓名 | 入伍年份  | 退伍年份  | 退伍身份  | 退伍安置    | 在单位情况     |
|----|-------|-------|-------|---------|-----------|
| 黄  | 1981年 | 1984年 | 城镇义务兵 | 制药厂     | 93年倒闭下岗   |
| 刘  | 1981年 | 1984年 | 城镇义务兵 | 供销社五金商店 | 96年倒闭下岗   |
| 王  | 1981年 | 1984年 | 城镇义务兵 | 啤酒厂     | 97年裁员下岗   |
| 李  | 1982年 | 1985年 | 城镇义务兵 | 啤酒厂     | 97年裁员下岗   |
| 周  | 1981年 | 1996年 | 农村志愿兵 | 运输公司    | 03年企业改制下岗 |
| 代  | 1981年 | 1984年 | 城镇义务兵 | 煤炭公司    | 02年企业改制下岗 |
| 冯  | 1981年 | 1984年 | 农村义务兵 | 复员      | -         |
| 吴  | 1981年 | 1984年 | 农村义务兵 | 复员      | -         |
| 陈  | 1981年 | 1984年 | 农村义务兵 | 复员      | -         |
| 余  | 1982年 | 1985年 | 农村义务兵 | 复员      | -         |

其中，4名农村义务兵退伍直接复员，5名城镇义务兵与1名农村志愿兵按政策接受退伍安置，但无一例外，他们均在企业倒闭或改制中下岗失业。这批军人回到地方后由于缺少职业技能的竞争优势，不免成为企业的裁员对象。他们下岗失业时已过了市场竞争的黄金年龄，加之有些人身上的核辐射影响开始出现，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国家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逐渐出现分化，很多原先政府承担的职能被剥离，国家一方面想要安置退伍军人，另一方面又无法再通过强制指令进行干预。使得除了下岗以外，还有一部分人长期处于“待安置”状态得不到解决。

“战友群里有好些个人早就就回地方了，交接的时候政府说的好好的，给安排到什么地方，民政局开具介绍信但一直未上岗。让你在家等通知，一等就是多少年也没动静。”（参试退伍干部胡某 20180716）；“国家这块本来也有政策，待安置期间要给我们单位平均工资的80%作为生活补助的，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要到一分钱。党中央的政策再好又有什么用，到了地方对没有‘官系’的‘百姓群体’来说只是一张享受不到的空头支票。”（参试退伍兵冯某 20180802）

安置过程中对政府的不满很容易进一步加深上访者的“受损”意识，促使他们通过上访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 三、历史遗留型信访的再生产

自建国以来，信访就被作为用于克服科层屏障和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有效工具，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控，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信访制度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除了承担解决纠纷的功能外，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法律、政策制度方面的协商功能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剩余事物兜底的功能。因此“畅通信访渠道”格外重要。但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都向中央涌入，中央便会陷入瘫痪，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在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面前，信访情况也会被纳入地方稳定的考核之中。这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对历史遗留型信访时，处于尴尬的境地。

#### （一）上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首先，国家维权话语的建立和法律、政策上的倾斜趋势为退伍军人的上访诉求提供了合法性根据。访谈对象吴某向我提供了整理成册的《退伍军人安置和优抚的法律政策依据》和信件，可以将X市参试退伍军人的诉求大致分为两类：1. 有关参试身份认定和补偿的诉求，其主要依据民发[2007]号文：“向部分参战退役人员、原XXXX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发放生活补助，以及实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等3个政策”，提出这部分诉求的人员主要包括有工作单位未能享受生活补助的群体以及已享受生活补助但就政策解读上与地方政府存在歧义的群体（例如对于中央所提出的“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或略高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中“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判定标准看法不一）；2. 有关就业和医疗保障的诉求，其主要依据劳社部发[2006]17号《关于认真做好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地方政府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做好军转志愿兵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问题；妥善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和国办发(2013)78号《关于深入贯彻〈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扎实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意见》：“各用人单位要切实保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待遇落实，要及时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尽快安排上岗。”以上诉求虽有所差异，但都是退伍军人在国家大气候中得到了某种信号的结果，

他们感受到能获得国家支持和政策照顾的可能。

“上面的政策还是很阳光的，但具体到职能部门就变成了要么断章取义，要么误判曲解、要么对法律法规视而不见，中央政策上要求要确保优抚对象及退伍军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或略高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但相关职能部门就是不做为。”（2018.08.02，参试退伍兵冯某）

而另一方面，退伍军人上访在其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也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动员话语体系，为上访代表们所使用，从情、理上将不得到政府支持的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行为正当化了，在退伍军人的动员上起到不为人察觉的作用。这些词汇往往有一层特殊的含义，能够使听者自然而然的产生联想。例如，当上访代表们提到进京上访的行为时，多次将中央军委的同志昵称为娘家人，把进京上访的活动比作“回娘家诉苦”。

“在地方上没人管，自然第一个想到回娘家（中央军委），地方不管的娘家总该管，我们这些年的种种苦楚，总该有个地方倾诉。”

娘家一般意味着出嫁的姑娘最挂念、最亲近的地方，因此这个词汇的使用，能够一定程度上唤起退伍军人们对部队和中央军委的特殊情感，因而进一步将越级进京上访的活动赋予正当性。在这里越级进京上访的逻辑就变成了：我们在外受了“委屈”，自然要到“娘家”去找“娘家人”诉说苦水、发发感慨；又例如退伍军人经常将政府的某些行为比作“扣帽子”、“泼脏水”。这个词在文革时间常常被使用，说话者使用这类词汇希望听者能够预设上面的罪名都是诬告。

<sup>3</sup> “就今年 3 月多，那时候两会马上开了，市里面怕我们上北京，一直派人跟着我们。我那天跟其他四个战友到火车站送余某（上访牵头人）去看病，，还没下车就好些个警察和截访的人来了。要以“涉黑涉恶”对我们立案侦查。然后家属就接到了市公安局的《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理由是扰乱单位秩序，行政拘留十日，可我们那天压根就没找政府，头几天去政府门口要求见领导没人接应，他们不过是怕敏感时期我们找上面。3 月 22 日拘留期满后又下达了另一份拘留通知书。以涉嫌诈骗（低保）罪对我们刑事拘留。拘留的名义太牵强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上访是我们的权力，政府给我们扣个诈骗和涉黑涉恶的帽子，摆明了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参试退伍兵周某 20180718）

在上访组织者的话语文本中，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归因策略来解释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过激的事情：

“领导答应和我们接谈，答复有关政策落实问题，但到接访时间，领导又不接见了。那没人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只能找上面，上访那是公民的权力嘛，你说你即不接见还要派人堵我们这就是政府的错了。那截访的人不叫我们走，还威胁我们，一被威胁，这个群情被激起来后，那就不好收拾了嘛，大家就怄在一起堵了交通。如果不是他们施压太厉害也不会这样。”（上访组织者余某 20180718）

余某的上述解释一方面从情理的角度维护上访群体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归因策略控诉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一被威胁，这个群情被激起……”，通过把主动意味变为被动的语态转换，强化事件发生过程中上访群体的被动性，从而将过激事件负面影响的责任推卸给了政府，维持了上访者们的正面形象。

## （二）信访治权有限性与政府责任的无限性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诉求，在中央修改或出台新的政策之前，都没有办法在正式制度渠道范围内解决。属地管理的原则又迫使地方政府把具有历史沿革性问题的上访稳控在当地。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过去能对部分钉子户进行规训的治理资源越来越少，一些可以利用的软肋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土地调整），伴随着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的废止，基层失震慑退伍军人越级、集体上访的权威性力量下降。基于这种特殊境况的考量，地方政府常只能采用暂时性策略来稳住上访活跃份子。暂时性策略包括监控上访者的动向，对其进行拦截与稳控。它只能在当下把上访者暂时稳控住，采取措施采取不当，很容易激发更强烈的矛盾，引起下一次更激烈的上访。2018年3月地方政府在实在拦截不下来的情况下对进京上访的个别人员以涉黑诈骗的名义进行了行政拘留，虽然在敏感时期把越级上访的苗头掐灭了，却激化了上访者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促使上访进一步升级：

在下面的组织上访会议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一体现：

“去区里、市里、省里依次上访，如果结果不满意，这就是终结和所谓的三级上访。拿好所有上访答复，直接去中央上访。只要到了马家楼刷身份证，政府业绩分就会扣掉。扣了地方政府分，地方政府会拘留上访。临时拘留条件非常好，根本不用怕。拘留出来，就去当地人民法院要求行政复议。我得让政府知道，我们是懂法的，才不会小看我们。经过这之后，政府也许比以前态度好转些，可以谈解决问题，不解决，继续上访，连续三次，当地政府领导直接降职。这就是政府怕和打压的原因。所以既然选择维权，一定要坚持住。政府妥协了，我们就有维权成功的希望了。”

这一时期的上访者们并不将希望寄托于双方协商解决问题，上访者的行动重心已经转向了反抗基层政府对他们的整治，这时他们的行动常常被逼入了绝境，坚定了与基层政府抗争到底的决心。他们通过有策略地以中央挟地方直接要求地方政府对他们的诉求进行妥协，地方政府以往所惯用的“非访”拘留的打压方式难以再起到震慑作用。基层政府本来是为了遏制集体上访的势头，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成为集体上访新的动员因素，使这种行动不断再生产出来。此后，X市政府不再敢轻易使用硬手段，只能采用陪旅游、陪吃饭、陪打牌的方式对上访活跃的人实行软监控，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暂时缓解其越级上访的念头。

面对基层政府信访治理资源的不断萎缩，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强化了基层政府的无限责任。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2009年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和《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以及在具体信访运作中，信访考核压力下包保责任制的制度化促使信访工作被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与诉讼工作不同，信访工作被要求对待群众的一切困难和问题都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这意味着政府的无限责任。但历史遗留型信访的诉求并非本届地方政府所能制度化解决，对于政策规定上不符合，但又确实存在困难并且不断制造上访麻烦的人，有时便会使用个案化解的方式，运用物质安抚的手段换取上访者的“息诉罢访”。在X市上访初期，个别上访的退伍军人便享受到了这不公开的“甜头”，总找上门的退伍军人得到了诉求的个案解决，例如调动政府的资源为其安排工作、提供低保和一定生活补助。而没有上访的不知情者则没有这一特殊待遇。一旦“开口子”的秘密在退伍军人群体中传开，个案化解便会诱发出源源不断的上访，甚至可能向谋利型上访转化，对其他人产生示范效应。

## 四、信访治理的困境

### （一）个案化解与维稳的反作用

无论地方政府采用暂时性手段稳控上访者，还是采用个案化解的方式对个别人员进行物质安抚来换取停访，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上访者制造麻烦的能力和程度。只有善于持续不断地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又踩线不越线的上访者才能在避免威胁（行政拘留）的同时，换取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这一前提塑造了上访者们的潜规则意识：“只有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喝”，使得即便有理的信访者也只能通过缠闹扩大影响引起政府的重视。退伍军人通过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广泛动员老战友，坚持“五天一小访，十天一大访”的原则给政府施加压力；集访时注重保护带头人，如果一个维权团队，只有一个维权代表，这个代表就将会成为“维稳对象”，于是他们通过设立若干个维权代表，并定期更换组织者，将维权代表模糊化。人人都是代表，人人又都不是代表，规避政府对上访带头人的威胁；同时他们经常内部开会，讨论行动安排，分析别的省上访行动中出现的問題，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提升缠闹技术。有时还会派牵头人与其他地区的代表开会，互相了解各地方政府解决上访问题的一些内部消息，并向各组织内其他成员转达外省外市的上访情况。

“像我这样的，对维权比较热心，又对政策文件更懂一些，别的战友吧有问题都来找我谈谈拿主意，在材料解读上我有权威，现在微信群又很发达，跟外省保持了联系，消息都很灵通，他们官方搞不来的材料，我们都搞来了。没有这些材料到政府那拿什么去说……上半年漯河事件、镇江事件闹得可凶，我们经常在一块说这些个事情。”（参试退伍兵黄某 20180814）；

这种权宜式的治理促使退伍军人上访缠闹技术的提升，同时缠闹也源源不断地促使政府的正式规则被妥协和权宜之计的再产生。在两者互相生成的过程中，维稳将越维越不稳。

### （二）政策边界划定的矛盾

从中央制定关于退伍军人各项安置、优抚的政策到地方执行落实，相关政策在确定时需要划定一个标准来确定享受政策的群体范围。但这个群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特殊情况使其难以找到一个明确且唯一的边界，这一情形下，真实符合每个人需求的边界是不存在的、模糊的。边界的模糊的确带来了很多问题，政府也在致力于划定边界使其更加明晰，但这一系列政策又催生出新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处在边界的边缘并成为源源不断的新上访者。

一方面，在划定边界时，处于这个边界边缘的群体总会设法上访要求享受边界之内的待遇，虽然相关补助政策在不断上访的压力中不断扩大，享受政策的群体范围也在扩大，例如国发[2013]第 99 号文和国发[2015]第 101 号文的相继推出，已经连续不断地提高了参试退伍军人的优抚标准和范围，并且 2018 年 3 月中央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该事务部将专门负责处理退伍军人有关事务。但这些举措并没有缓解参试退伍军人上访的态势，他们的剥夺感依然没有消失。在历史遗留问题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处于边界边缘外上的人仍然会成为源源不断的上访者。另一方面，在边界标准模糊的情况下，各省市落实的不一致也会催生出基于不平衡感的上访。中央的某些文件规定，属于原则上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可操作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的实施办法，尽管相比之前有所提高和改善，但各地市的落实可能存在不一致。各地区政策落实程度的差异也会催生退伍军人的持续上访。

“当时在部队的时候，政委就说要我们团特殊，要吃三类灶，保证好每位战士的身体。结果到了地方，同样都是吃三类灶的，就因为地区不同有的享受了政策，有的啥也没有。这凭什么呢？”（参试退伍兵刘某 20180717）

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往往是和自己类似的其他人比较。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则指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和所失的本身，而且还关心它们与别人所得和所失之间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的”。参试退伍的上访军人正是在这种比较后产生了不公平感，继而唤醒内心或许一直存在的不平衡感，加之有的生活困顿，更是激起了他们采取行动的决心。他们不仅仅跟外省、同省、同市不同区的同期参试退伍军人比，还会跟早期、后期的退伍军人以及现役的核岗位军人相比。

“国家早就停止了核试验，核试验基地的现役人员里面大多数根本没有参加过核试验，但他们有丰厚的核岗位补贴。反而，那些真正参加核试验的退休和退役人员却得不到应得的，这对我们显然极不公平……上面对我们一直有政策，强调对我们这些参试老兵要优抚，下面各省市县不同地区有的也发了文，但重视程度不一，落实情况不平衡，甚至差别很大。”（参试退伍兵王某 20180717）

这种比较不仅仅会促使他们继续采取行动，还为上访者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和心理期待：别的地方政府能妥协的，我们上访也同样可以争取到。“我们去上访好多次，A区在大前年开了口子，现在全区的那项补贴基本都落实了，但是B区这两年才同意给我们发放，到现在仍然有一部分人的没落实。要说经济条件吧，A区是我们市中心，钱根本不是问题，A区早就拿到了B区却迟迟不给，人家外省的好多经济条件还不如我们这，政府也照样执行了政策，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参试退伍兵李某 20180706）

也正是在对政府与政府的比较中，上访者们看到了上访获得成功的希望。

### （三）越级上访与属地管理的矛盾

历史遗留型信访问题的治理还存在一个难以调节的矛盾，即越级上访与属地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历史遗留问题的上访者普遍偏好向上的越级上访，这与当前的属地管理原则相违背。为什么有些信访总不止于地方而有向上发展的偏好？关于这一问题，应星在对农民上访群体的相关研究中认为，农民上访群体对“乡镇——区——中央”三级政府有着“贪官——清官——明君”对号法。<sup>4</sup>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乡镇一级，作为“青天大老爷”如果得知他们的遭遇，一定会为他们主持公道。而退伍军人上访群体较为特殊，他们对“区、市——省——中央”的看法有所不同。军队中军人习惯于听从命令，只有命令指示清楚才有利于他们准确服从。因此他们所感知到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好比军队中“司令员”与“办事员”之间的关系。尽管“办事员”没能很好的落实“司令员”的指示，但归根结底，是“司令员”没能下达明确的指令。例如精通政策的冯某像笔者提出：

“中央制定的参试人员身份的认定标准与事实存在偏差，部分也曾参试的其他部队的部分成员无法获得参试人员的身份认定，这才导致地方上对待这批人的补贴没有及时落实”。

虽然退伍军人也将中央亲昵的称呼为娘家人，但他们认为，对于地方政府执行不力、不作为的问题，其根源出于中央。



“中央政策有些地方说的太笼统，具体怎么定得地方自己拿捏，你不去上访，光指望地方政府解决不了问题。”（参试退伍兵黄某妻子 20180901）

这样的归因认知促使他们的上访活动不仅仅停留于地方，还有向上发展的偏好。进京上访活动的活跃不仅仅因为与地方的矛盾冲突逐渐加深，还因为地方虽有属地管理之责，却缺少实际有效的治理资源，解决不了他们上访所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上访者只用通过抓住更高级别的政府“臂膀”并引起重视，才有希望将自己划定在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清晰的边界之中，成为政策的受益者。同时，作为“司令员”发号指令的模糊性给了他们提出诉求的政策空间。其次，也正是中央对退伍军人问题上的明朗态度给了退伍上访军人持续上访的心理动力，为其上访提供了一定的心理空间。他们相信历史遗留问题在地方层面上解决不了，只有中央才有权在法律、政策层面为其诉求提供保障。

## 五、总结

历史遗留型问题是在社会转型、体制变迁和政策环境变动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它的信访诉求它在一系列的“畅通信访渠道”和“维护稳定”的制度安排中不断产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一方面，国家维权话语的建立和法律、政策上的倾斜，为其上访诉求提供了正当性与合法性根据。另一方面，实践中形成的动员话语体系和归因策略，为上访代表们所使用。从情、理上将不得到政府支持的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行为也正当化了。他们在和地方政府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应对政府权宜式治理的手段：访民的缠闹技术。两者的交织会诱发出源源不断的新的上访，甚至可能向谋利型上访转化，对其他人产生示范效应。针对这一类型的信访，当前政府面临着三个主要困境：缺少治理资源的地方政府只能采取个案化解和带有惩罚性的维稳策略，使得只有善于持续不断地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又踩线不越线的上访者才能在避免威胁的同时，换取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其次，中央制度的政策边界是模糊的，无论如何划定，都使得处于边界边上的人成为源源不断的上访者。最后，上访者对“中央-地方”的权力感知使信访存在向上发展的偏好，它不断对属地管理制度下的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研究认为，当前政府应尤其注意对历史遗留型信访加以甄别，任何维稳手段的不当使用都很有可能激发出更大规模的上访；同时，应警惕其向谋利型上访转化的可能，并清晰地认识到制度化解此类问题的必要性。

##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1999，《疯癫与文明》，上海：三联书店。
- [2] 詹姆斯斯科特，2002，《弱者的武器》，北京：北京译林出版社。
- [3] 詹姆斯斯科特，2004，《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北京：北京译林出版社。
- [4] 陈柏峰，2012，《特定职业群体上访的发生机制》，《社会科学》第8期。
- [5] 何绍辉，2008，《隐性维权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及困境——来自湘中M村移民款事件的政治人类学考察》，《人文杂志》第6期。
- [6] 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7] 吴毅，2007，《“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 [8] 应星，2000，《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9] 应星，2009，《“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第6期。

- [10]应星, 2012, 《超越“维稳的政治学”——分析和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7期。
- [11]邱娟莲, 2014, 《转业军人干部安置、群体性上访与社会稳定研究》, 南昌大学。
- [12]余瑛娜, 2010, 《为“身份”而战——X市企业军转干部上访研究》, 北京大学。
- [13]于建嵘, 2004,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14]应星, 2000, 《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15]董海军, 2008,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第4期。
- [16]陶凌云, 2011, 《身份认同与集体抗争的逻辑》, 哈尔滨工程大学。
- [17]董志强, 1999, 《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 《人文杂志》第4期。
- [18]赵鼎新, 2016, 《论“依法抗争”概念的误区:对李连江教授的回应》, 《社会学评论》第1期。
- [19]陈先兵, 2010,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黄冬娅, 2011, 《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1]李连江, 2013, 《重建信访制度》, 《人民论坛》第22期。
- [22]张泰苏, 2009,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3]于建嵘, 2009, 《“陪访制”的地方政府苦衷》, 《人民论坛》第16期。
- [24]于建嵘, 2012, 《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再论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 《探索与争鸣》第9期。
- [25]覃琮, 2009, 《农民维权与农民问题研究路向——关于农民维权活动三种解释框架的评述》,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 [26]刘世奎, 1991, 《归因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7]裴宜理、余钢, 2008, 《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上)——从孟子到毛泽东延至现在》, 《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
- [28]裴宜理、余钢, 2008, 《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下)——从孟子到毛泽东延至现在》, 《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
- [29]傅春晖、彭金定, 2007, 《话语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诠释》, 《求索》第5期。
- [30]朱政, 2016, 《基层信访工作中的“开口子”:信访困局的郁结与疏解》,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31]陈先兵, 2010,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32]折晓叶, 2008,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33]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 [34]盛乐, 2017, 《湖北省复员军人安置及其群体研究(1950-1958)》, 华中师范大学。
- [35]张萌, 2017,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下的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研究》, 天津大学。
- [36]赵婷婷, 2016, 《1950年代回乡复员军人问题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 [37]高鹏, 2016, 《基于就业能力视角的我国退役士兵就业问题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 [38]丁寒春, 2011, 《新时期我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中的问题 and 对策研究》, 湖南大学。

☆ 作者简介: 胡子瑜,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胡 麟

# 网络自拍：自我认同的符号化幻想

田晓娟

**摘 要：**随着社交网络和移动智能设备的发展，自拍成为人们展演自我、塑造认同的符号化幻想。本文基于与社交网络密不可分的网络自拍，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自拍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思考网络自拍在构建自我认同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发现其中的偏差并提出辩证的意见。本文首先回顾自拍行为的历史脉络，尝试对网络自拍进行分类并探索其特征，其次以符号为切入点分析网络自拍的功能属性，然后分析网络自拍在进行自我表达背后的技术驱动和心理动因，进而发现当今社会网络自拍在自我认同过程中的一些偏差，诸如真实与虚拟、个性与去个性等问题，最后提出辩证的建议。

**关键词：**网络自拍 符号表达 自我认同

## 引言

智能手机的拍照技术将人们拍摄、修饰和观看自拍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开放性的社交网络为人们展示自拍并获得反馈提供了平台。展现理想化自我形象的载体由自拍转变为网络自拍，各种美颜、滤镜、特效成为自拍者美化自我形象的工具，使得人们通过网络自拍进行符号化叙事进而塑造出一个“完美”的虚拟自我成为可能，但虚拟自我与真实自我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该问题愈发值得关注。目前，有许多学者从图像话语、视觉消费、图像政治等角度对自拍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从符号化叙事的角度分析网络自拍对自我认同的构建，从中探索网络自拍创造的虚拟化幻想与自我认同的一些偏差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辨正的建议。

## 一、网络自拍的符号化叙事

### （一）网络自拍的历史脉络

2002 年澳大利亚的一个男生上传一张自己拍摄的个人照片，并配文“selfie”，由此，“自拍”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社交媒体迅猛发展，越来越多人在社交网络中上传自拍照片，自拍现象愈发普遍。回溯自拍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 自画像时代

自拍的伊始形态可以说是画家为自己绘制的自画像，最典型的自画像时代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伦勃朗、拉斐尔等一大批画家将自画像提升为艺术创作，对着镜子借助画布将自己的形象记录下来进行艺术表达，使自我形象成为“永恒”。这一时期的“自拍”，具有特殊的专业门槛，往往是只有画家才拥有的“技艺特权”。

#### 2. 相机时代

从摄影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自拍开始作为个人摄影的一个分支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照相机的一种功能持续存在，个人利用照相机能够对自己进行拍摄。在快门线、延时快门、三脚架等其他拍摄技术的辅助下，相机时代的自拍能够相对方便地实现，但依然是具有一定门槛的。首先是经济门槛，拥有用于自拍的相机，是有钱人才能享有的权利；其次是技术门槛，相机的使用是需要学习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这项技术。

#### 3. 网络自拍时代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网络媒介迅速发展，移动拍摄工具井喷，再加上电脑、平板等移动网络终端的普及，自拍与网络变得愈发密不可分，“自拍”也逐渐转变为“网络自拍”。2004 年

Flicker 网站诞生，这是第一个以分享自拍照片为主题的网站。有国外研究表明，从 2012 年到 2015 年，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自拍信息增加了 900 多倍。在新媒体时代，正是由于有社交网络这样一个用于展示的舞台，自拍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 （二）网络自拍概念界定

2013 年，《牛津词典》将“自拍”（selfie）列为年度热词，并对其进行了界定：“一个人给自己进行拍摄的照片，尤其是指利用智能手机或者网络摄像头进行拍摄，并且将其上传至社交媒体的照片”。根据《牛津词典》给出自拍的定义并结合自拍发展为网络自拍的三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语境下的“自拍”将网络社交媒体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自拍与社交媒体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因此，本文中所讨论的“自拍”即自拍者进行自我拍摄行为并发布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自拍”。

## （三）网络自拍的类别与特征

### 1. 网络自拍的类型

#### （1）形象展示型

形象展示型自拍主要用来记录和表现主体的外貌形象，即表现出主体“长什么样”。最初艺术家们的肖像画是在囿于技术的情况下，通过画笔把当时的相貌记录成永恒；相机诞生后，人物摄影始终是摄影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排队到照相馆照相，或者是在某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拍一张相片，这些绝大多数都是人物留影；在网络自拍时代，人们享受着自拍技术的赋权，每一个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肖像自拍，而且可以使用滤镜、美颜和各种特效来“美化”自己的外貌形象，使最终展示在社交平台上的外貌符合自己的想象。

例如某位男明星经常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帅照并配文“今天长这样”引起粉丝们的效仿，“今天长这样”一度成为分享自拍照的热词。再如随意打开一个明星的微博，往往能看到无数张面容精致的自拍照，精心修饰用以展示给无数的粉丝们，或者是晒出素颜的照片用以证明自己没有整容。近些年网络上流行晒“A4 腰”、“硬币眼”、“人鱼线”、“马甲线”、“反手摸肚脐”等，都是用以展示自己的身材和长相的形象展示型自拍。

#### （2）身体在场型

身体在场型自拍主要用于彰显主体的在场感，当主体处于某种特定场域中时，拍一张正处于某一环境中的自拍，以特定场景为自拍的背景，可以显示出“我在这里”，昭示主体身体的在场。网络自拍技术赋予人们能够彰显自己“在场”的技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拍控制和转换其“在场”的舞台（自拍的背景），任何空间和场景都可以轻易成为人们自拍的背景，外界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极大程度地减小，人们可以用自拍的方式实现身体的“无处不在”的能力。同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通过将身体在场型自拍发布于社交平台的方式，人们可以便捷地拥有对外“告知”的渠道。比如，朋友圈里经常有晒各种游客照片的人，通过在朋友圈晒旅游自拍，即使不使用任何文字的辅助，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昭示自己去了某个地方。再比如，参与了某项会议活动或者去听了某位歌星的演唱会，为了显示自己身体的“在场”，人们往往也会在现场拍自拍用以佐证。这些都可以说是证明身体在场型自拍。

#### （3）关系表达型

关系表达型自拍主要用于展示自拍中主体与其他被摄者（包括物品）的关系。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并不是作为孤立个体的形式而存在，确切地说，人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的。而这些关系用文本的方式表达往往是复杂繁琐的，图像语言自诞生就拥有比文本语言更加直观和易于传递信息的特性，所以使用图像的方式表达某种关系就显得格外方便快捷。晒其与家人的自拍可以表达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晒其与恋人的自拍可以显示幸福甜蜜的恋爱关系、晒其与朋友的自拍可以彰显其良好的社交能力。当一个人结识明星或者权贵时，晒出合照可以昭示自己所拥有的人脉资源。同时，关系表达型自拍也可以表达与物品的关系，比如把豪宅或豪车晒出来表示自己拥有雄厚的财

力，或者购买了奢侈品晒自拍炫耀其所属关系等，这些都可以证明自拍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往往带有炫耀的属性。在某些情况下，这类自拍实际上更加具有关系表演的意味，比如当某位明星传出与另一位明星有不和或矛盾时，最常见的公关策略，就是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两人的合照，以破除所谓关系不和的“谣言”。

## 2. 网络自拍的特征

### （1）网络自拍的社交属性

在新媒体语境下，只有经过拍摄、修饰调整、分享到社交网站、获得反馈这四个环节，网络自拍活动才算完成。网络自拍通常发布于朋友圈、微博、论坛、贴吧等社交网络上，这些传播平台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在这些平台上，人们不仅可以拍摄发布自己精心“制作”的自拍，还可以浏览、点赞、评论其他人的自拍，与其他自拍者形成互动。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网络自拍带来的互动不仅是基于自拍者的熟人关系网络，也可以是陌生的关系网络。所以，分享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拍，不仅可以维持现有的社交而且有机会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 （2）网络自拍的技术属性

如果说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拍具有一定技术门槛，修饰自拍需要 Photoshop 等专门的软件，那么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如今的网络自拍已经几乎没有技术难度了，诸如美图秀秀、天天 P 图这类图片修饰类 APP，可以方便快捷地进行修图；再如轻颜相机、Faceu 激萌、B612 咔叽等手机自拍 APP，在拍摄过程中就可以直接实现美颜、磨皮、瘦脸、大眼等效果，加之各种滤镜和道具，即使是普通大众，也能够“制作”出理想化的自拍照片。

### （3）网络自拍的娱乐属性

自拍者拍摄和发布网络自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我满足和娱乐消遣的目的，通过发布美化的自我形象，引起他人的注意，从他人的反馈（包括浏览、点赞、评论等）中获得自我满足。从自拍者的群体特征来看，自拍者大多数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在网络自拍还未能如此便利的时代，他们想要塑造自己的形象并进行传播是比较困难的，而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自拍给他们提供了展现和传播自我形象的途径，使得这些个体化、无组织的普通人能够通过发布网络自拍并获得他人评价的方式获得塑造自我、展示自我的快感，而且，开放性的网络传播能够放大这种快感，满足他们的娱乐消遣的需求。

### （四）网络自拍的符号学关照

人是通过符号来传递信息的，我们生活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符号空间或意义空间。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将符号界定为“能指”和“所指”，体现出其二元论的思想。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符号不仅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不同于索绪尔，皮尔斯把符号看作一种媒介，他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媒介”、“对象”和“解释”这三个要素构成，只有通过“解释”，“媒介”和“对象”才会产生关系，只有“被理解”的符号才能具有意义。网络自拍作为一种非语言的符号，自拍者通过控制进入自拍画面的内容和对自拍照片进行后期的修饰对其进行一定的解释，传达给观看者特定的意义，使观看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解释”，从而达到自己通过网络自拍进行自我表达的目的。同时，皮尔斯的“意义传递观点”认为，意义传递的过程并不是某个特定意义的单向传递，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人们把网络自拍作为符号并赋予其一定的意义以塑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上传至社交网络与他人进行意义的交换，即自拍照修饰成希望其他人看到的样子表达自己在自拍中赋予的意义，分享之后收到他们的评价也就是意义的反馈，是一个自拍者与观看者进行互动的过程。

## 二、网络自拍对自我认同的构建

弗洛伊德提出“认同”(identity)一词，指个人与他人、群体在情感上、心理上逐渐趋同的过程，是个体产生情感联系的最原始状态的表现形式。自我认同也叫做“自我同一性”，是对个人的内部状态和外界环境的认识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性。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的人格理论时多

次阐述自我同一性这一概念，并将其解释为个体对自身的评价和对未来的设计与社会的评价和要求的协调一致。网络自拍对自我认同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自拍具有自我认知的功能，当自拍者在审视自我的图像时，实质上是站在一个作为客体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进而对自我形成一种判断和评价，这时作为自我的主体性就被建构起来；当自拍者对自我的形象不够满意时，便会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形塑，在这个过程中自拍者不断进行修改以完成对自我形象的构建，直到展示出来的自拍是符合自己理想化的形象，自拍者的自我认同也就随即被构建出来。

### （一）视觉符号化的自我表达

#### 1. 身体与符号

在网络自拍中，自拍者的身体往往是自拍照的主体。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网络自拍塑造出虚拟化的身体形象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自我表达，自拍者以身体作为表达自我的符号，这与自我认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安东尼·吉登斯在考察自我认同与身体的关系时指出“自我是由肉体体现的”，把身体看作“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在网络自拍中，身体不仅是一种物理实体，而且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在自拍者进行自我身份构建的行动中通过主观控制衣着、妆容、五官的方式被赋予符号化的意义，这种意义蕴含于“晒”自拍的实践之中。

#### 2. “晒”强化了自我表达

通过自拍进行的自我表达，关键之处不在于照片本身，而在于将其“晒”在网络之中的行动。“晒”是伴随网络社交媒体的日益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行为，字面意思指物品在太阳下晾干暴晒，延伸意义为“秀”（show），有展示表演之意。随着“晒”这一行为的活跃出现了一群网络“晒客”。“晒客”源自于英文单词“share”、“sharer”的音译，就是指乐于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我的一群人。“晒客”们热衷于自我表露，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文字、图片、音视频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展示自己，获得展示和表演所带来的满足感，并且帮助他们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互动。通过网络自拍进行自我表达的“晒客”通过“晒”这一动作可以大大强化其自我表达的效果，一张网络自拍从拍摄、修饰、到发布在社交网络中，并没有结束其使命，“晒”自拍最重要的是发布者所期待的反馈，这是用来检验自拍者自我表达效果的关键指标，而“晒”这一动作是能够得到反馈的重要前提。

### （二）自我呈现中的技术驱动

#### 1. 技术发展带来权力的转移

清华大学教授彭兰将自拍称作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的“自我技术”，而影像技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对这种“自我技术”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新媒体时代的影像技术和传播技术得到了空前的进步，“网络自拍”这种“自我技术”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同时也对人们的自我呈现提出了区别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要求，即适应镜头的能力。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的自我呈现往往依靠的是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文本的描述，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主要依靠镜像，对于向陌生人的自我呈现或是口耳相传或是画师的手笔，即使是在相机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自拍这种自我呈现的技术也是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能拥有的特权。

与网络传播技术、自拍和修图技术伴随而来的网络自拍技术开启了普通人进行自我呈现的新纪元，镜头从他人手中转移到自拍者自己的手中，普通人不仅能够游刃有余地适应镜头，并且能在“美颜”过程中享受最大化的身体主宰权。同时，网络自拍使草根阶层拥有成为形象上的公众人物的权力，也就是说，人们对自拍者的认知不再仅仅局限于他人的述说或是枯燥的文本，而是可以通过逼真的照片，并且自拍者拥有了对照片进行编辑和修饰的技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拍摄技术、美图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被巧妙地融合在手机这一载体之中，以一种几乎没有任何技术门槛的“傻瓜式”操作方式运行。自拍者通过智能手机就可以同时拥有拍摄、修饰和传播这三项权力，技术呈现的特权由社会精英转移到草根阶层的手中。

#### 2. 复制技术带来标准化审美

人们发布网络自拍，不论是晒相貌身材、塑造一种“在场感”还是表明关系，实则都是在完成个体审美和期望符合他人的审美，也就是完成客观世界给主观感受带来一种愉悦感。然而，网络自拍技术使人人都有相似的自拍照，发布网络自拍完成审美动作所带来的愉悦感在复制技术的裹挟下越来越视觉化、标准化和单一化，这似乎契合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批判。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将艺术生产工艺化或制作化，认为可量身定做、机械复制、批量生产的艺术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有学者将网络自拍视为后工业时代的网络亚文化进行考察，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审视网络自拍现象时，不难发现如今的网络自拍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美得千人一面，“颜值”一词就是最好的体现。“颜值”暗示了美是可以用数值来衡量的，框定了关于美的评价体系，数值越高就越接近标准化的美。网络人像自拍可以通过对五官和形体的修饰提高自拍者的颜值，增加自拍者对其外貌的视觉愉悦感。这种视觉愉悦感使人们过度追求标准化的美而忽略了对多元化的美的追求，自拍者可以享受通过技术创造的视觉愉悦感。

### （三）自我呈现中的个性与去个性

网络自拍技术使自拍主体在网络社会中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有了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所说，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数字化时代人们似乎能够成为有个性的“个体”，然而，网络自拍真的带来了个性化的传播与表达么？笔者认为如今过度泛滥的网络自拍在表面上看似乎给了所有人表达个性化“自我”的机会，但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是对个性化的抑制和削弱，个性化的自我表达越来越呈现出“去个性”的特点。

首先，从网络自拍生产的审美角度来看，人们（很大一部分女性用户）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拍照无论初始形态如何，最终“晒”出来的照片看上去似乎都是同一个人，小脸、大眼睛、尖下巴、高鼻梁、洁白无暇的皮肤，尽管很多人对“网红脸”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但这些相貌特征与所谓的网红脸恰恰是及其相似的，说明这类相似的五官特征在大众审美中仍然被认为是“美”的，最起码是同一化的“美”，是“去个性”的“美”。

其次，从网络自拍生产的技术角度来看，网络自拍中个性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各一系列技术手段，而技术往往是呆板的、缺乏个性的，技术处理使得人们改变自拍中自己的形象更加方便快捷，同时也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

最后，从网络自拍传播的社会角度来看，人们在进行自拍照片的分享活动时，实质上是以获得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同为主要目的。此时，自拍照片成为一种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为了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交圈子，晒出来的网络自拍往往需要参照公众审美和社会判断的标准，符合当下“颜值评价体系”中的形象建构，而这一评价体系在大众审美的影响下，对美的评价是同质化的。人们为了能够符合这一评价体系，往往在潜移默化中为了符合群体对美的评价标准，舍弃了自己的个性特征。福柯分析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认为这是一种“凝视”，“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都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人们屈从于群体的“凝视”使自拍符合群体审美，产生“颜值崇拜”现象，致使个性的逐渐丧失。

### （四）自我呈现的心理动因

#### 1. 虚化的自我展演

网络自拍中所展示的自我形象往往是真实与虚拟交错的，也可以说是虚化的自我展演。自拍者在发布自拍时往往声称其照片的真实性，实则只有部分真实，如外貌展示型自拍惯常是经过人为美化，大眼、瘦脸、美白再加上滤镜和特效，实际上已经较之原图相去甚远；身体在场型自拍可以是经过场景的摆拍来表现出一种虚化在场感；关系表达型自拍可以是与他人物品合拍使观看者造成该物品属于自拍者的错觉等等，这些自拍都是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而表演或多或少是虚化的。这种虚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自拍者的自我成就感，真实世界中无法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能够在网络自拍中轻而易举地实现。当由这种虚化形象所构建的自我展演占据自拍者的真实生活时，那么真

实形象则可能被虚化形象所遮蔽。虚化成为貌似真实的存在，或满足自拍者对更好的自己的幻想，提高自信心或满足虚荣心，或满足其炫耀的心态，促使自拍者更加乐于建构虚拟化的自我形象。

## 2. 群体认同的自我表演

欧文·戈夫曼提出“拟剧论”，认为生活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进行着“表演”。人们通过自拍这种视觉符号在社交网络这一舞台上进行的表演，其目的是赢得观众的认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各种类型的网络自拍，可以看作是一种展示在前台的自我表演。由于媒介呈现属于前台部分，不能展现表演者的全貌，所以自拍者可以在后台操控关于自己的信息，制造出迎合群体审美的自我形象。比如，一桌高级餐厅的美食配以海边度假的背景再加上精心美颜的五官，就创造出小资情调的自我形象，足以引起其他小资群体的共鸣。自拍者通过各种道具向观众展现自我以寻求群体认同与归属，发布精心制作网络自拍获得好友或陌生人的点赞和评论可以消除个体的孤独感、寻求情感的共鸣，在心理上获得群体归属和情感支持，形成“自己人”的圈子，增强自拍者的自信心和安全感。

## 3. 自我焦虑的调适

人都是有“虚假自我”的，著名心理学家希金斯（Higgins）在 1987 年提出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把自我划分为现实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应该自我（Ought self），人们常将三者进行比较，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不一致时会引起失望和抑郁，实际自我与应该自我之间的不一致将导致紧张、焦虑和内心疚感，自我差异也就随之出现了。在自我差异出现时，人们往往难以进行自我认同而产生自卑情绪，处于自我焦虑的状态。当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被外界定义，产生认同艰难的焦虑而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时，人们倾向于使用印象管理的策略进行自我美化，通过晒出网络自拍在他人面前构建出“理想自我”的表象，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自我焦虑感的调适。

# 三、网络自拍中自我认同的偏差与辨正

## （一）摆脱“颜值”崇拜，谨防自拍成瘾

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自拍体现出当今社会日益严重的“颜值”崇拜问题日益严重，许多网络自拍者为显示自我“颜值”高而沉溺于网络自拍，是一种自恋心理的体现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瘾”。《国际心理健康和成瘾期刊》（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过度自拍可能是一种精神障碍，研究者把这种障碍称为“自拍成瘾”（Selfitis）。过度频繁的网络自拍会导致过度炫耀和对他人认同的极度心理依赖，甚至造成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在日常生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当朋友圈的某个人过于频繁发布自拍（尤其是处于炫耀其“颜值”目的），他人或许会采取屏蔽的方式拒绝做一个被动的观看者。当过度频繁的自拍受到排斥时，那么自拍者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失败的。

过度自拍者应该把握自拍的分寸，跳出被异化的大众审美的框定，摆脱“颜值即正义”的狭隘信条，适当减少上传网络自拍的频率，谨防“自拍成瘾”。

## （二）悦纳真实自我，增强自我认同

社交网络上虚化自我形象在构建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能够强化群体认同，但长期的虚化形象也会加剧自我认同的危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巴拉克里斯兰在调查研究中指出，极度自卑、孤独、不能悦纳自我的人，他们更加渴望获得关注，融入群体。由于现实生活中怯懦于进行自我展示，而网络自拍能够恰好成为弥补自尊心和情感空白的方式，因此他们依靠网络自拍悦纳虚化自我，而真实自我愈发受到冷落，对真实自我的接受就变得更为艰难。网络自拍依赖于高仿真的自我形象与他人进行互动，用美化的面具来维持自己的社交关系。实际上，网络自拍里的形象越是美化，就越是提高了理想自我的标准，使得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越来越大。半虚拟化的形象存在的时间越长，展示的频率越高，人们就越难以摆脱对“美化的自我形象”的依赖，一旦回归真实的自我形象，就难免产生难以接受的抵触情绪，提高了自我厌恶的水平，产生认同危机，造成自我的异化。



这就造成了自我认同的怪圈：沉溺于半虚拟化自我-面对真实自我时产生失望和厌恶情绪-更加渴望半虚拟化自我来维持自我认同。

所以，当意识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时，人们应该认清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更应该用实际行动接纳真实自我并改善真实自我，以缩小与理想自我的差距，进而增强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认同。

### （三）明确边界意识，强化隐私保护

网络自拍同时也是一种观看者窥私欲和自拍者暴露欲的相互满足。窥私欲是人类正常的心理需求。虽然人们会因为担心自己的隐私被窥探而惴惴不安，但当人们在窥探他人隐私时却能够产生控制的快感，在社交网络上浏览他人的自拍，从中窥探他人生活的蛛丝马迹，甚至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愉悦感。而有些人的自拍也是其暴露欲的驱使，最典型的就是对肉体的暴露，比如近年来网络上泛滥的女性自拍照中露胸露腿等以博取他人的关注，从而满足暴露自己的快感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自媒体时代，即使不是人为在网络自拍中展示个人信息或隐私，也会有隐私泄露的风险。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自拍中塑造完美的形象时，往往很容易对自己的个人隐私失去控制。

网络自拍使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网络自拍更应该理性地处理好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关系。自拍，实质上是一种自曝隐私的行为，而这种自我暴露应该存在于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之内，每个网络自拍发布者都应当明确隐私暴露的边界，强化自我隐私保护意识，珍惜个人隐私。

## 四、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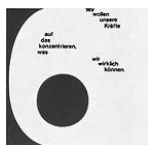
网络自拍的技术属性和社交属性帮助人们制造出符合幻想的虚拟形象，人们通过自拍并上传至社交网络，无论是展示美化的外貌形体，还是宣告自己的身体在场或者表示自拍中的关系，目的都是使个人形象的建构充满美学化的色彩，用虚拟的幻想获得自我认同的自信心。人们从拍摄、修饰、分享和获得反馈的符号化叙事过程中获得视觉符号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而这种符号化的叙事包含了诸多对自我形象的幻想，也带来了自拍成瘾、加剧对真实自我的认同危机、丧失个性和隐私泄露的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不仅需要摆脱“颜值”崇拜、增强对真实自我的认同、厘清私人空间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更需要每一位自拍者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合理利用自拍展示理想化自我，从虚拟化的自我形象中醒来，不断从现实中改善自己、提高自己。

###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 Balakrishnan / Mark D. Griffiths, 2018,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elfit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 [2] Selfitis Behavior Scal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2018) 16. (<https://doi.org/10.1007/s11469-017-9844>)
- [3] 孔祥娜，2005，《大学生自我认同感和疏离感的研究》，《河西学院学报》第3期。
- [4] 米歇尔·福柯，2007，《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 [5] 尼葛洛庞帝，1997，《数字化生存》，海口：海南出版社。
- [6] 欧文·戈夫曼，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7] Oxford Words Blog. The Oxford Dictionaries Word of the Year 2013 is Selfie [EB/OL].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3>.
- [8] 彭兰，2018，《自拍：一种纠结的“自我技术”》，《新闻大学》第5期。
- [9] Souza, F. 2015, Dawn of the selfie era: the who, where, and hows of selfies on Instagram, In Proceeding of the 2015 ACM on conference o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 [10] 王玲宁、兰娟，2017，《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一项基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2期。

☆ 作者简介：田晓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白静艳



## 科学世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探究：关系与方法

马超群

### 一、理解舒茨的关键线索：生活世界-科学世界-社会科学方法论

日常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关系是理解舒茨思想的关键线索。《论多重现实》一文延续着舒茨早年的学术关怀，即为社会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舒茨深受韦伯思想的影响，并对其构建的“阐释社会学”赞叹不已。但舒茨认为，韦伯更多关注于现代社会的具体问题，对社会科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探讨则少有兴趣。胡塞尔现象学为舒茨建构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不同于胡塞尔力图剔除各种经验材料指向内在的“先验自我”，舒茨更关注于这些“自我”间的关联性，即外在世界的主体间性，尤其是以此为基础运作的生活世界。此外，“流亡”到美国的舒茨受到了心理学家詹姆斯的影响。詹姆斯通过分析我们对实在的感觉指出，实在的起源源于主观的兴趣（注意），这种兴趣的背后有着我们自身和物的连结（人与对象的意向性问题），不同的连接也就出现了不同实在的秩序，即“次级宇宙”。舒茨并没有全盘接受詹姆斯的观点，而是认为实在秩序的关键在于意义而不是结构。至此舒茨提出了多重现实，每一重现实就意义而言都是一种有限的意义域，他们有不同的认知风格，但就主体的感受而言他们都是“现实的”。通过对多重意义域的建构，舒茨也找到了为社会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理论基础的路径，即舒茨的提问，人们怎样才能通过客观的知识系统来领会主观的意义结构呢？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日常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关系找到线索，即回答“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之高无上的现实性，那么科学世界如何探究它呢？”。

理解舒茨对两个世界的关系的揭示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开始。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源”，之后亚里士多德将其解释为“万物从水中来，又复归于水。”虽然这个质料论与舒茨的理论并无关系，但就命题的形式而言，我们可以将舒茨的主张理解为“科学世界是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来，又要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一方面日常生活世界是科学的母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世界获得了基本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跳跃”到科学世界；另一方面，科学世界的成果必须要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这正反映了胡塞尔对技术支配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

### 二、作为“至尊现实”的生活世界与“准现实”的科学世界

现实的多重性。舒茨对实在的分析始于詹姆斯的次级宇宙”理论，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的篇章中指出，实在仅仅意味着与我们情感生活和主动生活的关系。全部实在的起源都是主观的，无论激发出我们的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它都是真实的。说一个事物是真实的，意味着这个事物处在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系之中。因为我们对对象的关系形式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现实秩序，詹姆斯称之为“亚宇宙”。但是舒茨并没有照搬詹姆斯的理论，而是认为，正是我们各种经验的意义而不是客体的本体论结构构成了实在，所以用有限意义域来代替次级宇宙，以凸显经验所表现的特殊认知风格。舒茨进而指出，实在是多重的而非是单一的，这些现实包括日常生活世界、梦的世界、幻想的世界、宗教体验的世界、科学静观的世界等。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种“至尊现实”，其它的世界都是一种“准现实”。日常生活世界可以从交互主体性和自然态度两个方面来理解。舒茨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

互为主体建构起来的。这个世界不是个体私有的，而是为人们所共享。舒茨在此特别关注了沟通的机制，即解释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同时性互动构成了一种“我们关系”，通过沟通“我们一起变得老练。”舒茨的交互主体性不仅关注现在的“我们”，而且关注以往的经验的结构，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比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的社会，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是以这些以往的经验为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舒茨认为日常生活世界另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处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秉持自然态度行事。他们只是去做，而不去怀疑，尤其是在工作世界（在日常世界中力所能及的，最核心的部分）中。他们对实践有着清醒的注意，但是缺乏一种理论的兴趣。日常生活至高无上的现实性就是由这两方面所决定，瑞泽尔指出，它（生活世界）是我们经验现实的原型，所有其它的意义领域可以看作是它的变型。除此之外，舒茨具体论述了幻想的世界、梦的世界以及科学的静观世界，在这些世界中认知风格中，我们都无法与他人进行沟通，所以，其它实在被舒茨视为一种“准实在”。对于科学世界而言，生活世界具有奠基意义，它是科学的起点，是科学建构实在的基础，所有科学及问题都从这里产生，并且也只有在这一领域才可能获得解决。生活世界与科学的静观世界作为两种不同的意义域有其独特的认知风格，舒茨指出了二者之间一些关键的区别。第一，两个世界的目的不同。日常世界中的人采取了一种实用动机，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取向的，体现为一种实践的兴趣；而科学世界中的科学家则保持了一种客观中立观察者态度，并不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介入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体现为一种理论的兴趣。第二，两个世界对知识的理解有所不同。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知识，但知识（窍门）在需要时便随时可以使用，除非出现一种与以往经验不一致的陌生情境。而科学家的知识则来源于学术共同体所享有的知识，他们对自己掌握的知识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些方面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探寻科学世界如何研究生活世界的方法。

### 三、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探究：自然态度的悬置与构建理想类型

从生活世界向科学世界“跳跃”需要悬置自然态度。科学世界来源于日常生活世界，所有的科学思想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经过检验的观察，也就是说，来源于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对事实的最初经验。但科学世界因其累积的知识系统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认知风格，“它不为任何实践意图服务，它们不与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这种进行理论化的自我是孤独的，他不具有社会环境，它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外。”舒茨指出，两个世界不能通过某种公式进行转化，而只能通过“跳跃”实现两个世界的沟通。舒茨并没有具体阐释这种“跳跃”的机制，但从对科学静观世界的描述来看，这种“跳跃”总体表现为一种自然态度的悬置。正如上文所述，人们在生活世界依据实用主义的自然态度行事，关注实践效果忽略理论沉思。在舒茨看来，行动与反思必然是分离的，舒茨通过时间的性质建构了“单纯地做”与“单纯地思”两种类型，指出只有停止了目前的做，才有可能进行思。这种思集中体现在理论静观的世界里，在这个理论世界里，科学家摆脱了日程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为了具有恰当的科学态度，社会科学家必须与他们所研究的那些生活世界相分离，以非实用的态度投入科学世界中，而且必须将他们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平情境悬置起来。

在澄清了社会科学家在科学世界里所需秉持的态度后，舒茨继而提出两个关于科学如何探究生活现实的问题：（1）进行理论化的孤独的自我，怎样才能找到通向这个工作世界的入口，并且使这个世界称为理论静观的客体呢？（2）理论思维怎样才能得到沟通，理论化本身怎样通过主体间性进行呢？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舒茨关于两个世界关系的辩证法，即科学如何从生活中来，又如何回到生活中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理性类型的建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科学必须要回到生活世界进行沟通，因为科学世界并不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一个不太准确的形式就是，做研究如何既要“进得去，又要出的来。”

舒茨不仅指出了科学家进入科学世界所需要秉持的态度，还指出了科学家在科学世界所要进行的具体工作，即构建理想类型。通过构建理想类型，舒茨从而解决了社会研究中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悖论。舒茨首先从处在两个世界中的人们认知特点的共同特征出发，即两个世界的人们都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取得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这种类型化得以成立的基础就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构建的类型是

真实的。舒茨将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称为一级构造（first order construct），将科学世界的类型化称为二级构造（second order construct）。在生活世界中，人们有着丰富日常知识的积累，这些知识是不自觉的，也是不系统的，但舒茨指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知识的构造。而在科学世界中，社会科学家要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构造的基础上进行再构造，也是这种在常识基础上进行的构造，使科学称为可能。更为精彩的是，舒茨指出，社会科学是通过构造一种“傀儡”来替代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行动者。“这种模型不是不是和那些通过其充分人性存在的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和各种傀儡、和各种类型生活在一起，它们是被这样构造的，似乎它们能够进行各种工作行动和反行动。当然，这些工作行动和反行动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它们不像意识自发性的各种表现那样来源于活生生的意识，它们只是由于社会科学家的恩惠才被赋予这些傀儡的。”在提出通过理想类型的构建来理解社会生活的设想之后，舒茨接着提出了理想类型构建的基本假定，来具体处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第一，关联性假定。正如胡塞尔所呼吁的那样，科学应该关切现代人自身命运，而不是构造一个生活世界不可及的世界。生活世界是科学的基础，科学世界探讨的主题必然要和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处境和意义相关。第二，适当性假定。科学在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建构，所以需要保证这两者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第三，逻辑一致性假定。既然是科学的建构，就必然要符合逻辑的清晰、一致和自洽性。第四，相容性假定。社会科学家所建构的知识类型必须能够与以往的知识积累能够对话。第五，主观解释假定。社会科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生活世界的人们的主观意义之上。上述五项假定中，前两项和最后一项阐释了解释社会学与日常生活常识基础的关联，保证了解释社会学的“解释性”；而第三和第四项则明确了解释社会学中的科学认识论基础，保证了解释社会学的“科学性”。

科学世界的理论沉思并不与生活世界相分离，而是要回到生活世界。首先，社会科学家在科学世界的工作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只有通过沉思才能进行理论化的建构。其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世界进行工作，是基于他人的理论静观能够称为我们所理解的假设，并且由后来的科学家证伪或证实。然而，这种相互证实和相互驳斥、相互赞成和相互批评预先假定了沟通，而沟通却只有在这种纯粹理论领域之外、在这个工作世界中才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任何理论唯有在可以沟通的世界中才得以可能，合作与交流是科学活动自身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必须回到生活世界进行检验而不是完全停留于一种理论的沉思。所以，社会科学家需要在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来回切换，与科学家群体与普通人进行沟通。而这种切换的前提在于人内在时间的意识流，它可以使人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在多个世界中“跳跃”。最后舒茨指出了这种回归的更高目标，即将“思想家充分的人性带回到理论领域中去。”

至此我们也能够理解现象学社会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证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唯一的实在，并且这个实在是可以被认识的。实证主义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打磨工具，以更为精准的方式映射出这个唯一的实在。然而，在舒茨看来并不存在唯一的实在，实在是多重的。于此同时，也不存在一种方式可以把实在完完全全的反映出来，舒茨通过构造理想类型的方式，用“傀儡”来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而这个“傀儡”也只是社会科学家所根据常识构造的理想类型，现实中并不存在与之一一对应的现象。

#### 参考文献:

- [1] 乔治·瑞泽尔，2014，《古典社会学理论》，王建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2] 阿尔弗雷德·许茨，2001，《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3] 杨善华主编，1999，《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马超群，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岚茜

# 舒茨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意义

刘青青

---

**摘要：**行动及其意义研究始终是社会学探讨的重要议题。舒茨认为，日常生活世界具有至高的现实性，本文借助《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看医生”这一案例，从行动的视角出发探究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得出如下启示：行动者通过“手头库存的知识”进行行动的选择；在主体间际的世界，个体通过互换视角和互换理解来经验对方的行动，从而理解对方的行动意义。最后，作为研究者，不但要遵循关联性假定和适当性假定，主动感知研究对象的行动的意义脉络，在一级构造的基础上建立二级构造，也要遵循逻辑惯性假定和相容性假定，“悬置”自己的理论预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观察生活世界中成员以何种方式对其据以为真的事物和事件进行主观构建，避免对研究对象产生干扰，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科学研究。

**关键词：**舒茨 现象学社会学 行动 意义 诠释

---

“至于我的结果，我不敢保证是最好，其他人也许会做得更好。但我坚信一件事，我所探索的这些问题正是社会科学应该解决的问题。”

——Alfred Schutz

## 一、研究缘起

自韦伯提出解释社会学以来，如何诠释行动的意义一直是社会理论家关注的重点问题。韦伯本人认为，意义是社会学在考察社会行动时的着手点，他将意义区分为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提出当观察者试图把握一个行动的意义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借助直接观察，二是通过考察动机进行说明性理解。韦伯将上述有关社会行动、意义、理解的论述视为解释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奥地利裔美籍哲学家、社会学家舒茨在对韦伯解释社会学的“细读”和批判基础上，将行动的意义分析作为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的出发点。舒茨认为韦伯所提出的概念存在许多模糊之处，社会世界中的意义问题远比韦伯设想的复杂得多，因此，有必要对意义的结构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他借助柏格森的生命流程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之后，舒茨的学生伯格和卢克曼发扬了舒茨的思想，进一步探讨实在的社会构成。舒茨的思想通过他们的学说对美国主流社会学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除此之外，加芬克尔、布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重要的社会理论家都对舒茨的思想有所研究。可以说，舒茨的著作已成为社会理论的经典文本。

近年来，国内对舒茨思想的研究不断增多。涂纪亮先生所著的《美国哲学史》中曾用不多的篇幅介绍了舒茨的思想，这应该是国内较早对舒茨的引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霍桂桓先生陆续翻译了舒茨的主要著作《社会实在问题》、《社会理论研究》、《现象学哲学研究》，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舒茨的思想，尤其是有关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孙飞宇等学者对舒茨的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的结构、行动意义的赋予和现象学方法等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然而，中国社会学界试图将社会学应用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以指导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尚有不足。杨善华在这一方面有所尝试，他将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田野调查中，探讨舒茨的“意义关联”、“日常生活世界”、“我群关系”等理论概念对于定性研究的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中“看医生”这一日常生活事件为例，结合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的意义进行分析，探寻进而探讨舒茨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与启示。

## 二、案例：《不平等童年》之“看医生”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一书，通过考察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的生活，展示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上，并对塑造孩子性格，获取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在“看医生”这一片段中，作者以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亚历山大·威廉斯与贫困工人家庭出生的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进行对比，两个小孩年龄一般大小，面对同一件事情——“看医生”，表现却有巨大的反差，这与父母教导、语言训练等过往经济紧密相关。

### （一）中产阶级家庭“看医生”过程

在去医生办公室的路上，中产阶级家庭的母亲威廉斯女士教导亚历山大如何在常规检查中自信地面对医生。

**威廉斯女士：**亚历山大，你得想想要问医生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

**亚历山大（想了一分钟）：**我用了除臭剂之后腋下就出现了几个肿块。

**威廉斯女士：**真的吗？你是说用了新的除臭剂之后？

**亚历山大：**是呀。

**威廉斯女士：**嗯，你应该问问医生。

亚历山大的母亲教导儿子，他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例如，“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最重要的是，她在为她示范如何通过提前理清思路来准备面对一个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在诊所看医生的时候，母亲和儿子都有机会去激活他们在之前谈话时明确的这些社会地位资源。

在看医生过程中，当医生说到亚历山大的身高在第九十五个百分点时，亚历山大敢于中断医生的权威。

**亚历山大：**我在干什么？

**医生：**这个的意思是说，在包括你在内的一百个男孩子中，你比九十五个小男子汉在，嗯，10岁的时候都要高。

**亚历山大：**我还不到10岁。

**医生：**啊，他们作图时把你算成了10岁。你有9岁零10个月。他们通常选最近的年龄来作图。

中产阶级父母更鼓励孩子感到自己作为个体的重要，并肯定他们有权利对大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主意。亚历山大更正医生时（“我还不到10岁”）的轻松随意，更进一步表明这个孩子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当话风转到亚历山大的饮食上，与专业人士交流中这种自如感的价值得到进步强化。

**医生：**你吃水果和蔬菜吗？

**亚历山大：**吃呀。

**威廉斯女士（尖声地）：**噢……？

**医生：**我看到了不同意见了哦。（笑）

**亚历山大（提高了嗓门）：**你每天午餐都给我吃香蕉什么的。而且昨天的晚餐我吃了卷心菜。

**医生：**你是每天至少会吃一到两种水果和一到两种蔬菜吗？

**亚历山大：**是呀。

**医生：**将将够，是吧？

**威廉斯女士：**他大多数时候吃得还不错。

**医生：**好吧，我觉得还凑合。

这种诚实是一种资本形式，因为这样他们就给了医生确切的信息。当威廉斯女士透漏自己对一种药物“放弃了”的时候，社会地位资源再一次被激活。医生和蔼愉快又清楚明了地建议她要再坚

持服用一段时间，并没有直接命令她执行一个必要的医学举措，从而承认了威廉斯女士拥有的相对权利。而威廉斯女士也就接受了他对药效的解释，并表示愿意让儿子坚持服药。

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亚历山大和他妈妈一样在与医生的谈话间进行着这种交换互让，努力去“用户化”自己和医生在一起的时间。当他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问医生自己腋下的肿块时，他得到了医生全心的关注，意味着得到了医生暗含的承认：这说明他的状况是个正当话题并值得考虑。

**医生：**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在做检查之前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亚历山大：**嗯……只有一个问题。我腋下长了一些肿块，就在这儿[指着腋下]。

**医生：**下面？

**亚历山大：**对。

**医生：**好的，我需要在做细致检查的时候仔细看看。我会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再看看我能怎么治疗。这些肿块是疼还是痒？

**亚历山大：**不疼也不痒，只是有这些肿块。

**医生：**好的，我会给你检查的。

在结束时，医生转向亚历山大的母亲，问道：“您有什么问题或疑虑吗？”威廉斯女士回答：“没有……他表现不错，很有进步。”这一方面表明她对儿子的肯定，另一方面强调了威廉斯女士和医生之间相对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段权威人士和下属之间的交流。

## （二）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看医生”过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的母亲麦卡利斯特女士带儿子去看医生过程。通常很喧闹的麦卡利斯特女士变得十分安静，说话声音很小，回答医生的问题也很困难，有时她并不明白医生在说什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麦卡利斯特女士并没有像威廉斯女士一样训练儿子在权威人士面前表现出自信，也没有帮儿子准备见到医生以后要说什么。

**医生：**他每天都吃些什么——鱼，肉，还是鸡蛋？

**麦卡利斯特女士（她的回答声音很低又很弱）：**是。

**医生（试图做眼神交流，但没有成功，因为妈妈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检查表）：**黄色的蔬菜？

**麦卡利斯特女士（仍然没有眼神交流，朝下看着）：**对。

**医生：**绿色的蔬菜？

**麦卡利斯特女士（看着医生）：**不是总吃的。

**医生：**不常吃。那水果和果汁呢？

**麦卡利斯特女士（声音很低，没有眼神交流，眼睛盯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填写的潦草字迹）：**嗯，嗯。

**医生：**他每天喝牛奶吗？

**麦卡利斯特女士（很唐突地忽然用很大的声音）：**喝。

**医生：**麦片粥，面包，大米，土豆，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麦卡利斯特女士（摇摇头，看着医生）：**有，当然也吃。

在此短暂的交流过程中，哈罗德一直保持缄默。当医生问他：“你在学校上几年级了？”像母亲一样，他用很安静很低的声音说：“四年级。”但是当话题转到体育运动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大了许多，变得自信又热情。

从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情境分析中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和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在看医生过程中的表现与其生活经历和语言世界密切相关。书中讲到，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同孩子进行广泛的说理、提问、对观点的探究和对回答的倾听。这样的训练帮助亚历山大和其他中产阶级孩子发展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参与意见，提出特别的要求，对他人进行评判，并给成年人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得到重视，以至于在“看医生”中表现自如，懂得表达自我诉求。和亚历山

大相比，哈罗德并没有发展起巨大的词汇量，没有与日俱增的科学知识和政治见识，没有一套帮他去“用户化”家庭以外各种境遇的工具来让他最大限度地获利，也没有人教他如何运用证据为自己的论点来辩护。这体现在“看医生”过程中一方面，哈罗德全程沉默，由母亲代为与医生交谈；而另一方面，当医生试图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起初也表现出对权威人士的唯唯诺诺，而这种表现也是贫困工人阶级的母亲的性格在孩子身上的映射，当问到他的兴趣点，才敢于侃侃而谈。

### 三、日常生活世界行动的意义

如上述案例所示，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都经历“看医生”这个事件，在与医生互动过程中却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方式。他们不同的行为反应与其生活经历和语言世界背景密不可分。换言之，同样的事情，同样日常生活事件，在拥有不同经验或语言背景的行动者眼里，会做出不同的行为，产生不同的效果，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所要探讨的问题——日常生活世界行动的意义。生活世界是舒茨晚期思想的主要着眼点，笔者结合“看医生”这一案例，运用舒茨的理论对行动的意义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 （一）“我”如何赋予自我行动的意义

舒茨指出，人的行为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持续意识过程，是具有时间性的，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已经完成的所作所为，是已经冻结的、空间化的。舒茨将前者称为“行动”（action），而后者称为“行事”（act）。另外，行动的筹划也是一种虚拟的、幻想中的“行事”。

当“我”处于“行动”状态时，“我”就沉浸在绵延的时间流中，是不可能发现任何清晰的、可互相分辨的经验。而一旦当“我”意识到这一绵延，这种意识本身就使我脱离了这种时间流，使我借助时间的回溯，通过反思的态度，关注“我”的体验，区辨、挑选、勾画经验，从而使持续的意识流转化为冻结的、空间化的完成状态，将“行动”构成“行事”，最后从中构成行动的意义。

这些意义不断积累增长，就组成舒茨所谓的“手头的库存知识”（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借助这些“库存知识”，处于自然态度中的普通人的所有过去经验就都获得了有序的安排，而这些安排的基础就是各种意义构造形成的秩序模式。舒茨称这些模式为经验图式。这种经验图式尽管曾经是意义构成过程的产物，但普通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这些构成过程，将构成的结果看作想当然的客观意义联系。而他们正是借助这些经验图式赋予行动意义。

在上述案例中，面对同一个事件“看医生”（这里我们假定所有医生对待不同的患者具有相同的态度），两个被调查的家庭在与医生沟通中呈现不同的反应，这源于不同阶层的家庭根据以往的经历和语言知识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因此，在他们的行为表达背后存在着某种规定性的因素，当行动者面临一个新的情境时，其实他是将自己“手头的库存知识”和过往经历带入到现实问题应对中。

#### （二）“我们”如何理解对方行动的意义

“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完全得到限定、并且具有明确属性的客体构成的世界。我们在这些客体中间运动，它们抵抗我们，我们也可以影响它们。人们通过“自然态度”把这个世界当作一种实在来经验，对它具有突出的实践方面的兴趣，这种兴趣是由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必然性造成的。舒茨认为主体间的互动交往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对世界的怀疑存而不论，在一种自然态度下行动，而舒茨正是要揭示被“自然态度悬置”的世界。

舒茨认为韦伯没有认识到每个个人的意识流——也就是每个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的意义——在本质上是其他人无法进入的。要理解这种意义，必须和他人一样处于他生活的意识流中，去对他的经验“赋予意义”，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意味着普通人之间无法相互理解，解释社会学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这里舒茨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说他人的体验对“我”是完全封闭的，也不意味着他人的行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不可理解。这种洞察力只是告诉我们“我赋予你的经验的意义，不可能与你在解释这些经验时所赋予的意义完全一样”。换言之，自我的意义确立过程和对他人经



验的理解涉及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即基于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生平情境所形成的不同的经验图式和解释图式。

那么不同的人之间是怎样沟通的呢？舒茨发现，当我们在理解他人的行动（比如言语）时，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情况，我们关注的焦点可能会是言说者的身体运动、声音，他的言语的字面意义，以及言说者的意图。舒茨认为，只有当我们发现了他人的意图时，才算是真正的理解。在这种理解里，在言语的字面意义之外，我们还触及到言语所体现出来的言说者本人的主观经验，正是这种经验赋予言语（或行动）以“表面意义”之外的附加意义。

真正的主体间性的理解涉及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沟通意图，另一种是具有沟通意图，使用符号理解。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所把握的意义都介于纯粹的客观意义和绝对的主观意义之间。一方面，我们既不可能达到他人意想的主观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重视他人的意义构成过程，只可能面对该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只停留在客观意义的层面上，因为在舒茨看来，不触及他人的主体经验的意义理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理解。

案例中，两个家庭根据自身所处阶级的行为习惯“看医生”，做出自己对“看医生”这一事件的反应，那么医生如何解释对方所表达的语言和行为呢？医生是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父母和孩子的语言表达、表情和行为而做出与之相对的反应。为威廉斯检查的医生通过孩子母亲积极配合的交流，给予更丰富细致的医疗建议，为哈罗德检查的医生在几度和母亲交流无果后，草草结束了谈话。我们可以发现，人与人互动过程中，不仅分享时间共同体，也分享空间共同体，双方卷入共同的意识流中，处于共同的意义脉络。每个人根据他人的动机和目标，通过互换视角和互换理解来经验对方的行动，从而理解对方的行动意义。

### （三）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诠释行动者行动的意义

根据舒茨对多重现实的论述，科学世界也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有限意义域”。然而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是，科学理论工作可以完全不为任何时间目标服务，“它的目的不是掌握世界，而是观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理解世界”。因此，科学世界作为一个“准现实”，生活在其中的科学家就要采取与日常生活中不同的认知风格，“跳跃”到一个和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迥异的现实秩序中，成为“超然的观察者”，从而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所特有的悬置：将科学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主观性，将他触及的日常生活世界组织起来的取向系统和基本焦虑及其引发的关联系统统一概化在括号中。在此，舒茨实际上是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阐释韦伯有关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论述。

日常生活世界中普通人拥有大量的知识积累，这些就是普通人有关世界的构造。而根据舒茨对科学世界的分析，所有的科学构造原则上都要超越常识思想中的构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别。作为自然科学考察对象的那些事实和事件并不具有内在的关联结构，科学家分析的领域对于处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原子和电子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然而，社会科学家眼里的事实和事件则具有特定的意义结构和关联结构，普通人正是运用这些结构建立了对事实和事件的常识构造。而社会科学家进行的科学构造活动就要以这种常识构造活动为基础。因此，相比而言，普通人对社会世界的构造，就是一级构造，而社会学家的构造则是对社会行动者的二级构造。社会学科学方法论一方面要考虑社会科学的特点，在一级构造的基础上建立二级构造；另一方面又要遵循科学世界这个“准现实”的独特认知风格，保证科学家“超然观察者”的形象，使二级构造不受一级构造中的实践目标干扰。舒茨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关社会世界的科学构造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假定：

1.关联性假定（the postulate of relevance）：社会科学家的构造也受他们所创造的关联系统的现实，因此，社会科学家设想的各种类型必须符合关联性的原理。这一点实际上是韦伯所谓“价值关联性”思想的一个新表述。

2.适当性假定（the postulate of adequacy）：在构造有关人的行动的科学模式时必须考虑到，这些行动都是由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个人完成的，而这些普通人在完成这些行动时借助了他们自己能够

理解的类型构造。这一假定保证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构造和常识性的构造之间的一贯性（这一点是自然科学无需考虑的）。

3.逻辑一惯性假定（the postulate of logical consistency）：社会科学家设想的构造体系要具有最高程度的清晰性，要完全符合形式逻辑的原理（而日常生活中的库存知识并不具有这一特性）。这一点可以保证科学构造的客观有效性。

4.相容性假定（the postulate of compatibility）：社会科学家构想类型必须只包含那些科学上可以验证的假设，这些假设又必须与我们整个科学知识体系相容。

上述四项假定中的前两项阐述了解释社会学与日常生活的常识基础之间的关联，保证了解释社会学的“解释性”；而后两项则明确了解释社会学中的科学认识论基础，保证了解释社会学的“科学性”。可以看出，舒茨利用自己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强调了社会科学作为二级构造的特点，丰富并发展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在本文所提到的案例中，虽然没有写明研究者安妮特·拉鲁的表现，但是根据不同家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研究者没有对被研究者的正常生活遭到巨大干扰，“悬置”自我的理论假设，坚持中立客观，才有两个家庭“看医生”行为中表现出的逻辑性一致，与科学的相容性；另一方面，从书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研究者主动去感知被研究者行动，理解其行动的意义，所作出的解释符合一般性关联性假定和适当性假定。

#### 四、小结

本文通过《不平等的童年》中“看医生”这一案例对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理解。中产阶级家庭和贫苦的工人阶级家庭面对事情是一致的，而做出的反应却千差万别，这与其生活经历和语言背景密不可分。随之，笔者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意义进行三个层面分析：首先，作为个体，通过对过往行为反思从中获得行动的意义，这些经历和意义构成以后行动的“手头库存知识”。其次，这个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每个人根据他人的动机和目标，通过互换视角和互换理解来经验对方的行动，从而理解对方的行动意义。最后，作为研究者，不但要遵循关联性假定和适当性假定，主动感知研究对象的行动的意义脉络，在一级构造的基础上建立二级构造，也要遵循逻辑一惯性假定和相容性假定，“悬置”自己的理论预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观察生活世界中成员以何种方式对其据以为真的事物和事件进行主观构建，避免对研究对象产生干扰。

“社会世界的科学论题都是针对一般的主观意义脉络去构建客观的意义脉络。”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是“意义诠释”，这也是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种独特方法，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把握对社会实在的意义。舒茨在研究肇始于韦伯的理解社会，试图构造一个关于社会行动的普遍的理论与方法，强调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强调了“社会认可的类型化与相关性的体系”的重要作用。正是透过这一体系，人们才赋予他们“生活世界”的意义。然而，舒茨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缺陷，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更注重对微观层面的社会行动的分析，无法说明自然而客观的社会结构问题，也无法处理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另外，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舒茨既强调了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是所有成员共同的世界，个人的行为及反应受到他人的影响，又强调个人的而历史经验对其行为的重要意义，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矛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主体间性的世界并不是在经验层面，而非行为的内容，是态度的形式。

#### 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舒茨，2001，《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2]阿尔弗雷德·舒茨，2012，《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3]安妮特·拉鲁，2009，《不平等的童年》，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4]孙飞宇，2013，《方法论与生活世界：舒茨主体间性理论再讨论》，《社会》第1期。

[5]杨善华, 1999,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青青,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白静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胡亮副教授参加第七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

2019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8 日, 第七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环境研究研究生院召开。主办单位为韩国环境社会学协会, 协办单位韩国环境研究所、首尔研究所、高阳市、国立首尔大学、阪神大学区域发展中心等。该论坛已经举办六届, 河海大学 2013 年承办了第四届,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东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社会行动: 迈向可持续的地球”, 来自中日韩以及澳大利亚、美国的学者约 80 人应邀与会,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阿江教授、胡亮副教授组团参会。

本次会议共分为“能源转型与政体”、“社区、抗逆力与灾害管理”、“环境政治与风险治理”、“跨境环境问题的环境社会学”、“人类世 (Anthropocene) 的自然”、“社区与环境运动”、“东亚能源转型的政治学”、“东亚的水资源政策”、“公地与可持续转型”、“公正转型与能源民主”、“环境意识与生态公民意识”、“气候变迁与社会行动”、“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能源技术”、“灾害与环境受害”、“重构食物”等分论坛, 以及“《巴黎协定》之后的气候行动和气候治理”、“环境社会学的东亚经验”等 2 个全体论坛。论坛仍旧主要聚焦于从东亚视角看复杂的社会-生态问题及可持续转型。此外, 10 月 28 日会议组织了一次学术考察 (field trip), 地点主要包括沿汉江生态公园、汉江森林湿地等。

会议期间, 陈阿江教授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代表中国环境社会学界介绍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同时, 陈阿江教授站在东亚视野的高度对中日韩三国的环境社会学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 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经验与方法, 对世界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胡亮副教授就华南海岸生态治理进行了案例分析, 其余中国学者介绍了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演变, 分享了中国在水生态治理等方面的相关经验。会议约定下一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 年于中国昆明举办。

# 社会权力控制的极致——疯癫与他的自我审判

孙 婷

---

**摘 要：**《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他勾勒了一幅关于疯癫文明的演变图。疯癫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是一种文化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内涵。疯癫究竟是什么，是启示、是罪恶、是疾病抑或是非理性，这不是由疯癫本身来决定的，而是由不同时期的权力运行机制来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古典之前，古典之际还是在古典之后，福柯关注的焦点始终只有一个——权力。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力运行机制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界定疯癫并决定疯癫的归宿，这便是疯癫的命运——成为被权力压迫的受害者。

**关键词：**福柯 疯癫 权力 理性

---

## 一、引言

米歇尔·福柯是 20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力图从社会历史中那些被定义为反常、越轨、变态的现象入手，运用他所擅长的考古学和系谱学，解析现代生活的症结。他的理论为当代社会学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受他思想观点的影响，人们认知问题的方式开始有了新的转变。《疯癫与文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他勾勒了一幅关于疯癫文明的演变图。疯癫与文明分别代表着理性与非理性，并且疯癫一直是被文明压制着的，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疯癫是对非理性的偏执坚持。那么什么是疯癫，什么是理性呢？人们对疯癫的认识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疯癫为何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呢？所有的这些问题，福柯都在这本书中了解答。

## 二、疯癫——权力的受害者

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疯子可以在大街上跑来跑去，这个时期人们可以去嘲笑他们，甚至去侮辱他们，即便是嘲笑和侮辱，也是人们和这些疯子之间的一种交流和对话。这个时期，疯子还没有被社会排斥与隔离。在福柯看来，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或是疯癫的，还没有形成一套清晰的、标准的体系去判断、去界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 17 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被视为一种梦幻、一种人本性的流露而得以自由地呼喊。”福柯在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时发现，这些文学作品通常将疯癫化为真理的象征，真理通常在疯人的疯人疯语中被揭发。“疯癫由此进入了一个道德的领域。”即理性与疯癫在时候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疯癫是理性的仪仗和随从。

到了古典时期，大禁闭开始了，“禁闭是 17 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它从一开始便获得一种重要意义，从而使它与中世纪的囚禁毫无关联。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社会防范措施，它是一项发明。然而，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这个时期疯癫成为了理性研究的对象。疯癫被完全排除在理性之外，而划归于非理性一类。“文明人”开始把自己身边的疯子关起来了，因为只有将他们隔离起来，与自己划分开，才可以显得自己是文明的、正常的。就好比说一个人要证明自己是干净整洁的，他就必须要找一个邋里邋遢的人做对比，在这种比照中，他的干净得体才得以显现。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俗并没有消失。相反，它继续发展，几乎成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有特色的制度。“米拉波 (Mirabeau) 在《一个英国人的游记》中报道，比塞特尔的疯人‘像稀有动物一样’展示给‘愿

意付一个硬币的大傻瓜’看。”“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理性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排他的过程，因为正是在与非理性的比照中，理性才能彰显自身。这些便是展览疯癫的意义所在。福柯表示理性要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它就必须找到非理性的存在。于是，一套由理性主导，关于疯癫的话语体系开始建立，并且不断地在发展。

近现代，精神病院来了。这个时期在西方科学史上，精神病医学已经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这意味着理性完全掌握了疯癫的话语权。这个时期，人们不再关注疯癫究竟是什么，而是如何要使疯癫回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里去。疯癫已经完全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否定，迎接他们的是象征人道主义的精神病院。疯癫的人除了在图尔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自始至终都没有给疯癫下一个明确定义。就是因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是一种文化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中，他认为是权力在操纵着社会文化知识的构造，知识不是不断累积的。在某个时期内权力根据自己的需要，构造有效的知识，让人们认识他、服从他。换了一个时期，知识结构就要开始转变，至于知识是否有效，是否具有真理并不重要。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知识就可以驱除宗教、迷信，获得真理。其实这只是知识的结构不断被重组、不断被构造，形成框定人的东西而已。疯癫究竟是什么，是启示、是罪恶、是疾病抑或是非理性，这不是由疯癫本身来决定的，而是由不同时期的权力运行机制来决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力运行机制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界定疯癫并决定疯癫的归宿。这便是疯癫的命运——成为被权力压迫的受害者。

### 三、疯癫的自我审判——权力控制的极致

“过去，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弓版给理性的权威。现在，它则受到审判，但不仅仅在它进入疯人院时为了识别、分类和使它从此变得清白而对它进行审判。它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疯癫是如何一步步被迫走向自我审判呢？书中的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首先，他被文明“识别”出来。于是，理性开始分类，他成了社会“异类”。最后为了让他消失，人们创造了一种运作机制，可以让他变得清白，在这种机制下，疯癫无法走出，只能陷入无限的自我审判中。承载这套运行机制的便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的规训机构——精神病院。

18 世纪末，图克创立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疯意被视为一种幼稚的状态。在这里，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变成成年人。疯癫永远处于被监视与审判之下。疯人必须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以免呈现疯癫的举动而成为理性目光的焦点。福柯在书里表明这类的精神病院，实际上是“象征资产阶级社会极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在这个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里，人们只承认一种合法的规范，疯人是病态的、不正常的，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外在的审判与约束，这是理性世界所规定的，疯人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皮内尔创立的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在这个小型的司法世界，神化的医务人员是世纪精神病院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在医生与病人之间，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平等的交流。权力赋予了他权威。他代表着理性，他是家长，同时也是法官。他们实施的道德治疗不再针对疯子的身体，看似人道，实际上则是更大的控制、征服和压迫。这种道德治疗的核心，在于建立疯子的自我克制，通过在疯人中设立镜子，不仅包括设置有形的镜子，使病人不断陷入自我对照的观察中，对自己的放肆言行产生羞愧；也包括设置作为观察和期待理性表现的无形的镜子，使病人屈服于医生，接受他像家长对待未成年子女那样的权威和惩罚，让病人意识到应当对自己的非理

性的一切表现予以克制，变成可期待的理性的模样。这种看似友善的对待和“治疗”，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了解放，而恰恰意味着他们被同化、被制服，和犯人一样，在这种强制过程中，疯人丧失了自我，陷入一场无休止的精神审判中。

这种审判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疯人不断地否定自我，不断受到内心谴责，不断为自己的过错而悔悟，相信自己需要治疗、需要接受医院设定的道德标准与制度管理，从而进一步维理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来巩固理性的绝对统治地位。现代社会权力控制的极致，就是让人无意识的陷入自我审判中。在福柯的另一本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他提到现代社会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当权力的触角变得足够柔软纤细时，我们会以为自己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时，权力的规训作用也发挥到了极致。在书中，他提到，理性化的规训艺术让社会力量在尽可能不受权力磨损的情况下发展，并且带来令人满意的效率。但是在规训艺术所建构的秩序里，我们随时暴露于全景监视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警察，我们每个人都为履行“义务”、遵守“道德”和承担“责任”而感到满意，殊不知这些“义务”、“道德”、“责任”是权力为我们精神世界上的一把永恒的枷锁，它可以让我们随时都陷入无尽的自我审判中。

#### 四、结语

学者陈皓认为，当福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对疯人的禁锢、压制时，他自己也并没有赞同古典时代以前的，把疯人言语看作智慧的那个时代，他客观的指出，疯癫只是理性的炫惑。按照福柯的理解，人真正的自由的实现不在于打碎外在的铁链，消除一切控制和压迫的权力关系，而在于人的自我觉醒。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并没有贬低理性的地位，他所揭示的恰恰是现代社会中自我的丧失、理性的丧失。陈皓认为，福柯所批判的理性，是那种以结构、分类作为全部认知方式的简单化的理性主义、技术化的理性主义；同样，福柯也深刻地揭示了理性知识背后的深层的权力因素，理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自人自觉、主动认知的成果，而是源于权威和偏见。然而，人不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数字，也不是各种器官的机械组合，福柯呼吁在劳动、生命和语言等人的具体存在中重新发现人，使人转向自我，以自身为目的，自觉的、自主的获得自我和世界的知识，真正成为自我的主宰。

#### 参考文献：

- [1]福柯，1999，《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3]公风华，《道德：理性专断的工具——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 第 1 期
- [4]田志娟，《被建构起来的文明史——读〈疯癫与文明〉》，《法制与社会》，2010 第 17 期
- [5]黄晖，《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法国研究》，2010 第 1 期
- [6]高继海，《〈古典时代疯狂史〉及与德里达的论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第 6 期
- [7]包亚明主编，1997，《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8]布莱恩·雷诺，2004，《福柯十讲》，韩泰伦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 作者简介：孙 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薛孟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海社会学经典读书会第三、四期顺利举行

2019年10月28日与12月30日，下午两点，河海社会学经典读书会第三期、四期分别在厚学楼401室与409室成功举办。

第三期读书会由沈洪成副教授作为引介人，并邀请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徐天宏，王雪以及硕士生王上青三位嘉宾作为评议人。读书会的四位报告人分别为刘明珠、李芊趣、张心仪和李懿。此次读书会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党支部主办，《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具体承办，本科生王岚茜主持。

读书会伊始，沈洪成老师为我们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希望我们静下心来阅读文本，取得收获。随后，沈洪成老师阐述了自己对于《自杀论》一书的见解：《自杀论》不仅仅是进行自杀这一单方面研究，而是试图利用经验研究来提取社会运行的潜在逻辑；此外，《自杀论》所研究的自杀现象虽远离常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自杀作为社会的另一面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去探究社会的另一面，就是在尝试完整的认知社会；最后，我们理所应当的就能发现人类当下文明发展的处境，拥有一种社会学的情怀。这三个层面被完整的统驭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之中，因此该书就拥有了相当的阅读价值。

第一位报告人是刘明珠，在关于《自杀论》序与导论和第一部分的讨论中，详实的列出和初步解读了涂尔干的主要观点，同时在关于涂尔干对于自杀动机的解释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最后表达了对于涂尔干的繁琐赘述的不理解。刘明珠认为，涂尔干在第一部分中对于自杀现象的解读，更多采取了一种排伪的态度，从而引出第二章。

评议人王上青认为涂尔干运用统计数据，试图将自杀从心理学领域拔出，成为社会学问题，是理解第一部分最重要的关键。评议人徐天宏强调，我们在阅读和理解原著时，一定认识到作者身处的社会事实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在对过往典籍的怀疑当中，也要学会理解，发现与当下的逻辑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之处。评议人王雪认为课件和讲述中规中矩，然后仔细问答了刘明珠的关于忧郁、种族、自然因素和仿效等方面所产生的问题，认为涂尔干只是想要通过同一个材料来证明不同的观点，所以略显繁琐。沈洪成老师认为该书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繁琐之嫌，但其实质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写作中所蕴含的“证明”思路的一种表征。紧接着，沈洪成老师结合三位评议人的评述，认为涂尔干需要证明社会学的学科合法性，需要用一种立体的架构来描述自杀现象，所以文本中相对冗长的描述也就显得相当必要。

第二位报告人是李芊趣，所探讨的是《自杀论》与中国式自杀的比较。详细解释了《自杀论》中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失范型自杀的现象和成因，紧接着以宗教作为切入点，结合《浮生取义》解释了中国式自杀的特殊性。

评议人王上青认为在大家认识涂尔干如何拆分自杀类型的时候，需要去真正理解为何进行如此分类，而不是简单得到一个认知。评议人徐天宏认为能够将中国与西方自杀进行比较十分亮眼，提出如果报告人能够深入阐述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可以极大程度上用来审视涂尔干观点的普世性和科学性，所以没能深入便成为了遗憾。评议人王雪认为中国式自杀和《自杀论》中的观点没有一种断裂式的区分。沈洪成老师认为报告人提出的问题虽好但尚早，我们在读书时必须熟悉文本然后扩展到衍生文本，否则既无法深入理解原生文本，对衍生文本的理解也不会十分深入，甚至会产生误解。沈洪成老师认为涂尔干对于自杀的分类依据始终要放在特定的时空域中，对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以宗教为维度进行具体的区分，所以这也是涂尔干的理论不适用于描述中国式自杀的原因。

第三位评议人是张心仪。简单进行开场白之后，张心仪展示出数据图来引入涂尔干关于社会自杀根源的研究，然后表达了对于涂尔干将抑郁排除在外，以及对涂尔干使用行会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的怀疑。报告人结合实际，提出中国青少年自杀如何通过《自杀论》的角度来理解的问题。

评议人王上青首先回答了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她认为中国青少年自杀也是可以参考涂尔干的论点的，通过详细的解读，她希望同学们在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同时也要做到忠实于文本理解。评议人徐天宏希望报告人能够不仅仅局限于该书，而是要大量阅读该方面的论文等来扩展视野。随后，徐天宏指出只能通过抑郁这一表象与致郁的社会成因之间的关系解释自杀率的变动，而不能着眼在个体层面，才可以避免解释链条的断裂。评议人王雪对行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具体区分了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差别，解释了涂尔干推崇行会的宗教原因。沈洪成老师对张心仪的读书方式赞赏有加，认为这种“裂缝”式的读书方式非常有利于切入文本并提出问题。然后，对涂尔干推崇行会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涂尔干研究问题需要一个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组织来深解释；而不适用于中国的原因是，中国国家同构的政治体态导致了中间组织职能转移到国家，因此出现理论不匹配的情况。

第四位报告人是李懿。李懿对整个文本进行了一个概览式的总结，随后联系实际表达了自杀现象需要通过社会环境来理解的观点；最终，李懿的关注点立足在了涂尔干使用的共变法和具象化的操作手段之中，倡导大家学习使用。

评议人徐天宏率先发问，质疑了共变法的科学性，认为共变法实际上不能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运用在研究当中。沈洪成老师说明，涂尔干使用共变法作为研究方法受制于当时不完善的数据统计手段，所以使用共变法本身并没有问题。

四位报告人报告完毕后，沈洪成老师、三位评议人和全体同学进行了激烈的交流，抒发了各自的见解，加深了对《自杀论》，对涂尔干思想观点的理解。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读书会圆满成功。

第四期次读书会荣幸地邀请到王毅杰教授、张虎彪副教授和沈洪成副教授作为引入人；另外邀请到博士研究生杨兴鑫、段太香以及硕士研究生董越墨、夏小童作为本书评议人。读书会的四位报告人分别是龚宇、张震、郑添、张茜。此次读书会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党支部主办，《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具体承办，本科生王岚茜主持。



张虎彪副教授首先作了开篇演讲。张老师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是一部比较浅显易懂、贴近生活的作品。本书文学化的表达方式使得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感受到少许的艰涩之余，还能感受到几抹属于文学作品的亮色。随后，张老师详细的介绍了戈夫曼的生平，认为我们需要从戈夫曼的生活史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他的理论。此外，张虎彪老师结合本次读书会的举办形式对于本书中关键概念“表演”作了详细的解释。张虎彪老师对戈夫曼注重表演方式，而不是注重表演本身的想法表达认可；同时，张虎彪老师对于戈夫曼关于“表演”的概念作了双关，认为他对于米德理论的突破就是其对于表演的批判。

沈洪成老师认为本书与以往读书会的选书相比是更为简单的，但是却面临着好读、好懂但不好讲的情况。而这原因在于，从前我们都是注重于对宏观理论的理解，在阅读这本书时思维转化到理解日常生活的琐碎，仿佛社会学的意味产生了变化。充分理解这种变化则可以帮助我们仔细思考社会学的真正意义。随后，沈老师举例了鲁迅笔下“孔乙己”的形象以及《围城》一书引申开来，认为日常生活、文学作品和理论读物有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这样的精髓，用更完善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理论作品。

第一位汇报人龚宇首先简单介绍了戈夫曼的生平，认为戈夫曼的理论研究与其工作生涯是十分紧密的贴合的。随后，他详细的介绍了戈夫曼的前台理论，并列举了很多书中的前台具象化的表现。紧接着，他对于后台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后台是每一个人“藏污纳垢”的地方，可以展示一定的真实的自我，并且后台之下还会带有一定的前台印记。接下来，龚宇对印象管理进行了阐述，认为良性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有助于展现人的社会性，否则人便只剩下了自然性。最后，他引入了社会期待这个概念进一步加深对本书的理解，认为群体对于社会角色及其身份表达自己的期待就是导致角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龚宇提出了自己对于面对面普遍性解释框架、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和“面具交流”的意义的疑问。

第二位汇报人张震在一开始同样简要介绍了戈夫曼的生平。随后他梳理了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行文顺序，并对每一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其中重要的理论进行了整理。张震结合互联网互动模式，对于戈夫曼的理论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互动方式、观众来源和表演舞台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前台和后台在这样的巨变中界限愈来愈模糊，使得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最后张震对于舞台设置与个人前台、戏剧支配优势与导演支配优势两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在点评环节中，杨兴鑫认为第一组很有重点，不断举例表达自己对于本书理论的理解和展示自己对理论与生活的对话的尝试。同时，他认为汇报人尝试讲述了自己对于本书的理解，但是也可以尝试使用本书的逻辑来讲解，把控情景定义，所以讲解顺序有待加强。随后他对于“面具交流”问题进行了解释，认为可能是为了符合大众价值观和谋求相对应的待遇。第二组了解背景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缺乏对于本书的自我理解。段太香则认为从形式上来讲，第一组和第二组涉及的知识面都很广，而知识链接会增加知识的趣味性和可理解性。对于两位汇报人都牵涉到的互联网的时代背景，结合了自

己的理论理解，认为探讨同一个角色的变迁可以去理解到时代变迁的内容。而第二组的表演形式更强，具备更加完整的内容呈现。夏小童认为两位汇报人思维灵活，观点新颖；并且汇报流程也相当正规。在关于前台后台的界限问题上，她认为并不是前台后台的界限模糊，而是群体不同，我们对于前后台的定义也就相对不同。当然，她认为完全意义上的前台后台也是存在的，除了个人都是前台，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反差，认为只是角色在前台和后台间的位置转化所导致。评议人董越墨提出面对面的表演越来越少的观点，认为前台是社会化的自我，后台是完全的自我。后台对于前台的重要性在于，后台可以调节前台的压力，而当前的现状是前台对后台的压缩越来越严重，为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焦虑。

张虎彪老师对于汇报人龚宇提出的戈夫曼有没有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框架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解释到戈夫曼本人对于宏观理论的构建是存在批判的，但是后期自我的理论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矛盾。沈洪成老师简单讲解了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差异，认为对于经典的原著应该要细致的阐述内容，同时紧抓要点的方式也是需要的，在内容丰富的情况下就需要将表演更好的呈现出来。

第三位汇报人郑添首先详细介绍了作者戈夫曼、符号互动论和本书的主要内容。随后分版块介绍了情景定义、表演区域、印象管理。随后，郑添将“表演”置于现代生活，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举例了网红们的“精致”生活对于屏幕前和屏幕后的人群的影响。她提到窥视后台在现代生活中层出不穷，举了“狗仔队”“私生饭”两种群体作为例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最后，她认为过度表演和人设的不真实影响着表演者的真实生活，但良性的表演也可以提高服务的质量，有助于利益的交换。

第四位汇报人张茜，节选了《哈利波特》和《小时代》片段引入戈夫曼的剧场和前台理论。随后，对于不合格的表演者、追求主流价值、我们的普遍焦虑和冲动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紧接着以朋友圈为例详细解释了印象管理，最终建立起自己对于戈夫曼关于自我探讨的框架式的理解。

诸位评议人认为第三组的理解十分充分和扎实，但是生活参照过程中举得例子过于极端，不具备参照价值，同时缺乏自己对于理论的思考。第四组有和观众进行互动，亮点在于例子更加符合常规，也更加的生活化。此外，构成场域的基础，对表演造成威胁的表演崩溃也是重要一点。第三组的表现更加突出思维导图式的前台化的表演，第四组则突出体现自己本人在后台的理解。

最后，两位老师对于两位汇报人的汇报进行了总结。沈洪成老师认为郑添的汇报更加具有洞察力，可以在以后的学习中加以发扬；而张茜的汇报则更加细致入微，更加的多样化。张虎彪老师认为大家不能只看到戈夫曼的“表演”，认为现实生活中表演之余也需注重伦理道德，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边界；同样，表演背后所蕴含的制度规范、文化等也需受到关注。



## 2019 届硕士毕业 论文信息统计表

### 2019 届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信息统计表

(答辩时间: 2019 年 5 月)

| 序号 | 姓名  | 论文题目                                      | 指导老师 |
|----|-----|-------------------------------------------|------|
| 1  | 眭页娇 |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额贷款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 W 县为例            | 陈绍军  |
| 2  | 干蕾  | 水库移民征地补偿权益的性别差异研究——以 W 水库受影响村 Q 村为例       | 陈绍军  |
| 3  | 高巍  | 南京市青年群体艺术消费心态及支出研究                        | 石德生  |
| 4  | 胡盼盼 | “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行为逻辑研究——一个社区治理的个案分析            | 孙其昂  |
| 5  | 赖慧苏 | 被释压的乡镇政府及其自主性执行<br>——以 G 县河长制实施为例         | 陈涛   |
| 6  | 李叶  | 亲缘合作中的“过度依赖”与“互惠共赢”——以 H 村一家生姜代收的亲缘关系互动为例 | 沈毅   |
| 7  | 刘会聪 |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社会稳定风险研究——以“JN”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 施国庆  |
| 8  | 牛立霞 |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研究——基于冀南 T 村的考察            | 石德生  |
| 9  | 汪璇  | 从“抗争”到“退出”——丹村村民环境行为的演变                   | 陈阿江  |
| 10 | 王琪  | “搬”或“留”——贵州省 J 村易地扶贫搬迁参与主体策略研究            | 余文学  |
| 11 | 王秋涵 | 农村女性的基督教信仰何以成为可能——基于南京市六合区三个农村教会的田野调查     | 叶南客  |
| 12 | 王思雨 | 稻田面源污染治理中农户参与困境研究——基于皖南 W 村实地调研           | 朱秀杰  |
| 13 | 吴冰琪 | 水井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消解——以浙西 S 村的泉井为例                | 许佳君  |

|    |     |                                       |     |
|----|-----|---------------------------------------|-----|
| 14 | 吴秀梅 |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居民参与研究——以 N 市 Y 小区为例    | 朱秀杰 |
| 15 | 徐胜兰 | 鬼神之间：民间信仰的异变——皖南 Q 村母子坟信仰研究           | 许佳君 |
| 16 | 叶胜岚 | 政策影响下的村庄经济与环境——上溪村畜禽产业案例研究            | 陈涛  |
| 17 | 余庆洋 | 平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位职校班主任的日常工作研究            | 王毅杰 |
| 28 | 周雅静 | “香火”延续与第三代姓氏选择——基于南通地区“双独”家庭的个案调查     | 沈毅  |
| 19 | 朱文  | 高校教师子女教育中的报班行为研究——对 H 校教师群体的经验研究      | 毛绵逵 |
| 20 | 陈嘉星 | 以生蚝养殖为例的人海关系变迁研究                      | 胡亮  |
| 21 | 董鹏  | 央企基层组织治理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以 T 公司为例            | 王毅杰 |
| 22 | 韩立国 | 从拘谨到自由——农村妇女吸烟行为的个案研究                 | 顾金土 |
| 23 | 李梦华 | 城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四市为例       | 何志扬 |
| 24 | 卢舟  | 基层供销社经营模式变迁的社会学研究——基于皖南 M 镇供销社的生命历程考察 | 张虎彪 |
| 25 | 吕叶晨 | 县域内行政区划调整的动力机制与治理困境——Y 镇的实践案例         | 徐琴  |
| 26 | 任毅  | 公私转变：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空间产权的动态建构                | 陈绍军 |
| 27 | 袁宗梁 | 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入研究——以江苏省三市调查数据为例             | 何志扬 |
| 28 | 曾祥明 | “跑偏”：驻村第一书记的扶贫实践                      | 胡亮  |
| 29 | 朱杰  | 胜败转换中的农民环境诉讼维权研究——以 N 市一起污染纠纷案为例      | 顾金土 |

# 2019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信息统计表

(答辩时间: 2019 年 5 月)

| 序号 | 姓名  | 论文题目                                   | 指导老师 |
|----|-----|----------------------------------------|------|
| 1  | 高晓晴 | 城市低保尿毒症患者个案工作介入研究-以 T 市尿毒症患者申某为例       | 毛绵逵  |
| 2  | 李虹  | 临终关怀服务中志愿者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以项目中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为例   | 王毅杰  |
| 3  | 刘二妮 |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文化养老的社区社会工作介入——以南京市 X 社区为例     | 何志扬  |
| 4  | 罗霞  | 小组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以巢湖 CL 社区环保项目为例        | 陈绍军  |
| 5  | 宋昕  |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参与问题及介入研究——以南京市 X 安置区为例     | 顾金土  |
| 6  | 王璐  | 社会工作介入涉罪青少年帮教的个案研究                     | 胡亮   |
| 7  | 王琪  | 社会组织介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过程研究——以 N 市 A 社会组织为例    | 朱秀杰  |
| 8  | 王思涵 | 社会工作介入监护缺失儿童的研究——以 N 市 L 项目为例          | 毛绵逵  |
| 9  | 王婷婷 | 优抚社会工作实践的研究——以 N 市 M 社区为例              | 刘畅   |
| 10 | 王严威 |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能力障碍的社工介入研究——以“田野书舍”项目为例    | 张虎彪  |
| 11 | 王越  | 社区文化营造的社工介入研究——以姜家社区鸡头米文化活动为例          | 张虎彪  |
| 12 | 吴冬霞 | 自闭症儿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南京市 Y 项目为例        | 顾金土  |
| 13 | 吴玲  | 空巢老人精神慰藉的小组工作介入——以南京市 Q 社区为例           | 何志扬  |
| 14 | 许倩  | 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的运作模式研究——以 H 市 S 工疗站的实践为例   | 武艳华  |
| 15 | 闫芹  |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社工介入养老服务的探究——以 MCY 护理院为例      | 施国庆  |
| 16 | 杨欣婷 | 社区戒毒的个案工作介入——以 N 市 M 街道小 A 为例          | 朱秀杰  |
| 17 | 殷晓宇 | 叙事治疗模式在留守儿童厌学问题中的应用——以怀远县 LX 学校 S 儿童为例 | 沈洪成  |
| 18 | 尹胜楠 | 离异军人家庭儿童成长风险的个案研究                      | 顾金土  |
| 19 | 尹一帆 | 妇女参与农村社区环境治理的小组工作介入——以 CH 市 XJ 社区为例    | 陈绍军  |

|    |     |                                            |     |
|----|-----|--------------------------------------------|-----|
| 20 | 赵璐  | 拆迁安置社区妇女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意识的研究——以南京市 X 社区为例         | 沈洪成 |
| 21 | 赵杨丽 | 公益创投项目的供需错位研究——以 A 机构社区营造项目为例              | 毛绵逵 |
| 22 | 周玲  | 妇联扶持妇儿社会组织成长的实践探讨——以 X 市妇联妇儿社工公益项目为例       | 刘畅  |
| 23 | 周蒙雨 | 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儿童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南京市段女士个案为例         | 胡亮  |
| 24 | 时孜腾 | 城市边缘区流动人口居住环境需求研究                          | 陈阿江 |
| 25 | 宋元勋 |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研究                    | 陈绍军 |
| 26 | 杨国田 |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盐城市 S 社区为例             | 陈涛  |
| 27 | 周双磊 | 专业社工参与社会组织党建的路径研究                          | 孙其昂 |
| 28 | 鲍慧敏 | 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众筹的现状和问题——以“99 公益日”为例              | 王毅杰 |
| 29 | 陈姝竹 | 社工机构介入城市流动儿童中问题儿童的实践探索——以“流动花开 心情守候”项目为例   | 刘畅  |
| 30 | 程倩  | 优势视角下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实务探究——以南京市 Y 社区为例             | 顾金土 |
| 31 | 丁灿灿 | 社会工作视角下渔民养老困境及需求研究——以舟山市 H 岛为例             | 陈绍军 |
| 32 | 金明月 | 单亲家庭关系问题的社工干预研究——以 N 市 A 家庭为例              | 朱秀杰 |
| 33 | 李彩霞 | 赋权视角下随迁子女语言表达能力提升——以戏剧表演成长性小组为例            | 王毅杰 |
| 34 | 李思阳 | 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南京市 Y 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 严登才 |
| 35 | 刘奎钰 | 高龄空巢老人居家照顾的个案研究——以 N 市 X 社区 S 夫妇为例         | 顾金土 |
| 36 | 马紫艳 |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类家庭”养育的作用探讨——以某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 胡亮  |
| 37 | 秦思思 | 基于团体动力学的老年娱乐小组工作研究——以“乐在其中”社团为例            | 沈洪成 |
| 38 | 生悦  | 基层公益创投项目第三方评估工作机制的研究——基于 M 街道案例            | 张虎彪 |
| 39 | 宋玲  |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垃圾分类的研究——以上海市 W 社区绿色账户项目为例         | 张虎彪 |
| 40 | 田昕昕 | 半失能老人精神慰藉的个案社会工作介入——以 XH 项目为例              | 何志扬 |
| 41 | 欣未  | 留守儿童成长困境问题的个案工作介入——以 L 学校 W 儿童为例           | 沈洪成 |
| 42 | 刘洪利 | 小学高年级儿童科学意识培养的小组介入研究——以 S 社区“创翼未来”科学活动小组为例 | 石德生 |
| 43 | 黄仲桥 | 失独老人人际交往障碍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武汉市汉阳区 S 社区为例        | 秦贤宏 |







